傳播研究與實踐

科技部TSSCI期刊

第11卷 第2期 2021 年7月

專題論壇／傳播來時路：兩岸三地的新聞教育

導言：兩岸新聞傳播教育——不同的創新理念與實踐方向／蘇鑰機、羅文輝

專題論文

新聞教育在臺灣的轉變：政治大學新聞學系的發展與省思／蘇蘅

翠谷的傳播教育：「世新模式」探索／游梓翔、温偉群

「學科化」與「中國化」：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傳播研究與教育史／劉海龍、秦藝丹、段世昌

困境、變革與反思：數位匯流下新聞教育的案例研究／馬耀祖

特邀論文

復旦師生的「好學」與「力行」：新聞傳播學的中國經驗／李良榮、周玉橋

術道之衡與範式轉移——香港浸會大學傳媒教育個案／陳璁、黃煜

如果沒有了你：新聞傳播教育的新局面與舊挑戰／汪琪

政大新聞教育與我的報業生涯／黃清龍

研究論文

陸生在臺之網路使用行為及其趨勢研究／單文婷、朱灼文

研究紀要

公民科學與創客運動：空氣盒子計畫的案例探討／曾靖越

JCRP 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世新大學 舍我 紀念館

Ainosco Press

主　　編

夏春祥／世新大學口語傳播暨社群媒體學系教授

副 主 編

蔡　珮／世新大學廣播電視電影學系副教授

編輯委員（依姓氏筆劃）

王孝勇／靜宜大學大眾傳播學系教授
林富美／世新大學傳播管理學系教授
林照真／國立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教授
林鴻亦／輔仁大學新聞傳播學系副教授
胡元輝／國立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
胡幼偉／文化大學新聞學系教授
施琮仁／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副教授
陳炳宏／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教授

編輯顧問

李金銓／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玉山學者
周成蔭／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館長兼美國杜克大學亞洲中東研究學系實踐副教授與故事實驗室負責人
邱皓政／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管理學系教授
林靜伶／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教授
胡智鋒／中國北京電影學院教授
唐海江／中國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教授
高　鋼／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
郭良文／中國上海交通大學媒體與傳播學院教授
郭振羽／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教授
陳國明／美國羅德島大學傳播學系教授
陳憶寧／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教授
張惠晶／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奧爾巴尼分校榮譽學院教授
張錦華／國立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教授
張讚國／國立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教授
黃清龍／臺北市信民兩岸研究協會理事長、《中國時報》前發行人兼總編輯
黃鈴媚／世新大學口語傳播暨社群媒體學系教授
黃懿慧／香港城市大學傳播與媒體講座教授
程曼麗／中國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鍾振昇／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傳播學系教授
劉新儀／美國德州聖道大學傳播藝術系教授

英文編輯

張明傑／傑作翻譯工作室

執行編輯

徐暄淯／世新大學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助理教授
江信昱／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助理教授

編輯助理

鐘育騏／世新大學口語傳播暨社群媒體學系碩士生

Editor

Hsia, Chun-Hsiang / Department of Speech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Media, Shih Hsin University, Taiwan
Address: No. 1, Ln. 17, Sec. 1, Muzha Rd., Wenshan Dist., Taipei City 116, Taiwan
Tel: +886-2-22368225 ext. 83170
Fax: +886-2-22360278
Email: chhsia@mail.shu.edu.tw

Associate Editor

Tsai, Pei / Departmant of Radio, Television and Flim, Shih Hsin University, Taiwan

Editorial Board

Chen, Ping-Hung /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wan
Hu, Yu-Wei /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Taiwan
Hu, Yuan-Huei /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Taiwan
Lin, Chao-Chen /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wan
Lin, Fu-Mei / Shih Hsin University, Taiwan
Lin, Hong-Yi /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Taiwan
Shih, Tsung-Jen /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wan
Wang, Hsiao-Yung / Providence University, Taiwan

Advisory Board

Chang, Chin-Hwa /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wan
Chang Hui-Ching / University at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USA
Chang, Tsan-Kuo /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Taiwan
Chen, Guo-Ming / University of Rhode Island, USA
Chen, Yi-Ning /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wan
Cheng, Man-Li / Peking University, China
Chiou, Haw-Jeng /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wan
Chow, Cheng-Yin / Shih Hsin University, Taiwan; Duke University, USA
Chung, Jensen / 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 USA
Gao, Gang /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China
Hu, Zhi-Feng / Beijing Film Academy, China
Huang, Ching-Lung / Taipei Trust in Democracy Association, Taiwan
Huang, Christine Yi-Hui /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Huang, Lin-Mei / Shih Hsin University, Taiwan
Kuo, Chen-Yu /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ingapore
Kuo, Liang-Wen /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China
Lee, Chin-Chuan /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wan
Lin, Jing-Ling /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Taiwan
Liu, Hsin-I / University of the Incarnate Word, Texas, USA
Tang, Haijiang /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ina

English Editor

Chang, Ming-Jay / Jay's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Executive Editor

Hsu, Hsuan-Yu / Shih Hsin University, Taiwan
Jiang, Xin-Yu / Shih Hsin University, Taiwan

Editorial Assistant

Chung, Yu-Chi / Shih Hsin University, Taiwan

傳播研究與實踐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第 11 卷 第 2 期　**2021** 年 **7** 月

JCRP
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舍我紀念館
Cheng She-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Ainosco Press

編者的話

刊物準備出版，已是新冠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在全球蔓延接近兩年之際；全球近兩億人口染疫（177,040,182/ 0616），死亡總數逼近四百萬人（3,832,997/ 0616）。而在 2021 年五月初諾富特華航桃園機場飯店事件之後，臺灣這塊土地也開始面臨著特別的處境轉換；從境外移入到社區感染、從自由進出到三級警戒、從援助口罩到缺乏疫苗，從世界抗疫模範生到全球解封末段班。此時，全臺每日確診數已累計破萬（13,587/ 0616），死亡更近五百人（497/ 0616），唯疫苗接種仍未超過 5%，這使得全面停擺的壓力一直都在。“Taiwan can help, and Taiwan is helping!” 言猶在耳，但頓時間，“Taiwan needs help” 卻浮上公民心中。原因不外其他，在於臺灣獨特的生存脈絡，需要更多在異質個體間的公平互動、透明溝通，與更成熟的社會文化，不管是對內與向外，才得以面對與克服那因為防疫破口而來的人為傷害。

文化需要經營與深化，本期專題「傳播來時路：兩岸三地的新聞教育」（The Road of Communication We’ve Traveled: Journalism Education in Taiwan,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除延續上期論壇對於知識生產建制化的關注之餘，更關注我們「傳播」知識生產源起的新聞教育，曾經累積出怎麼樣的觀察視角與文化，而在今日數位化的時代中，我們又要留下甚麼東西來「傳播」以作為未來發展的基礎。一語雙關，「傳播」既作為名詞，又是動詞，傳播學的未來走向自是我們念茲在茲者；但路走遠了，唯恐歧路亡羊，因此我們希望對過往發展歷程進行有意識的檢視與討論，甚且讓相關訊息廣為周知且有聚焦討論平臺，這就是「傳播來時路」的具體主張。

這一專題的醞釀最早是由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蘇鑰機教授，以及香港浸會大學新聞學系客座教授羅文輝於 2018 年中旬提出建議，希望本刊籌組專題，記錄新聞教育創立過程中一些將被遺忘，或愈來愈難以說清、辨明的事情。2019 年，我們開始接觸、協商且徵詢兩岸四地多校同學、教師與研究員，並於年底撰寫「建制與發展：華人地區新聞傳播學院歷史回顧」的專題徵稿說明。翌年（2020）一月公開徵稿、歡迎各校與關注此議題者以學術探究的方式自由參與，一方面說明系所建制化的過往細節，另一方面也凸顯學院科系的今日現況，並由兩位擔任客座主編。今（2021）年 1 月，我們刊登了四篇文章用以說明「華人傳播教育建制化」，分別討論香港中文大學、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臺灣世新大學新聞系與南華大學傳播學系的相關教育及其變革，11 卷 1 期的〈導言：國際本

土結合、創新改革並行〉記錄了這一步驟的具體內涵。

本期期刊再度組成專題，繼續將臺灣政治大學、世新大學、銘傳大學、上海復旦大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香港浸會大學等六校新聞教育發展過往的相關文章刊出。在這兩期十篇文章中，共有七篇文章通過雙匿名審查程序，三篇則為特邀論文，藉以使得新聞教育到傳播教育的整個變化歷程可被掌握與檢視，也提供關心此領域者在面對今日數位挑戰、戮力於課程變革以滿足學生期待的同時，有個跨地域、跨文化、跨社群的多方比較視野可以醞釀與關照。關於這些文章的介紹與討論，可在後面客座主編的〈導言：兩岸新聞傳播教育——不同的創新理念與實踐方向〉中觸及，此處不再贅言。而從傳播研究的學門現實出發，很多系所遺珠未被觸及，事實上也難逐一介紹、全部網羅，但期刊之所以願意規劃、落實，與刊登這一系列或是特邀、或是投稿的學術論文，實是因為作者們在書寫論述中的嚴肅性（seriousness），雖然每篇各有關注，核心關懷卻始終如一：大學教育何去何從？他如何面對政治、經濟與文化力量的介入與變化？他又如何看待孕育自身的民眾與社會呢？特別是新聞傳播躋身高等教育殿堂之後，他所聚焦的傳播媒介又成了現今時代的核心樞紐，從新聞到資訊，從圖像到藝術、從生存到連結、從市場到文化，不一而足；那麼，以新聞傳播之名面向青年，處於所在社會、華夏文明、古老亞洲，以致於國際秩序等條件輻輳下，我們高等教育該傳承下甚麼樣的堅持與觀點呢？

在這些記錄各地華人新聞教育的發展過程中，與廣義政治權力的協調（包括了共商與對抗等）成了一個亙古永恆的軸線，層級、策略或有差異，例如國際化與在地化、專業化與通識化等，臺灣公、私立院校的傳播院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黃金輝傳播與訊息學院，與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的發展都是典型，其中由復旦大學於 2013 年發展出來，現已普遍推廣於大陸高等院校的「部校共建」模式，則是在人文研究中極為戒慎的權力共謀作法，即由政治力量協調各種社會資源與學術力量共同發展，這與研究主體性之間的辯證關係，也在這些介紹之中，成為一個亟待討論的議題，並等待更多關注者的檢視。第二條主旋律則是如何將西方知識本土化，使其與社會、文化與政治等相應，這也是兩岸四地華人社會傳播教育的當務之急，只是在這條路徑上，全球秩序的政商力量與產業經濟的市場力量又構成一股極大的驅力，使得專業訓練隨時向滿足業界需求挪移，繼而遺忘了義大利修辭學者維科（Giovanni Battista Vico, 1668–1744）在 17、18 世紀便已揭示的高等教育人文精神，及其對批判（critica）的反思；但也是在此，讀者們可看到了建制化的不同發展路徑，如香港中大新傳學院的「系友化」等，而在臺灣，如以專長分類的學程制、強調博雅精神的大一大二不分系作

法，以及在實驗不同作法並嘗試做出整合、提出新概念的臺灣政治大學、世新大學、銘傳大學，與南華大學等。

而為了讓這期專題論壇中的六篇文章產生更多對話與交流，我們特別邀請了熟悉兩岸四地新聞傳播教育的資深學者汪琪教授，以及前《中國時報》總編輯黃清龍分別代表學術界與實務界，對我們的論題（topica）與觀點作出回應。在〈如果沒有了你：新聞傳播教育的新局面與舊挑戰〉一文中，針對傳播科技的日新月異與傳統傳媒新聞產業的漸次落寞，兩岸四地不同學校在傳播教育上發展出各自的建制化作為以為因應；政大退休教授汪琪在瀏覽眾文後以自己三十年的研究生涯回首檢視，指出在「後大眾傳播時代」的新聞教育雖然輝煌不再，但一步一腳印，留下了珍貴且值得反覆咀嚼的發展經驗，因此她在文末意味深遠地寫道：「沒有我們，你還真不行」，將新聞教育的過往經驗視為是傳播教育再次拓荒的關鍵記憶，更特別的是她以 2021 年新聞傳播學門世界排名前幾名的歐美大學課程變革作為對照，提出了一個不卑不亢的變革註腳：高等學術的社會機制自有其存在意義。

而黃清龍〈政大新聞教育與我的報業生涯〉一文，主要對話的是蘇衡〈新聞教育在臺灣的轉變：政大新聞系的發展與省思〉的探討。他以個人作為政大新聞系畢業生的角度出發，檢視自己在《聯合報》、《首都早報》、《自立晚報》、《自立早報》、《中時晚報》、《中國時報》與《旺報》等不同媒體的工作經驗，以及前述三分之二媒體已經從市場上消失的滄海桑田，指出在政大新聞系就讀期間，對他後來實務經驗助益甚大的課程，其實是來自於徐佳士（1921–2015）描述為「集中選修」的一種建制化安排；而在他實務工作經驗中，媒體批判力量與傳播教育界對於產業關注有所偏誤的發展情況，或許是現在教育變革中值得注意的過往提醒：「唯有找出媒體產業的生路，媒體教育才有未來可言……。」在這樣的討論脈絡下，我們不禁想起此時此刻的傳媒環境；2020 年 11 月 18 日《中天新聞臺》被中華民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裁定不予換照，中斷了 1994 年 9 月 1 日開播以來在電視頻道上的運作，而在轉向新媒體形式之後，在文化治理與表達自由之間的一波新變化於焉開展。2021 年 5 月 17 日，曾經在 2003 年創刊時引入跟監、偷拍的狗仔文化、給臺灣報業帶來強烈震動的《蘋果日報》宣布紙本停刊，集中發展線上新聞網； 6 月 24 日，由黎智英於 1995 年創立的香港《蘋果日報》因特區政府凍結資產被迫停刊，終止 26 年業務。產業的發展總為政治力量桎梏……。

只是在策劃專題、閱讀大量文獻，也和作者持續溝通時，常可發現在不同歷史舞臺上的人物如何在這些史料記載中浮現集體的容貌（prosopography，或譯為

集體傳記、群像研究、集體人物傳記研究等），而為使讀者容易進入過往脈絡，因此嘗試在本專題文章中，均以紀元起訖的時間標示在人名之後，以便於讀者們進入到院系創辦的特定時空。我們邀請來回應上述十篇論文的資深教授汪琪，曾以自身在香港中文大學的客座經驗，協助政治大學新聞系落實「教授治系」的實際運作，這種建制化互動開展在個人與集體的辯證釐清之間，她也回憶起小時在金門街自家院子裡看見程滄波（1903–1990，原名中行，多以字行）如何穿著廣東人熟悉的無領唐裝、拿把扇子走進客廳與其父親汪公紀（1909–2000）相談閒聊，而在中國大陸討論「復旦學派」的論文中，可以看到時任中國國民黨中央機關報《中央日報》社長的他，如何在復旦大學重慶階段撐起新聞系的經營與發展，而也就是這個中行先生，在成舍我（1898–1991）來臺試圖辦報卻無法遂行之際，以復旦創辦人馬相伯（1840–1939）耳順之年辦學案例相勸，並同時擔任發起人，才讓他決定籌辦臺灣世新大學的前身—世界新聞職業學校，繼而成就了本期教育專題中的「世新模式」。在華人世界中新聞教育的發展歷程裏，不同的建制化路徑卻有著彼此關聯的層層相疊與核心議題。

在專題籌辦接近完成之際，知悉文化研究學者約翰．費斯克（John Fiske, 1939–2021）在美國因心臟病去世；在此，謹向這位啟發學界眾人對流行文化（popular culture）產生不同認識的研究大家致意，他在《媒介很重要》（*Media matters: Everyday culture and political change*, 1994）一書中的觀點，一直是我們在規劃面對數位匯流之傳播教育專題時的深刻信念。在書中，他描繪前現代的歐洲，每個人都有喉嚨，卻很少有人能夠在公共和政治生活中發言。也就是說，只有努力地經營、改變文化、賦權個人，才能解決技術普及與大眾化之後的關鍵問題。誠哉此言，斯人雖已逝，典型在夙昔！

除此外，本期刊物還刊登了兩篇分別放在「研究論文」與「研究紀要」的文章，分別是臺灣藝術大學廣播電視學系副教授單文婷，與中國文化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副教授朱灼文合著的〈陸生在臺之網路使用行為及其趨勢研究〉，以及臺北市立大學視覺藝術學系助理教授曾靖越撰寫的〈公民科學與創客運動：空氣盒子計畫的案例探討〉。由兩位學者合著、採取貫時性取徑（diachronic approach）的文章討論了一個日益稀少，過往卻是兩岸交流重要中介的在臺陸生群體，對於臺灣傳播環境的評估；上個月，英國新聞評論刊物《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 1843–）才剛發文指出臺灣海峽是全球最兵兇戰危之處（the most dangerous place on earth），這份論文說明了這種關係的現況為何，也提供了現象真實的不同觀點。一般總認為臺灣自由開放，沒有太多禁區，因此習慣「翻牆」的陸生應該會很快地適應此地環境，並在回大陸後會有著「曾經滄海難為水」的強烈感受，

但研究顯示陸生對臺灣傳播環境的評價不高，雖常經常使用 Google 搜尋，也在 YouTube 中娛樂，但「普遍表示臺灣新聞業在新媒體的技術水準相對大陸同業要落後」，且隨著兩岸關係變化，晚近訪談中陸生的戒心日益明顯，其所反應的在臺上網體驗也每況愈下。

後面一篇則是科學傳播領域的論文，主要介紹 2013 年發展於臺灣的「空氣盒子」計畫，如何在官方預算（中華民國行政院前瞻計畫）支持下，在全臺中小學布置站點及全球 40 個國家合作推廣的經驗歷程，以為民眾關注的空氣品質，提供一個大型環境感測系統；過程中，研究者揭示在科技變遷的社會脈絡中一種「公民科學」新興現象：創客運動的形成，及其與民主文化的關聯。一般而言，「公民科學」泛指民眾積極參與科學活動，並透過監測等方式進行數據收集與分析，藉此與科學家一同參與研究，因此它更適合做為一種民眾質疑事物的方法與態度，也是保護環境的一種有效作法，而創客運動則是藉由製作技藝與分享資訊，來孕育出民主社會中的在地文化。此文有系統地介紹了海量數據的價值，也闡述了在社群軟、硬體等數位工具下，臺灣民眾關於空氣汙染品質的接收情形與實踐反思。

期刊的出版已進入第 11 卷，當初籌辦時的構想提出者成露茜（1939–2010）還來不及親眼目睹，便已撒手遠去，但回歸期刊創辦本心，歷經多任主編辛苦創立、經營，以及新聞傳播學多位院長、舍我紀念館館長等的大力支持，為傳播社群的各種實踐留下可資辨識的足跡，一直是我們期刊不敢或忘的起點；現在回首益發珍貴，本期內容關注的實踐形式有新聞教育、社群媒體、團體溝通，以及科學傳播等。在規劃上，我們期刊一直採取類似日本將雜誌（magazine）與書籍（book）合在一起的「雜誌書」（mook）概念路徑，並藉由專題論壇的規劃來落實這種構想在學術期刊上的發展，但欠缺學界前例，也只能摸著石頭過河，期待各方的指正，而發展過程中的風雨均有四方友人相助共挺，再次致上真誠感謝。本刊近三年的退稿率均為七成上下（2018–2020），用以回應各界對期刊的殷殷期盼；2021 年，期刊再次獲得「110 年臺灣學術資源影響力獲獎名單」中的「期刊即時傳播獎」第一名及「期刊長期傳播獎」第四名，也與廣大讀者分享。

今年四月，積極參與刊物經營的編輯顧問、銘傳大學前院長倪炎元（1957–2021）因病過世，令人哀傷，數位編輯顧問也因退休、病痛、任職等各種原因請辭，我們因此新邀臺灣、美國與中國大陸等地學者們加入，共同攜手以繼續期刊發展的未來路程。而在耕耘許久，編務團隊再次更動，原副主編、舍我紀念館研究員黃順星卸任，他從執編做起，擔任副主編四年，前後共九年時間，感謝他長期以來的辛勤付出，新職則由本校廣播電視電影系蔡珮老師接手負責，執行編輯

則為世新大學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教師徐暄淯，以及資訊傳播學系的江信昱老師。自本期起，期刊編譯改由「傑作翻譯工作室」負責；原本編輯助理鐘育騏也在 6 月辭職，並由世新大學口語傳播暨社群媒體碩士班研究生林昱萱接任，7 月起，本刊首次獲得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學術期刊數位傳播」補助，將在經營紙本期刊之餘，全力發展期刊內容的數位資源配置，並聘請世新大學新聞系碩士班研究生陳聖盈擔任助理，希望提供作者、審查委員，與讀者們更便利的資訊與互動環境，是以為記。

夏春祥

2021 年 6 月 25 日

目　次

專題論壇／傳播來時路：兩岸三地的新聞教育

導言：兩岸新聞傳播教育——不同的創新理念與實踐方向／蘇鑰機、羅文輝　1

專題論文

新聞教育在臺灣的轉變：政治大學新聞學系的發展與省思／蘇蘅　5

翠谷的傳播教育：「世新模式」探索／游梓翔、温偉群　37

「學科化」與「中國化」：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傳播研究與教育史／劉海龍、秦藝丹、段世昌　67

困境、變革與反思：數位匯流下新聞教育的案例研究／馬耀祖　95

特邀論文

復旦師生的「好學」與「力行」：新聞傳播學的中國經驗／李良榮、周玉橋　131

術道之衡與範式轉移——香港浸會大學傳媒教育個案／陳璁、黃煜　153

如果沒有了你：新聞傳播教育的新局面與舊挑戰／汪琪　173

政大新聞教育與我的報業生涯／黃清龍　179

研究論文

陸生在臺之網路使用行為及其趨勢研究／單文婷、朱灼文　185

研究紀要

公民科學與創客運動：空氣盒子計畫的案例探討／曾靖越　221

Contents

FORUM OF SPECIAL TOPICS

The Road of Communication We've Traveled: Journalism Education in Taiwan,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Introduction: Cross-Strait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Different Innovative Ideas and Practice Directions / So, Clement York-Kee & Lo, Ven-Hwei 1

FEATURE RESEARCH ARTICL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Journalism Education in Taiwan: Reflec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at NCCU / Su, Herng 5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in the Green Valley: Exploring the Shih Hsin Model / Yu, Tzu-hsiang & Wen, Wei-Chun 37

"Disciplin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The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Education at th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a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 Liu, Hailong, Qin, Yidan, & Duan, Shichang 67

Predicament, Reform, and Reflection: A Case Study of Journalism Education in the Era of Digital Convergence / Ma, Yao-Tsu 95

INVITED ARTICLES

"Be Fond of Learning and Practice with Vigor" at Fudan University: Chinese Experience in the Discipline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 Li, Liang-Rong & Zhou, Yu-Qiao 131

From Balancing "Skills" and "Principles" to Paradigm Shift—A Case Study of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in Teaching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 Chen, Cong & Huang, Yu 153

Can We Do Without You: The Same Old Challenge of Journalism Education in a New Era / Wang, Georgette 173

The Journalism Education at NCCU and My Career as a Newspaper Journalist / Huang, Ching-Lung 179

RESEARCH ARTICLE

The Patterns and Trends of Internet Uses of Mainland Chinese Students in Taiwan / Shan, Wen-Ting & Chu, Cho-Wen 185

RESEARCH NOTE

Maker Movement and Citizen Science: The Case of the AirBox Project / Tseng, Ching-Yueh 221

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11 卷 第 2 期．頁 1-4．2021 年 7 月
DOI:10.6123/JCRP.202107_11(2).0001

導言：兩岸新聞傳播教育——不同的創新理念與實踐方向

蘇鑰機 *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羅文輝

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訪問教授

延續上期「華人傳播教育建制化」的討論，本期專題的焦點是「兩岸三地的新聞教育」。由於《傳播研究與實踐》主編夏春祥教授的支持和大力推動，這個有關大中華地區新聞傳播教育的專題才能排除各種困難，分兩期面世，也使討論的內容更充實，空間更廣寬。此外，我們也要感謝學刊編輯團隊的努力、不同院校老師的投稿、學者和業界朋友的評論。除了上期有關香港中文大學（簡稱中大）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簡稱南大）的文章，本期更有臺灣政治大學（簡稱政大）、臺灣世新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簡稱人大）、上海復旦大學、香港浸會大學（簡稱浸大）幾所著名新聞傳播院校的分析和討論。

政大新聞系的發展，凸顯了新聞教育在臺灣的轉變。從政大的個案，可以看出新聞傳播教育、社會政治及國家層面的關係。該系於 1934 年在大陸創立，並於 1950 年代在臺灣復系。到了 1960–1970 年代，經歷了多元發展期，將新聞教育擴展到廣播電視、廣告、公關等領域。1980–1990 年代，傳媒產業面臨變化，也影響政大新聞傳播教育的路向。千禧年後面對新聞業出現危機和科技洪流，於是推出數位傳播學程，並進行「大一大二不分系」改革。政大新聞教育不僅推動新聞專業發展，回應社會的需求，更鼓勵創新和實踐，以應對科技潮流的衝擊，努力迎接教與學的各種挑戰。

世新大學的傳播教育很有特色，提出了「世新模式」。知名報人成舍我於

* Email: clementso@cuhk.edu.hk

JCRP 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成舍我紀念館 Cheng Shu-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Ainosco Press

1956 年在臺北創辦「世界新聞職業學校」，經歷轉型及擴充，在 1997 年成為一所綜合型大學。它奉行的價值精神有四個方面：首先是以「世界主義」喚起民眾，主張報紙大眾化並培養相關人才；其二是「手腦並用」以帶動實踐；第三是「德智兼收」並堅守道德；最後是「我要說話」，用來提倡言論自由。這幾方面回應了傳播教育「三大斷裂」的挑戰。第一是「理論實務斷裂」，透過強調手腦並用以建立跨媒體內容融合的「全媒體」。第二是「口語媒體斷裂」，解決之道是設立口傳課程以凸顯「人與媒體並重」，推出「全傳播」教育。第三是「歸人過客斷裂」，把傳播學由人流稀少的十字路口變成「交會中心」，成就了不同學門的「全貫穿」。

人大新聞學院於 1955 年成立學系，是中國內地悠久的傳播教育機構，它的發展體現了「學科化」與「中國化」。受到社會和政治環境影響，傳播學到了 1990 年代才成為教育部認可的學科，此時又因市場經濟的發展，使傳播學有較大的生存空間。新媒體技術猛進，不單對社會有深遠影響，對傳播教育也是發展的契機。國際發表令學術水平提升，對中國的學術評審機制也有正面示範作用，學術刊物開始較為規範化和國際化。透過和政府合作，傳播學的正當性得到提升。之前傳播專業在政治上的身分未明，在 21 世紀新媒體的影響下，國家宣傳部認為傳播學可成為輿論治理的手段，使傳播學的發展超越了新聞學。這些外部政治和經濟因素，對新聞傳播教育產生很大作用，甚至比學科發展本身的邏輯更重要。如何在社會政經力量因素之外，在學術研究主體取得「學科化」的自身發展，是個可持續探討的議題。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是中國內地歷史非常悠久的院校，於 1929 年創立。它經歷了幾個時期，首先是 1930 年代基本成型，在戰爭中的 1930–1940 年代西遷重慶又東歸上海，之後在 1950 和 1960 年代因應社會和政治環境而有起伏，1970 年代至今則有長足發展。可見該校的新聞傳播教育同樣離不開所在社會的大環境，同時也受到新聞業和關鍵教師的影響。復旦新聞系的系銘是「好學力行」。「好學」的意思是學貫中西、博通古今、融會文理，希望師生有紮實的文史哲基礎，視野開闊和目光敏銳。「力行」則在於宣傳真理、改造社會，在實踐上有所作為。復旦新聞系曾經歷「三次超越」，包括超越對文學的依賴、超越政治話語、超越西方傳播學。它有四個實踐特色：配合國家政策以服務國家、創新人才培養新模式和理念、國際化水準高、緊跟學科前緣及重視跨學科合作。

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作為傳播教育的個案，重點是術與道的平衡和「範式轉移」。它以傳播技術革命作為背景，探討新聞傳播教育的「術道之衡」，及如

何回應社會環境的要求。「術」是指在 1968–1990 年間，浸會傳理學院以實踐先行方式，強調以術為先，並訂立「唯真為善」作院訓。由 1991–2014 年，則「以道統領」，務求「道術平衡」，強調理論先行。自 2015 年至今，在新科技環境主導下，強調要有新型知識並作「範式轉移」。跨學科的知識系統帶來課程改革，推動新聞傳播教育，同時要堅守傳播道德倫理傳統，及維持「唯真為善」。

本期專題另有馬耀祖博士的文章談及數位匯流。它是現今傳播生態的主流，影響着新聞傳播課程的變革，當中涉及新技術與匯流定義等不確定性因素。在探討困境、變革與反思過程中，作者透過訪問教師和學生意見調查，以瞭解他們的看法。文章探討宏觀的制度面包括師資教學、財務資源、課程配置，及微觀的互動面如學生態度、教學學習、跨領域範圍。文章也考慮媒體產業不同層級的影響，以及新技術出現的問題。個案分析了「大一大二不分系」的作法，瞭解教師和學生的評價，指出當中實踐的困難。有關數位匯流的議題，包括學門建制革新、未來新聞傳播人才培養、未來的新聞教學、範式轉移、傳播關鍵字詞變化等。文章指出，匯流教育要能夠打破傳統、顛覆性創新、打破舊有學科典範。

兩期的文章考察了七所院校的發展和努力方向。它們的歷史都相當悠久，經歷過不同時期的發展，相同之處是無可避免受到社會大環境的影響，而且各社會的情況差別頗大，所以經歷各異。其他的因素還包括各地新聞傳播業界的情況，及學科本身發展的路向。幾所院校各有特色，側重點自然不同。以它們的院訓或校訓為例，政大提倡「親愛精誠」，世新強調「德智兼修、手腦並用」，人大堅持「實事求是」，復旦遵從「好學力行」，浸大推舉「唯真為善」為座右銘，中大推崇「以人新、為人傳」的人文社關精神，南大則提出「自強不息、力求上進」。每所院校有其獨特的理念和實踐經驗，可說是它們的心血結晶。例如中大總結出「本地化」和「系友化」，南大着眼「國際化」，人大提出「學科化」。復旦則表示有「三個超越」，世新提出「全媒體、全傳播、全貫穿」，政大嘗試「大一大二不分系」，浸大則強調「術與道的平衡」。這些想法和經驗，不一定能簡單地搬到其他學校，但應該可以供大家作參考素材。

科技發展的影響及對新聞傳播教育的衝擊，可說是所有學院都在思考的主題。目前各院校需要探討如何進行數位教育，把相關科目納入課程當中。大家因應自己的傳統、特色和需求，各有不同的想法和作法，當中的思考值得大家互相借鏡。將來甚至可以透過另一專題，來探討科技發展對新聞教育的影響。

這兩期的專題文章，回顧了大中華地區新聞傳播教育的歷史發展、特色和經驗，縱向有歷史軌跡的描述，橫向有比較價值和意義。專題檢閱了一些有代表性

的院校，探討了一些重要議題，和未來大家要面對的挑戰。相信各位讀者看完這些文章，應有很多值得思考的相關議題，也希望這些論文對促進未來的教研工作有所助益。

專題主編 **蘇鑰機、羅文輝**

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11 卷 第 2 期．頁 5-36．2021 年 7 月
DOI:10.6123/JCRP.202107_11(2).0002

新聞教育在臺灣的轉變：政治大學新聞學系的發展與省思

蘇蘅 *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教授

摘要

新聞教育、新聞事業，與民主進程息息相關，本文探討臺灣新聞教育演變過程中，教育發展和國家、社會，與政治經濟的各種關係。1935 年創立於中國大陸南京市的政治大學新聞系，因而成為主要關注，其課程、師資和新聞學理論與實務之間的變化與歷史，作為具體分析的研究對象。也就是說，全文探討影響政大新聞教育形塑的環節、不同時期的教育理念、課程特色、學術取向，以及如何與為何轉向等問題。研究發現美國新聞教育深深影響政大新聞教育的發展主軸，也影響臺灣新聞教育發展；黨國資本邏輯雖然對教育理念和研究影響甚大，但政大新聞系仍持續追求教育主體性，並在媒體匯流環境下挑戰了新聞教育的專業取向，使新聞教育重新概念化並因應新的變局。

關鍵詞：政大新聞系、新聞教育、新聞、歷史

* Email: herngsu@nccu.edu.tw
投稿日期：2021 年 2 月 26 日
接受日期：2021 年 5 月 13 日

JCRP 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成舍我紀念館 Cheng Shu-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Ainosco Press

壹、緣起

2013 年，「世界新聞教育協會」（World Journalism Education Council）進行全球二千四百個新聞教育機構的學科調查，發現不同國家的新聞教育理念歧異很大。北美學者大多認為新聞是民主社會的支柱，但是阿富汗、盧安達等國卻因為文化、政治、地理條件不同，認為新聞教育和課程需要為該國政治服務，教育以宣傳為目的；其中區別不僅顯示背後有不同的意識形態支持不同教育規劃，不同學術環境也對新聞理論與實務的比重有不同看法，更延伸到發想於傳統媒體的新聞教育，在未來能否持續，如何改變，相當歧異 (Josephi, 2016, July 7)。

新聞教育成為大學教育一環以來，最主要的批評是太「西方中心主義」取向，指的是新聞教育在許多國家並未顧及文化異質性，也不管在地文化能否調適，卻將以民主為基礎的美式新聞模式，一味灌輸到其他國家，不考慮其他因地制宜的可能 (Tulloch, 2007)。

學者 Carey (2000, p. 16) 指出，美國最早的新聞教育從報人普立茲 1903 年推動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簡稱哥大）的新聞教育計畫來看，主要想把新聞人員變成紀律嚴明的工作者，並從哥大新聞學院新聞教育為基礎，逐漸建立新聞專業常規和以事實為基的客觀價值。另一所密蘇里大學（University of Missouri）新聞學院於 1908 年成立，一開始也以培養高品質的職業技能為取向（張咏、李金銓，2008）。兩所知名學府皆為美國早期把新聞專業人才訓練帶入大學教育奠定基礎 (Schlesinger, 1979)。

不過曾擔任馬里蘭大學（University of Maryland）新聞學院院長、美國新聞教育學會（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AEJMC）會長的 Kunkel (2003) 認為，新聞教育不是一種單一概念，而是包含不同新聞教育理念的光譜，從重視實務的哥大、密蘇里大學，到印第安納大學（Indiana University）、北卡羅來納大學（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的學理實務兼具，課程也不定於一尊，正因為媒介機構的新聞文化不盡相同，各校各有所長，開展多元的新聞教育。不過 Kunkel 也強調，「新聞教育」主要指「大學部的教育」，因為美國大學部的新聞教育有重視博雅和人文通識的傳統，才使新聞教育高品質的技能導向更貼近實務工作（同上引）。

Mensing (2010a) 指出，新聞教育長期以來屬產業中心（industry-centered）導向，尤其又以培育報紙媒介的新聞工作者為主軸，但近年均因新科技發展而有所變動，使全球的新聞教育課程和教學方法面臨類似挑戰。我們已知的「新聞」

概念正在重新定義，許多大學開始教授新世代的新聞採訪和數位媒體需要具備的科技和技能，且分科日益精細，像哥大新聞學院 2010 年成立「數位新聞中心」（Tow Center for Digital Journalism），研究數位新聞、平臺和數位出版，揭示新聞教育已經從傳統的技藝導向有所調整，更重視產業變化需要的新媒體知識和專業準備（同上引）。

Freeman & Shafer (2010) 比較多國新聞教育的發展指出，全球新聞教育確實長期受西方媒體模式（Western media model）影響，多以美國的「客觀典範」（objectivity paradigm）為馬首是瞻，甚至全盤接受美式新聞價值和倫理觀點，謹守中立和不偏不倚蒐集資訊與報導的信念，並相信這種理念放諸四海皆準（同上引，頁 141）。但 Gardeström (2017) 用場域裡的衝突競合觀點，主張新聞業和新聞教育之間有一種辯證關係產生的拉鋸，更導致 1950–2000 年間瑞典新聞教育的轉變。

Donsbach & Fiedler (2008) 認為即使用「西方」和「非西方」來區分新聞教育，都不應該太簡化的分類新聞教育；新聞教育仍然需要「在地化」，教育是一種和產業密切結合、與時俱進的知識體系；新聞教育也要不斷選擇調整，樹立學院嚴謹的要求，才能使學生在拿學位之外，將新聞視為長遠的職業。

本文探討臺灣「新聞教育」的發展脈絡，並以「政治大學新聞系」作為個案研究對象（以下將國立政治大學簡稱為政大）。為什麼在臺灣眾多新聞科系中，特別關注政大新聞系的發展？政大新聞系是最早在臺灣推動新聞教育、最早為新聞業培養人才的科系；而其發展過程，雖然移植於美國新聞教育的專業人才培育理念，但也受到當時社會情境的影響。舉例來看，1970 年代徐佳士擔任政大新聞系主任時，把純技術訓練的課程體系加入通識課程，開拓博雅教育的特色，增添新聞教育更多結合公共責任與專業認知的養分。隨著政大新聞系和其系內三個分支的新聞、廣告、廣電學系各自成長茁壯，政大於 1989 年設立傳播學院，成為臺灣第一所學、碩、博完整的新聞與傳播學院。又為因應新科技變化，新聞系於 2001 年分設「新聞與資訊學程」和「媒體與文化學程」，2008 年又分設「新聞編採學程」「網路及多媒體學程」「國際傳播學程」。研究表現上，政大新聞系和傳播學院的教師的研究相當國際化，使得學院在國際研究表現排名受益，2021 年成為臺灣同領域中的第一。由是，無論從高教變革、課程革新、研究表現，歷經何種困難和挑戰，哪些因素牽引政大新聞系的改變，均值得書寫和探討。

本文除了描繪政大新聞系的發展歷程，並分析不同時期教育機構和社會變遷的關係，勾勒發展過程中一些重要大事，探討學系走向和社會背景有何關聯。本

文資料來源除了歷史文獻、相關論文和教育評鑑資料，也憑藉個人在行政、教學工作上的參與觀察，和早期新聞系任教學者的訪談等。

貳、政大新聞系的創立與早期發展

政大中央政校時期（1929–1946），出任首屆新聞系主任的馬星野（1909–1991），為政大新聞系寫系歌，曾以「新聞記者責任重，立德立言更立功，燃起人心正義火，高鳴世界自由鐘」作為勉勵，這正是政大新聞系創設的理念和目標。

政大新聞系可以追溯到 1927 年國民政府配合訓政時期需要，在南京創立中央黨務學校，1929 年改名中央政治學校，並於 1934 年增設新聞學科，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決議，明令政校辦理新聞系（中華民國大眾傳播教育協會，1982，頁 5；國立政治大學校史編印委員會，1973），並於 9 月成立新聞系，由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學成歸國的馬星野主辦（朱立等人，2011）。

當時的新聞系屬於專修科，只需上課兩年。程天放（1899–1967）擔任專修科教務主任期間，認為新聞雖然有系，但是專修科只需修業兩年，培養專業人才，以應戰時的需要（張金鑑，1973，頁 67），不過程天放認為兩年專修教育不能因應人才培育需要，決定 1943 年停招，並在大學部增設新聞系。其時中央宣傳部副部長董顯光（1887–1971）正想培植高級新聞人才，國民黨中央決定在中央政治學校另設一個新聞學院，和新聞系雙軌並行（程天放，1973）。新聞學院於 1943 年成立，目的在「培育高級新聞人才，俾能領導及主持戰時宣傳及報導工作，期以博致國際的同情與支持，並鼓舞國人抗戰精神，瓦解敵人士氣」（張金鑑，1973，頁 67）。

由國民黨和中央宣傳部合辦新聞系，早年置於教育長之下。在「中央政治學校」時期，政大是黨校定位，專修科的學生上課六個月，以應戰時的需要（張金鑑，1973，頁 67）。由於副教務主任羅家倫（1897–1969）力爭，最後決定改為四年制的大學正規教育體系（羅家倫，1973）。1940 年進一步把研究部改制為研究所（顧毓秀，1973），奠定大學納入新聞教育的基礎。

大陸時期以擔負戰時宣傳和國際發聲為主的政大新聞教育，有何教育目標和課程規劃？著名報人、抗戰時期主持中央宣傳部的董顯光，1909 年赴密蘇里大學獲得新聞學士，1912 年進入哥大新聞學院，1913 年獲得新聞碩士，1937 年出掌宣傳部，為了營造中央政府的國際形象，爭取西方媒體對中國抗戰的支持。董顯光建議蔣介石應成立一個學校「以訓練懂美國新聞、會說英文的年輕人」，也

聯絡哥大新聞系主任 Carl W. Ackerman（1890–1970），討論如何在中國建立戰時新聞學 (Wang, 2011)。Ackerman 是董顯光的哥大同學，兩人攜手展開三年計畫。1943 年 10 月，哥大協助新聞學院展開第一期 32 名新手記者訓練，董顯光擔任主任，哥大新聞學院有三位教授到重慶，分別是 Rodney Gilbert、Richard Baker、Athony Dralle 和後來代替 Ackerman 的 Floyd D. Rodgers Jr. (Wang, 2011)。這幾位教授多有實務經驗，也把美國新聞自由理想主義的新聞專業帶到中國。Rodney Gilbert 於 1944–1946 年擔任過重慶中央政治新聞學院院長，為新聞記者出身，也是報紙專欄作家，中文流利，1912–1916 年曾到中國旅行，撰寫過系列專欄，戰時是國民黨及蔣介石的支持者，強烈反對共產黨。Athony Dralle 教新聞學，Richard Baker 曾任《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記者，負責宗教新聞。Floyd D. Rodgers Jr. 也是記者，在重慶教廣播。朱立（2010 年 11 月 1 日）回憶，政大新聞系在臺灣復系後，在重慶教學的 Richard Baker 還來臺教授「美國報業面臨的問題」與「新聞採訪寫作」兩門課，學生受益匪淺。

Ackerman 說，在哥大教授及宣傳部督導之下，重慶設立一個教育機構，名為「中國新聞研究院」，將遴選若干已在美的中國學生進入哥大新聞學院，準備戰後到亞洲各國從事新聞工作。該學院用英語授課，每年至少招收 25 名學生，須具大專學校畢業資格，有閱讀及寫作英文之能力（董顯光，1977，頁 251）。

當時的課程和師資是：教務長及新聞學教授一人，兼任新聞學原理與歷史、哲學之教師。新聞學助教若干人，任務為：一、講授採訪、編輯、報紙及雜誌特稿寫作。二、講授廣播寫作及廣播技術。三、講授新聞攝影及新聞圖片採集技術（董顯光，1977，頁 251）。三位美籍教授皆為記者出身，不但熱心協助抗戰時期中國的新聞教育，並帶來美國新聞自由理想主義的新聞專業。哥大教授負責新聞寫作與編輯，「中國政府結構與組織」、「三民主義」等政治必修課程則由本國教師擔任，合作持續到中日戰爭結束。

董顯光說，當時在美受到新聞學訓練的學生在中國不多，他想在重慶辦一所新聞研究院，想移植美國的「鼓勵獨立之報紙企業，將為中國政府之政策」（董顯光，1977，頁 252）。另一位美籍教授 Cross 在自傳說，戰時他曾擔任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即政大前身）的教授，當時幾位美籍教授沒有因為抗戰到中國服務得到特別待遇，美籍教授曾仔細討論在中國要教什麼，覺得教學生新聞自由演進的觀點非常重要，特別是美國的新聞自由；雖然服務的是黨校機構，但他們被賦予特殊地位，不需要為政黨傳聲筒服務，反而可以從美國角度發揮影響力 (Gauss, 1944, July 14)。不過當時政校新聞學院想和哥大新聞學院合辦新聞教育，

主要為了培養國際宣傳人才，雙方目的並不相合（馬星野，1973，頁 174）。

催生政大新聞系的馬星野（1009–1991），投注心力於創辦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以下簡稱中央政校）新聞教育，因應抗戰需要，中央政校還創辦半年制的新聞事業專修班甲組、一年制的新聞事業專修班乙組和兩年制的新聞專修班，主任由馬星野兼任。自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回國的馬星野深受密大影響，認為新聞記者應該具備多方面的條件：一、學識、技能、敏銳的新聞感和辨別是非的能力；二、良好的語文基礎，英文是必須的。好的國語文更是基本條件。三、新聞事業的專門技巧，包括編輯、採訪、速記、打字、撰寫社論等。此外新聞記者也需要具有社會科學的知識，比專業技能還重要（馬星野，1982，頁 12-13）。他也以密蘇里模式為師，把當時新聞系課程分配比率為社會科學五成，人文和文學二成五，新聞專業科目二成五（同上引，頁 5-6），他自己擔任新聞學及新聞史的專業課程授課。

馬星野是第一個由國立大學公費派往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國家培植使他感到有為國家主辦教育的責任，「雖然燕京、復旦、聖約翰都先辦有新聞系，但在國立大學辦新聞系，政校是創始」（馬星野，1982，頁 13），他對記者角色有著美式新聞的信念，「在民主政治中，建議政府，監督政府，收效最大，影響最鉅的也莫過於報紙」。中央政校新聞系自 1935 年創辦到 1949 年大陸淪陷，共辦理十一期。馬星野雖然把黨國和政府視為一體，但他仍對日後可能成為國民黨宣傳人員的學生灌輸新聞自由思想。曾念專修班的陸鏘（1919–2008）說：「他把在美國密蘇里新聞學院所學的新聞學理論，結合中國新聞事業的實際、傳授給我們，強調新聞道德和記者操守，使我們得益極深」（陸鏘，2004）。

從表 1 可知，政大新聞專修科（1941–1943）在戰時重慶時期的課程包括國際公法、政治學和中國通史、世界通史等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的訓練，也重視新聞專業實務課如採訪學、編輯學和新聞學概論，由中、美教授合力開設，不過「三民主義」這類國家主義意識形態的課程也在其中，當時的新聞教育是由知識分子和黨國結構共同操控、協力產出的文化事務。

表 1：抗戰時期政大新聞專修科課程

類別	科目
新聞專修科	三民主義、中國通史、法學通論、經濟學、國文、英文、新聞學概論、採訪學、世界通史、政治學、理則學、國際公法、編輯學

資料來源：宋仰高（1973，頁 308）。

參、在臺復系後不同階段的發展

一、重新起步與發展

國民政府遷臺後，最早由政工幹校（1951–1970）於 1951 年創設新聞組，政工幹校由時任總政治部主任蔣經國創辦，1956 年改成三專，1959 年改成大學新聞系。政大新聞系也於 1955 年復招，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系 1955 年開設新聞學組，國立藝術學校在 1955 年成立印刷藝術科，訓練平面出版專業。接著世新大學新聞系（1956 年）、文化大學新聞系（1989 年）、輔仁大學新聞傳播系（前身是大傳系新聞組於 1971 年成立，並於 1997 年改設新聞傳播系）陸續創立。

從 1955–1970 年代的十五年間，臺灣新聞教育陸續成立，都是臺灣培養新聞人才的重要學府（朱立等人，2011）。直到 1983 年以後，臺灣新聞教育陸續因為廣播、電視等大眾傳媒蓬勃發展，逐漸拓展成立大眾傳播相關科系。

政府遷臺初期，大學教育人事資源匱乏，當時政府以國家優先、一黨獨大的政治體制，鼓勵大學新聞教育創立；而隨著政經條件改變，學院教育自主性和現實需求產生拉鋸，環境變化也對教育和課程產生極大影響。本文擬分成三個階段探討政大新聞系在臺發展歷程：（一）在臺復系期：從政大新聞系 1955 年恢復招生起算，迄 1987 年解嚴前成立廣告系、1988 年設立廣播電視系為止。（二）多元發展期：從解嚴後到 2014 年政大傳播學院打破大學部和研究所內的新聞、廣電、廣告分野，進行大一大二不分系招生與課程的改革。（三）成熟應變期：2014 年起新聞系再度修改課程，調整結構，結合科技，出現轉變與創新。

（一）在臺復系期

政大 1954 年先恢復研究所，1955 年新聞系復招，開始由《新生報》社長謝然之兼系主任（孫曼蘋，1990，頁 16）。馬之驌在《新聞界三老兵》一書提到曾虛白、成舍我、馬星野三人為新聞教育在臺灣開創「現代新興之學科」（馬之驌，1986，頁 109），導入社會科學、人文學於新聞教育（同上引，頁 108）。1958 年政大成立學院，新聞系屬於文學院。

新聞系在臺復系，先後有曾虛白和謝然之擔任主管，時間較短。1960 年由畢業於政校專修班、留學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的王洪鈞接掌系務。一開始他曾公開說明政大新聞教育基本精神與大陸政校新聞教育時期或無二致（王洪鈞，

1993），但也逐漸發現，當時教育界、學術界與實務界對新聞教育的目標看法不一，需由教育界整理一套指導方針。王洪鈞 1961 年在全國新聞教育座談會中，舉出新聞教育四項內涵：1. 知識教育，為改變中的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的基本觀念和現象。2. 技能教育：培養實際作業能力，包括如何做（know how）及為何這麼做（know why）。3. 道德教育：準備從事新聞事業的道德信念及法律知識，養成正義感和責任心。4. 方法教育：周密的思想、獨立的判斷，迅速的採編、閱讀調查和表達的方法（同上引，頁 163-164）。當時教育部亦請政大新聞系修訂大學新聞系必修科目及學分，成為全臺八個新聞系的課程藍本（同上引，頁 171）。

王洪鈞重視人文社會科學基本知識，當時訂定通才教育學分為 84 個，占 64%，專業科目為 45 個，占 33%，大四分為編採、廣電、新聞英文、公共關係及廣告、報業管理及圖畫新聞六組。畢業學分為 142，成為全臺新聞教育的先河（請見表 2）。

不過真正為臺灣新聞教育帶來最大改變的是徐佳士，他的理念和實踐也為政大新聞系於 1960–1970 年間締造出「黃金時代」（陳啟彰，1990）。

早年政大新聞系和所行政分屬不同主管，不過王洪鈞 1967 年出任文化局長和曾虛白 1969 年從所長退休後，由徐佳士一人任兩職。他接任系主任之初，說明教育重點為：1. 專任師資增強。2. 課程改進：包括 (1) 加強語文訓練，實施小組教學；(2) 擴大知識基礎，社會科學列為必修；(3) 培養專門記者，每個學生必須集中選修一門「副科」，包括政治學類、法律學類、經濟學類、國際關係類及企業管理類，各類至少二十學分；徐佳士精簡新聞科目至全部學分的四分之一（徐

表 2：政大新聞系在臺復校時期的課程

課程類型	課程	學分
一般必修課	三民主義（4）、國文（8）、英文（8）、國際組織與國際現勢（2）、中國近代史（4）、哲學概論（4）、西洋通史（6）、普通心理學（6）、政治學（6）、經濟學（6）、法學緒論（4）	58
新聞系必修課	新聞學概論（4）、新聞採訪學（3）、新聞編輯學（3）、評論寫作（2）、新聞文學（2）、新聞英語（6）、新聞寫作（2）、中國報業史（2）、世界報業史（2）、報業行政（2）、報業經營與發行（2）、廣告學（2）、分類編輯學（2）、新聞法規（2）、廣播與電視（2）、通訊事業概論（2）、公共關係（2）、報刊實習（4）、業務實習（4）	50
新聞系選修課	中國近代報業研究（2）、民意測驗（2）、輿論學（2）、新聞心理學（2）、廣播業務（2）、新聞攝影（2）、新聞印刷（2）、新聞英語名著選讀（4）、新聞英語寫作與翻譯（4）	12

資料來源：謝然之（1982，頁 28-29）。

佳士，1982），創設「集中選修」制度「……規定學生在新聞系以外的政治、法律、經濟、國際關係和企業管理五系，任選其一修二十學分的課，目的是要讓學生及早確立方向，並將他們訓練成專業記者」（徐佳士，2005，頁 7）。1970 年代初期，臺灣僅有 6 所大專院校設立新聞傳播科系，課程多仿政大新聞系開設，表 3 顯示，1970–1973 年間，新聞系以新聞實務、人文和社會科學為主。徐佳士的集選制度具有博雅教育概念，使得師生視野開闊，知識與研究突飛猛進。

為了提升學術研究表現，徐佳士希望推動傳播學院設立，並說學院成立時，新聞研究所將改稱為「傳播研究所」，增設博士班也包括在未來發展方案。……政大新聞教育將進入一個新境界（徐佳士，1982，頁 93-99）。政大一再力圖改進新聞教育的結構，在新聞學系之外，增設廣播電視及廣告學系。可知徐佳士已開始推動新聞系向一個整合的「傳播學院」邁進。

徐佳士自承深受老師馬星野的影響，要在新聞實務教育加強學理和社會人文基礎。徐佳士曾說，（政大）雖然是黨校，但 1947 年政校改制為國立政治大學後，忠黨愛國的調性就降低了，政治立場變得不重要，老師也不會要求學生要忠黨愛國，反而朝自由主義的學術氣氛邁進，這種變化對學生的影響極大，特別是自由主義的新聞教育啟蒙許多新聞系學生（楊倩蓉，2012 年 10 月 25 日）；研究生

表 3：政大新聞系 1970–1973 年課程

學期／年	課程	時數
第一學年（同法政系）第一學期	融法律行政兩系於一，大一大二不分系，到大三才趨專門。黨義、國文、英文、政治學、經濟學、民法概論、中國通史	20 小時
第二學期（同法政系）	黨義、國文、英文、政治學、經濟學、民法概論、哲學概論、理則學	24 小時
第三學期	國文、英文、社會學、政治地理、中國外交史、西洋近代史、刑法、中國憲法、新聞學概論、新聞採訪	20 小時
第四學期	國文、英文、倫理學、社會心理學、政治地理、中國外交史、西洋近代史、刑法、中國憲法、新聞學概論、新聞採訪	26 小時
第五學期	新聞英語、西洋政治思想史、亞洲近代史、西洋外交史、比較政府、國際公法、日文、編輯、報業管理	25 小時
第六學期	新聞英語、西洋政治思想史、亞洲近代史、西洋外交史、比較政府、國際公法、日文、編輯、報業管理	25 小時
第七學期	日文、中國政治思想史、國際關係、英文名著選讀、新聞事業史、評論作法、議論文	21 小時
第八學期	日文、中國政治思想史、國際關係、英文名著選讀、專題研究、無線電、議論文	19 小時

資料來源：徐志明（1973，頁 194）。

論文主題不再侷限於歷史性的描述與新聞編寫或業務之探討，而擴及行為科學或社會科學的理論範圍，帶動臺灣傳播研究發展，爭取研究經費。1964–1986 年之間，臺灣所完成的 133 項研究中，有 116 項（87%）是政大新聞系、所教授完成（臧國仁、汪琪，1993 年 6 月）。徐佳士主政八年主要仍仿照美國，以培養應用型人才為目標，更結合教學和研究來發展新聞教育，拓展了以傳播理論與研究為主的多元教育，納入集中選修作為學生更加寬博完善的知識體系，更引進不同專長的師資，包括政治、經濟、國際關係、企管、社會及法律等學科，可由新聞系學生選修，成為臺灣新聞教育的轉捩點。

（二）多元發展期

新聞教育出現有助提升新聞專業水準 (Adam, 2001; Weibull & Asp, 1991)。1960–70 年代間，西方新聞環境急速變化，廣電媒體普及，新聞業成為不同媒介載體的共同內容，新聞教育此時認為應該擴大至整個人類傳播，且應培養能在複雜社會情境任職於不同媒體和廣告、公共關係的人才。由於這個轉變，許多大學的新聞系此時傾向減少新聞學色彩，轉而發展成立傳播學院或新聞與傳播學院。

在此大環境下，淡江大學 1982 年成立大眾傳播系，政大在 1983 年成立新聞系博士班，1987、88 年先後成立廣告系、廣播電視系，1989 年成立傳播學院。

1990 年代初期，威權體制的政治控制因解嚴而逐步鬆綁，新聞傳播教育更加蓬勃，並陸續依據不同媒體的人力需求增設廣播電視、傳播管理等學門，分科日益精細。1990 年代許多新大學創立，這些新大學和原有的大學為回應新聞傳播事業對專業人才的需求，陸續成立新聞傳播學系。國立臺灣大學在 1991 年開辦新聞研究所，國立交通大學同年成立傳播科技研究所。國立中正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在 1993 年、1997 年分別成立電訊傳播與傳播管理研究所，這段期間，大葉大學、長榮大學、元智大學、朝陽科技大學、銘傳大學、南華大學、國立臺南藝術學院、玄奘大學、樹德科技大學、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與實踐大學先後成立新聞傳播系所，到 2001 年臺灣 24 所大學設置 70 個新聞和傳播相關系所（朱立等人，2011）。此時學院受社會政治環境轉變的影響，批判政治經濟理論的書籍和論述，都將政治經濟學和批判理論掛連，對臺灣媒體環境持續提出批判，相關課題論述不斷進入新聞傳播學院，形成規模，更扮演解釋、分析和促成變遷的角色（馮建三，2003）。

1977 年底開始，先後有「中壢事件」及「美麗島事件」，[1] 民主運動人士開始在議會中爭取政治改革，言論自由是重要議題之一。學界開始受到兩方面重要影響：民權人士發行的政論刊物普遍流傳，源於歐洲也盛行於美國的批判理論進入臺灣，新聞傳播學者開始反映這種社會潮流。1980 年代，臺灣社會經濟鬆綁，促成政治自由化與民主化。

1980 年代，新聞媒體受市場力強烈影響，嘗試尋找新秩序，傳播學者開始討論媒體壟斷和記者工會等組織，挑戰對新聞自由的屏障，並言及提振專業精神可能發揮的作用（翁秀琪，1988，頁 285-304，1992；馮建三，1994）。社會出現工會組織、新聞記者協會的成立，[2] 許多媒體組織亦有以新聞學為藍本的新聞倫理公約、採訪手冊等自律機制。歷經戒嚴的新聞工作者多半以報導公共議題為己志，組織改而重視記者的專業自主，使得當時的新聞工作屬於薪資佳、福利優渥，且記者能藉由認真經營某一路線，取得同事與同業的認同及讚賞，經驗交織成的尊嚴與榮光，構成他們對新聞專業的想像（張文強，2015）。

政大新聞系早年以採寫編輯及實務技能為主（羅文輝等人，2004），可以更貼近業界實際工作，此時卻因專業訓練的教育理念很難契合商業化和市場化的發展，新聞教育已必須擴充創新知識版圖，轉向培養未來傳播領域的專業人才，使其教育理念和基本結構面臨極大挑戰。1988 年報禁解除，報紙發行迅速成長，解嚴後新的廣播電臺紛紛成立。2006 年立法院更通過法律，規定黨、政、軍退出媒體經營。媒體數量驟增，帶來許多工作機會，也是大學新聞傳播科系百花齊放的時代。

學者馮建三（1994）在〈從報業自動化與勞資關係反省傳播教育〉一文，談到 1982 年《聯合報》頭版出現國內第一個以電腦檢排的報紙以後，進入報業自動化的列車，截至 1994 年，從報紙編排自動化得到最大優勢媒體，不出《中國時報》與《聯合報》兩家大報系。但他主張未來傳播教育可以在課程納進工會意識的養成以及工會問題與歷史探討，讓未來學生熟悉追求工作自主所可能面臨的

1 中壢事件是 1977 年中華民國縣市長選舉中，桃園縣長選舉投票過程中作票，引起市民憤怒，群眾包圍警察局中壢分局、翻覆警車，最後放火燒毀警局，為戒嚴時期的重大事件。被認為是臺灣民眾第一次自發性地街頭抗議選舉舞弊事件（房慧真，2017 年 11 月 17 日）。美麗島事件又稱「高雄事件」，1979 年 12 月 10 日國際人權日時發生於高雄市。以美麗島雜誌社成員為核心的黨外運動人士（非國民黨籍），於 12 月 10 日組織群眾進行遊行及演講，訴求民主與自由，終結黨禁和戒嚴。引來激烈鎮壓，爆發警民衝突，逮捕涉案 156 人，被送軍事審判者有黃信介、施明德、林弘宣、林義雄、姚嘉文、呂秀蓮、張俊宏和陳菊八人（BBC NEWS，2019 年 12 月 10 日）。

2 臺灣新聞記者協會於 1995 年 3 月 29 日成立，成立宗旨為「爭取新聞自由、提升專業水準、保障新聞工作者獨立自主、落實新聞媒體為社會公器之責」。

處境。翁秀琪 1992 年出版《大眾傳播理論與實證》，於第 17 章納入「批判理論與文化研究對傳播研究的貢獻」，引入批判思維，力倡培養批判的能力，希望對在地傳播研究帶來新的反思。同一時期，受過密蘇里正統新聞教育的羅文輝陸續出版《無冕王的神話世界》（1994）、《精確新聞報導》（1997），並和香港中文大學陳韜文、潘忠黨、蘇鑰機等學者合著《變遷中的大陸、香港、臺灣新聞人員》（2004），堅守新聞專業教育和研究精神。政大新聞系教師此時在新聞教育的實務或學術有更開放的探討，希望讓學生受到的教育不是「產業導向，不夠學術」，而是具有創造性思維。

此時政大新聞系延攬許多在美國或歐陸著名學府獲得博士的教師。大量具有博士學位的教師加入新聞系，對於西方學理和研究方法的主流研究補充甚佳。此時新聞系專任老師人數約 15、16 位，除了新聞專業以外，還包括國際傳播、語意學、文化研究、批判理論、傳播心理學、科學傳播和傳播教育等。新聞加上傳播教育的規模日漸成熟，也可從不同視角再思新聞教育架構。

1980–1990 年代，傳播產業面臨自動化、商業化快速變化，從事新聞不再是新聞系唯一選擇，跨域學習的思維加深老師和學生對學科主體性的質疑。臧國仁（1998）提出來自各界及其他社會以及人文等領域學術界直指新聞傳播是「專業訓練」，而無「學術」成分的質疑，使新聞傳播學界產生領域正當性危機。陳國明也主張，由於系所競爭激烈，加上市場有限，以實用取向來吸引學生，冀求以速成的技藝傳遞幫助學生畢業後能輕易謀得餬口之職。如此造成一窩蜂往媒體相關方向跑的畸形發展，使整個傳播教育領域像技工訓練所（陳國明，2001）。實務為主的教育，缺點在學生所能獲取的工作位階與待遇較低，更由於缺乏思想性課程的薰陶，創造力與批判思考不如其他學生，潛力不易在工作上適當發揮，競爭力薄弱，升遷速度亦較遲緩（陳國明，1999）。

此一時期各大學紛紛成立新聞傳播系院，卻發展不同特色，例如輔大的新聞傳播系強調結合新聞與語文傳播、兼顧理論與實務、科技與人文。世新大學新聞系偏重傳統媒體實踐與批判研究；平面與廣電新聞課程豐富齊全，公共新聞學與社區傳播充分展現社會關懷。中正大學在傳播系納入新聞，以傳播基本技能及進階實作課程為基礎，學習新聞、資訊、影視、廣告、聲音等專業傳播領域知識，輔以社會人文、思辨、媒體素養等選修。重視跨媒體訓練，而政大課程一向強調理論和實踐並重，學術傾向也比其他院校明顯。但也保持因應社會和行業需要的傳承，大力拓展課程多樣性和種類。

政大新聞師生另一明顯特色是社會關懷和社會參與。1990 年代後期媒體私

有化政策成為主流，媒體產業加速朝向寡占競爭與集中化（陳炳宏，2001；瞿宛文、洪嘉瑜，2003，頁 51-96）。新聞傳播環境受市場的影響與日俱增，2002 年三家無線電視臺晚間娛樂新聞出現明顯「市場導向新聞」（張耀仁，2002）；2003 年香港《蘋果日報》在臺創辦，以完全市場邏輯為基的商業模式，使得原本力求恪守傳統專業意理的新聞媒體面臨複雜處境，一如歐美媒體受市場資本主義作為媒體編採政策指南，離 20 世紀初甫樹立的新聞專業與實踐愈來愈遠 (Mensing, 2010b)。

此時政大新聞系師生除了撰文批判外，也投入社會運動，形成督促媒體改造的力量。1999 年 6 月，由臺大教授賀德芬結合學術界、新聞實務界等人士發起組成臺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成員包含多位政大新聞系教授；馮建三並擔任第二屆董事長，網站提及成立目的是關心《壹傳媒》進入臺灣，媒體競爭與逐利行為展現在置入性行銷、政黨意識形態操弄與媒體內容羶色腥化等問題。亦投入傳播政策改革，如健全公廣集團制度。另一個公民團體於 2005 年成立，稱為「公民參與媒體改造聯盟」，主張衛星電視公會建立媒體自律（臺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n.d.）。「無線電視民主化聯盟」（簡稱「無盟」）亦於 2000 年成立，2003 年轉為「媒體改造學社」，以改造臺灣媒體結構、提升全民媒體素養、保障傳播從業人員工作權、健全本地傳播生態為宗旨，參加成員多位是政大新聞系的師生。

媒體改造團體的大聲疾呼，加上新聞專業和市場驅力如此糾結和矛盾，批判文化的思潮帶動媒體改革的社會運動，退報運動（1992–1994 年）、九〇一活動（1994 年）、地下電臺運動（1994–1996 年）、三退運動（1995 年）、公視正名運動（1993–1995 年），以及推動公集團電視運動（1999）風起雲湧（馮建三，2002），此階段也有系列媒體工作者與傳播教育問題的探索（馮建三，1994，2001a，2001b），締造新聞傳播學界參與社會的新猷。

（三）成熟應變期

進入數位時代，新聞業明顯轉變，媒體匯流趨勢出現，新聞工作受到科技演進不斷挑戰，加上傳送新聞給閱聽眾方式改變，在在顯示新聞學院數十年變化有限的教育模式需要大幅改革。早年新聞教育被認為只在服務報紙，後來因媒體形態改變，教育順勢增加廣電、廣告和公共關係的訓練，陸續又增加設計、媒體管理和各種寫作類型的課程，雖說新聞教育具有追求專業的目標，也必須訓練學生

未來進入媒體工作的技能，仍不能完全脫離「產業導向」（industry-oriented）模式 (Mensing, 2010a)。不過 Nerone (2013) 指出，2000 年初期，全球新聞業遇到社會、經濟、科技巨變，帶給新聞教育極大衝擊。新聞教育不斷向科技傾斜，無論在課程結構、形式、資源、學生技能準備，都自覺脆弱，希望更密切地與業界合作和交換知識 (Stark, 2019)。

20 世紀後半，仿效美國把課程分為人文、新聞傳播理論與社會科學三類的新聞教育，進入百花齊放的階段。此時無論是傳統的新聞學系，到傳播與科技學系、影像傳播、資訊傳播學系，都和從事新聞傳播工作有關。數位傳播的內容更逐漸變成近年新聞傳播教育的重點（朱立等人，2011）。

近二十年新聞業出現生存危機，年輕人不再覺得新聞工作有吸引力，新聞系甚至興起改名之議。2003 年 10 月，政大新聞系系務會議有更改系名以反映新聞產業萎縮、網路資訊崛起和社會傳播環境丕變之議，但調整組織名稱以標榜研究與教育內涵改弦更張之議，未獲多數支持（林元輝，2009，頁 282）。但課程結構勢必得因應數位科技發展而修改。

2001 年因應數位新聞取代傳統新聞之勢，政大新聞系把「數位傳播」學程改為「網路及多媒體學程」，「廣電新聞」學程併入「新聞編採」學程，總共三學程，每個學程各有 24 學分的必修課，重新以模組方式組合。2008 年起傳播學院進一步整合新聞系、廣電系、廣告系，共同實施研究所「學程制」，以達到教學資源共享與知識整合目標。實施學程制主要作法是調降必修課比例、放寬修課規定、擴張選課空間和彈性。大學部學生在大一時均修全院共同課程，並於大二開始修習本系專業課程。接著將分別從「新聞編採」、「網路及多媒體」以及「國際傳播」等三個專業學程進行進階研修。經過數年調整磨合，課程開課情形日趨穩定（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2008）。

表 4 顯示 2005–2007 年政大新聞系「新聞編採學程」的課程中，屬於平面媒體編寫課程共有 6 門仍為基本訓練，廣電新聞 3 門，視覺方面的新聞攝影課 2 門，專題研究共 6 門，多以平面寫作為主，但會探討社會各層面議題。另外在「網路及多媒體學程」中，有 6 門基本編採寫課程和「新聞編採學程」相同，也多了新媒體製作、電腦中介傳播和資訊設計等 5 門新課。新聞系此時課程的學程化和模組化走向，被學者稱為「自由主義新聞教育」，教育理念和實踐逐漸走向專業化，課程安排以「社會的多元性、媒介的獨立性和新聞自由的可欲性」為前提，希望能培養學生的批判能力和專業性（陳韜文等人，2003，頁 5）。另也涵納科技專業課程，數位傳播的專業教育也是近年重點。

表 4：2005–2007 年新聞系新聞編採學程修課學生人數及每班平均修課人數

模組名稱	科目名稱	開班數	94 學年度		95 學年度		96 學年度	
			修課學生	每班人數	修課學生	每班人數	修課學生	每班人數
基本課程	基礎採訪寫作	4	95	24	100	25	51	26.00
	基礎新聞編輯	4	87	22	89	22	46	11.00
	新聞編採實驗	2–6	178	30	199	33	65	16.25
進階編採	進階新聞報導與採訪	2–4	77	39	92	23	57	28.50
	進階新聞寫作	1	18	18	未開課	未開課	4	4.00
	進階新聞編輯	1–2	40	40	48	24	962 學期開課	
進階編採	進階廣電新聞採編	1	19	19	15	15	15	15.00
	廣電新聞專題研究	1	15	15	28	28	962 學期開課	
	廣電新聞深度報導	1	15	15	9	9	18	18.00
圖文整合	新聞攝影	1	22	22	19	19	28	28.00
	進階新聞攝影	1	22	22	12	12	962 學期開課	
專題研究	新聞倫理與個案研討	1	15	15	5	5	962 學期開課	
	分類版面編輯研究	1–2	29	13	16	16	962 學期開課	
	分類報導訊息研究	1–4	36	36	58	15	46	46.00
實驗模組	校外業務實習	2	68	34	70	35	962 學期開課	
	進階編採實務	2	12	6	13	7	18	18.00
	進階編採實務（二）	2	15	8	15	8	13	13.00

資料來源：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2008）。

政大傳播學院（簡稱傳院）接著進行大一、大二不分系，希望學生在大二以前，可以儘量認識傳播學院不同科系，到大三再選擇專業。新聞傳播課程除了傳統採寫編之外，更開設「新聞網站平臺運作實務」新課，有助學生準備進入數位新聞產製實務。2019 年政大新聞系在網站說明課程目標如下：

> 本系目前設有「新聞與資訊」、「媒體與文化」兩主修學程，學程設計的特色，是以前瞻性、未來性、與創新觀點設計課程。學生在大一二不分系，大二下學期則依照志願選擇分流。
>
> 「新聞與資訊」主修課程著重培養學生處理「紀實資訊」的能力。本主修區分為採訪編輯、影音產製、媒介敘事以及統整等模組，著重影像、圖像、文字、聲音在不同平臺上的採、編、播、出版的完整訓練。相較於社會上行銷當道的氛圍，本系更重視公共利益與社會關懷。

> 「媒體與文化」主修著重理論和研究方法訓練，培養學生從事批判思考能力。本主修區分為理論方法、區域研究、媒介敘事以及統整等模組。本系鼓勵學生根據興趣和性向，選擇適合自己的課程組合，並搭配輔系、雙修與自由選修制度，在大學四年中，自行規劃學業發展的機會。（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政大傳院〕，2019）

表 5 和圖 1 顯示新聞系在大一大二不分系之後的課程結構及必選修課的垂直和水平安排。可以看出傳院在基礎課和新聞系大三大四課程銜接不足，缺少新聞系專業基礎技能的訓練，因此廣告系在 2019 年已提案修改基礎先修課程。另外，新聞系開的選修課雖然多樣，但未必能因應外界新科技發展的新知識需要，2019 年兩個學程再次調整，補強新科技的課，但必修課程愈來愈少。

二、教育理念、實習和學術發展

政大新聞系具有培育實務人才的傳統，實習刊物和媒體實踐是教育重要的環節。1935 年，政大新聞系前身的實習刊物為《中外月刊》。1937 年，時值八年抗戰，大後方的新聞系學生在江西牯嶺辦《戰訊壁報》，僅剩的幾人到湘西，辦了半年的《芷江民報》。對日宣戰 4 年後，新聞系在南溫泉改辦新聞專修班與新聞專修科，當時實習刊物為《南泉新聞》。光復後，政治大學新聞系來臺辦學，1956 年發行《學生新聞》。1973 年，徐佳士與多位老師的企劃下，《學生新聞》改版為《柵美報導》，成為臺灣第一份登記有案、服務小眾的社區報紙。1991 年，《柵美》擴增並轉型為《大臺北報導》，1993 年改名為《大學報》，以大學社群和大學師生發生與關心的事為主要報導內容。數十年來，雖因時空、定位而更改刊名及內容，但作為新聞系輔助教學的實驗報立場，提供學生學習、反思之精神未曾改變。

配合實習媒體課程，目前傳播學院設有「資訊與媒體整合實驗中心」，下轄六大實驗室，其中「新聞實驗室」、「政大之生實習電臺」主要配合新聞、廣播的實驗設置，並提供平面出版、影棚、錄音器材、高中階攝影機、多媒體電腦、實驗用手機等硬軟體資源和設備供學生使用。新聞系的實習媒體《大學報》、網路媒體 Uonline 及影音新聞製作等，提供學生「做中學」。《大學報》原有平面報紙和網路報紙 Uonline，為集文字、影音、多媒體於一身的媒體平臺。2012 年因應數位匯流趨勢，停止印刷紙本，改以網路為主要出版平臺，強化影音新聞製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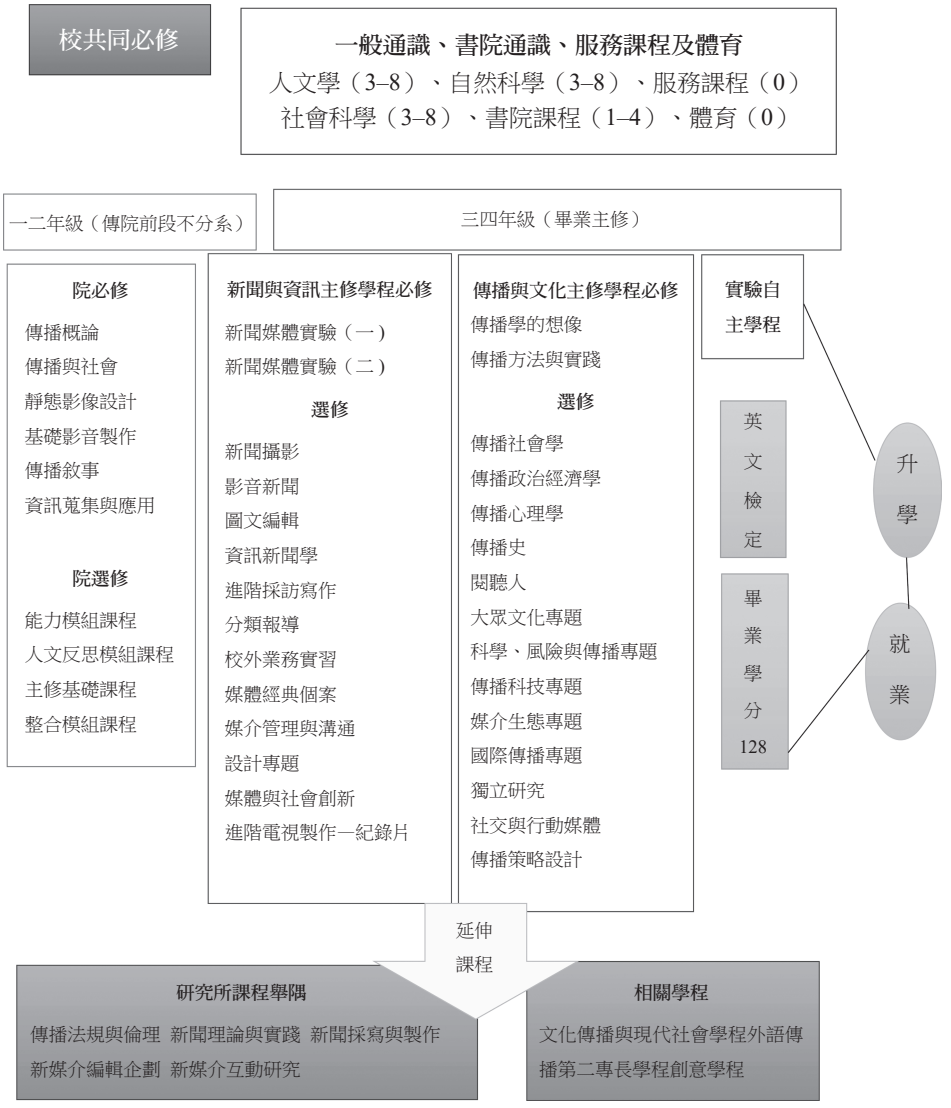
表 5：2019 年新聞系大三和大四的課程規劃

課名	必選修	學分
大三上學期		
新聞媒體實驗（一）	群	3
傳播學的想像	群	3
國際新聞報導實踐	選	3
飲食、傳播與文化	選	3
英文新聞編譯	選	3
國際傳播專題—區域傳播	選	3
進階採訪寫作—性別、階級、族群	選	3
大三下學期		
新聞媒體實驗（二）	群	3
傳播方法與實踐	群	3
大眾文化專題—電視文化	選	3
設計專題—說故事的方法	選	3
設計專題—隱喻與創意	選	3
新聞攝影	選	3
影音新聞—電視	選	3
國際新聞專題	選	3
大眾文化專題—離散媒體與外籍配偶	選	3
大四上學期		
數位化媒體：情境與策略實作	選	3
資料新聞學	選	3
進階影音新聞—深度報導	選	3
英文採訪寫作（107 學年度停開）	選	3
媒介管理與溝通	選	3
專業實習—機構實習	選	3
報導文學	選	3
設計專題—雜誌編輯	選	3
大四下學期		
社交與行動媒體	選	3
新聞網站平臺運作實務	選	3
媒體經典個案（107 學年度停開）	選	3
傳播政治經濟學	選	3
閱聽人分析	選	3

資料來源：政大傳院（2019）。

政大新聞系對臺灣新聞傳播研究也貢獻良多，系、所出版的《新聞學研究》於 1967 年 5 月 20 日創刊，1999 年改為季刊，每年 1、4、7、10 月出刊，為「臺

圖 1：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學士班）課程地圖——103 級起適用



灣社會科學引文索引核心期刊」（TSSCI）收錄的第一級期刊，是國際知名的 Scopus、DOAJ、CIOS 資料庫的索引期刊，也是臺灣最具影響力的新聞傳播學術期刊。在英文的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學術期刊中，雖然引用的文獻幾乎全部來自英文期刊，但是《新聞學研究》位列第 20（蘇鑰機等人，2013）。

除了專業學術期刊外，2008 年臺灣教育部實施頂尖大學計畫，新聞系教師

就提出以下的研究計畫，包括翁秀琪的新素養研究、蘇蘅的傳播倫理研究、汪琪的華人傳播研究群、羅文輝的跨國電視新聞計畫和電視新聞研究群、陳百齡的社會網絡研究群，和張寶芳的數位內容學程計畫，還有資科系的李蔡彥和廖文宏的新媒體研究群。可知當時配合數位化和科技化的趨勢，新聞系和傳播學院甚至和不同學院的科系已經提出不同範疇的新聞傳播研究。新聞系和傳播學院目前有五個研究群，皆為新聞傳播跨領域的研究群，包括華人傳播研究群、傳播倫理研究室、數位閱聽人研究群、新媒體研究群和社會網絡研究群。

在培育研究人才方面，新聞系很早即開始和美國夏威夷東西文化中心（East-West Center）建立學術合作關係，並進一步和設在新加坡的亞洲傳播研究與資訊中心（Asian Media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Centre）、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傳播系、美國波爾州立大學（Ball State University）新聞傳播學院等學術機構進行交流。新聞系和研究所也是國內新聞與大眾傳播領域師資養成的主要搖籃。大學院校新聞傳播科系專任教授，大多有新聞系、所畢業生任教，例如前臺灣大學新聞所所長張錦華、前臺灣師範大學副校長林東泰、社會教育學系陳雪雲；輔大大眾傳播學系有前系主任皇甫河旺、張文強等；中正大學有羅世宏、交通大學有張玉佩，文化大學有羅文坤；世新大學有蕭湘文、楊意菁、夏春祥，靜宜大學有陳韻如，還有香港浸會大學的羅文輝，和已退休的澳洲昆士蘭大學（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教授朱立，在各個大學見證不同輩分的傳承關係，有的是老師和學生，也有不同的歷史分期，持續培育後續新聞傳播人才成長茁壯。

肆、結論

回顧新聞專業的發展脈絡，隨著大眾傳媒普及，新聞工作先是一種特定職業，並在走向專業的道路徐徐推進。然而相較於醫學或法律，新聞學因知識系統不明確，範疇多元而難以界定，加上新聞教育向來對實務訓練重視，新聞教育始終在技藝（craft）和專業（profession）的模糊地帶。不過以新聞系發展歷程來看，相較於人文、社會等其他相關領域，新聞系應用性格較濃厚，因此與實務界之協合關係經常引發討論與爭議（鄭瑞城，1998）。《新聞學研究》於 1996 年推出專題「『新』傳播教育」。「編輯前言」簡述該期出版前幾年，美國有二十餘個大學因預算減少而考慮或根本已經裁撤或合併了新聞系；東京大學的新聞研究所也早已更名為「社會情報研究所」，專題主編陳世敏教授因此提出一個問題：「傳播學應該如何提高學術地位，以加強它在大學校園的正當性？」（林照真，2017

年 6 月；馮建三，2006，頁 8）。這個問題之後也獲得 Reese (1999) 的呼應。

Reese (1999) 強調，新聞教育場域中，新聞教育不應只提供職業訓練，應該思考學與術的關聯，進而整合兩者，發展一有脈絡的新的新聞教育體系。世新大學前傳院院長成露茜也指出，「任何大學的新聞傳播教育機構如果不教專業技術就不配做一個傳播教育機構，但是如果只教技術，它不配做一個大學的機構。新聞教育必須培養不僅有新聞專業技術的人，這些人必需能對他們的專業有檢討、反思、批判、分析和行動力」（轉引自管中祥，2017 年 11 月 17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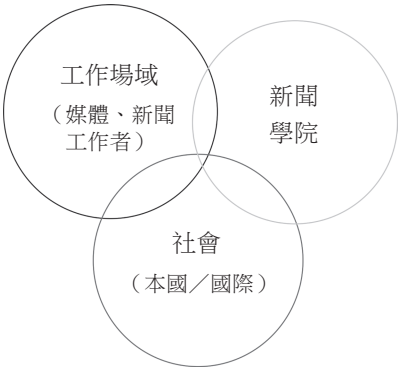
回顧政大新聞系發展歷程，歷經黨國專政時期的創立，開授了基本新聞專業課程及實習課，創系的馬星野到後來的徐佳士並未忘記美國新聞教育的專業和獨立自主理念，新聞教育固然和當時的社會環境與結構關係密切，但是個體仍可在某時刻發揮關鍵影響，足以扭轉歷史進程和教育發展的方向 (Archer, 2003)。

不過當數位傳播的內容逐漸變成近年新聞傳播教育的重點後，年輕人不再覺得新聞工作有吸引力，新聞教育需要重新整合，要多管齊下，才能解決當前迫切的問題。張曉等人（2015）從比較的觀點探討新聞系學生從事新聞業職業選擇，發現這已是海峽兩岸三地共同現象。潘乃欣（2017）探討為何新聞系學生畢業後願意投身新聞職業的愈來愈少，檢討新聞教育是否反而對學生的新聞從業意願造成負面影響。隨著電視媒體的普及和聲光的吸引力，以報紙為學習情境的政大新聞系開始失去光環。林照真（2017 年 6 月）也發現，在報禁解除不久，政大新聞系入學最低分為 514.58 分，高於廣電系的 507.80 分，新聞系是傳院的第一志願。1996 年廣電系的聯考分數首度超越新聞系，廣告系第三。2005 年時，廣告系入學分數首次超越新聞系，從此新聞系在傳院的志願中敬陪末座。廣告系後來亦超過廣電系，成為傳院第一志願。

教育部統計處（2014）發布《99–101 學年度大專校院畢業生就業薪資巨量分析》報告，顯示畢業生投入相關行業分析，傳播學門畢業後投入相關行業之比例僅 22.3%，主要原因在於傳播行業並非教育與就業高度接合的產業領域，新聞教育屬於職業應用導向的學科，但從實際來看，兩者有學難以致用的矛盾，也是當前新聞專業面臨的瓶頸。

Maniou et al. (2020, pp. 35-36) 因此整合了工作場域、新聞學院和社會共變等重要因素，主張近年新聞業應有破壞性創新的推動和思維（圖 2）。學界雖然提出許多診斷及矯治方法，但教育者不能僅以科技趨勢的課程調整作為目標，應該綜觀新聞產業和教育的綜效為何、新世代學生需要什麼，再提出積極實踐的教育內容；另外也要有互動教育、資訊工具和社會需求整合的概念，新聞教育要從教

圖 2：工作場域、新聞教育和社會共變創模式



資料來源：Maniou et al. (2020, p. 35)

育者本身經驗、對經驗的觀察和反思，根據反思形成的抽象思考，再從反思建立可行的新概念。未來學生畢業仍要和社會及工作場域的需求接軌，網路原生世代的教育目標是「共同學習、知識互換和激勵學生如何在職場發展特別專業」。

綜觀政大新聞教育發展歷程，發現如下幾個特色：

一、以教育奠定新聞專業及社會影響：政大新聞系是最早在臺創辦的新聞教育機構之一，早年強調與專業接軌，因深受美國新聞教育自由主義的影響，學習密蘇里新聞學院將新聞事業當成一種社會服務事業，認為新聞從業人員應當思想清晰、立論公正、為公眾利益服務，因此必須建立完善的新聞教育，才能使新聞從業人員兼具專業技能及社會責任。課程設計為理論與實務並重，並強調自由主義與專業性（羅文輝，1989；羅文輝等人，2004）。早年師資和資源雄厚、課程內容參照國外編寫，但也有在地化調適，正如陳世敏（2016）指出，「培養專業」無疑是臺灣新聞教育的核心價值。早年如馬星野從密蘇里大學回到政治大學新聞系任教，即仿威廉斯「報人守則」，手擬「中國新聞記者信條」十二條，明確揭櫫新聞教育理念，闡釋新聞專業的內涵。為學生提供進入良好實習機會，和媒體共同進行培訓，其守則也作為在職教育的補充，新聞教育中的知識分子確實能在教育和社會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二、鼓勵新聞和傳播實踐，創新課程：政大新聞系在解嚴前後為適應廣電和媒體和廣告人才要求，1987 年成立廣告系，1988 年成立廣電系，1988 年成立傳播學院，課程學制隨之調整，以適應媒體分殊化趨勢，也開展學院式的新聞教育。1995 年以前很少人研究的主題，如批判理論、文化研究、語藝傳播、

國際傳播陸續出現在新聞系及後來分出的「傳播與文化」學程的課表中。2012 年傳播學院走向大一大二不分系，2019 年政大新聞系在大三分流中設置「新聞與資訊」和「媒體與文化」兩個學程，言明在傳統媒體組織已逐漸凋零、崩壞，以網路為基底的自媒體則迅速崛起，顯示新聞系有快速的應變能力。

不過，當新聞已發展成 Bauman 所說的「液態現代」或 Hermida 的「瀰漫新聞」，以網路為基底的自媒體迅速崛起，新聞場域的採訪、編輯、產製都可以在新聞室以外的虛擬空間進行，新聞產製也已經跨越實體工作室或新聞組織，進入跨空間時間的網路世界，甚至如 Anderson (2011) 所言，實體新聞室可能有一天會消失，新聞領域教師和實務工作者如何預見新聞業的移動方向，如何培養未來新聞工作者能力和媒體匯流時代的新聞專業，將是極大挑戰。

在科技潮流衝擊下，政大新聞教育發展面臨以下四項挑戰。

一、「學業分流」，卻忽略專業核心價值以及課程和業界需求的整合：隨著媒體科技變化打破媒體界線，原本緊密連結的新聞教育和新聞業逐漸走向「學業分途」的陌路，新聞學院教一套，但業界做的是另一套，無論新聞產製、新聞價值和經營理念等，都產生學術和實踐間的巨大落差，尤其與新聞專業核心有關的法規倫理課成為選修，難怪學者認為無論媒體結構如何改變，教授學生新聞專業意理和自主意識的動機都應更強調 (McChesney, 2003)。另外，如果高等教育體系的新聞教育僅止於技術層次的訓練，太過重視技術的新聞教育訓練，也不易使學生將新聞視為長遠的職業 (Reese & Cohen, 2000)。

二、教學缺少批判思考，學生解決問題能力不足：翁秀琪（1988，頁 285-304）和馮建三（1994）在 1980、90 年代看到新聞媒體受市場力強烈影響，嘗試尋找新秩序，認為討論媒體壟斷和記者工會等組織，對於屏障新聞自由及提振專業精神可能發揮作用。然而 1990 年代後期，訊息科學研究成為主流，政大新聞系也呼應此一趨勢，分設「新聞與資訊」學程和「媒體與文化」學程，然而新聞學術領域針對新聞與訊息發展與數位科技撞擊，科技對產業造成的破壞性創新，甚至對新聞專業價值的裂解問題，並無太多深入研究。政大新聞系認知的傳統新聞教育以引導學習為主，在社群媒體出現後，課程結構已不符合「浮現的實踐課程」的需求。主要原因在於「政大新聞系」雖然標誌著「教育旗艦」領航者角色，但在外在環境丕變下，新聞行業門檻下降、公民記者和部落客皆可自稱新聞工作者，廣告遭新媒體襲奪、失去對人才品管的控制，導致新科技成果在教學環境少有介紹，教學內容與當代社會科技

發展狀況脫節。

三、大三大四分流，但基礎能力不足因應：傳播學院整合資源之後，新聞系學生上大三才選擇新聞系就讀並取得學位；然而也帶來新的問題，其中之一是課程的挑戰，即哪些基礎課要全院學生共修？哪些課程安排在大三大四？原本新聞系的課程在大一大二安排基礎採訪寫作和新聞編輯，這些課被當成必備技能，這些課程如果從大三才開始修習，可能根基太弱，新聞系在大三安排上媒體實習課時，學生基礎不足，前面二年時間可能白白浪費（轉引自林照真，2017 年 6 月）。新聞從威權掌控走向商業化、民營化，新聞內容過於淺碟，置入性行銷為新聞品質帶來隱憂，新聞組織使用公關內容日益興盛，都強化新聞職業的不穩定感（王維菁，2018 年 7 月 23 日；潘乃欣，2017），導致傳院學生在升大三時選擇新聞學程的學生興趣缺缺，人數持續下降。

四、新聞數位化後，多元專業課程不足：數位化已成為改變新聞工作中重要的力量之一，從產業結構到經營模式，從行銷策略到行銷活動以至生產實踐的勞動條件，無不受影響。在這科技迅速變化的關鍵期，新聞教育何去何從？曾任新聞系主任的孫式文指出，隨著國外新聞教育開設視覺、圖像、資訊（媒介共享的溝通要件）課程的邏輯思考，處理新媒介不斷增生的問題，或許可從數位媒介的匯流之處、相通之處、整合之處著手，「以數位媒介的共同特質為基礎、引導學生熟悉變化多端的數位媒介，探索數位媒介未來的趨勢、數位媒介的共同特質中、我認為介面應是傳播新聞教學與研究需要關注的焦點之一」（孫式文，2005，頁 275）。

Tameling & Broersma (2012) 和張文強（2015）都憂心，科技導入新聞課程中，如果不能發展新的專業，無形中將新聞工作化約或引導成資訊處理工作，默默減弱了新聞學與新聞教育原有的專業想像成分。科技和數位化雖然提供課程打掉重煉的良機，Doherty (2018) 認為未來仍需重視新聞教育的核心——社會責任、公共利益，這些概念仍要加到網路和新科技裡，教育者不能劃地自限，要重視積極實踐，以發揮教育綜效。Mensing (2010a) 指出，過往線性、單向的傳播方式已和現今網絡化（networked）的傳播環境大相逕庭，建議未來新聞教育應帶領學生重新認識新聞工作者的角色，尤其新聞工作不再是由上到下的工作方式，從《紐約時報》新聞室工作不但需要團隊合作，更是多方向的組合記者、編輯、攝影、視聽影片工作者、圖像設計和程式設計師一起工作。當下新聞教育應以培養多媒體能力、尤其是能夠進行團隊合作，共同解決問題，又能獨立工作能力。但最終還是目前新聞場域有種種限制，新聞業不易達到高品質的專業標準。

科技給予新聞工作質變的衝擊，新聞界比以前更需善於運用科技技能於數位傳播環境中，學者建議課程應走向計畫導向（project based），並建構更能應用的知識，新知識的學習需要設定更多不同情境，讓學子透過思考過程，進行與他人的社會互動，但是這種學習如何相依互動、既維持個人特質又融入社會的工作認知和能力為主，並不容易 (Bereiter & Scardamalia, 1993)。

Deuze (2004)、Shumow & Sheerin (2013) 主張新聞教育要培養新聞工作者的多媒體意識，不是指所有新聞工作者都要有多媒體能力，而是他們要熟悉新的數位工作環境，知道新聞產製整體流程，也知道自己何時要參與團隊，為新聞產製做出更多貢獻，才能因應未來變化多端的挑戰。鍾蔚文也說，「我們不見得要把學生都送到新聞界。可是反過來，我們怎麼抓住新聞、事實、資訊的本質，訓練學生讓他的範圍可以廣泛到很多相關的領域。應該是在整個課程上面，我們大家都應該負起的責任」（轉引自蘇蘅等人，2018，頁 214）。

儘管新聞科系就讀人數近年大不如前，在數位時代，如何培養用數位能力說好故事、解決問題，在社會挑戰中發展能反思自己出路的新型態新聞工作者，仍有重要性。從新聞教育一路發展的歷程可知，未來教育應當超越當下偏重科技及產業的框架，思考學子如何在合作共創的新環境把握機會，拓展新聞、資訊、圖表、甚至程式設計等更寬廣的就業之途，並從社群媒體面向，建立新媒體高品質的專業，從傳統媒體中，採納新科技的新經營模式，也掌握社群媒體連結、互動、共創的特質，產生新專業和新倫理 (Allan, 2013)，但這些專業的核心價值仍以新聞專業的「真實」和「查證」為根本 (Jukes, 2019)。

2018 年全臺灣開設新聞傳播相關系所的大學有 30 所，除了政大新聞系，全臺灣已呈現多元的新聞教育樣貌，值得未來研究關注。新聞業再度面臨未來發展高度不確定的時刻，但高品質專業的服務和內容仍受社會廣泛期望，新聞系教學和課程應該提供哪些重要且值得內化的價值、基礎和實務課程，以及對教育、職業和新聞在社會聲譽的期望，都值得再加探討。

參考書目

BBC NEWS（2019 年 12 月 10 日）。〈美麗島事件 40 週年：盤點重要政治人物參與見證臺灣民主化〉，《獨立評論》。上網日期：2020 年 2 月 10 日，取自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50726110

王洪鈞（1993）。《我篤信的新聞教育》。臺北：正中。

王維菁（2018 年 7 月 23 日）。〈傳播教育怎麼變？該怎麼變？〉，《媒體改造學社》。上網日期：2021 年 3 月 20 日，取自 http://twmedia.org/archives/2333

中華民國大眾傳播教育協會主編（1982）。《新聞教育與我》。臺北：編者。

朱立（2010 年 11 月 1 日）。〈朱立：為華人傳播學者搭起溝通橋樑〉，《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上網日期：2021 年 3 月 20 日，取自 https://comm.nccu.edu.tw/zh_tw/link18/people10/%E6%9C%B1%E7%AB%8B-%E7%82%BA%E8%8F%AF%E4%BA%BA%E5%82%B3%E6%92%AD%E5%AD%B8%E8%80%85%E6%90%AD%E8%B5%B7%E6%BA%9D%E9%80%9A%E6%A9%8B%E6%A8%91-38723442

朱立、羅文輝、蘇蘅（2011）。〈傳播學〉，王泛森（編），《中華民國發展史：學術發展（下冊）》，頁 487-509。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聯經。

宋仰高（1973）。〈新聞專修科〉，國立政治大學校史編印委員會（編），《國立政治大學校史史料彙編第一集》，頁 307-308。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校史校長室。

林元輝（2009）。〈東京大學新聞傳播教育的更張和啟示〉，《新聞學研究》，98：275-293。https://doi.org/10.30386/MCR.200901_(98).0006

林照真（2017 年 6 月）。〈政大新聞系怎麼變小了？：從聚合觀點探討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大一、大二不分系的教育改革〉，論文發表於「中華傳播學會 2017 年年會」，臺灣，臺北。

房慧真（2017 年 11 月 17 日）。〈【中壢事件 40 周年】許信良：群眾火燒警局時，我在三溫暖睡覺〉，《報導者》。上網日期：2019 年 11 月 19 日，取自 https://www.twreporter.org/a/zhongli-incident-40-years

馬之驌（1986）。《新聞界三老兵：曾虛白、成舍我、馬星野奮鬥歷程》。臺北：經世書局。

馬星野（1973）。〈國立政治大學〉，國立政治大學校史編印委員會（編），《國立政治大學校史史料彙編第一集》，頁 170-177。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校史校長室。

_____（1982）。〈我從事新聞教育經過〉，中華民國大眾傳播教育協會（編），《新聞教育與我》，頁 1-14。臺北：編者。

翁秀琪（1988）。《大眾傳播理論與實證》。臺北：三民。

_____（1992）。〈工作權與新聞記者之自主性〉，翁秀琪、蔡明誠（編），《大

眾傳播法手冊》，頁 297-327。臺北：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

徐志明（1973）。〈政校之門〉，國立政治大學校史編纂委員會（編），《國立政治大學校史史料彙編第一集》，頁 178-208。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校史校長室。

徐佳士（1982）。〈政大新聞教育的創始成長和現狀〉，中華民國大眾傳播教育協會（編），《新聞教育與我》，頁 88-99。臺北：編者。

_____（2005）。〈新聞教育與我〉，馮建三（編），《自反縮不縮？新聞系七十年》，頁 5-9。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

孫式文（2005）。〈介面與新聞教育：一個從隱喻研究切入的觀點〉，馮建三（編），《自反縮不縮？新聞系七十年》，頁 275-293。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

孫曼蘋主編（1990）。《薪傳：政大傳播學院落成紀念特刊》。臺北：國立政治大學。

張文強（2015）。《新聞工作的實用邏輯：兩種模型的實務考察》。臺北：五南。

張咏、李金銓（2008）。〈密蘇里新聞教育模式在現代中國的移植——兼論帝國使命：美國實用主義與中國現代化〉，李金銓（編），《文人論政：民國知識分子與報刊》，頁 321-350。臺北：政大出版社。

張金鑑（1973）。〈本校教育的發展〉，國立政治大學校史編印委員會（編），《國立政治大學校史史料彙編第一集》，頁 59-78。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校史校長室。

張曉、羅文輝、郭佳、汪婧、徐昌鵬、余舒虹、張芳（2015）。〈新聞教育的危機：中港臺新聞系學生的未來職業抉擇〉，《中華傳播學刊》，28：123-154。https://doi.org/10.6195/cjcr.2015.28.04

張耀仁（2002）。〈市場導向新聞學之研究——以臺灣三家無線電視臺晚間娛樂新聞為例〉，《廣播與電視》，18：59，61-90。

國立政治大學校史編印委員會主編（1973）。《國立政治大學校史史料彙編第一集》。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校長室。

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2008）。《政治大學九十七學年度新聞學系自我評鑑報告》。臺北：作者。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2019）。《108 學年度傳播學院課程手冊》。臺北：作者。上網日期：2021 年 1 月 30 日，取自 https://comm.nccu.edu.tw/uploads/asset/data/5d5e75591d41c8045b001edd/%E5%82%B3%E6%92%AD%E5%AD%B8%

E9%99%A2108%E5%AD%B8%E5%B9%B4%E8%AA%B2%E7%A8%8B%E6%89%8B%E5%86%8A_%E4%B8%8A%E5%82%B3%E7%B6%B2%E9%A0%81%E7%89%88__0822%E7%89%88_.pdf

陳世敏（2016）。〈博腦佛心：重返新聞專業初心的路途有多遠？——追思徐佳士教授新聞教育的核心價值〉，《新聞學研究》，127：153-161。https://doi.org/10.30386/MCR.201604_(127).0005

陳炳宏（2001）。《傳播產業研究》。臺北：五南。

陳國明（1999）。〈華人社會傳播教育前瞻〉，《新聞學研究》，59：179-181。https://doi.org/10.30386/MCR.199904_(59).0014

_____（2001）。〈回歸人本的傳播學教育〉，《傳播研究簡訊》，25：15-17。

陳啟彰（1990）。〈締造黃金時代〉，孫曼蘋（編），《薪傳：政大傳播學院落成紀念特刊》，頁 21-25。臺北：國立政治大學。

陳韜文、羅文輝、潘忠黨（2003）。〈新聞傳播教育對新聞人員的影響：大陸、臺灣和香港的比較研究〉，《傳播研究集刊》，8：1-49。https://doi.org/10.6334/CRM.2003.8

教育部統計處（2014）。《99–101 學年度大專校院畢業生就業薪資巨量分析》。上網日期：2021 年 3 月 20 日，取自 https://depart.moe.edu.tw/ed4500/News_Content.aspx?n=672D3725AE71AAC1&sms=DD07AA2ECD4290A6&s=0FE03FA3F3FAF802

陸鏘（2004）。《大記者三章——記者的精神與作為》。臺北：網路與書。

程天放（1973）。〈主持政大教育的回憶〉，國立政治大學校史編纂委員會（編），《國立政治大學校史史料彙編 第一集》，頁 35-38。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校史校長室。

馮建三（1994）。〈從報業自動化與勞資關係反省傳播教育〉，《新聞學研究》，49：1-29。https://doi.org/10.30386/MCR.199407_(49).0001

_____（2001a）。〈臺灣媒體工作者階級意識之初探（1988–1997）：以三家工會刊物為例〉，張炎憲、曾秋美、陳朝海（編），《邁向 21 世紀的臺灣民族與國家研討會》，頁 167-189。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

_____（2001b）。〈從西歐公營電視模式轉化臺灣電視生態〉，《當代》，162：12-17；163：80-84。

_____（2002）。〈臺灣媒體八十年：1921–2002〉，《二十一世紀雙月刊》，

74：119-126。

_____（2003）。〈傳播政治經濟學在臺灣的發展〉，《新聞學研究》，75：103-140。https://doi.org/10.30386/MCR.200304_(75).0004

_____（2006）。〈試論新聞傳播教育學術正當性的建立：記者養成與媒介素養教育〉，《教育資料與研究》，69：181-197。

楊倩蓉（2012 年 10 月 25 日）。〈徐佳士　新觀念的創造者〉，《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上網日期：2020 年 10 月 20 日，取自 https://comm.nccu.edu.tw/zh_tw/member/link18/retired_teachers/%E5%BE%90%E4%BD%B3%E5%A3%AB%E3%80%80%E6%96%B0%E8%A7%80%E5%BF%B5%E7%9A%84%E5%89%B5%E9%80%A0%E8%80%85-83267920

董顯光（1977）。〈憶本校戰時的新聞研究院〉，國立政治大學校史編印委員會（編），《國立政治大學校史史料彙編 第二集》，頁 250-254。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校史校長室。

管中祥（2017 年 11 月 17 日）。〈成露茜的傳播教育理念與實踐〉，《報導者》。上網日期：2021 年 3 月 20 日，取自 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47/article/2643

臺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n.d.）。〈歷史沿革〉，《臺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上網日期：2021 年 3 月 21 日，取自 https://www.mediawatch.org.tw/about/history

臧國仁（1998）。〈專業或學術——新聞教育的挑戰〉，《高雄市立空中大學校刊》，2（1）。

臧國仁、汪琪（1993 年 6 月）。〈臺灣地區播研究的回顧與前瞻〉，論文發表於「一九九三中文傳播研究暨教學研討會」，臺灣，臺北。

潘乃欣（2017）。《新聞學系畢業生的非新聞職業抉擇歷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碩士論文。

鄭瑞城（1998）。〈大學教育和大學傳播教育——觀念的再思考〉，《傳播研究簡訊》，15：4-6。https://doi.org/10.6335/CRN.1998.15(2)

謝然之（1982）。〈臺灣新聞教育之開拓〉，中華民國大眾傳播教育協會（編），《新聞教育與我》，頁 16-36。臺北：編者。

瞿宛文、洪嘉瑜（2003）。《全球化下的臺灣經濟》。臺北：臺灣社會研究雜誌社。

羅文輝（1989）。〈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對中華民國新聞教育及新聞事業的影響〉，《新聞學研究》，41：201-210。https://doi.org/10.30386/MCR.198904_

(41).0012

羅文輝、陳韜文、潘忠黨、蘇鑰機、陳懷林、李金銓、魏然（2004）。《變遷中的大陸、香港、臺灣新聞人員》。臺北：巨流。

羅家倫（1973）。〈本校的誕生與成長〉，國立政治大學校史編印委員會（編），《國立政治大學校史史料彙編 第一集》，頁 29-34。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校史校長室。

蘇蘅、王維菁、林照真、倪炎元、夏珍、張文強、陳百齡、陳韜文、鍾蔚文、吳岱芸、吳俊葵（2018）。〈《新聞學研究》五十週年座談：數位時代新聞傳播教育的改變與挑戰〉，《新聞學研究》，134：179-217。https://doi.org/10.30386/MCR.201801_(134).0005

蘇鑰機、王海燕、宋霓貞、呂琛、茅知非、區家麟、程曉萱、黃佩儀、 張家麒、董卓文、趙萌萌、鄭珮、鄧皓文、譚麗珊（2013）。〈中華傳播研究的現況：誰做甚麼和引用誰〉，《傳播與社會學刊》，23：31-79。

顧毓秀（1973）。〈本校的改制〉，國立政治大學校史編印委員會（編），《國立政治大學校史史料彙編 第一集》，頁 39-44。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校史校長室。

Adam, G. S. (2001). The education of journalists. *Journalism*, *2*, 315-339. https://doi.org/10.1177/146488490100200309

Anderson, C. W. (2011). Between creative and quantified audiences: Web metrics and changing patterns of newswork in local US newsrooms. *Journalism*, *12*, 550-566. https://doi.org/10.1177/1464884911402451

Allan, S. (2013). Journalism as interpretive performance: The case of WikiLeaks. In C. Peters & M. J. Broersma (Eds.), *Rethinking Journalism* (pp. 156-171). London, UK: Routledge.

Archer, M. S. (2003). *Social origins of educational systems* (University ed.). London, UK: Sage.

Bereiter, C., & Scardamalia, M. (1993). *Surpassing ourselves: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implications of expertise*. Chicago, IL: Open Court.

Carey, J. (2000). Some personal notes on US journalism education. *Journalism*, *1*, 12-23. https://doi.org/10.1177/146488490000100103

Deuze, M. (2004).What is multimedia journalism? *Journalism Studies*, *5*, 139-152. https://doi.org/10.1080/1461670042000211131

Doherty, S. (2018). *Journalism design: Interactive technologies and the future of storytelling*. London, UK: Routeledge.

Donsbach, W., & Fiedler, T. (2008). *Journalism school curriculum enrichment: A midterm report of the Carnegie-Knight Initiative on the future of journalism education*. Cambridge, MA: Joan Shorenstein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Freeman, E., & Shafer, R. (2010). Ambitious in theory but unlikely in practice: A critique of UNESCO's model curricula for journalism education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emerging democracies. *The Journal of Third World Studies*, *27*, 135-153.

Gardeström, E. (2017). Losing control: The emergence of journalism education as an interplay of forces. *Journalism Studies*, *18*, 511-524. https://doi.org/10.1080/1461670X.2015.1073117

Gauss, C. E. (1944, July 14). The Ambassador in China (Gaus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No. 2768). Retrieved July 23, 2019, from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44v06/d862

Josephi, B. (2016, July 7). Journalism education. *Communication, 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s*. Retrieved July 23, 2019, from https://doi.org/10.1093/acrefore/9780190228613.013.92

Jukes, S. (2019). How social media and technology are challenging journalists' perceptions of their role. *Interactions: Studies in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10*, 111-127. https://doi.org/10.1386/iscc.10.1-2.111_1

Kunkel, T. (2003). What is journalism education? A college president rekindles the debate. (Top of the Review). *American Journalism Review*, *25*(1), 4.

Maniou, T. A., Stark, A., & Touwen, C. J. (2020). Journalism training beyond journalism school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Educator*, *75*, 33-39. https://doi.org/10.1177/1077695820904979

McChesney, R. W. (2003). The problem of journalism: A political economic contribution to an explanation of the crisis in contemporary US journalism. *Journalism Studies*, *4*, 299-329. https://doi.org/10.1080/14616700306492

Mensing, D. (2010a). Realigning journalism education. In B. Franklin & D. Mensing (Eds.), *Journalism education, training and employment* (pp. 27-44). New York,

NY: Routledge.

-- (2010b). Rethinking (again) the future of journalism education. *Journalism Studies*, *11*, 511-523. https://doi.org/10.1080/14616701003638376

Nerone, J. (2013). Why journalism history matters to journalism studies. *American Journalism*, *30*, 15-28. https://doi.org/10.1080/08821127.2013.767693

Reese, S. D. (1999). The progressive potential of journalism education: Recasting the academic versus professional debat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4*(4), 70-94. https://doi.org/10.1177/1081180X9900400405

Reese, S. D., & Cohen, J. (2000). Educating for journalism: The professionalism of scholarship. *Journalism Studies*, *1*, 213-217. https://doi.org/10.1080/14616700050028217

Schlesinger, P. (1979). *Putting "reality" together: BBC News*. London, UK: Sage.

Shumow, M., & Sheerin, M. S. (2013). Making ends (and Bytes) meet: The challenges of teaching multimedia at an urban, underfunded university (3-U).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Educator*, *68*, 22-32. https://doi.org/10.1177/1077695812472893

Stark, A. (2019, July). *Journalism training beyond journalism school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5th WJEC Syndicate Recommendations, Paris, France.

Tameling, K., & Broersma, M. J. (2012). Crossmediale dilemma's. De zoektocht naar convergentie bij Nederlandse nieuwsmedia. *Tijdschrift voor Communicatiewetenschap*, *40*, 231-250.

Tulloch, J. (2007). *Model curricula for journalism education* (CI.2007/WS/7 REV). Paris, Franc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Wang, J. (Ed.). (2011). *Soft power in China: Public diplomacy through communication*.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https://doi.org/10.1057/9780230116375

Weibull, L., & Asp, K. (1991). *Svenska journalister: Ett grupporträtt*. Stockholm, Sweden: Tide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11(2), pp. 5-36, July 2021

The Transformation of Journalism Education in Taiwan: Reflec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at NCCU

Su, Herng*

Professor,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Journalism education and journalism itself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emocratic process in society.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development in education, state, society, and political economy during the evolution of journalism education in Taiwan. In view of this, the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at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NCCU), founded in 1935 in Nanjing, China, was selected as the primary focus of the study. The history and the changing dynamics among its curriculum, its faculty members, and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journalism education were analyzed in details. Questions explored in this study include the key factors that shaped the journalism education at NCCU, the concepts of journalism education in different periods, the curriculum features, the academic approaches, and how and why each change of direction happened. The findings indicated that American journalism education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axis of the journalism education at NCCU as well as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journalism education in Taiwan. Despite being under the strong influence of the logic of the party-state capital on its concepts of education and research efforts, the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at NCCU strived to pursue and maintain its subjectivity in education. With the arrival of media convergence, the professional orientation in journalism education was challenged, and the reconceptualization of journalism education was suggested in order to better reposition itself for the changing future.

Keywords: the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at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journalism education, journalism, history

---

* Email: herngsu@nccu.edu.tw
Received: 2021.2.26
Accepted: 2021.5.13

JCRP 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成舍我紀念館 Cheng Shu-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Ainosco Press

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11 卷 第 2 期．頁 37-65．2021 年 7 月
DOI:10.6123/JCRP.202107_11(2).0003

翠谷的傳播教育：「世新模式」探索 *

游梓翔 **

世新大學口語傳播暨社群媒體系教授

温偉群

世新大學口語傳播暨社群媒體系教授

摘要

1956 年由知名報人與教育家成舍我（1898–1991）創立於臺北的世新大學，咸認為臺灣傳播教育的領導品牌之一，以貼近實務脈動與綿密校友網絡為其最大優勢。作為對傳播教育工作者極具參考價值的傳播教育實踐案例，本文旨在梳理（一）世新大學自 1930 年代始於北平世新，近一世紀一脈相承的辦學歷史；（二）受成舍我及其辦報理念影響的重要價值精神，如世界主義、德智兼修、手腦並用與我要說話；以及（三）世新大學回應西方傳播教育面臨的「理論／實務」、「口語／媒體」及「歸人／過客」等三大斷裂之「全媒體」、「全傳播」及「全貫穿」等策略，目的在總結臺灣傳播教育中「世新模式」之內涵。

關鍵詞：世新大學、成舍我、理論實務並重、臺灣傳播教育

* 作者感謝本文撰寫過程中成露茜民國新聞史研究團隊資料提供與協助。
**Email: tyu@mail.shu.edu.tw
投稿日期：2021 年 3 月 2 日
接受日期：2021 年 5 月 21 日

JCRP 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舍我紀念館 Cheng Shu-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Ainosco Press

壹、緣起

位於臺北市南端的世新大學（簡稱世新），風景別緻，從正門進入校園必經一條隧道，隧道另一端是綠樹蒼蒼的青翠山谷。這讓世新得了「翠谷」的別稱。

數十年來，於這片幽靜翠谷之中，世新發展成為臺灣傳播教育的領導品牌之一。《Cheers 雜誌》對世新的介紹是「新聞傳播教育起家」，也是臺灣「傳播科系最多」、「唯一設有傳播博士班的私立大學」；另外，世新「孕育大量的媒體實務人才，尤其以廣電媒體為多」，且「綿密的校友網絡與貼近實務脈動，始終是世新的一大優勢」（潘乃欣，2018 年 8 月 29 日，頁 68），這基本反映了世新在臺灣的普遍評價。

世新是由知名報人成舍我（1898–1991）於 1956 年在臺北所創。初建時是職校層級的「世界新聞職業學校」，歷經「世界新聞專科學校」（1960）和「世界新聞傳播學院」（1991）等發展階段，於 1997 年升格成現在的綜合型大學。不變的是世新始終以傳播教育為其特色，並一直使用「世新」的簡稱。

與臺灣乃至兩岸三地其他教育機構相比，世新的辦學模式深具特色、自成一格。本文旨在探討世新如何以其特殊的辦學歷史、理念和策略，形成一套傳播教育的「世新模式」（*Shih Hsin* Model），特別是在回應西方傳播教育發展歷程中面對的重大挑戰方面，「世新模式」作為傳播教育的一個最佳實踐案例，具有供華人傳播教育工作者參考的重要價值。

本文作者將從歸納西方推動傳播教育遭遇的三大「斷裂」——「理論／實務斷裂」、「口語／媒體斷裂」和「歸人／過客斷裂」為論述起點，繼而以世新為案例，理解世新在中國大陸的十多年和在臺灣的六十五年發展，是如何以其特殊的傳播教育模式，應對各項挑戰，為臺灣培養傳播人才。

貳、傳播教育面對的三大斷裂

論及現代大學層級傳播教育的建立，最具規模的當然是美國。而臺灣的傳播教育，受到留美學者的影響很大。美國大學的傳播專業課程，是在 19 世紀下半葉起逐步發展，主要有兩個發展源頭：一是為因應報業蓬勃發展，產生的「新聞」（journalism）或「報學」訓練需要；另一則是因工商業盛行，培養學生表達能力的「口語」（speech）或「言語學」訓練需要。20 世紀初，新聞與口語均邁向學科化，於是「新聞／大眾傳播」（journalism/mass communication）以及「口語

／人類傳播」（speech/human communication）和這兩個關係密切且頗具規模的學科，在 20 世紀中期基本成型。20 世紀後半葉，兩者又逐漸融合成更大的「傳播學門」（field of communication）。

任何學門在演進成長的歷程中，都會遭遇學門核心界定以及學門領域整合的挑戰，傳播學門也不例外。參酌相關文獻，可以發現在西方傳播教育推展的過程中，曾經發生的三個理念與路線辯論，可以稱之為三大「斷裂」（divides）。

第一也是討論最多的斷裂是「理論／實務斷裂」（theory-practice divide），就傳播學門而言，即傳播教育應該以理論或是實務為重的討論。傳播教育起於實務訓練需要，但因為置身大學校園，其分配資源的正當性又需要為其他學術學門認可接受，這就讓傳播教育一直面對理論和實務斷裂的挑戰。這就是夏春祥（2002，頁 11）所謂的「如果學術理論與技術實務是一條線的兩段，那麼目前的傳播研究困境，可以說是最矛盾的體現」。

以新聞／大眾傳播為例，在學科創建之初，就有「威斯康辛模式」（Wisconsin Model）與「密蘇里模式」（Missouri Model）[1] 之間的爭辯 (Altschull, 1995)。兩位代表人物之一是在威斯康辛大學（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推動新聞教育，後來成為新聞學院（成立於 1927 年）院長的 Willard Bleyer（1873–1935），另一位則是在密蘇里大學（University of Missouri）主持全美首個新聞學院（成立於 1908 年）的 Walter Williams（1864–1935）。Bleyer 重視研究，希望透過學術發展提升新聞學地位；Williams 則認為新聞學始終應以專業訓練為核心 (Rogers & Chaffee, 1994)。「威斯康辛模式」與「密蘇里模式」之爭一直延續到新聞傳播學高度學科化之後，在新聞學院的屋頂下，重實務輕理論的「綠色遮光罩人」（green-eyeshades），似乎始終與重理論研究但輕視實務的「卡方人」（chi-squares）存在格格不入之感（游梓翔、夏春祥，2003；Dickson, 2000; Lovell, 1987; Rogers, 1997）。

在中國發展新聞教育之初，也面對著理論與實務孰輕孰重的問題，其中不能忽略的是 Walter Williams 於 1921 年曾到中國演講，受到各界重視，[2] 這使得密蘇里模式更早影響了中國的新聞教育，張詠、李金銓（2019，頁 343）指出「長

1　美國傳播教育界另一個稱呼「密蘇里模式」的常見名詞是「密蘇里方法」（Missouri Method），重視實務訓練的密蘇里模式，其核心理念是「動手做」（hands-on）和「做中學」（learn-by-doing）(The J-School, n.d.)。

2　Williams 於 1921 年 12 月訪問中國，4 日在北京大學發表演講，講題是「世界的新聞學」（Williams 著／林斯陶譯，1921；方漢奇，2000，頁 938；任白濤，1941），負責口譯的是胡適；此行 Williams 還在清華大學演講「受過教育者的特點」（〈校聞：名人演講〉，1921）。

期以來，國人說到美國的新聞教育似乎只知道密蘇里，密蘇里新聞學院在中國甚至比在美國有名」。不過即使多所學校都仿效了密蘇里新聞學院，但理論與實務課程孰先孰後、適當比重為何，始終是中國新聞教育者的爭論焦點。例如王師萊（1947）就認為新聞教育應兼顧「技術教育」和「認識教育」，並以前者為首重，因為「新聞教育並非訓練一個僅僅懂得理論，而是必須實踐地應用理論的新聞工作者」，不過探討比重，他卻認為技術課程應占總課程的三分之一。就時數上看，這似乎又把「認識教育」看得更重要。儲玉坤（1948，頁 19）則認為好的新聞教育應該「和研究兵學一樣，三分理論七分實際」。

傳播教育可能面對的第二項斷裂，來自「口語／人類傳播」和「新聞／大眾傳播」的區分。傳播學者描述這種區分的名稱不一，有人就直接以「人際／大眾傳播二分」來稱呼 (Reardon & Rogers, 1988)。因為這基本是出身口語傳統的學者和出身新聞傳播學者間的鴻溝，本文作者稱之為「口語／媒體斷裂」（speech-media divide）。此項斷裂會出現，正是因為傳播教育最初來自兩個源頭，口語一支更關注人的親身溝通，媒體一支則更關心人類透過媒介的傳播。雖然一世紀以來，無論在專業傳播學會（如美國全國傳播學會〔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與國際傳播學會〔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或大學校園，都有不少西方傳播學者致力整合兩者，但迄今仍未能化解口語與媒體兩個傳播教育傳統間的分歧（游梓翔、夏春祥，2003）。

雖然有學者分析早在 1927 年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中就有「交通／傳播」兩種譯名的區分，前者更接近口語或人際傳播，後者則更接近媒體傳播（高海波，2013）。但在華人傳播教育體系，「新聞／大眾傳播」一支的獨大頗為明顯。例如大陸學者劉海龍（2019，頁 107）指出，「中國語境中所說的『傳播學』其實並不是一個準確的概念，或者說更接近於一個由中國學界自己創造的本土概念，即『新聞學』」，但傳播學的範圍其實要比新聞學或大眾傳播學大得多，涵蓋人際與群體傳播在內。劉海龍（2015，頁 132）也曾提到在傳播學 1980 年代引入大陸的過程中，「大眾傳播理論與傳播理論被畫上了等號」的問題。這說明了在大傳播學門下整合口語和媒體教育的目標，在華人世界似乎比西方挑戰更大。

談論到傳播學門的整合問題，美國傳播學者 Pooley (2016) 為文指出，美國傳播學存在著四大若即若離的文化，包括：一、口語與修辭，二、重實務的大眾傳播學、三、疏離實務的大眾傳播學，以及四、電影研究在內。他認為四者的疏離（即使辦公場所座落於同一棟大樓內），將無法適應今日社會對匯流融合和學

科跨界的要求，更不利傳播學的內部整合與對外形象。從本文採取的框架來看，Pooley 指出的四大文化疏離現象，同時反映除了傳播教育的「理論／實務斷裂」以及「口語／媒體斷裂」，其結果就是破碎的傳播學與傳播教育。

論及傳播教育的第三項斷裂，本文作者借用了臺灣詩人鄭愁予《錯誤》中的兩個中文用語，稱之為「歸人／過客斷裂」（tarrying-passing divide）。但其英文來自在 1960 年代傳播學門逐漸成形時，學門主要推動者 Wilbur Schramm 的一段文字：

> 傳播理論與研究可說吸引了心理學者、社會學者、人類學者、政治學者、經濟學者、數學家、歷史學者和語言學者的興趣，而來自這些和其他領域的學者們也對我們理解傳播做出貢獻。這是一個學術十字路口，很多人路過，但只有少數人逗留。(Schramm, 1963, p. 2)

Schramm 是傳播學學科化的重要推手，而這個傳播學是「傳統的英語系中的修辭演講方向，加上新聞研究，再加上形成於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的社會學、政治學、社會心理學等社會科學，雜糅而成」（劉海龍，2019，頁 107）。但 Schramm (1963, p. 2) 的感慨，是初創的傳播學門成為了協助各科學者瞭解所屬學科中傳播問題的一種「附隨研究」（auxiliary study），因此過客居多，真正以傳播學位學術認同核心的歸人較少。這透露出傳播學學術正當性與地位不足的些許無奈。從 Schramm 的時代以來，從事傳播教育的人，經常必須面對傳播是作為其他專業的一個「副科」，還是足以成為「主科」的挑戰。這項挑戰即使在十字路口比喻發表的六十多年後，仍是傳播教育工作者所必須面對的。

在中國，也存在著一個十字路口。在中國推動新聞教育的人之所以來到這個路口，不是為了要長期建立新聞傳播作為一個學門的基礎和地位，而是為了人力的短期所需。這就是卜少夫（1944，頁 65-66）說的「過去創立新聞教育機關的人，主要的動機由於應一時緊急的需要，以致用為主，很少是為了企圖建立中國新聞學術，以求中國新聞學在學理技術上的奠立」。

本文論述傳播教育的三大斷裂出發，是因為作者相信，「世新模式」作為傳播教育的一套理念和作法，很多方面都能對這三大斷裂有所因應。接著作者將從歷史沿革、價值精神和因應策略三方面，梳理「世新模式」的形貌。

參、探索世新發展的歷史軌跡

世新在臺灣的發展開始於 1956 年創立的「世界新聞職業學校」，但這其實並非世新的真正源頭。世新的最前身可以溯至成舍我於 1933 年在北京創辦的「北平新聞專科學校」。北平新聞專科學校一般簡稱「北平新專」，但因其與《世界日報》的關聯，也被稱為「世界新聞專科學校」，我們可以稱之為「北平世新」。

北平世新的創辦，是在成舍我所辦，以「世界」為名的三家報紙——《世界晚報》（1924）、《世界日報》（1925）、《世界畫報》（1925）之後。如果從「三個世界」的時代算起，世新的辦學文化更已有逼近一世紀的孕育與積累。

世新創辦人成舍我是在 1917 年從滬到京。透過舊識——時任北京大學文科長的陳獨秀（1879–1942）協助，進入北大就讀。又因先前已有報館校對編輯經驗，再經時任北大圖書館主任的李大釗（1889–1927）介紹，到北京《益世報》工作。他很快在《益世報》展露頭角，從小編輯成了大編輯（吳範寰，1963）。

後來成舍我決定自己辦報。草創時只用了兩百大洋，「堪稱奇蹟」地辦了《世界晚報》（黃侯興，1998，頁 73），再陸續辦了日報和畫報。1927 年，成舍我又在南京創辦《民生報》，1935 年則在上海創辦《立報》。作為開辦含世界三報等多家報紙的成功報人，管翼賢（1943，頁 167）評價成舍我為「北京新聞界之巨擘」，將其名列六位中國「報業名人」，與徐寶璜、戈公振、林白水、邵振青和張季鸞並列。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 MacKinnon 教授，在關於民國新聞史的論文中如此評價成舍我：

> ……或許最有趣最具雄心的新報業大亨——也是中國以外較少人認識的——就是成舍我，他在北京、南京、漢口和香港創辦了系列報紙，同時也辦了最早的新聞職業學校之一。(MacKinnon, 1997, p. 9)

除了北平世新，[3]MacKinnon 也提及成舍我後來還創辦了臺灣世新，並說這是他在臺灣「最為人們記得的成就」(MacKinnon, 1997, p. 10)。加拿大卡爾頓大學（Carleton University）的 Eaman (2009, p. xxxv) 教授，也將北平世新的創辦事蹟，寫入了他主編的《新聞學歷史辭典》「大事紀」中。這都說明了北平世新和

3 MacKinnon 教授在論文中誤植新聞專校的創辦地點為上海。

後來世新的發展受到國際傳播學界的一定注意。

據後來擔任臺灣世新校長及董事長的成舍我之女成嘉玲（1998，頁 165）回憶，成舍我之所以創辦北平世新，是因為「當時的新聞記者素質欠佳，不夠專業，新聞道德素養又缺乏」，因此透過辦學可以「培養一幫夠水準的記者，好提高報紙的水平」。MacKinnon (1997, p. 10) 也認為成舍我比起同期其他報人，在辦報初期時便更關注「如何提高新聞作為一項專業的地位和標準」。

其實成舍我辦理新聞教育的準備和想法由來已久。他在 1926 年便曾透過《世界日報》籌組「報童工讀學校」，既協助北平貧童也能解決報館派報的人力問題，收「讀可兼工，一舉兩善」之效（〈報童工讀學校募捐啟〉，1926 年 10 月 4 日），後來《世界日報》和《立報》又招考「練習生」，作為人才來源（唐志宏、連慧珠，2011）。1929 年，成舍我應邀擔任國立北平大學（簡稱平大）秘書長，也有建立大學本科等級新聞教育的嘗試。他本計畫在平大法學院設置「新聞專修科」並自兼主任，可惜幾經輾轉該計畫未能落實（賀逸文等人，1982）。結束平大工作後成舍我赴歐美考察新聞事業於教育機構，在美期間參訪了美國大學新聞教育極具代表性的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當成舍我訪問之時，Williams 已成為了密蘇里大學的校長，兩人曾談及「新聞商業化」的問題（成舍我，2012a，頁 33）。

自歐美考察返國後，成舍我決心私人辦學，創立北平世新，於 1933 年 2 月正式招生。因為未來工作能有確保且不收學費，在當時引發的迴響極其熱烈，1933 年 3 月 4 日天津的《北洋畫報》報導了北平新專的招生盛況：

> 北平最近最有號召能力之學校，厥為世界日報社長成舍我創辦之新聞專科學校。該校現招職業班新生，原定只取四十名，結果報名者達六百人，[4] 蓋以該校既不收學費，且可擔保異日有事可作也。（記成舍我之新聞專科學校，1933 年 3 月 4 日）

北平世新最早設置「初級職業班」和「報業管理夜班」。1933 年 4 月 8 日首屆開學。初級職業班的 40 位新生中包括本名林含英，後來成為知名作家的林海音在內（林海音，1998）。1935 年 9 月，北平世新又再開設了「高級職業班」（賀逸文等人，1982）。整體規劃上，原本在初級和高級班後，就要開設本科，成為「2 + 2 + 3」的三階段設計（成舍我，1935，頁 105），希望「修業滿七年者，

4　後來成舍我先生在北平新專開學講話中說報名人數是四百多人（成舍我，1935）。

對新聞事業全部之必須技能與知識，皆可有相當之明瞭，無論其為報社之經理或編輯，甚至，印刷工人，均能應付裕如」（管翼賢，1943，頁 212-213），可惜後來本科的招生計畫因盧溝橋事件發生而未能實現（許曉明，2016）。

北平世新的創辦可以放置在歷史的大脈絡中看。1930 年代的中國新聞教育尚處新生階段。雖然 1912 年「全國報業促進會」就有創設「報業學堂」以培養專門人才發展報業的提案，卻因該會崩解無疾而終。1920 年「全國報業聯合會」籌設「新聞大學」之議也未能落實。中國大學新聞教學的開端，從北京大學 1919 年的「新聞研究會」開始，但要到 1921 年上海的聖約翰大學的報學系，才算是中國第一個大學新聞系。到了十二年後的 1933 年時，已有不少大學或專科設置新聞系，[5] 但也有部分短期便告夭折。[6] 北平世新創立時，雖僅為專科，因有《世界日報》在內的多個重要報刊為支援，頗被新聞教育界看重。例如 1935 年 1 卷 2 期的《報學季刊》在「新聞教育機關概況」的欄目中，便納入了北平世新，與同在北平的燕京大學新聞系（1924）、廣州的中國新聞學專門學校（1928）、上海的復旦大學新聞系（1929）及滬江大學商學院的新聞科（1929）並列。[7]

其中北平世新和滬江大學商學科又與一般大學的新聞系不同，算是由報社或通訊社直接參與主辦。[8] 卜少夫（1944，頁 66）指出，當年因中國報紙劇增，各校培養之人才數量太有限，報館依靠練習生學徒補充人才緩不濟急，自辦學校則得以「訓練實現自己從事新聞事業的主張和方法的大批幹部」，比其他大學的畢業生更好用。卜少夫等於解釋了世新這套辦學模式的優勢。大陸學者陳建雲（2010，頁 239）則評論說，「在舊中國民營報人中，能夠做到辦報、辦學相輔相成、齊頭並進，成舍我一人而已」。時任上海《新聞報》總編輯的郭步陶到上海民治新聞學專科學校演講「中國的新聞教育」，提起了北平世新，他說：

---

5 1933 年以前設置或曾設置新聞科系的主要大學除聖約翰大學，還有廈門大學（1922）、北平的平民大學（1922）、上海的大夏大學（1923）、北平的燕京大學（1924）、北京的法政大學（1924）、國際大學（1924）、上海的南方大學（1925）、上海的光華大學（1926）、民國大學（1926）、復旦大學（1929）、滬江大學商學院（1931）。專科則有中國新聞學院（1928）、民治新聞專科學校（1928）。

6 1933 年以前即停辦新聞系的學校如廈門大學（1926）、南方大學（1925），而燕京大學則一度在 1927 年停辦，1929 年復系。

7 另外《報學季刊》在 1 卷 3 期中還納入了北平的民國大學新聞專修科，以及兩所函授學校，分別是上海的申報新聞函授學校和濟南的濟南新聞函授學社。

8 滬江大學商學院新聞科除了與上海《時事新報》合辦，參與者還有上海多家報紙和通訊社的主管，如《新聞報》、《晨報》、《申報》、《大陸報》、申時電訊社等（申時電訊社，1935b）。

> 我倒很贊成他這種辦法，因為一面讀書，一面到他自己報館裡去練習，所以得的經驗就比只在課堂上讀書增進得多，成舍我造就的這批人材，差不多都進他自己辦的報館，所以他這一系與其他新聞學校是不同的。（郭步陶，1937，頁 3）

抗戰期間北平淪陷，北平世新停辦。1942 年，成舍我在桂林讓北平世新復校（即「桂林世新」），招收 50 名「印刷職業班」學生，結果入學考試時又來了四百

多人（李鴻銘，1998）。程其恆（1944，頁 170）在所著《戰時中國報業》附有「新聞教育機關一覽表」，僅收錄抗戰期間中國最重要的六所學校。除復旦與燕京新聞系，還包括從南京遷重慶的中央政治學校新聞系（成立於 1935 年，即後來的政治大學新聞系）、由上海遷重慶的民治新聞學專修學校（1928），以及遷往四川萬縣的上海法學院報業管理專修科，六所學校中桂林世新也名列其中。可惜桂林世新僅維持兩年，就因桂林淪陷再次停辦。再後來要到 1945 年對日抗戰結束，北平《世界日報》才得以恢復，北平世新也重新招生，抗戰後的北平世新設有「印刷職業班」50 人和「編採班」30 人，但最終還是因國共內戰國軍失利而在 1948 年 7 月告終（賀逸文等人，1982）。

1952 年底，成舍我和家人定居臺北，本想在臺復辦《世界日報》，但因當時政府實施戒嚴與「報禁」，未能如願。1953 年 4 月 18 號成舍我在《新生報》發表專文〈需要一萬名新聞幹部回大陸〉，強調培養新聞人才的重要，許多人勸他既然辦報不成不如開辦學校。當時的臺灣當局既不讓成舍我辦報，又擔心他會「悶出問題來」，於是也鼓勵他辦學校（成嘉玲，1998，頁 165）。成舍我本憂心年近六十難看見辦學成果，據說是程滄波以復旦創辦人馬相伯耳順之年辦學的案例相勸，才讓他毅然決定籌辦臺灣世新（成舍我，1976 年 10 月 15 日）。

成舍我原想辦的是專科或本科，但因當時政府對大專設立管制嚴格，只能先辦職業學校（成嘉玲，1998）。於是他邀集一群文化界聞人，包括于右任、王雲五、端木愷、程滄波、黃少谷、葉明勳共同發起，並四處募款籌資。最後僅靠 30 萬臺幣和私人貸款，終在 1956 年，於原本「雜草叢生、闃無人跡」（葉明勳，1998，頁 222）的溝子口山麓，順利開辦「世界新聞職業學校」，這是臺灣世新的肇始，最初設立「編輯採訪科」，招收初級高級各一班。

1960 年，因辦學成績優良，世新獲准升格「世界新聞專科學校」並設「新聞科」。1962 年，新聞科一分為三，成為「編輯採訪」、「報業行政」和「廣

播電視」三科。之後數年，再增設包括「公共關係」（1963）、「圖書資料」（1964）、「電影製作」（1966）、「印刷攝影」（1969）及「觀光宣導」（1976）等五科。1976 年時，臺灣世新已發展成涵蓋八門專業頗具規模的傳播學府。

這段期間世新師生仍持續爭取升格。在成為專科的三十多年後，世新終在 1991 年 8 月成為「世界新聞傳播學院」。最初設立五個專業科系——「新聞」、「公共傳播」（分公關、廣告、觀光三組）、「視聽傳播」（分廣播、電視、電影三組）、「印刷攝影」以及「傳播管理」。1992 年增設全亞洲第一個「口語傳播系」，1994 年設立傳播碩士班。為了再進一步轉型為綜合大學，隨後幾年世新又陸續增設「社會心理」、「觀光」、「經濟」、「財務金融」、「行政管理」、「法律」等傳播專業以外的科系。

1997 年世新如願實現「在 10 年內讓學校發展成為一所精緻綜合大學」（成嘉玲，1998，頁 169）的目標，獲准改制「世新大學」。世新大學下設四個學院。原有的傳播專業納入新聞傳播學院，並新增管理學院、人文社會學院和法學院。1997 年，世新獲准設立全臺第二個傳播學博士班，開始頒授傳播博士學位。今日的世新新聞傳播學院共有八個學系，涵蓋「新聞」、「廣播電視電影」、「公共關係暨廣告」、「圖文傳播暨數位出版」、「口語傳播暨社群媒體」、「資訊傳播」、「數位多媒體設計」與「傳播管理」，無論就專業種類和主修學生總數來看，世新的傳播學發展在臺灣都是最領先的，沒有之一。

肆、探索世新的價值精神

要梳理「世新模式」，除了理解歷史沿革，另一途徑是剖析世新作為傳播教育機構所信奉的價值精神，即組織文化學者所稱之「奉行價值」（espoused values） (Schein, 2017)。對此我們可從四方面切入：一、世新最初名稱中和「世界三報」共用的「世界」一詞；二、世新從北平世新時代便崇尚的「手腦並用」原則；三、之後和「手腦並用」並列世新校訓的「德智兼修」；以及四、成舍我以其處事典範與辦校風格傳遞給師生的「我要說話」與言論自由價值。

一、世界——喚起民眾的價值精神

世新辦學模式奉行的首項價值來自世新的原始校名——「世界」新聞學校。這個「世界」無疑是承襲了成舍我創辦的「世界」三報。

成舍我為何選擇以「世界」作為報紙和學校名稱，缺乏可提供解答的直接證

據。但據學者與成舍我後人對其思想脈絡之研究，一種觀點是「世界」來自成舍我長期主張的「世界主義」，而這個「世界主義」是五四運動前後盛行之「無政府主義」思潮的一支。例如成舍我之女成露茜等人便主張三報中的「世界」是成舍我「擁護無政府主義裡分化支脈世界主義理想的映射」（成露茜等人，2011，頁 241）。李金銓（2019，頁 242）也認為，「成舍我創辦報系和新聞學校，均以『世界』為名，可見他對世界主義如何推崇」。張育仁則有以下論斷：

> 後來，無政府主義這一思想派別分化為許多支，其中的一支就是成舍我奉為人類真理的「世界主義」。他之所以將自己所有的報紙都冠名為「世界」，其思想奧妙就在這裡。（張育仁，2002，頁 418）

成舍我信奉的世界主義，反對暴力革命，主張「以人道和互助實現理想」（李金銓，2019，頁 242）。也因為世界主義下的「大同」思想，成舍我重視報紙對一般民眾的宣傳教化功能，深信「喚起民眾」為實現世界大同之必要。他在五四運動之後尚未辦報之時就深信「我以為文化運動最大的武器就是報館」（成平，1920，頁 4）。因此他一直主張報紙應從事「大眾教育」（citizen pedagogy），廣泛傳遞實用知識，並作為「大眾娛樂中心」(Chow, 2009, p. 58)。

成舍我的世界主義不僅反映於「世界」三報，也與他一生中創辦的其他報紙關係密切。當年中國無政府主義代表人物李石曾，1927 年元旦為成舍我的《民生報》撰寫新年祝詞，就曾這麼註解——「《民生》與《世界》南北輝映、互為表裡，此實即世界之真義，亦即民生之真義也」（賀逸文等人，1982，頁 72）。成舍我後來創辦的《立報》，也帶有先立大眾再立國立民的理念。難怪有人戲稱，成舍我若要再辦新報，名稱可以是「世界民生立報」（宋小嵐，1945 年 9 月 25 日，頁 26）。

落實到新聞理念上，成舍我的世界主義反對報紙的菁英導向，致力讓報紙更大眾化 (Chow, 2009; Eaman, 2009)。這就是他在 1933 年北平世新的開學典禮上所強調的「報紙要向民間去」（成舍我，2012b，頁 90）。他辦報是辦給一般民眾看的，售價要讓一般民眾可以負擔，內容要被一般大眾所能接受。1927 年辦《民生報》時，成舍我也以利於大眾接受的「精、簡、全」為其編輯政策（周靖波，1998）。1935 年的上海《立報》更是在創刊宣言便直接標舉「報紙大眾化」（成舍我，1998）。《立報》廣受歡迎的特色就是透過簡單語言，來呈現簡短的硬性與人情趣味新聞 (MacKinnon, 1997)。但成舍我反對黃色新聞式的大眾化，他說：

> ……我們要報紙大眾化，是要報紙真能走到民間去，如果大眾化的結果，只是造成幾個像美國一樣的黃色報紙大王，他們只知道個人發財，不管社會遭殃，那麼這種大眾化的報紙，試問於大眾有何利益？（成舍我，1935，頁 109）

誠如大陸學者周海波（1998，頁 129）所言，成舍我是要「努力將報紙辦成為大眾所能接受的喚起大眾思想情感的報紙」，而非走嘩眾取寵的路線。大陸學者李時新（2012，頁 4）則認為成舍我是要結合大報重視要聞和小報短小價廉的長處，卻摒除大報生硬價昂和小報低級娛樂的短處，辦成一份介於大報小報間的「第三種報紙」。

因此雖然包括 MacKinnon 和 Eaman 等西方學者，常將成舍我與美國報業大亨赫斯特（William Hearst，1863–1951）作連結，但成舍我本人對赫斯特的黃色新聞風格卻是毫不欣賞。林海音（1998，頁 242）回憶，成舍我曾明白表示赫斯特辦報的誇張渲染是「報下之品」，他更嚮往的報人典範其實是創辦英國《每日郵報》和《每日鏡報》，後來主持《泰晤士報》的北岩爵士（North Cliff，1865–1922）（林海音，1998）。

對成舍我而言，要實現報紙大眾化，必須透過新聞教育讓具有理想性的人才投入，才能避免報紙的「資本化」傾向。談及創辦北平世新的緣由時，成舍我曾經明白地將把辦新聞學校作為辦大眾報紙的基礎：

> 後來經過縝密的考慮，覺著要實驗我們的理想，非有根本徹底的辦法不可。而人才的準備，尤其必要。最好先辦一所新聞學校，一方面訓練未來的人才，一方面在學校裡可以創辦一個民眾化的報紙。（成舍我，1935，頁 112）

因此我們可以對成舍我的「世界」做以下理解。實現世界大同首須喚起民眾，喚起民眾要靠大眾報紙——這就是唐志宏、連慧珠（2011，頁 159）總結的，成舍我是要先讓報刊「大眾化」，方可進而「化大眾」，而實現報紙大眾化則必須從培養能辦大眾報紙的人才開始。「世界」新聞學校的理想是，人才來自大眾，報紙辦給大眾，而受報紙啟發的大眾，可以實現更美好的世界。

二、手腦並用——落實實踐的價值精神

自創辦以來，臺灣世新就是以「德智兼修，手腦並用」為校訓（成舍我，1982 年 6 月 19 日），其中更早出現的是「手腦並用」。當年在北平世新的印刷實習工廠門口有副對聯，上下聯是「莫刮他人脂膏，要滴自身血汗」，橫眉就是「手腦並用」（成舍我，1935，頁 114）。

成舍我創辦新聞學校的主要動機，就是要培養手腦並用的人才。在提到「理想的新聞教育」時，他這麼寫道：

> ……我的原意是想替中國今後的新聞事業訓練一些手腦並用的小朋友。假使這些小朋友，真能完成他們的畢業，那麼，他們將來的技能，是一方面穿上長衫，做經理，當編輯，一方面也可以換上短衣，到印刷工廠中，去排字、鑄版、管機器。（成舍我，1935，頁 105）

成舍我期望未來到報館工作的人，能真正做到「沒有勞心勞力的區別」。這樣既可避免勞心者對勞力者的壓榨（這就回應了馬克思），也有另一好處——當報館中人人都能兼顧勞心與勞力時，相互理解將更「容易協調」。他也堅信要真正辦好報紙，對於編輯採訪等勞心工作與排版印刷等勞力工作，「也有融會貫通的必要」，這就闡明了「手腦並用」的真諦。

相較其他新聞教育機構，「手腦並用」儼然成為北平世新的品牌特色，1935 年的《報學季刊》在介紹北平世新時這麼敘述：

> 北平新聞專科學校，係北平《世界日報》及南京《民生報》合力所創辦，其目的，在造就「手腦並用」的新聞技術人才。（申時電訊社，1935a，頁 122）

創辦北平世新這樣一所重視動手和新聞技術的學校，成舍我很大程度受到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的啟發，他說「美國最完備的新聞學校，當首推密蘇里大學的新聞學院」（成舍我，1935，頁 109）。如 MacKinnon (1997, p. 12) 便認定成舍我創辦北平世新是赴美訪問密蘇里新聞學院後的「直接結果」。

而手腦並用，據曾任世新校長多年的成嘉玲（1998，頁 170）解釋，是在強調「理論與實務並重」，其目標是「本校畢業生離開學校進入傳播機構後，咸能

立刻上線，並能恪守工作崗位」。這就是世新師生和校友朗朗上口的，在進入職場時，世新畢業生將不會成為「二度新鮮人」（李正宗，1998，頁 113）。

如前所述，中國早年新聞教育，受密蘇里模式影響較大。北平世新之前，聖約翰大學報學系的首任系主任就是身為密蘇里新聞學院校友及教授的柏德遜（Don Patterson），燕京大學更與密蘇里新聞學院直接合作。而 1935 年創辦的中央政治學校新聞系，首任系主任也是畢業自密蘇里新聞學院的馬星野（許曉明，2016；羅文輝，1989）。不過世新與其他機構的最大不同，是世新的實務是上至管理採訪下至印刷工廠的實務，不以勞心勞力為界限。且世新的人才養成與報館緊密結合，力求學生時刻在學、即時可用，在學習中和畢業後都能走進報館、走進人群。舉例來說，成舍我（1935，頁 107）曾提到，即使是不入高級班的初級班畢業生，在報館「留用」後也會「每天以一半時間叫他們用手（印刷），再以一半時間叫他們用腦（採訪或報業管理）」。相較起來，其他大學的教育模式更容易被批評為是「象牙塔」教學，如復旦畢業生杜紹文（1939，頁 3）便曾寫道：不讓學生去「十字街頭」來「開一開眼界」的新聞教育，可說是「不合現實不能實踐的教育」，學生「總有一天會大失所望」。在總結中國新聞教育「失敗」或「未能如理想的成功」時，陳錫余（1948，頁 6-7）歸納的原因除了「不重視新聞教育」、「報業環境不好」與「教師教材缺乏」外，另一項關鍵就是「設備簡陋，不能使理論與實踐打成一片」，這使得「實習太少」成為中國新聞教育的主要問題。「到了學生離開學校進入報館，未能勝任實際工作」，這就導致外界認定「新聞學校與新聞事業無關」，甚至「新聞教育無用」。這些都說明了理論實踐整合確實是知易行難。這讓成舍我「以實務課程為主，理論課程為輔」的辦學模式（唐志宏、連慧珠，2011，頁 170），相較其他新聞學校確實與眾不同。

成舍我對實務的重視，還可以從課程設計上實習課程的所占比重看出來。表 1 是以 1940 年代施志剛（1948）對六所新聞學校的課程統計為基礎，將之與北平世新初級職業班的課程規劃作比較，可以看出北平世新對實習課程的側重十分明顯。

成舍我辦學重視實習的作法也和多年後王公亮（1948，頁 8）與若干大學新聞系師生談論起新聞教育的共識非常類似，他說：

> 我們咸認為新聞系倘能減少教授新聞學理論的鐘點，而增多進修其他科目的時間，再利用假日光陰派遣學生赴各新聞事業機關實習，既可使理論與實際配合，更可使學生增多充實基本學識之機會。

表 1：北平世新與其他新聞教育機構課程比較表 [9]

學校	類別					共計
	本系科課程		文法科共同課程			
	理論課程	實習課程	語文課程	史地課程	其他課程	
政治大學新聞系	33 27.73%	—	43 36.14%	11 9.24%	32 26.89%	119 100%
復旦大學新聞系	36 45.00%	2 2.50%	24 30.00%	9 11.25%	9 11.25%	80 100%
民國大學新聞系	73 52.53%	—	27 19.37%	17 12.25%	22 15.85%	139 100%
暨南大學新聞系	7 16.28%	—	9 20.93%	6 13.95%	21 48.84%	43 100%
中國新聞專科學校	44 31.43%	8 5.72%	41 29.28%	20 14.29%	27 19.29%	140 100%
民治新聞專科學校	18 50.00%	3 8.33%	6 16.67%	2 5.56%	7 19.44%	36 100%
北平新聞專科學校	2 5.13%	20 51.28%	10 25.64%	2 4.10%	4 5.13%	39 100%

資料來源：北平新聞專科學校以外之統計引自施志剛（1948，頁 6），北平新聞專科學校課程統計則取自申時電訊社（1935a，頁 124）。

成舍我對「手腦並用」的重視曾被批評是搞「學徒教育」（宋小嵐，1945 年 9 月 25 日），但這其實是只見其「手」而未見其「腦」。唐志宏、連慧珠（2011，頁 177）也提及成舍我的辦學是結合學院型和學徒型「兩條不同取徑」，並認為成舍我學院型辦學是從「報童工讀學校」為基礎再走向北平世新，但兩人明確指出成舍我的北平世新原來的構想上是要走向他早年即非常嚮往的「大學校」，可惜因戰亂最後只開辦了初級和高級職業班，而非完成本科的設立。大陸學者黃志輝（2017，頁 274）則認為，成舍我辦學的方針是「適時地根據中國新聞事業發展的需要，在新聞事業發展的不同階段提出不同的培養方案」，透過對成舍我的深入研究，他認為「培養視野寬闊的高級新聞人才」才是成舍我真正追求的目標。當然成舍我眼中，高級新聞人才也必須懂得報館中必須動手做的各項事務。

成舍我的手腦並用還有一個目的，1932 年 4 月他應邀到燕京大學新聞系演講〈中國報紙之將來〉時曾談及報館組織，曾經提到「未來的中國報紙，他應該受民眾和讀者的控制，他的主權，應該為全體工作人員——無論知識勞動或筋肉勞動者所共有」，如此才能「絕對獨立，不受『商業化』任何絲毫的影響」（成

9　唐志宏、連慧珠（2011，頁 175）亦曾將施志剛之統計與北平世新相較，但在北平世新的課程比例計算上根據的是與本文不同之來源。

舍我，2012a，頁 34）。由此可見成舍我理想的報紙經營是一種「由下而上」，讓報館為全體成員所有的模式，如此才更能呼應民眾和讀者的需要。則就是成舍我在北平世新開學典禮上所說的「工作者有其報」（成舍我，2012b，頁 90）。但要報館主權屬於全體，如果基層人員不能有手有「腦」，「行使這種主權，當然非常困難，就是貿然接受，等到行使起來，其結果也要有名無實」（成舍我，1935，頁 107-108）。由此可知，成舍我辦報乃至於辦學強調的「手腦並用」，也與他世界大同喚起大眾的世界主義關係密切。

三、德智兼修——堅守道德的價值精神

雖然自創辦時起，「德智兼修」就是臺灣世新校訓的一部分。但論者提及北平世新和桂林世新，則較偏重「手腦並用」，特別是其中「手」的部分。不過成舍我對用腦以及對品德和智識的重視，卻早在北平世新時期即明白展現，並一直延續到臺灣世新。成舍我（1996a，頁 557）曾經引用密蘇里創院院長在北大演講的內容，強調從事新聞工作「學識」、「技術」和「人格」都很重要，「而人格尤其重要」，技術是「手」，學識和人格是「腦」，其中學識是「智」，人格是「德」。

在「德」方面，1935 年成舍我在為《報學季刊》所寫的〈我所理想的新聞教育〉文中，就曾言及北平世新重視對學生「忠於職守」的訓練，而「忠於職守」的一項關鍵就是在新聞工作上不能造假。為了說明此點，成舍我還舉出某記者「消息任意捏造，騙自己，騙報館」，終至穿幫的案例。成舍我也強調他教育學生「與其信用耳朵，不如信用眼睛」（成舍我，1935，頁 106-107），這是要學生重視親身查證而不應道聽途說，怠忽記者職守。

在臺灣世新，成舍我以培養「品德第一的最優秀新聞人才」為念，他經常用下面這段話勉勵世新每年的畢業生：

> 你們畢業以後如果進入報館，你們手中的一支筆，正和戰士肩上的一管槍相同。如果新聞記者的筆，不用來維護正義，獎善懲惡，相反的卻要求賄賂、受人豢養、顛倒黑白、混淆是非，則這一類的記者，其罪惡與戰士不用槍保衛國家、殲滅敵人，而只是威嚇善良、搶劫強暴，或報仇洩憤，同該受全國唾棄、最高刑罰。（成舍我，1982 年 6 月 19 日，第 4 版）

其實在成舍我創辦世界三報前，還曾短暫辦了《真報》。《真報》雖不成功（吳範寰，1963），但可知追求正義與真理是成舍我多年秉持的價值精神。

成舍我的教育理念也很重視「智」。追求廣泛新知無論對新聞學校學生或新聞工作者，都很重要。成舍我本人很早便展現求知不懈的精神，北大時期他勤於翻譯外文著述，在創辦《真報》和世界三報前，便曾先後組織了「新知編譯社」和「新知書社」（吳範寰，1963；〈新知書社開會紀事〉，1921 年 3 月 8 日）。他的翻譯和文字在五四前後中國的覺醒年代裡，留下了鮮明印記（游梓翔，2019；Chow, 2009）。

成舍我辦學，同樣著眼於提升新聞專業的「智」。他強調，「高深的研究和普通技術的訓練」兩者均不可偏廢（成舍我等人，1947）。他也深信必須積極提倡新聞教育的學理研究：

> 其實新聞教育一方面固然是職業教育的一種，一方面何嘗不含有高深學理的研究，尤其號稱民本主義的國家，新聞教育，更有積極提倡的必要。（成舍我，1935，頁 110）

他還以醫科和法科為例，駁斥論者僅因新聞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育新聞記者，就貶其為欠缺學術價值的說法。醫法兩科同以培養醫師律師為務，卻無礙兩者成為大學重要學科。成舍我強調，「新聞教育一方面是職業教育，一方面也是文化教育的一種，技術的訓練和學理的研究都應該同樣重視」（成舍我，1935，頁 110）。

成舍我很重視新聞學理，當年北平世新的「新聞學」課程，是由他親授。林海音（1998，頁 239）回憶說，「那時有一本徐寶璜翻譯的《新聞學》，以及邵飄萍等人寫的有關新聞學方面的幾本書，舍我師都瞧不上，所以他寧可親自講授他自己的一套」。斷言北平世新只著重養成新聞實務技術上的「手腦並用」人才，明顯忽略了成舍我對「德智兼修」同樣看重的事實。

四、我要說話——言論自由的價值精神

作為編輯和報人，或是作為立法委員和教育家，成舍我一生始終力行「敢言直言」，重視言論自由的價值精神。早年最為人稱頌的事例，就是 1919 年五四運動爆發不久，成舍我在 5 月 23 號的《益世報》上所寫的署名社論《安福與強

盜》，痛批北洋軍閥的腐敗。1924 年開辦《世界晚報》，四項宗旨中的前兩項就是「言論公正」和「不畏強暴」。[10] 後來上海《立報》在發刊詞中申明「憑良心說話」是《立報》編輯的首要原則（成舍我，1998）。在專業生涯中，「不畏強暴」曾多次讓成舍我身陷囹圄甚至危及生命（周靖波，1998），但他對言論自由的堅持始終如一。

在創辦北平世新的 1930 年代，成舍我同時積極參與當時爭取言論自由和反民權壓迫的重要團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Wasserstrom & Perry, 1994)。北平世新正式招生前夕，在 1933 年 1 月成立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北平分會」上，成舍我還當選了該分會的執行委員，和他同時列名該會執委的社會賢達還包括胡適、許德珩、蔣夢麟等人（耿雲志，1998，頁 1996）。也就是此種重視言論自由的立場，讓張育仁（2002，頁 326）認定成舍我創辦北平世新的目的之一，即是要「培養為我所用的自由主義新聞人才」。

1955 年，臺灣世新創辦的前一年，成舍我曾以立委身分，在立法院十五會期五次會議上，質詢當時的行政院長俞鴻鈞。質詢發言稿後來以〈「人權保障」與「言論自由」〉為題，在《自由中國》雜誌發表。這篇鏗鏘有力的文字強調人權保障與言論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兩大支柱」，並舉出多起當時政府有侵害人權疑慮的案例，包括報禁、查禁報刊等問題，發出正義之聲（成舍我，1955，頁 8）。

成舍我重視人權保障和言論自由的立場，臺灣世新的辦學上更加彰顯。臺灣世新的教師聘用可謂海納百川，吸納了許多「政治上有問題的知識分子」（王曉波，1998，頁 107），因「臺大哲學系」政治事件遭臺大解聘，平反回臺大任教前被世新聘為教授的王曉波這麼回憶：

> 在那個時候，雖然每年暑假都傳說上面又有解聘的「黑名單」下來。但是我們都很安心，在舍老的保護傘下，我們這些被政治迫害的知識分子仍能安心的教學研究。「世新」竟成為在戒嚴時期，臺灣唯一的「自由學府」。（王曉波，1998，頁 107）

正因成舍我和臺灣世新在言論立場上的包容，讓《天下雜誌》在一篇報導中說「前半生辦報，後半生辦學、問政，成舍我始終堅持為異議分子留一個空間」（鄭一青，1998 年 1 月 1 日，頁 299）。

10 《世界晚報》的四項宗旨是：言論公正、不畏強暴、不受津貼與消息靈通。

成舍我逝世前一年，因病住院，病情影響了口語表達，但他仍經常掙扎手書「我要說話」四字。後來「我要說話」就被人們用來總括他追求言論自由的一生，認為這足以作為成舍我「獻身新聞事業八十年的最佳表白」（鄭一青，1998 年 1 月 1 日，頁 298）。

這個「言論自由」或「我要說話」的價值精神，要說的話主要是什麼話呢？成舍我或許在當年創辦《世界晚報》時就給了答案，據說他辦報「最大的願望」，就是「第一是要說自己想說的話；第二是要說社會大眾想說的話」（黃侯興，1998，頁 72）。

伍、「世新模式」對傳播教育挑戰之因應

就在本文上述兩節梳理的發展歷程積累和價值精神堅持中，世新發展出了新聞傳播教育辦學上獨特的一套「世新模式」。雖然成舍我在 1991 年——世新升格為學院的前夕離開人世，但他所創造的「世新模式」讓後來三十年接下辦學火炬的後人，面對前述傳播教育的挑戰，得以發展出不同凡響的應對策略。

首先，面對「理論／實務斷裂」，「世新模式」的應對策略是在重視新聞傳播學理價值的同時，始終強調「手腦並用」——重視傳播實務的訓練，避免成舍我所謂「勞力」和「勞心」的二分。正因為強調「手腦並用」，世新的新聞傳播教育一直更接近成舍我嚮往的美國「密蘇里模式」——與實務界緊密對接，培養能上手的人才，這讓世新畢業校友深受業界歡迎。《Cheers 雜誌》所說「綿密的校友網絡與貼近實務脈動，始終是世新的一大優勢」，可說就是來自世新並重理論實務的「手腦並用」。

而且，從專科時代的八科到現在新聞傳播學院的八系，世新重視的實務是非常多元，涵蓋新聞傳播繽紛面貌的實務。成舍我曾對世新的專科畢業生說了以下這段話：

> 我們的校名，是「新聞」，但實際上我們的範圍，已包括了整個大眾傳播。我們畢業的同學所用工具，將不僅是一支筆；所服務的機構，將不僅是報館，舉凡廣播、電視、電影、戲劇、圖書、印刷以及觀光旅遊，它們能否發揮最大功效，都無一不與我們的民主政治，血肉相連。（成舍我，1982 年 6 月 19 日，第 4 版）

簡言之，世新名為「新聞」，卻早已延伸至「媒體」和「傳播」。多元的專業設置有利於世新學生在校內「跨界」。當年的世新可說就已在傳統媒體時代實現了「全媒體」。[11] 而隨著數位資訊網路行動等新媒體的到臨，匯流已成趨勢，今日世新正式採納為辦學方針的「全媒體」策略，則是在強調跨媒體內容的融合（游梓翔，2018）。正是此種在同一學院涵蓋豐富多元專業，並鼓勵學生跨系修課的設計，讓學生更容易培養出跨媒體的知能，有利於實現創作上的「融合」。這個實務上因應新興媒體而來的「全媒體」策略，是今日「世新模式」的一大特色，但卻與成舍我早年多元媒體實務的辦學理念密切相關。

特別是今日的大學教育，面對的是遠比過去更強烈的「應用型教學」和「導入新科技」的期待 (Moscardini et al., 2020)，都可能讓世新「手腦並用」、「理論與實務並重」和「全媒體」的特色更具時代競爭力。

其次是「口語／媒體斷裂」的挑戰。雖然臺灣乃至整個華人傳播教育界，在 1990 年代前基本呈現獨重新聞與大眾傳播的趨向 (Kim et al., 2008)，但世新在 1992 年就創建了迄今仍是臺灣唯一的「口語傳播系」，這讓口語傳播一脈的專業課程——如演說辯論、人際傳播、組織傳播、跨文化傳播等，得以既廣且深地融入了世新的傳播教育中。像是世新設置的傳播博士班，其博士人才的培養方案就高度整合了口語傳播及媒體傳播的理論與研究。口語傳播專業在理念上繼承了來自西方的古希臘羅馬民主修辭傳統，堅信言論自由，重視語言表達與理性論辯。雖然成舍我未能親見口語傳播系的成立，但口語傳播的教學研究理念，可說與成舍我「我要說話」的價值精神非常契合。

其實納入口語傳播專業消弭「口語／媒體斷裂」的想法原非僅見於世新。臺灣同以新聞傳播教育見長的國立政治大學，1990 年代擬定的中長程計畫中原也有增設「語藝」學系——即口語傳播系的提議（中華民國新聞年鑒編輯委員會，1991，頁 321），可惜後來並未實現。這使得納入口語傳播課程，凸顯「人與媒體並重」，成為傳播教育的「世新模式」的獨有特色。兼容口語與大眾傳播、人際與媒體傳播的世新，不僅是「全媒體」教育，也是「全傳播」教育。

而在社群媒體盛行後，人與媒體的整合似乎比過往更受重視。甚至有西方學者認為這是個「媒體傳播 + 人際傳播」的「人媒傳播」（masspersonal communication）時代 (O'Sullivan & Carr, 2018)。為了因應此種趨勢，世新的口語

11 世新大學的「全媒體大樓」於 2019 年啟用，其「全媒體」主要在表達媒體匯流融合之特性，故以 "omnimedia" 為正式英文名稱。但此處之全媒體除匯流融合也希望涵蓋世新自成舍我時代以多元媒體樣態為特色的辦學理念，因此 "all media" 似乎更能表述此一脈相承之特色。

傳播系獲准在 2020 年更名為「口語傳播暨社群媒體系」，將「人媒傳播」納入學系的核心關注中。未來更多的「人媒整合」也讓「全傳播」的「世新模式」更具競爭優勢，這等於是成舍我新聞實務與我要說話理念的深度交融。

另外，面對「歸人／過客斷裂」的挑戰上。今日的世新大學作為始終以傳播教育為特色的綜合大學，即使是傳播以外的專業，如管理學院、人文社會學院與法學院旗下的不同領域，也與傳播專業互動密切，成為傳播教育的多方支援和堅強後盾。培養多元知識基礎其實也是成舍我新聞教育「德智兼修」的重要部分。當年北平世新創辦時設立的「初級職業班」所開七門課程中，與新聞直接相關的僅有三門（新聞學、新聞學實習、印刷實習），其餘四門是國文、英文、社會科學大意與自然科學大意；同時設立的「報業管理夜班」所開五門課中，也只有報業管理直接與新聞相關，其餘則是簿記、會計、統計、商業通論等管理知能課程（申時電訊社，1935a）。成舍我辦學的這項特色，落實了黃楨多年後在談到改進中國新聞教育說的這段話：

> ……新聞學雖然已經被公認為一種獨立的科學，但是它和其他科學都永遠有著最密切的關係。說得露骨一點：新聞學實在就是由於別的各種科學輔助而成的。因此，一個學習者應當在本科幾門課程外，更要努力於政治、經濟、史地一級別的社會科學及自然科學的學習。（黃楨，1945，頁 7）

延續至今，世新雖然已發展綜合大學，但不同專業領域支援發展傳播核心的辦學特色仍在。例如財務金融系結合金融與傳播的財經新聞特色，法學院結合法律與傳播的智慧財產權研究所，或是像世新的英語系最近更名為「英語暨傳播應用學系」等。在世新，傳播學不是個只有過客而缺歸人的十字路口，更像是多元學科共享傳播興趣的「交會中心」（hub）。

因此在世新的辦學設計下，如同在 Schramm 的時代，傳播學以其獨特視角，為其他專業做出貢獻，而其他專業也能為傳播學灌溉養分，但不同的是多元專業背景的師生並非短暫停留，其中很多會選擇在這個交會中心生根立足，透過傳播連結來凸顯與其他學校相同專業相較時的專長與特色。這就是世新推動多年，被稱為「傳播貫穿各學門」的辦學策略，也就是游梓翔（2018）所說的「全貫穿」。「全貫穿」在世新拉近了經常挑戰傳播學界的「歸人／過客斷裂」，給予「世新

模式」更大的競爭力，而這一切始於成舍我新聞辦學下豐富新聞人才知識視野的「德智兼修」。

陸、總結：延續翠谷傳奇

1933 年北平世新開學時，成舍我曾對學生勾勒以下的願景：

> 只有同學和各位教職員，都來共同努力，將來新聞專科學校一定可以做成一個完全的學校，一天天的發展起來，或者能造一個十層樓八層樓的工廠化的學校也未可知。（成舍我，1935，頁 114）

臺灣世新當初創辦時，資源缺乏，成舍我連自宅都拿去抵押籌款。透過戮力辦學、節儉持校，一路走來才有了今日世新大學的規模。今天的世新僅是一棟「全媒體中心」大樓，就是「十層樓八層樓的工廠化」的規模。而這個新的工廠已不是作為傳統印刷媒體骨幹的排字印刷工廠，而是在數位社群時代容納眾多新傳播科技的數位內容製作工作坊。不過無論傳播科技如何進展，終究只是「用」，一所學校最重要的是她的「體」，她的文化、她的歷史、她的價值精神。

從北平世新到桂林世新，從臺灣的世界新聞職業學校、世界新聞專科學校、世界新聞傳播學院到現在的世新大學。世新多年來以其秉持的喚起大眾理想，對德智兼修、手腦並用的重視，和對我要說話的堅持，創造出了獨特的「世新模式」。

這些由成舍我多年來鍛鑄的價值精神，作為世新辦學的理想典型，在發展過程當然難免遭遇現實的挑戰。在世界主義思維下，成舍我無論報紙和學校都是為大眾而辦，反對「商業化」。但私人辦學不靠政府資助，僅能靠學雜費和捐助，堅持「手腦並用」需要鉅額的實習設備投資，堅持「德智兼修」則必須禮聘一批優秀的教師隊伍，為求資源有效運用常須有所取捨，這也難免引發不同議論。但成舍我（1976 年 10 月 15 日，1996b，頁 328）從創辦臺灣世新時起即堅信辦學是「捐資」而非「投資」，更認為以營利為目的之「學店」是「下流所歸，君子不齒」，世新始終奉行不悖。而在臺灣多元政治環境下，批評討論校務實屬常態，[12] 但持不同觀點師生論辯時仍多以「我要說話」的言論自由價值律己律人（如

12 例如世新學生的獨立媒體新聞人報社旗下的「新聞人電子報」，便經常對世新校務提出批評，參見 http://www.newspeople.com.tw/author/

吳柏軒，2014 年 12 月 24 日）。由此可知，實踐上偶有不同意見與爭辯，但成舍我的精神價值無疑在今日的世新校園延續著。

從新聞教育角度來看，「世新模式」的另一項特色，是以獨特策略回應了「理論／實務」、「口語／媒體」，以及傳播學和其他領域「歸人／過客」的斷裂分歧。但世新多年的堅持包括：一、在理論研究中總堅持實務應用才是傳播教育的基石；二、在關注媒體時總不忘關懷閱聽使用媒體之人群，對人的溝通、言論自由乃至社群傳播給予重視；以及三、在辦學規模提升後，始終堅持傳播學的發展軸心，營造出傳播貫通多元專業的學術生態。這些都是「世新模式」的特色。

世新在臺灣走過了 65 個年頭，若從「世界三報」和北平世新算起，則已接近一個世紀。可以預見的是，傳播科技仍將持續變化，新聞教育在培養人才上的挑戰也將不斷增加。但懷抱世界、手腦並用、德智兼修、我要說話的「世新模式」，仍會在下一個百年作為華人新聞傳播教育的重要成員。

參考書目

Williams, W. 著，林斯陶譯（1921）。〈世界新聞學〉，《稅務專門學校季報》，3（1）：40-41。

卜少夫（1944）。〈談新聞教育〉，《新中華》，2（4）：69-78。

王公亮（1948）。〈興革大學新聞教育管見〉，《知識與生活》，31：8-9。

王師萊（1947）。〈新聞教育的重點在哪裡？〉，《文化通訊》，2：2-3。

王曉波（1998）。〈臺灣知識分子的自由堡壘——記成舍我先生與「世新」〉，中國人民大學港澳臺新聞研究所（編），《報海生涯：成舍我百年誕辰紀念文集》，頁 99-109。北京：新華。

中華民國新聞年鑒編輯委員會編（1991）。《中華民國新聞年鑑》（八十年版）。臺北：臺北市新聞記者公會。

方漢奇編（2000）。《中國新聞事業編年史：上》。福州：福建人民。

申時電訊社編（1935a）。〈新聞教育機關概況：北平新聞專科學校〉，《報學季刊》，1（2）：122-124。

_____（1935b）。〈新聞教育機關概況：滬江大學商學院新聞學科〉，《報學季刊》，1（2）：115-116。

成平（1920）。〈文化運動的意義與今後大規模的文化運動〉，《新人》，1（5）：6-12。

_____（1935）。〈我所理想的新聞教育〉，《報學季刊》，1（3）：105-115。

_____（1955）。〈「人權保障」與「言論自由」〉，《自由中國》，12（6）：8-11。

_____（1976 年 10 月 15 日）。〈我如何創辦世新〉，《聯合報》，第 12 版。

_____（1982 年 6 月 19 日）。〈董事長勉應屆畢業生〉，《小世界》，第 4 版。

_____（1996a）。〈傳播教育會訊：報禁開放與新聞教育〉，唐志宏（編），《成舍我先生文集：港臺篇，1951–1991》，頁 555-558。臺北：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暨新聞史研究中心。

_____（1996b）。〈「捐資」與「投資」〉，唐志宏（編），《成舍我先生文集：港臺篇，1951–1991》，頁 327-328。臺北：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暨新聞史研究中心。

_____（1998）。〈我們的宣言〉，中國人民大學港澳臺新聞研究所（編），《報海生涯：成舍我百年誕辰紀念文集》，頁 60-64。北京：新華。

成舍我（2012a）。〈中國報紙之將來〉，劉家林、王明亮、陳龍、李時新（編），《成舍我新聞學術論集（上冊）》，頁 28-48。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_____（2012b）。〈如何使報紙向民間去〉，劉家林、王明亮、陳龍、李時新（編），《成舍我新聞學術論集（上冊）》，頁 85-90。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成舍我等人（1947）。〈當前報業的幾個實際問題〉，《新聞學季刊》，3（2）：1-6。

成嘉玲（1998）。〈「世新」永遠的老校長：父親在新聞教育上的理念與貢獻〉，中國人民大學港澳臺新聞研究所（編），《報海生涯：成舍我百年誕辰紀念文集》，頁 164-173。北京：新華。

成露茜、唐志宏、李明哲（2011）。〈無政府主義的影響和實踐：成舍我的「非資本主義大眾化報刊」〉，《新聞學研究》，106：219-248。https://doi.org/10.30386/MCR.201101_(106).0006

任白濤（1941）。《綜合新聞學》。上海：商務。

宋小嵐（1945 年 9 月 25 日）。〈世界民生立報成舍我：一個新聞怪傑、一個不倒的報人〉，《新聞天地》，1：26-28。

李正宗（1998）。〈「世新」——傳播專業人才的搖籃：並記校友心目中永遠的老校長〉，中國人民大學港澳臺新聞研究所（編），《報海生涯：成舍我百年誕辰紀念文集》，頁 110-120。北京：新華。

李金銓（2019）。《傳播縱橫：歷史脈絡與全球視野》。臺北：聯經。

李時新（2012）。《上海〈立報〉史研究（1935–1937）》。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李鴻銘（1998）。〈百歲冥壽念校長——追憶創業艱難，緬懷豐功偉績〉，中國人民大學港澳臺新聞研究所（編），《報海生涯：成舍我百年誕辰紀念文集》，頁 252-269。北京：新華。

吳柏軒（2014 年 12 月 24 日）。〈抗議校方撤學生會櫥窗　世新學生怒吼「我要說話！」〉，《自由時報》。上網日期：2021 年 2 月 26 日，取自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1188876

吳範寰（1963）。〈成舍我與《北京世界日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四十三輯》，頁 231-261。北京：中華書局。

杜紹文（1939）。〈建設中國本位的新聞教育〉，《戰時記者》，5：2-3。

周海波（1998）。〈論成舍我與中國報紙的大眾化趨向〉，中國人民大學港澳臺新聞研究所（編），《報海生涯：成舍我百年誕辰紀念文集》，頁 121-135。北京：新華。

周靖波（1998）。〈成舍我的業績〉，中國人民大學港澳臺新聞研究所（編），《報海生涯：成舍我百年誕辰紀念文集》，頁 5-21。北京：新華。

林海音（1998）。〈一生的老師——悼吾師成舍我先生〉，中國人民大學港澳臺新聞研究所（編），《報海生涯：成舍我百年誕辰紀念文集》，頁 237-244。北京：新華。

施志剛（1948）。〈論中國新聞教育〉，《讀書通訊》，152：2-6。

〈記成舍我之新聞專科學校〉（1933 年 3 月 4 日）。《北洋畫報》，19（902）：1。

唐志宏、連慧珠（2011）。〈成舍我的新聞教育實踐：從職訓報童到本科專業（1919–1937）〉，《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35：145-183。https://doi.org/10.30383/TJH.201105_(35).0004

夏春祥（2002）。〈眾聲喧嘩的迷思：關於傳播研究的筆記〉，《中華傳播學刊》，1：3-26。

高海波（2013）。〈論戈公振的傳播思想〉，《國際新聞界》，35（4）：159-167。

耿雲志編（1998）。《胡適論爭集：下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校聞：名人演講〉（1921）。《清華週刊》，231：12。

張育仁（2002）。《自由的歷險——中國自由主義新聞思想史》。昆明：雲南人民。

張詠、李金銓（2019）。〈密蘇里新聞教育模式在現代中國的移植——兼論帝國使命、美國實踐主義與中國現代化〉，李金銓，《傳播縱橫：歷史脈絡與全球視野》，頁 343-376。臺北：聯經。

郭步陶（1937）。〈中國的新聞教育〉，《學校新聞》，61：3。

陳建雲（2010）。《向左走　向右走：1949 年前後民間報人的出路抉擇》。福州：福建教育。

陳錫余（1948）。〈中國新聞教育與新聞事業〉，《文風學報》，2/3：4-7。

許曉明（2016）。《中國近代新聞教育發展史研究（1912–1949）》。石家莊：河北人民。

黃志輝（2017）。《追夢與幻滅：報人成舍我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

黃侯興（1998）。〈成舍我的三個「世界」〉，中國人民大學港澳臺新聞研究所（編），《報海生涯：成舍我百年誕辰紀念文集》，頁 71-88。北京：新華。

黃桷（1945）。〈談談目前的新聞教育〉，《新聞戰線》，5（2-3）：6-8。

程其恆（1944）。《戰時中國報業》。桂林：銘真。

游梓翔（2018）。〈傳播學對新媒體時代的因應〉，《青年記者》，1：67-68。

_____（2019）。〈我要說話：五四運動與中國的口語傳播時代〉，《傳播研究與實踐》，9（2）：41-75。https://doi.org/10.6123/JCRP.201907_9(2).0003

游梓翔、夏春祥（2003）。〈傳播學門的再思考：口傳與大傳的分立史與整合路〉，《中華傳播學刊》，4：109-144。

賀逸文、夏方雅、左笑鴻（1982）。〈北平《世界日報》史稿〉，張友鸞（編），《世界日報興衰史》，頁 40-207。重慶：重慶出版社。

〈報童工讀學校募捐啟〉（1926 年 10 月 4 日）。《世界日報（北平）》，第 3 版。

〈新知書社開會紀事〉（1921 年 3 月 8 日）。《北京大學日刊》，825 期，第 4 版。

葉明勳（1998）。〈懷世新傳播學院創辦人成舍我〉，中國人民大學港澳臺新聞研究所（編），《報海生涯：成舍我百年誕辰紀念文集》，頁 221-225。北京：新華。

管翼賢主編（1943）。《新聞學集成：第七冊》。北京：中華新聞學院。

鄭一青（1998 年 1 月 1 日）。〈獨立辦報　捨我其誰——成舍我〉，《天下雜誌》，200：298-299。

潘乃欣（2018 年 8 月 29 日）。〈臺大二度奪冠，4 成企業說：「有讀有加分」〉，《Cheers 雜誌》，216：64-71。

劉海龍（2015）。《重訪灰色地帶：傳播研究史的書寫與記憶》。北京：北京大

學出版社。

_____（2019）。〈中國傳播學 70 年：知識、技術與學術網絡〉，《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8（5）：106-114。

儲玉坤（1948）。〈論我國新聞教育〉，《報學雜誌》，1（2）：18-19。

羅文輝（1989）。〈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對中華民國新聞教育及新聞事業的影響〉，《新聞學研究》，41：201-210。

Altschull, J. H. (1995). *Agents of power: The media and public policy* (2nd ed.). New York, NY: Longman.

Chow, E. C. (2009). Serial sightings: News, novelties, and an Unofficial history of the old capital. In C. Rojas & E. C. Chow (Eds.), *Rethinking Chinese popular culture: Cannibalizations of the canon* (pp. 54-74). London, UK: Routledge.

Dickson, T. (2000). *Mass media education in transition: Preparing for the 21st century*.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Eaman, R. A. (2009).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journalism*. Lanham, MD: Scarecrow.

Kim, M.-S., Chen, G.-M., & Miyahara, A. (2008). Communication as an academic field: East Asia. In W. Donsbach (Ed.),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communication* (pp. 602-609). Malden, MA: Blackwell. https://doi.org/10.1002/9781405186407.wbiecc059

Lovell, R. (1987). Triumph of the chi-squares. It's a hollow victory. *The Quill*, *75*(9), 22-23.

MacKinnon, S. R. (1997).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ress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 *Modern China*, *23*, 3-32.

Moscardini, A. O., Strachan, R., & Vlasova, T. (2020). The role of universities in modern society.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https://doi.org/10.1080/03075079.2020.1807493

O'Sullivan, P. B., & Carr, C. T. (2018). Masspersonal communication: A model bridging the mass-interpersonal divide. *New Media & Society*, *20*, 1161-1180. https://doi.org/10.1177/1461444816686104

Pooley, J. D. (2016). The four cultures: Media studies at the crossroads. *Social Media + Society*. https://doi.org/10.1177/2056305116632777

Reardon, K. K., & Rogers, E. M. (1988). Interpersonal versus mass media communication: A false dichotomy.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5*, 284-

303. https://doi.org/10.1111/j.1468-2958.1988.tb00185.x

Rogers, E. M. (1997). *A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study: A biographical approach*. New York, NY: Free Press.

Rogers, E. M., & Chaffee, S. H. (1994). Communication and journalism from "Daddy" Bleyer to Wilbur Schramm: A palimpsest. *Journalism Monographs*, *148*.

Schein, E. H. (2017).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leadership* (5th ed.). Hoboken, NJ: Wiley.

Schramm, W. (1963).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W. Schramm (Ed.), *The science of human communication: New directions and new findings i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pp. 1-16). New York, NY: Basic Books.

The J-School. (n.d.). *Missouri School of Journalism*. Retrieved May 22, 2021, from https://journalism.missouri.edu/the-j-school/

Wasserstrom, J. N., & Perry, E. J. (Eds.). (1994). *Popular protest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modern China* (2nd ed.). Boulder, CO: Westview.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11(2), pp. 37-65, July 2021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in the Green Valley: Exploring the Shih Hsin Model

Yu, Tzu-hsia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peech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Media, Shih Hsin University

Wen, Wei-Chu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peech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Media, Shih Hsin University

Abstract

Shih Hsin University, founded in Taipei City by renowned newspaper publisher and educator Cheng Shewo in 1956, has been widely recognized as one of the leading brands in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in Taiwan. The school is famous for its dedication to bridging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its strong alumni network. As such, Shih Hsin is a valuable case and one of the best practices in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This study attempted to analyze Shih Hsin's formula for success as the following: 1. its century-long history of education since the Beijing News College period in the 1930s; 2. its espoused values influenced by Cheng Shewo and his mission as a newspaper publisher, including "cosmopolitanism," "cultivating morality and intelligence," "integrating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I want to speak"; and 3. its strategies ("all media," "all communi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for all") in response to the three divides in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namely the theory-practice divide, the speech-media divide, and the tarrying-passing divide. The study aimed to summarize the features of "Shih Hsin model" in Taiwan's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Keywords: Shih Hsin University, Cheng Shewo, integrating theory and practice,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in Taiwan

* Email: tyu@mail.shu.edu.tw
Received: 2021.3.2
Accepted: 2021.5.21

JCRP 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 成舍我紀念館 Cheng Shu-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 Ainosco Press

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11 卷 第 2 期．頁 67-94．2021 年 7 月
DOI:10.6123/JCRP.202107_11(2).0004

「學科化」與「中國化」：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傳播研究與教育史

劉海龍 *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

秦藝丹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博士生

段世昌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博士生

摘要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系）是中國內地最早引介和從事傳播研究、教育的機構之一。儘管傳播系作為一個獨立的系部成立時間較晚，但從 1960 年代開始，新聞系的張隆棟、林珊教授就開始率先引介西方傳播理論。在 60 餘年裡，人大新聞學院（系）始終走在中國內地傳播學研究和教育的前沿。回顧人大新聞學院傳播研究發展歷程這一經典個案，本文發現，作為一種來自西方的知識，傳播學在中國經歷了漫長的「學科化」和「中國化」過程，它的發展受到學科體制、政治、經濟等外部偶然因素的作用比較大，而非完全受學術邏輯左右，在批判與吸收、政治與市場等張力間搖擺，理論創新有待加強。如果中國傳播學要健康發展，未來的研究應努力保持學術研究的反思性與自主性。

關鍵詞：中國化、現代化、傳播學史、傳播教育、學科化

* Email: liuhailong@ruc.edu.cn
投稿日期：2021 年 2 月 2 日
接受日期：2021 年 5 月 17 日

JCRP 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舍我紀念館 Cheng She-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Ainosco Press

若從輝格史（Whig history）視角，中國內地傳播學發展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從引進到初步自主研究的進步歷程，仿佛一切都是學術邏輯運行的必然結果；而從知識社會學出發，這過程卻充滿外部因素導致的偶然性和其他可能。本文將以中國人民大學（以下簡稱「人大」）新聞學院（系）的傳播學教學與研究為物件，總結傳播學在中國大陸發展過程中的影響因素，尤其是政治、經濟和學科化三個外部因素的影響。

在這背景下，傳播學在中國開始了相應的「學科化」過程，卻也同時體現了傳播研究作為一門西方知識進入當地語系化的「中國化」過程，其中既涉及傳播學知識的當地語系化詮釋及應用，也涉及各類結構性因素對傳播研究路徑的規制；這類似於約翰・彼得斯（John Peters）所說的「建制化」（institutionalization）(Peters, 1986, pp. 535-536)，它是指傳播研究作為一門學科所經歷的從國家承認、建系、招生，到課程安排、教科書撰寫、學術組織、學術刊物、課題專案以及學科評估等一系列的「正當化」過程。

這些外部因素，往往是中國大陸傳播學特殊發展的關鍵背景，它不僅與北美、歐洲有別，也與香港、臺灣等地明顯不同。僅從理論發展的內部理路入手，很難加以闡述，中國人民大學傳播學的發展史正可作為這類思索的具體基礎，其新聞學院（系）是中國內地最早開始傳播研究、教育的機構之一，[1] 這是主要原因。而作為機構成員，本文作者中最長者已在其中有超過 25 年，具有局內優勢。當然，社會學者默頓（R. K. Merton，1910–2003）提醒，局內人難免存在偏見 (Merton, 1972)，因此在研究過程中，儘量將人大新聞學院放到更大環境中與其他同類學院比較，以反思和校正我們的判斷。

在具體寫作上，本文基本按時間順序，但是在某些部分，採取了記事本末體 [2] 的寫法以增強可讀性。從大中華地區，乃至全球來看，中國大陸傳播學的歷史發展呈現了反思和探討傳播研究的知識與社會的關係的另種可能。在考察了非洲的電影生產與觀看實踐後，人類學家布萊恩・拉金（Brian Larkin）曾經問道：如果媒介理論起源於奈及利亞，而不是歐洲和美國，會呈現出什麼樣子？

1 根據中國人民大學學位論文檢索系統統計，到 2021 年 5 月 10 日，共收錄 157 位傳播學博士生學位論文，1,268 名傳播學碩士生學位論文。關於人大的相關發展紀事詳見附錄。

2 紀事本末體是中國歷史書寫方式中與記傳、編年體並稱的體裁，是以歷史事件為主體，完整地敘述一個歷史事件始末的史書體例。創始於南宋袁樞的《通鑒紀事本末》。本論文主要按時間順序敘述，但是有一些現象或者重要問題橫跨不同階段，若採用編年體的寫法，可能會顯得瑣碎，難以看出彼此間的聯繫。因此本文也借鑒了本末體的寫法，在某些重要現象或問題的關鍵節點會順便將其本末加以專題討論。

（Larkin, 2008／陳靜靜譯，2014，頁 344）而通過回顧人大傳播系的歷史，我們想問：如果傳播學誕生在中國，它會是什麼樣子？

壹、無心插柳：政治批判中初涉傳播學

新中國成立後的 1950 年代，中央及各地新聞機構迅速發展；與此相對應，全國僅有復旦大學新聞系和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可以培養新聞學專業人才。在亟需新聞人才的背景下，中共中央於 1954 年決定在人大創辦新聞系，希望能「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建立適應中國新形勢的新聞教育陣地」（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2010，頁 307）。

《人民日報》副總編輯安崗（1918–2013）被任命為首任系主任。1956 年，人大新聞系面向全國擴大招生。1958 年，北京大學新聞專業（其中一部分來自燕京大學新聞學系）合併到人大新聞系，人大新聞系在校學生迅速增加，教師增至近百名，下設新聞理論、採訪寫作、報刊史、編輯、評論、攝影、文學（後發展為中文系和文學院）、漢語、外語（後發展為外語系和外國語學院）等教研室，成為「人大第一系」，也成為當時全國規模最大的新聞系。安崗當時說道：

> 北大加入人大兩個新聞專業的力量，將要等於：堅強的共產主義新聞教育陣地；權威的全國新聞學研究中心；多品種的新聞幹部培養和提高的基地；全套新聞學教材和教學人員的工作母機。（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2010，頁 309）

1950、60 年代，人大新聞系的張隆棟（1917–2009）、林珊 (1918–2014)，復旦新聞系的鄭北渭（1921–2012）、陳韻昭等個別學者較早注意到傳播理論，共同促成了中國傳播學理論引介的第二次重要時刻（第一次為 1920、30 年代）。張隆棟曾在燕京大學新聞學系任教並任代系主任，1952 年院系調整後，任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講師。1958 年北大中文系新聞專業併入人大後，轉任人大新聞系講師。1957 年，林珊也從山東大學調入。

雖然在 20 世紀初期，傳播研究已通過社會學和新聞學等傳統進入中國，包括約翰．杜威（John Dewey）、羅伯特．派克（Robert Ezra Park）訪華，以及民意調查、實用宣傳、廣告、國際傳播及社會心理學等諸領域對傳播問題的介紹與探討（劉海龍，2019），這些零星知識是作為社會學、政治學或心理學引進的，

並沒有一個清晰的傳播學概念。而到了 1950、60 年代，美國的傳播學逐漸在新聞院系中破土而出；同一時期的院系調整又取消了社會學與政治學，也中斷了傳播研究在這兩個學科中的孕育和醞釀契機。

由於新聞屬於大眾傳播的研究範疇，人大新聞系研究世界新聞事業的新聞學者們開始關注到這個新興學科。作為當時全國僅有的兩所專門的新聞研究與教學機構，人大新聞學系承擔著研究世界新聞格局，為國家政治決策（尤其是宣傳政策）提供參考的任務。人員構成的偶然因素促成了人大在傳播研究及教學方面的先著優勢。探究人民大學早期歷史的學者發現，校園裡存在兩個群體，一部分來自解放區，一部分來自國統區。前者政治資格老，但是知識結構不如後者，兩個群體在許多方面存在差異甚至潛在的衝突（Stiffler, 2010／姚昱等譯，2011）。新聞系也不例外，來自北大的師資中，有一部分是原來燕京大學的教授和畢業生。其中有實踐經驗豐富、曾在美學習的業務人才蔣蔭恩（1910–1968）、畢業於燕京大學並留校工作的學者張隆棟，以及有新聞工作經驗、又曾因配偶（經濟學家吳大琨）在美國學習工作而有多年旅外生活經歷的學者林珊等等。他們與從事過中國共產黨解放區報刊實踐工作的教師不同，對於西方學術界和實踐界的最新變化比較敏感，容易接觸到北美及世界範圍內傳播學興起的信號。

不過，這時期傳播研究在美國的建制化道路才剛開始，進入中國的勢頭也比較微弱，國內學者對傳播學並沒有形成整體認識，更談不上學科化意識。它只是在 1960 年批判資產階級新聞學時偶然引進的，政治因素在這過程中扮演著弔詭的角色，而這也是傳播研究早期「中國化」的一個重要體現。換言之，正是因為政治批判，學術機構有了翻譯出版西方「反面教材」的機會，同時國內學者也有了接觸西方最新學術動向的機會。這些資料一直到 1980 年代，都還被學者當作是西方新聞學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引用。

具體而言，全國「反右派」鬥爭後，人大新聞系也掀起了整風運動；由學生主導，審查教授講義，批判其中的資產階級新聞學觀點。為了樹立批判的靶子，自 1960 年起，人大新聞系內部編印了六冊《批判資產階級新聞學資料》。其中第三冊即是對威爾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1907–1987）參與撰寫著作《報刊的四種理論》（*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的翻譯，其中 “mass communication” 均被譯為「公眾通訊」（Siebert, Peterson, & Schramm, 1956／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譯，1960，頁 1-2）。此外，張隆棟在摘譯威廉・愛琳的《大眾傳播研究》一文時，也將 “mass communication” 翻譯為「公眾通訊」（王怡紅、胡翼青，2010，頁 4）。對這一時期的引進背景，林珊就說：「要批判，總得有個東西拿

在手上批判，我們是打著批判的名義引進介紹西方傳播學一些論著。」（轉引自姜飛，2012，頁 21）

學術批判運動直到 1961 年 7 月才停止，而人大新聞系也迎來了文革前相對穩定和安全的發展期。1961 年，《國際新聞界簡報》創刊，至 1965 年 12 月共出版 24 期。創刊號註明「內部教學參考資料請勿外傳」，由人大新聞系編輯，主要介紹國際新聞界的動態和有關資料。這份刊物的最初創辦者蔣蔭恩經常閱讀國外報刊，還為師生編寫了新聞英語詞彙。在同事建議下，他將平日閱讀英語報刊中的一些與新聞有關的文章編譯成冊並排印，將其命名為《國際新聞界簡報》。在資訊閉塞的條件下，它打開了一扇瞭解西方新聞業及新聞研究動態的視窗，其意義實非全球最新研究資料唾手可得的今日可以想像。1979 年復刊的《國際新聞界》交由張隆棟主編，在他的努力下，這份刊物成為引進傳播學的重鎮。

人大新聞系在這時期的穩定壯大以及《國際新聞界簡報》的創辦，為後來傳播研究的引入與發展積聚了相應的人才和平臺。1966 年，人大新聞系再次受到「文化大革命」影響，中止招生，《國際新聞界簡報》也被迫停刊；當時教師受到紅衛兵批鬥、被下放江西五七幹校，極大影響了傳播研究在中國的發展進程。

貳、曲折前行：批判研究的引入與輿論研究所的肇始

1978 年，國務院下發人大復校的文件，並將人大定位為綜合性的人文社會科學大學。同年秋，文革中被遣散到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的教師按原來建制重返人大，人大新聞系復系，並開始招收碩士研究生。1981 年，人大新聞系設立碩士點，1984 年設立博士點，1988 年經校務會討論，成立人大新聞學院，下設新聞系。從 1978–1989 年，人大新聞系共招收近百名碩士研究生。[3] 與此同時，《國際新聞界》也於 1979 年復刊，張隆棟任主編。

在這一時期，以張隆棟為首的教師開始在課堂介紹傳播學，[4] 同時《國際新聞界》也成為傳播研究引介的重要平臺。從 1979–1989 年，《國際新聞界》出版的 42 期，共刊登 62 篇西方傳播學研究的文章（王怡紅、胡翼青，2010）。總體而言，這些文章主要以引介為主，但從 1985 年以後也開始刊登一些原創性的傳播學文章，比如陳力丹的〈傳播學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王志興與郭健等關於

3 學院校友名單，由新聞學院校友工作小組編輯搜集（〈校友天地〉，n.d.）。

4 據王泰玄回憶，這一時期並未開設專門的傳播學課程，但張隆棟會在講授西方資產階級新聞思想相關課程時，添加和延伸傳播學知識（2021 年 5 月 7 日對王泰玄的訪問）。

傳播學研究方法爭論的文章。

人民大學的張隆棟、林珊等人是新聞系引介傳播理論的代表。1980 年，人大新聞系集體翻譯的《報刊的四種理論》正式出版。張隆棟這一時期在《國際新聞界》發表的〈公共通訊的過程、制度和效果〉、〈美國大眾傳播學簡述〉（上、中、下）標誌著中國學者首次較為系統地介紹西方傳播學知識。李彬認為，「這組文章內容廣博，材料翔實，脈絡清晰，新人耳目，可謂（中國）第一代（傳播學）研究者給人印象最深的力作」（轉引自陳昌鳳，2010，頁 736）。林珊編譯的數量也非常突出。1984 年，她翻譯的新聞傳播學經典之作李普曼的《輿論學》由人大新聞系作為內部資料印發，1989 年正式出版，這是國內介紹西方輿論學的第一本專著。她還一直關注傳播的批判學派；1986 年，她與王泰玄（1934–）等人翻譯《傳播媒介的壟斷》，並安排她的學生黃煜翻譯阿特休爾的《權力的媒介》。

除教師之外，新招收的研究生對傳播學表現出了深厚興趣。比如，王志興、範東生、鐘夢白、黃煜等也翻譯引介了不少大眾傳播理論文章。王志興、範東生就參與了《傳播媒介的壟斷》一書的翻譯工作。1985 年，兩人分別提交畢業論文《試析麥克盧漢的媒介決定論》、《試論南北國家間的新聞自由與責任之爭》，這些選題在當時十分前沿。

值得一提的是，由於人大新聞系不少師生的政治立場與西方左派理論存在共鳴，所以比較重視批判理論。《國際新聞界》在這一時期刊登的文章廣泛涉及到對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赫伯特・甘斯（Herbert J. Gans）、本・巴格迪坎（Ben Bagdikian）、詹姆斯・D・哈洛倫（James D. Halloran）、尼・甘納姆（Nicholas Garnham）、阿特休爾（J. Herbert Altschull）等人著作和文章的翻譯。而同一時期的兩大重要學刊《新聞學刊》和《新聞大學》則基本刊登的是經驗學派的文章（胡翼青，2008）。

在 1986 年由人大新聞系承辦的第二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上，王志興提交了一篇會議論文〈歐洲批判學派與美國傳統學派的分析〉。據李彬回憶，這篇論文在當時「好似石破天驚」，因為這令與會者認識到原來傳播學不止美國一家（李彬，2018，頁 12）。1987 年，還在日本學習的郭慶光（1956–）也在人大新聞系主辦的《新聞學論集》第 11 輯發表了〈大眾傳播學研究的一支新軍——歐洲批判學派評介〉一文，系統地介紹了北美和歐洲的傳播批判學派。林珊也曾提及，自己在翻譯完李普曼的《輿論學》後，一直致力於研究批判學派，也曾打算譯介席勒的著作，後來因為被安排教業務課而被迫中斷（劉海龍，2015）。對批判學

派的關注延續了新聞系師生 1960 年代對資本主義保持警惕與批判的政治立場，但是卻意外地打破了美國經驗學派傳播學主導的單一局面，客觀上「糾正」了其不足。不過因為時代的原因，這些「糾正」在當時並未引起大多數人的重視。經過文革將學術政治化的教訓之後，學術界更追求去政治化的「科學」理論，以獲得學術的自主性，因此對他們而言，政治化的傳播批判理論在表達方式及內容上都缺乏吸引力，並且還會讓經歷浩劫之後的人們有種本能的排斥感。同時批判學者關於文化產業、全球傳播秩序的學說對於當時尚未步入資本主義文化生產和全球化的中國來說也存在隔閡，反而是經驗學派的科學理論令人耳目一新。因此這些譯介文章雖然數量不少，但卻未引起新聞學者們的共鳴（劉海龍，2015）。

這一時期人大新聞系也開展了不少對外交流活動，促進了傳播學的引進。1982 年 5 月 5 日，施拉姆訪問人大新聞系。他在人大的學術報告〈美國「大眾傳播學」的四個奠基人〉刊登於《國際新聞界》（Schramm、王泰玄，1982）。施拉姆訪華在當時掀起一波浪潮，也為中國學者帶來一幅「施拉姆版本」的傳播學學科地圖。1985 年 5 月，國際傳播學會（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ICA）主席、英國萊斯特大學教授詹姆斯・D・哈洛倫應邀訪問了人大學新聞系，在三次報告仲介紹了英國的傳播批判學派。1986 年，張隆棟還作為中國新聞學術界的代表參加了在澳大利亞舉行的大眾傳播學術討論會（王怡紅、胡翼青，2010）。

1980 年代人大傳播引介的標誌性成果是張隆棟主編的《大眾傳播學總論》。這本書 1991 年完稿，1993 年出版，是 1980 年代人大師生對傳播學探索的全面總結。這其中既有對傳統美國經驗學派各研究領域的概述，也有批判學派、發展傳播學、輿論學、民意測驗等話題，可以視為是當時人大傳播學研究者們心目中傳播學的「知識地圖」。儘管以今天的眼光看來，這張地圖還不完整，邊界和細節的繪製也存在失真現象，但是它對中國大陸的傳播研究做出了重要貢獻。

1970 年代末到 1980 年代，是中國結束文化大革命並逐漸走向改革開放的關鍵時期，這一時期在政治和思想上較前一階段更加開放，但在政治主導、意識形態堅冰尚未完全破除的 80 年代，政界和學界對於傳播學總體而言仍然持小心翼翼的態度，因此傳播學在這一時期的「中國之旅」，也是一場充滿著政治色彩的曲折之旅。比如在 1983 年「清除精神污染」中，傳播學被捲入其中。1989 年風波之後，傳播學再次被作為「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的一部分，遭受批判，部分學校的傳播學課程甚至停止。陳昌鳳回憶，張隆棟就曾多次和他們說起傳播學在中國的困境，並在課堂上批評一些極左派人士「將傳播學視為資產階級的毒草」，

而直到 1990 年左右，英文的《中國日報》還因出現 “communication” 被批評（陳昌鳳，2010，頁 736）。胡正榮也因此指出：

> 80 年代中期全國新聞界一直在談新聞透明度，談新聞改革，也算是整個學術界對傳播學關注的一個微小聲音，90 年代初期曾經有人認為傳播學是為資本主義服務的學科，所以不敢再談了，甚至有些院校的傳播學課程也被停了。（轉引自袁軍等人，1999，頁 142）

如此，整個 1980 年代，對於傳播學是否是一門科學、是否有階級性、是否可以為中國所用的討論始終存在。1982 年，全國第一次傳播學研討會召開，並確定了對西方傳播學的 16 字方針：「系統瞭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創造」。此次會議的召開標誌著傳播學正式被引入中國並被新聞學學界接受。陳力丹在回憶這次會議時，曾提及一個細節：會上當他提到馬克思曾論過「交往」，大家就叫他趕緊寫一篇論文，「好從馬克思主義那裡找到一些理論依據，以證明研究傳播學是名正言順的」（轉引自袁軍等人，1999，頁 258），這一細節生動地折射出了處於大時代環境下知識分子的心態。

也正是在這樣的社會政治語境下，發展傳播學受到廣泛關注。對於正準備向現代化社會邁進的中國而言，問題就成為：大眾傳播與現代化的關係是什麼？它能夠促進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嗎？人大師生也參與到相關討論中。比如，「青年傳播學研討小組」在成立後就召開了「大眾傳播與國家發展問題」學術討論會，專門討論大眾傳播與國家發展的關係。會議上，人大新聞系碩士鐘夢白將大眾傳播與國家發展的理論分為兩個階段，一是以丹尼爾・勒納（Daniel Lerner）、大衛・麥克理蘭（David McClelland）、埃弗雷特・羅傑斯（E. M. Rogers）、施拉姆為代表，他們以西方發達國家的傳播水準及社會經濟文化狀況作為理想模式，研究發展中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如何開發利用傳播媒介在其中的催化作用；二是以席勒、詹姆斯・柯倫（James Curran）、彼得・戈爾丁（Peter Golding）和加漢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為代表的歐洲批判學派，以及第三世界國家的傳播學者。在鐘夢白看來，批判學派及第三世界國家學者的看法代表了第三世界國家的利益，但也有偏激之處。我們不能犯倒水潑嬰的錯誤，他因此寫著：

> 研究和建立起有特色的大眾傳播與國家發展理論，對於走在現代化道路上的中國，無疑是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劉燕喃等人，1989，

頁 5）

1980 年代，中國上下的一個共識是發展經濟，擺脫貧困，實現現代化。傳播學要獲得學科正當性，必須借助現代化的話語。而施拉姆來中國訪問的直接原因，正是來中國傳授使用最新的電視媒體進行電化教學的經驗。施拉姆等人提倡的發展傳播學，恰好與中國的現代化理論不謀而合，這就為傳播學在中國的引進掃清了障礙。儘管從今天的後知之明來看，發展傳播學所說的現代化與中國領導人所說的現代化目的完全相反。前者是為了遏制共產主義的擴張，而後者則是為了發展和鞏固共產主義（劉海龍，2020）。

除了理論引介外，人大新聞系還率先開展了輿論調查。1986 年，中國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成立，這是我國第一家專門從事輿論研究和民意測驗的學術機構，甘惜分（1916–2016）任研究所首任所長。參加過解放區新聞工作的甘惜分回憶，建立輿論研究所是其多年來的願望，尤其是在粉碎「四人幫」後的強烈願望。

> 粉碎「四人幫」，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人們的思想空前活躍，實現了人們多年夢寐以求的生活活潑的政治局面，這才為更廣泛地瞭解人民輿論創造了條件。（轉引自路元，1987，頁 12）

甘惜分認為，儘管輿論研究是從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開始的，是為資本主義服務的，但輿論調查本身是「沒有階級性的」（轉引自路元，1987，頁 12）。他在反思文革教訓時，意識到其主要問題是缺乏社會主義民主，黨脫離群眾，因此必須做到充分的下情上達。他申請辦報，萬事俱備，但最終因為沒有拿到刊號而放棄。他不得不採取迂迴方式，希望通過輿論調查反映民眾心聲（甘惜分，2005）。他認為對於社會主義的中國，輿論調查結構的主要功能有：促進社會主義政治的民主化；提供決策參考；擴大人民的視野；促進人民與政府的互相瞭解；繁榮學術，建立中國式的輿論學，豐富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意識學說（路元，1987）。1980 年代，輿論研究所也的確開展了不少關於媒介體制、新聞傳播效果等話題的宏觀研究，積極介入時下改革熱點難點，充當「決策的智囊團」的角色，比較典型的報告有《首都知名人士龍年展望的調查》、《關於我國新聞媒介學潮報導宣傳效果的調查》（袁軍等，1999，頁 169-170）。

總的來說，這一時期在英美等西方國家傳播研究逐漸發展壯大，而在國內文

化大革命結束並迅速推進改革開放的浪潮下，它們介入中國的進程相較於前一階段也更加密集和多元。研究者也初步開始形成學派、學科意識，這一點從前面提到的相關文章的題目、學界討論的議題就能有直觀的感受。但是中國彼時特定的政治、經濟因素也使得研究者只能在政治化了的學科大門邊緣「試探」。不過，當傳播研究的實用性逐漸與國家、社會治理主體的訴求暗合時，「學科化」的進程便會提速。

這一時期對傳播研究的引介和吸收為後來傳播學科在人大乃至在中國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也形成了兩條不同的發展路徑：一是學習和介紹西方的傳播理論，二是通過受眾調查，為中國的政治改革和經濟建設服務。

在第一個路徑上，傳播學的引進主要由新聞學者完成，傳播研究被想像和固定為作為新聞學另一階段的「大眾傳播學」、「美國傳播學」。比如，張隆棟在《美國大眾傳播學簡述》中就說：

> 美國大眾傳播學是由新聞學發展起來的，可以說是廣義的新聞學。這就是說，大眾傳播學既包括新聞學，又有它自己的新發展、新理論和新研究成果、新研究方法。（張隆棟，1982，頁 5）

但即便是對美國傳播實證研究的吸收，也存在忽視認識論、方法論的問題（劉海龍，2015）。

在第二個路徑上，傳播學從政治性的民意調查入手試圖影響政治決策，但是當這種民意調查受挫後，又轉而迂迴至通過促進大眾媒體市場化轉型，通過依賴市場的商業媒體反映民意。傳播學便以媒介經濟學的面貌出現在中國。這種傳播學發展路徑強調受眾調查，具有濃重實用主義色彩，為後來傳播研究理論創造力不足埋下伏筆。

參、雛形初成：學科的內部完善與外部正當化

進入到二十世紀 90 年代，傳播學研究的知識生態發生了改變。

在社會背景上，中國社會延續著改革開放的思想路線，注重經濟建設和實效的氣氛也在社會中彌漫開來，學術界整體上更為開放，迫切希望擺脫十年來的知識饑荒，從西方輸入可以回答現實問題的理論。雖然有囫圇吞棗、脫離現實高談闊論之嫌，但是整個社會見賢思齊、學習補課的心態健康向上。在這種時代風

潮下，新一代學者進入人大新聞學院，以刊物《國際新聞界》為主要陣地，延續著早期在傳播研究知識引介和教學方面的優勢，進一步完善傳播研究內部的知識版圖。他們也通過一批奠基性的教材，影響著國內新聞傳播學專業師生的知識體系。1997 年，傳播學作為一門學科得到教育部門的承認，實現進一步的正當化。同時，隨著 1990 年代中國社會從後計畫經濟轉向市場經濟，人大的傳播學者也通過實踐操作導向的研究介入社會，這些構成中國本土語境下傳播學研究的知識版圖。

談及中國大陸傳播學的知識地圖，就不得不提及從日本東京大學留學歸來的郭慶光。郭慶光本科畢業於人大新聞系，後負笈東瀛八年。1992 年回到人大後，郭慶光開設了本科與研究生的傳播理論課程，系統地介紹傳播理論。他撰寫、刊登系列文章，為當時中國傳播學研究提供了有益的知識補充。張隆棟、林珊等人通過文本學習和翻譯傳播理論，郭慶光則具有社會科學的系統訓練與知識結構，全面地呈現了傳播學研究的知識地圖。比如他先後介紹了「沉默的螺旋」理論及其蘊含的大眾傳播、資訊環境與社會控制之間的關係（郭慶光，1995），並且深入探討了傳播學研究的基本對象和問題，從社會資訊系統運行的德國新系統論視角將傳播研究與國家社會治理聯繫在一起，呼應了前面提到的傳播與國家現代化話語（郭慶光，1998a，1998b）。這一觀點與中國當時傳播研究者所熟悉的經驗學派的觀點有明顯差異，後者主要關注於局部的功能論解釋，缺乏社會宏觀視角。

郭慶光 1999 年出版了《傳播學教程》，介紹了人際傳播、組織傳播、大眾傳播等相關理論，成為中國傳播學的權威教材。此書在 2011 年出了修訂版，目前銷量已經突破 150 萬冊。和當時已經出版的傳播學教材以及人大師生編寫的《大眾傳播學總論》相比，這本教材不僅要言不煩地介紹了 1990 年代以前的西方傳播學主要理論，而且擺脫了過去學習闡釋的立場，用系統論和馬克思的交往理論對傳播學的研究物件與基本問題做了獨特的定位，並從中國的問題出發，對傳播與國家制度、國際傳播等問題做了本土化的闡釋。

2006 年開始，人大出版社陸續出版了一套由人大新聞學院教師撰寫的 21 世紀傳播學教材，包括《傳播學綱要》（陳力丹）、《大眾傳播理論：範式與流派》（劉海龍）、《網路傳播教程》（彭蘭）、《大眾傳播研究方法》（陳陽）、《視覺傳播》（任悅）等，更加系統深入地從本地視角整合傳播學的前沿理論，初步形成了人大的特色。這些教材在全國範圍內的大量流通體現了人大傳播學研究對國內傳播學研究長久的影響力。

教材是一個研究領域學科化的重要標誌，它劃定了一個學科的知識地圖。從翻譯資產階級思想的批判材料，到《傳播學總論》，再到銷量 150 萬冊的《傳播學教程》，最後到 21 世紀後出版的系列原創的和翻譯的傳播學教材，人民大學新聞學院三代傳播學者使得傳播學這一模糊的研究領域變得清晰可見，並被社會理解和接受，大量傳播學的概念進入政府檔和日常生活，這和三十多年教材的界定和普及工作密不可分。

在傳播學的引進過程中，一直面臨著政治上的爭議。從延安時期開始到 1970 年代末，中國共產黨的新聞理論一直將階級性、鬥爭性等屬性作為媒介的首要特性，強調媒介的政治維度。而當時中國學者青睞的經驗學派的傳播學則將媒介看成政治中立的透明管道，其主要功能是傳遞資訊。這導致傳播學在很長一段時間裡，被視為不講政治的資產階級思想。比如 1989 年風波之後，傳播學就成為新聞界受到資產階級自由化「毒害」的罪魁禍首之一（吳冷西，1991，頁 69-72），所以學科的正當化一直是懸在中國傳播學教學與研究之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The Sword of Damocles）。[5] 只有在國家的教育體制中獲得承認，傳播研究與教學才能真正擺脫政治風險，健康發展。同時也只有獲得學科正當性，才能獲得現實資源，吸引優秀的研究者投身其中。因此，在中國的語境下，傳播學科得到國家承認，其重要性怎麼強調也不為過。

1992 年，在國家技術監督局批准並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標準學科分類與代碼表》中，「新聞傳播學」被設置為一級學科，下設新聞學和傳播學兩個二級學科。1997 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和當時的國家教育委員會聯合頒布了《授予博士、碩士學位和培養研究生的學科、專業目錄》，該目錄承認傳播學具有授予博士學位的二級學科資格。當傳播學的學科地位得到確認後，大量資源向這一學術領域傾斜，使傳播學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無論是人員隊伍還是知識生產，無論是質還是量，都處於快速增長之中（王怡紅、胡翼青，2010）。人大新聞學院作為比較早引入傳播學知識、展開傳播學研究的重鎮，也憑藉著早已奠定的聲望以及在數量上也佔優勢的博士生導師而繼續獲得在人才教育方面的優勢。2000 年，人大新聞學院獲得新聞傳播學科一級學科授予權；2007 年，學院新聞

5 達摩克利斯是西元前 4 世紀義大利西西島上，古城敘拉古的僭主（tyrant，臺灣一般譯為暴君）狄奧尼修斯二世（Dionysius II，ca. 397–343 BC）的朝臣，他奉承狄奧尼修斯擁有權力和威信，非常幸運。狄奧尼修斯提議與他交換一天的身分，在晚上舉行的宴會快結束時，達摩克利斯才注意到王位上方僅用一根馬鬃懸掛著的利劍。他立即失去了對美食和美女的興趣，並請求僭主放過他，他再也不想得到這樣的幸運。因此達摩克利斯之劍經常被用來形容處於不安全的狀態，地位和財富很容易被剝奪。

傳播學科被評為國家重點一級學科，而二級學科傳播學也同新聞學一起被評為國家重點學科。由人大新聞學院教育、培養出來的博士們，分散在全國各地，擴大了人民大學傳播學研究的影響。

1990 年代市場經濟逐步確立，為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參與全球化競爭，媒介市場化、產業化也如火如荼地進行。經驗傳播研究具有很強的應用性，具有行政管理色彩，其效果研究範式本身就可以為政治和商業服務。當時，快速崛起的市場經濟，一方面能為實用的研究提供充足的資金支援，另一方面它要求理論能夠指導現實，具有實用性。對社會風向敏感的傳播學者也很快自覺地進入到以理論服務現實的這場大潮中。正如喻國明（1997，頁 276）所言，「正視市場進而參與市場，成了世紀末中國大陸新聞傳播領域一道最為突出的風景」。由甘惜分開創的政治民意調查傳統與媒體市場化轉型相結合，孕育了傳媒產業研究的新路徑。喻國明師承甘惜分，憑藉其深厚的理論功底、敏銳的洞察力以及重視實證操作的研究風格，通過大量傳媒產業市場調查和對傳媒業宏觀發展趨勢的研究，成為媒體市場化轉型的專家，獲得了「媒體軍師」的稱號。之後他和人大新聞學院的同仁合力創辦了傳媒經濟學專業。這一路徑構成了人大新聞學院面向實踐、提供現實解決方案的特徵。細究起來，傳統的新聞理論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也具有管理研究的特點。只不過其服務物件不是市場，而是國家；不是提供操作性實踐，而是提供宏觀政策諮詢或象徵性話語資源。

管理研究（administrative research）[6] 這一傳統在人大新聞學院的傳統中由來已久。如果說 1978 年以前支持這一傳統的是左翼理想主義精神和個人生存的需要的話，那麼在 1980 年代改革開放之後，使這一傳統得以延續的原因除了路徑依賴和風格傳承外，更主要的是學科正當性的匱乏。為了獲得國家和社會承認，政治上不被信任的傳播學必須證明自己對國家治理或經濟建設有積極作用。因此，純粹的建構理論的研究或者批判性的研究比例較低或者很難生存，如果有，也主要是應用研究衍生出的理論探討、為論證某些措施存在正當性的辨析，或者具有建設性的批評意見。這一傳統導致的直接結果就是對策性的研究占主導，研究題目追逐政治經濟熱點，注重直接的社會效益，而追求查理斯．賴特．米爾斯（Charles Wright Mills）所謂的結合個人處境與社會結構命題，崇尚理論建構、學術研究公共性，進而與全球社會科學研究進行對話的研究相對較少（Mills,

6 本刊編輯註：此一英文字詞，在臺灣社會中，統一被譯為「行政研究」或「行政性研究」，藉以區別傳播學中的「批判研究」，但也與商業、行政方面的管理研究（management research）有所區別。為尊重作者用法與大陸語言習慣，不對原文進行更動，特此說明。

1959 ／陳強、張永強譯，2005）。

這裡並不是要批評或者指責這種學術取向，而是希望將其作為一個現象和問題，來探討影響中國傳播研究的因素。如果我們從政治、經濟和學科體制三個角度來觀察中國的傳播學研究，就會發現政治意識形態對西方舶來理論的敵意、1990 年代改革開放的經濟背景和學科正當性赤字三個力量的作用下，中國傳播研究在世紀之交呈現出重引介，輕原創；重應用，輕理論的特徵就具有某種必然性。而且進入 21 世紀之後，雖然這三個因素的具體表現有所變化，但其影響變得更加明顯。

肆、深度學科化：國際化與中國話語的張力

進入新世紀，隨著中國加入 WTO（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世界貿易組織），經濟實力不斷壯大。承辦奧運會（北京 2008 年）、世博會（上海 2010 年）標誌著中國國際地位發生改變。經濟發展也帶來社會矛盾與衝突加劇，在新媒體普及的背景下，這些矛盾與衝突迅速擴散。在 2003 年中國 SARS 疫情、[7]2008 年甕安事件、[8]2011 年甬溫動車事故 [9] 等突發事件的處置中，政府開始重視與民眾的溝通與輿論，建立起新聞發布和網路輿情監控系統。國家管理者意識到，傳播學中的管理研究只是工具，也可以為我所用。對於舶來的傳播學的懷疑終於得到緩解，其學科正當性問題的解決為傳播學的發展掃除了後顧之憂。

如果說 1990 年代後期到 21 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傳播學初步解決了自己的學科正當化的話，進入 21 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後，傳播學的學科化不斷深化。一般來說，一個研究領域要成為學科，以下幾個條件必不可少。首先要證明自己對於社會的價值，得到國家和社會的承認。第二要建立專業的教學培養體系。第三要有規範的共識性教材。第四要形成學術共同體和學術團體。第五則要有專業學術期

7 SARS 疫情最初在 2002 年在中國廣東省，並隨後擴散蔓延至國內外，到 2003 年中以後才被逐漸消滅。2003 年 3 月 15 日，世界衛生組織將此疾定名為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此次事件對當時的中國的正常生活秩序、政府治理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8 2008 年，中國貴州省甕安縣因一起女中學生「溺水身亡事件」引發了大規模的群體性事件。當年 6 月，一些群眾對公安機關有關「自殺」的鑒定結果不滿而上街遊行，聚集在政府和公安局門口請願，並最終上演為暴力事件，黨政機關的辦公室、車輛被毀，是一次大規模、影響深遠的群體性事件。

9 2011 年 7 月 23 日，甬溫線浙江省溫州市境內，由北京南站開往福州站的 D301 次列車與杭州站開往福州南站的 D3115 次列車發生動車組列車追尾事故。此次事件在當時引發了諸多關於事故是否與提速有關、提速是否合理、有無盲目追求科技進步之嫌等議題的討論，部分聲音將矛頭指向政府和國家。

刊。第三點前面已經討論過，不再贅述，本節主要討論其他四點。

這裡提出了一個「深度學科化」的概念，它與 1990 年代解決生存問題的「初級學科化」不同，而是一種從量變到質變的擴張、膨脹甚至變形的過程。由於前面提到的政治意識形態的壓力，使得傳播學長期處於正當性赤字的狀態。這種危機感導致了一種過度補償的心理，迷戀學科的規模擴張與外部影響，陷入到追求量化指標和學科評估排名的遊戲之中。比如中國新聞傳播的教學點在短時間內就從幾十個發展到一千多個，一級學會中國新聞史學會在短時間內就從 8 個二級分會擴展到 22 個分會，連續召開了三屆千人大會。每個月各新聞傳播學院會議不斷，繁忙時一個週末會有 5 個以上的新聞傳播的學術會議在全國各地同時召開。[10]

隨著新媒體技術的發展，微博、微信、淘寶、快手、抖音等新媒體的社會影響開始超過傳統媒體，並且深刻地改變了政治、經濟和文化的運行規則，也使得媒體的影響滲透到了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很多與傳播相關的概念、表述流行於社會各個領域，甚至影響到中國主流政治觀念及其話語體系，進入中國共產黨的文件和政府工作報告，比如「互聯網 +」、「媒介融合」等經常見諸黨和政府的表述。在傳播技術面前，傳播研究的應用對策研究顯得捉襟見肘，在電腦與資料統計學等學科面前，傳播學面臨失語，只能在公關、行銷、產品開發等領域從事周邊研究，然而新技術一旦與政治相結合，對政治的路徑依賴使得傳播學找到了新的用武之地。主流媒體的轉型與媒介融合研究、政府的輿情管控與對社交媒體的治理等課題迅速成為傳播學的核心話題。

在這種情況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的傳播研究與教育，也在與時俱進發生著變化。在傳播教育方面，自 1990 年代中期中國接入互聯網，新聞學院便開始進行一系列的新媒體課程教學。2000 年，學院在新聞學專業下增加網路新聞專業方向，並將電腦課程改為網路新聞課，這是國內首家為適應互聯網傳播需要而開辦的專業方向，主要講授課程有「網路傳播概論」、「網路新聞實務」等。2006 年，學院新媒體教研室成立，彭蘭（1966–）任教研室主任，新媒體教研室主要承擔面向所有專業本科學生的「網路傳播概論」課程、面向研究生的「網路傳播研究」等課程，以及「手機媒體研究」等選修課程。2007 年，學院在新聞學專業中增設了數字新聞傳播專業方向，該方向的培養目標是造就一批適應新媒體以及實現數位轉型的傳統媒體需要的新型傳播人才。2016 年 7 月，由人大新聞學院和藍色遊標傳播集團共同打造的「未來傳播學堂」正式成立。作為中國大陸傳

10 這個現象也與中國高校的財政體制有關，每個財政年度的資金使用期限導致每年的特定時期因為要將撥款花掉而召開大量的會議。

播企業與傳播院系首個深度合作專案，「未來傳播學堂」旨在探索培養數位傳播時代的精英人才，未來傳播學堂除新聞學院外，學堂也面向管理學、社會學、法學、國際關係和財經學科合理開放，培養雙學位人才，並且每年遴選 20–30 名學生赴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斯坦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 ）等海外一流院校交流學習。

除了技術導致的傳播學擴張外，深度學科化既給傳播學帶來了新的發展契機，同時也帶來了難以克服的張力。傳播學學科化在人大新聞學院的一個外在的標誌就是傳播學從少數幾門課程，逐漸發展為一個專業，進而成立專門的傳播系，研究教學人員進一步專業化和國際化。

回到深度學科化中的教學培養體制問題。從 1954 年建系開始，人大新聞系即學習蘇聯模式，在教研室為基本單位進行教學與科研，比如知名的有新聞史論教研室、新聞採寫教研室、新聞編輯教研室、新聞評論教研室、廣告教研室、新聞攝影教研室等。2009 年，學院進行結構調整，組建四系一部，即新聞系、傳播系、廣告與傳媒經濟系、廣播電視新聞系、新聞傳播史論教學與研究部，原有的十個教研室自動撤銷。2013 年正式組建傳播學專業，招收傳播方向的本科生。

雖然傳播系成立，但是傳播理論和方法的研究與教學仍然集中在史論教學研究部（前身為新聞史論教研室），知名學者郭慶光、陳力丹（1951–）都屬於這個部。2019 年，新聞傳播史論教學與研究部被撤銷，人員併入其他四個系。史論部中研究傳播理論與方法的教師加入傳播系，傳播系實力大大加強。

2019 年廣播電視新聞系改名為視聽傳播系。隨著近年來新媒體的影響和媒體融合的推進，原有的廣播電視、公關、廣告、攝影等新聞研究與教學紛紛與傳播學融合，視覺傳播、公共傳播、策略傳播、文化產業等更一般的研究領域取代了紙媒介時代的研究領域。因此，人民大學的傳播學研究教學已經不僅局限於傳播系的研究，而是滲透到了所有專業方向。目前既有對傳播基礎理論、傳播思想史、傳媒文化、傳播技術與社會、傳播心理學的基礎性研究領域的深耕，也包括了社交媒體研究、視覺傳播、公共傳播和文化產業等社會熱點議題。近年來隨著人工智慧與大資料的興起，傳播系還開設多門課程系統地介紹了有關計算傳播學的內容，〈計算傳播學〉這門課程也被列為「新聞與傳播學科核心與特色課程創新計畫」課程，由具備電腦專業的教師講授。

從人員構成上看，在以傳播系為主的傳播研究者中，接受過海外教育的老師數量大大增加，由 1990 年代的 2 人，發展到現在的 15 人。近幾年還有畢業於美國的外籍教師加盟。大部分中青年教師有過一年以上的海外訪問學者經歷，師資

力量更為國際化。

2018 年，學院增設與外交部合作共建的「一帶一路」全球新聞傳播全英文碩士專案；增設與國家外文局合作共建的國際傳播博士專案，每年培養 50 名以上的國際新聞傳播人才。從 2020 級起，學院在傳播學專業下新增國際傳播方向。同時學院也積極與網路宣傳部門合作，開展輿情調查，開辦培訓班，培養網路傳播方面的人才。通過與政府的合作，傳播學的正當性進一步提升。

傳播學科的正當化來自社會的承認。而在這些評價體系中，對於中國大陸高等教育來說，教育部的權威排名至關重要，它既事關社會聲譽與生源品質，同時也是獲得國家各類資源投入的重要參考指標。在 2004 年教育部首次一級學科評估中，人大新聞學院名列全國新聞傳播學科第一。在其後的 2009、2012、2017 年三次一級學科評估中，人大新聞學院連續排名第一或並列第一。2017 年，人大新聞傳播學科進入國家「雙一流」學科建設序列。2019 年，傳播學被評為國家級一流本科專業建設點。

教育部的學科評估主要參照理工科的標準，國際影響與國際發表成為其中重要指標。學術發表與影響力被看成是國家文化、科技實力的一種表現。不僅如此，國際發表還被賦予了政治含義。它不僅意味著學術水準的進步，同時還具有打破西方學術話語和價值觀壟斷的政治意涵。

但是在實際操作中，國際發表的兩種意義經常處於緊張之中。國際發表可以解決國內發表中的人情與期刊腐敗等造成的學術標準墮落問題，讓教育主管部門找到一個第三方的客觀標準抽身而出，避免學科評估中因排名引發的爭議。但是，表面上海外發表是中國學術進步的表現，然而若從更深層的政治角度考量，海外發表又意味著承認西方的權威性，甚至人文社科的學者為了發表還可能要符合西方的學術話語體系與價值觀，這又與建立中國話語體系和價值體系的目標相矛盾。有批評者甚至提出這無異於是用中國的財政科研經費支出，來供養西方的學術期刊。於是在近期的學科評估和教學中，教育部強調不能只看學術論文發表，尤其是不能以海外學術發表為評判標準，同時強調不能使用西方的教材作為核心教材。對於像傳播學這樣的舶來學科而言，國際化與爭取話語權之間就產生了難以克服的張力。

沒有學科建制，傳播學研究與教學不穩定，缺乏資源與影響力，然而學科化又必須接受各種評估帶來的規訓。管理部門的評估壓力被轉移到學者身上，與升等和收入聯繫在一起。於是為了追求學術發表數量和刊物級別，研究者，尤其是青年研究者，疲於應付，難以沉下心來進行基礎研究。以發表作為目標，追求短

期效應，已經造成了一系列問題。同時學科化的進一步發展還會碰上評判標準張力所帶來的矛盾，這都使得傳播學的發展方向充滿變數。

傳播學科化加深的另一體現是學術刊物的規範化與國際化。2003 年陳力丹教授從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所調到人大新聞學院，2005 年接替做了十年主編的程曼麗（1957–），出任《國際新聞界》月刊主編。在程曼麗任主編期間，《國際新聞界》重新回歸學術期刊，發展起核心作者，關注國際新聞與國際傳播，從一本稿源不足的刊物變成了有影響的學術期刊。在陳力丹教授的主持下，《國際新聞界》正式實行了匿名審稿制度，並且建立起投稿審稿系統，包括校內稿件在內的所有稿件必須通過同行評議方能刊登。這不僅是新聞傳播類期刊首個實行全面雙盲匿名審稿系統的刊物，在全國社科刊物中也走在前列。同時陳力丹還對原來刊物偏重國際新聞業的定位進行了調整，將其改造為一本新聞傳播的綜合性期刊。隨著刊物定位的轉變，原來那種流於介紹描述性的稿件漸漸淡出，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學理性的論文。同行評審進一步提高了論文的規範性與學術性，也使得學術共同體逐漸在研究價值方向取得共識。這些都成為學科化中積極的一面。

陳力丹主編時期也正是高等教育學科化的重要時期，《國際新聞界》從程曼麗主編初期稿源稀缺，需要主動約稿、找選題，逐漸變成一稿難求的稀缺資源，用稿率不到 10%。職稱晉升與課題申請都需要在高水準期刊發表學術成果，《國際新聞界》在各個期刊影響因數的報告中名列前茅，被列為各學校核心期刊目錄。在新的學術評估指導思想下，中文頂級期刊的地位已經與國際期刊不相上下，這使得過去僅關注國際期刊的「海歸」們也開始重視中文學術期刊。尤其是近年來單篇文章字數增加到 2 萬左右後，篇幅減少，使得論文發表的競爭更加激烈。這些外部因素都促進了稿件品質和國際化水準的提高。

因為刊物品質的提升，《國際新聞界》成為新聞傳播學科國家社科基金首批資助期刊。近些年來，由於開放辦刊，雜誌的話題更具前沿性，視野開闊，成為影響大陸傳播學研究的核心期刊。在香港中文大學、浸會大學合辦的《傳播與社會學刊》2018 年 10 月號所刊登的〈中文新聞傳播學術期刊的評估〉中，《國際新聞界》在大陸學者中的閱讀率和引用率都居於四大刊之首（羅文輝等人，2018）。在歷年南京大學中國社會評價中心的「中國社會科學科學引文索引」（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CSSCI）和「中國知網」的學術期刊影響因數年報中，均名列新聞傳播類期刊前茅，並且在南京大學中國社會評價中心從 C 刊遴選出的百本社會科學期刊（C100）中，成為新聞傳播期刊的代表。《國際新聞界》從簡報到學刊的 1960 年，從初期率先刊登傳播文章尤其是批判學派的

文章，為國內學人打開傳播研究的大門；到現在始終保持開放性、包容性和前沿性，致力於引領、促進大陸傳播學知識生產和對話，對傳播研究在人大乃至於在中國的發展進程產生了重要影響。

除了通過學術期刊促進學術共同體的形成與交流外，學術組織和團體也是重要的媒介。1989 年，在人民大學新聞史教授方漢奇等人的宣導下，中國新聞史學會經國家民政部正式批准在北京成立，方漢奇擔任會長。迄今為止新聞史學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新聞傳播學方向唯一的全國一級學術團體，2014 年民政部出臺政策取消社會團體的分支機構下的分支機構（即三級學會）之後，大量屬於三級分會的學術組織不得不在一級學會下晉升為二級學會才能生存，於是新聞史學會作為本學科唯一的一級學會地位突然升高。到 2020 年為止，史學會下設了 22 個二級分會，除了原有的和新聞史相關的二級分會外，傳播學、新聞學、廣告、公關等本應高於或者同級的學術團體也成為新聞史學會下的二級分會。從 2017 年起，已經連續舉辦了三次千人學術年會。學會現有的團體理事單位 182 個，常務理事單 64 人，覆蓋新聞傳播專業的各個領域。中國新聞史學會的迅速膨脹成為新聞傳播學高速發展和深度學科化的一個縮影。2019 年，人民大學新聞學院的王潤澤教授（1971–）當選為第一任會長。這標誌著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在新聞學和傳播學科影響進一步強化。

除了國家級的學術團體外，人大新聞學院還通過大量會議和培訓推動傳播學的學科化和規範化。例如 2008 年 5 月在人大新聞學院召開的第一屆青年傳播學者論壇，集中了當時以 1970 年代出生的活躍傳播學者，跳過繁文縟節、門戶之見，實現學術觀點互相碰撞、激發的思想。當時的與會者目前均已成為全國傳播學者的中堅力量和各校新聞學際的傳播研究骨幹。這個論壇延續至今已經舉辦了十三屆，持續吸引青年學者參加。從 2009–2011 年，人大新聞學院開辦傳播學前沿問題的暑期學期，由海內外知名新聞傳播學者講授，也吸引了不少傳播研究的骨幹參加。2018 年以胡百精為首的新一屆七零後院領導上任後，開創了小規模「深研會」的學術交流形式，針對一個具體問題，邀請該領域國內新聞傳播領域的專家參加，進行深度交流，至今已經舉辦了 30 多期，其中許多前沿話題獲得了較大關注。

總之，深度學科化在導致傳播學科表面繁榮的同時，也帶來了很多深層的問題。比如，過度內卷帶來低水準重複，甚至自我封閉。注重量化考評使得發表和功利目標成為研究的目的，真正的社會問題和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被忽視。真理踏出半步就可能變成謬誤，這些潛在的問題是我們警惕深度學科化的原因。

伍、總結與討論

過去的 60 多年來，人大傳播學由零星的研究發展為成建制的系所，由打著批判的旗號譯介西方思想演進到努力實現本土創新，由學習傳播學知識發展為探索與中國社會相結合的傳播學教育，既是長期領先的標杆，也推動了中國大陸傳播研究學術共同體的內部對話和外部國際化。

整體來看，人大新聞學院在不同的關鍵節點見證著中國大陸傳播學研究的歷史，並且通過思想譯介、人才培養、刊物出版和學術活動影響著中國大陸傳播學研究的知識構成與版圖。因此人大新聞學院的發展歷史也成為管窺中國傳播學研究發展特徵的重要視窗。

儘管學者們可以左右自己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式，但是外部的知識生態通過規則或資源，引導著學術研究者對研究路徑的選擇。本文主要通過政治、經濟與學科化三個視角觀察人大新聞學院傳播學研究與教學的歷史，其中，學科化是可以最直接觀察得到的影響因素。人大新聞學院雖然是中國大陸最早引進傳播學的學術機構之一，但是正式建制和學科化卻比較晚，一直到 1990 年代才正式開設傳播學課程，1997 年其身分正式得到承認，2010 年前後才正式建立傳播系。當然，這也和傳播專業長期以來在政治上妾身未明的狀態有關係。進入 21 世紀之後，因為新媒體的影響，傳播學才正式被國家宣傳部門接受，成為其輿論治理的手段。而近幾年隨著傳統新聞業的沒落，新媒體和公關宣傳的普及，大部分畢業生都轉向在傳播行業就業。至於在學術研究上，新聞學的傳播轉向就更加明顯。這意味著無論是在研究還是教學上，傳播學都正在取代新聞學的位置。目前中國大陸的新聞院系中，自稱「新聞學院」的只有人大、復旦和武漢大學三家。而這個名稱只不過是標誌著歷史傳承，其真正科研與教學的重點，無疑都轉向了以傳播學為中心。

傳播學科從「資產階級思想」到取代新聞學的地位，也反映了社會環境的變化。其中最重要的莫過於背後的政治與經濟因素的影響。政治意識形態的宣傳方式從宣傳 1.0 發展到了宣傳 3.0（劉海龍，2013/2020）。在宣傳 1.0 時代，政府必須壟斷所有宣傳管道和內容，教育與學術研究也不例外。因此只要有不同於無產階級黨報理論的學說進入學術教育領域，宣傳部門就會提高警惕。認為媒介是中性的傳播學會被批評為不講黨性，進行傳播學調查或民意測驗被指責為別有用心、破壞黨群關係。但是隨著外部環境的開放和新媒體的影響，宣傳部門開始學習用科學的方法進行宣傳，經驗傳播學就變成了中性的治理工具，甚至批判的政

治經濟學派都能夠為政治所用。如果說 1990 年代以前的政治是以壓制的方式對待傳播學的知識生產的話，進入宣傳 2.0 和 3.0 時代，政治則是以米歇爾．福柯（Foucault, 1975／劉北成、楊遠嬰譯，2012）所說的知識——權力的方式促進傳播學的知識生產。

在對傳播學的影響中，經濟與政治很難截然分開，甚至在某些時候是政治的另一種表現，但是它也以獨特的方式影響著傳播學。1990 年代傳統媒體的市場化與產業化，促進了受眾研究與媒介產業研究。而 2010 年之後新媒體的興起則促進了媒體技術、大資料、媒介融合等領域的研究。技術正在成為政治、經濟和學科化之外的又一重要因素影響傳播研究。

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來看，人大新聞學院的傳播學以及更一般的中國傳播學發展史受到的外部因素的影響遠大於學術研究自身邏輯的影響。對於傳播學這樣一個同實踐結合十分緊密的學科來說，人大新聞學院的傳播學並不是孤例。美國新傳播研究史的研究也發現了類似的現象，傳播學的興起更多的不是學術邏輯產物，而是外部因素作用的產物 (Pooley, 2008)。就這一點而言，人民大學新聞學院乃至於全國傳播研究的興起與其「美國同行」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更進一步觀察，在本文描述的「中國化」過程中，學科化及社會政治、經濟影響因素及影響程度又具有特殊性，尤其是近年來政治主導下的深度學科化尤其值得警惕，這一點與中國一百多年來的歷史境遇及發展狀況有密切的關係。

當然，如果超越自治／他治這種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的思維來看待學科發展，會看到傳播學科與中國其他學科一樣，無法脫離社會語境獨立存在。我們也很難想像，中國的傳播學科如果脫離了國家或政治是否還會像今天這樣受到重視。所以問題的關鍵不是完全排除這些以政治為中心的外部因素的影響，而是如何在政治、經濟、學科化、技術等多個外部因素的影響下，保持學術研究的反思性與主體性，形成一個具有基本學術共識的共同體，緩衝政治與經濟的影響。與此同時，不斷地與來自不同環境的傳播學者進行對話，在彼此的映照下看到自己的不足與獨特性，發展扎根於本地的傳播理論與實踐。

參考書目

Schramm, W. 著、王泰玄記錄（1982）。〈美國「大眾傳播學」的四個奠基人〉，《國際新聞界》，4（2）：2-4。

王怡紅、胡翼青主編（2010）。《中國傳播學 30 年：1978–2008》。北京：中國

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編譯（1960）。《報刊的四種理論》。北京：編者。（原書 Siebert, F. S., Peterson, T., & Schramm, W. [1956]. *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2010）。〈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歷史概述〉，新聞學論集編輯部（編），《新聞學論集（第 25 輯）》，頁 306-329。北京：經濟日報。

甘惜分（2005）。《一個新聞學者的自白》。香港：香港未名。

吳冷西（1991）。〈新聞輿論界的作用令人深思〉，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中國新聞學會聯合會（編），《中國新聞年鑒 1990》，頁 69-72。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李彬（2018）。〈追憶一次陽光燦爛的學術會議——並以此紀念改革開放四十年〉，《新聞記者》，426：10-13。

姜飛（2012）。〈中國傳播研究的三次浪潮——紀念施拉姆訪華 30 周年暨後施拉姆時代中國的傳播研究〉，《新聞與傳播研究》，19（4）：19-32。

姚昱等（2011）。〈創建「新中國第一所新式正規大學」：1949–1950〉，周傑榮、畢克偉（編），《勝利的困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最初歲月》，頁 303-324。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原書 Stiffler, D. [2010]. Creating "New China's first new-style regular university," 1949–50. In J. Brown & P. G. Pickowicz (Eds.), *Dilemmas of victory*：*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p. 288-308].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胡翼青（2008）。〈雙重學術標準的形成：對批判學派「夭折」的反思〉，《國際新聞界》，30（7）：11-14，87。

〈校友天地〉（n.d.）。《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上網日期：2020 年 10 月 15 日，取自 http://jcr.ruc.edu.cn/zw/xytd/xymd_xy/ssyjs_xy/index.htm

袁軍、龍耘、韓運榮（1999）。《傳播學在中國——傳播學者訪談》。北京：北京廣播學院。

陳昌鳳（2010）。〈懷念敬愛的張隆棟先生：中國傳播學的開山者〉，王怡紅、胡翼青（編），《中國傳播學 30 年：1978–2008》，頁 735-738。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

陳強、張永強譯（2005）。《社會學的想像力》。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

書店。（原書 Mills, C. W. [1959].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陳靜靜譯（2014）。《信號與噪音 ——尼日利亞的媒體、基礎設施與都市文化》。北京：商務印書館。（原書 Larkin, B. [2008]. *Signal and noise: Media, infrastructure, and urban culture in Nigeria*. Durham, UK: Duke University Press.）

張隆棟（1982）。〈美國大眾傳播學簡述（上）〉，《國際新聞界》，4（2）：7-16。

郭慶光（1995）。〈大眾傳播，信息環境與社會控制——從「沉默的螺旋」假說談起〉，《國際新聞界》，17（zl）：4-9。

_____（1998a）。〈傳播學的研究物件和基本問題（上）〉，《國際新聞界》，20（2）：41-48。

_____（1998b）。〈傳播學的研究物件和基本問題（下）〉，《國際新聞界》，20（3）：51-55。

喻國明（1997）。〈九十年代以來中國新聞學研究的發展與特點〉，《新聞學研究》，55：272-290。https://doi.org/10.30386/MCR.199707_(55).0015

路元（1987）。〈建立中國的社會主義輿論學 ——訪中國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所長甘惜分〉，《中國記者》，158：12-14。

劉北成、楊遠嬰譯（2012）。《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原書 Foucault, M. [1975]. *Surveiller et punir: Naissance de la prison*. Paris, French: Gallimard.）

劉海龍（2015）。《重訪灰色地帶：傳播研究史的書寫與記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_____（2019）。〈中國傳播學 70 年：知識、技術與學術網路〉，《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8（5）：106-114。

_____（2013/2020）。《宣傳：觀念、話語及其正當化》（第二版）。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

_____（2020）。〈施拉姆與中國傳播研究 : 文化冷戰與現代化共識〉，《新聞與傳播研究》，27（6）：92-109，128。

劉燕喃、袁方、朱國聖、林述安、鐘夢白（1989）。〈青年傳播學小組舉行「大眾傳播與國家發展問題」學術討論會〉，《國際新聞界》，11（1）：27-31，5。

羅文輝、紀盈如、李宗亞（2018）。〈中文新聞傳播學術期刊的評估〉，《傳播

與社會學刊》，46：183-231。

Merton, R. K. (1972). Insiders and outsiders: A chapter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 9-47. https://doi.org/10.1086/225294

Peters, J. D. (1986). Institutional sources of intellectual poverty i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3*, 527-559. https://doi.org/10.1177/009365086013004002

Pooley, J. (2008). The new history of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D. W. Park & J. Pooley (Eds.), *The history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ontested memories* (pp. 43-69). New York, NY: Peter Lang.

附錄：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系）傳播學大事記

年分	人大新聞學院（系）傳播學大事記
1952	全國學科調整中燕京大學新聞學系併入北京大學中文系。
1955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成立，安崗擔任首任系主任。
1957	兩次全國新聞工作座談會；新聞系「整風鳴放」運動。
1958	北大中文系新聞專業併入人大新聞系。
1960	批判資產階級新聞思想運動（1960.4–1961.7）； 內部出版六本西方新聞傳播學譯著作為批判材料。
1961	《國際新聞界簡報》創刊。
1966	新聞系停止招生；《國際新聞界簡報》停刊。
1970	人民大學停辦，新聞系辦學中斷。
1971	人大新聞系大部分教師成建制分配北大中文系（1971–1973 年）。
1978	北大新聞專業教師按建制重返人大，人大新聞系復系。
1979	《國際新聞界》恢復出版。
1981	新聞學專業碩士點獲批；《國際新聞界》公開發行。
1982	威爾伯．施拉姆訪問中國，並於人大新聞系講座。
1984	新聞系設立博士點。
1985	廣播電視專業成立； ICA 主席詹姆斯．霍洛倫（James Halloran）來新聞系講學。
1986	輿論研究所成立，甘惜分任所長； 第二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在人民大學新聞學院黃山培訓基地召開。
1988	組建新聞學院，何梓華（1931–2018）任院長。
1989	中國新聞史學會在北京成立，方漢奇任首任會長。該會是中國新聞與傳播學界唯一的國家一級學術團體。
1993	張隆棟主編的《大眾傳播學總論》出版； 現代廣告研究中心成立。
1998	增設傳播學碩士點、博士點獲批。
1999	郭慶光任院長； 郭慶光著《傳播學教程》出版。
2000	獲得新聞傳播學科一級學科授予權； 新聞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被批准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 新聞專業下增設網路新聞方向。
2003	設立新聞傳播學博士後流動站。
2004	在教育部首次一級學科評估中，人大新聞學院名列全國新聞傳播學科第一。
2005	趙啟正任新聞學院院長，高鋼任新聞學院常務副院長。
2006	21 世紀傳播學系列教材陸續出版，包括《大眾傳播理論：範式與流派》、《網路傳播教程》、《大眾傳播研究方法》、《視覺傳播》等。
2008	第一屆中國青年傳播學者研討會在人大新聞學院召開。

年分	人大新聞學院（系）傳播學大事記
2009	倪甯任常務副院長； 傳播系成立； 人大新聞學院在教育部第二次學科評估中名列全國新聞傳播學科第一。
2012	人大新聞學院在教育部第三次學科評估中並列全國新聞傳播學科第一。
2013	正式組建傳播學專業。
2014	郭慶光任執行院長。
2017	人大新聞傳播學科進入國家「雙一流」學科建設序列； 人大新聞學院在教育部第四次學科評估中並列全國新聞傳播學科第一； 胡百精任執行院長； 設立「計算傳播」等跨學科課程。
2018	增設與外交部合作共建的「一帶一路」全球新聞傳播全英文碩士專案。
2019	傳播學被評為國家級一流本科專業建設點； 廣播電視新聞系更名為視聽傳播系； 新聞傳播史論教學與研究部撤銷，相關人員併入傳播系； 陸續引進多名外籍教師，講授傳播心理、資訊產品設計等課程； 中國新聞史學會第三屆學術年會在中國人民大學召開，王潤澤當選為新一任會長。
2020	傳播學專業下增設國際傳播方向； 周勇任執行院長。

資料來源：新聞學院院史（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2010）。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11(2), pp. 67-94, July 2021

"Disciplin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The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Education at th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a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Liu, Hailong*

Professor,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 Yidan

Ph.D. Student,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Duan, Shichang

Ph.D. Student,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The School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a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RUC) is one of the first few institutions of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in the Chinese mainland to introduc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o China. Despite the relatively late establishment of the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at RUC as an independent institution, two professors in the journalism department, Zhang Longdong and Lin Shan, had started introducing Western communication theories to China since the 1960s. For more than 60 years, the School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at RUC has always been at the forefront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education in China. After reviewing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th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at RUC, this study found that, as an academic discipline from the West, communication studies underwent a long process of disciplin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in China. Its development was influenced less by its academic logic but more by external and accidental factors such as the process of disciplinization or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orces. The communication discipline

* Email: liuhailong@ruc.edu.cn
Received: 2021.2.2
Accepted: 2021.5.17

JCRP 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 謝舍我紀念館 Cheng Shie-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 Ainosco Press

was swaying between being critical and being receptive as well as between politics and markets. As such, the theoretical creativity in the discipline remains to be improved. For the communication discipline in China to develop in a healthy way, the future research efforts should strive to maintain academic autonomy and reflexivity.

Keywords: localization, modernization,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education of communication, disciplinization

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11 卷 第 2 期．頁 95-130．2021 年 7 月
DOI:10.6123/JCRP.202107_11(2).0005

困境、變革與反思：數位匯流下新聞教育的案例研究

馬耀祖 *

世新大學傳播博士學程博士候選人

摘要

數位匯流為傳播生態帶來巨大衝擊，包括新聞報導方式、生產機制以及媒體結構與營運模式等，這些根本性變化同時也啟動全球新聞教育的變革浪潮，性質從試探性增補課程到大刀闊斧的全面整合，不一而足。本文爬梳新聞傳播匯流課程變革過程中諸多不利因素以及不確定性，藉以反思當前教育變革的適切性，並拋出傳播教育改革全新思維的可能方向。文內以國內某傳播學院新聞系為研究個案，一則用以檢視個案在實施大一大二不分系後，學生對於新制度實施的整體反映；二則作為上述課程變革不利因素的部分參照。本文訪談兩位教育工作者，作為與學生端意見調查互為檢證的對照，並有助瞭解匯流課程變革在實務面上的現狀與潛在問題。

關鍵詞：大一大二不分系、新聞教育、匯流課程、數位匯流

* Email: masir5189@gmail.com
投稿日期：2020 年 3 月 24 日
接受日期：2021 年 4 月 6 日

JCRP 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舍我紀念館 Cheng She-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Ainosco Press

壹、問題意識

當代對於「傳播媒體」的概念始終處在變化當中。從過去平面媒體（書籍、報紙、雜誌等）與視聽媒體（廣播、電視、電影等）的簡單分類，到有線電視、錄放影機、衛星、電腦網路、光纖、雷射、高畫質電視、行動電話等「新傳播科技」；21 世紀 Web 2.0 興起，YouTube、Facebook、Twitter、Line 等「新（新）媒體」開啟雲端紀元，OTT 服務（Over-the-top media services）更在生活中日形重要。傳播媒介因匯流科技不斷擴張疆界，持續地挑戰傳統的媒介定義。早在 20 世紀後期，由於社會快速變遷及新傳播科技湧現，國內大學曾出現因應新興科技而增設系所的現象（須文蔚、陳世敏，1996），也迫使傳統的新聞、廣告、廣告電視（簡稱廣電）等系所不斷調整課程，努力尋求新定位（潘家慶等人，1996）。國內的新聞傳播研究與學門發展，逐漸步上學者所形容的「嘈雜」（須文蔚、陳世敏，1996）而「眾聲喧嘩」（夏春祥，2002）的階段。

面對新科技對於新聞傳播教育的衝擊，傳播學術社群也曾積極回應。權威指標學術期刊《新聞學研究》曾分別在 1996 年（第 53 期）、1999 年（第 58 期）、2000 年（第 65 期）以及 2001 年（第 69 期）廣泛地大幅探討與獻策，至今仍有參考價值。2018 年，《新聞學研究》則以「數位時代新聞傳播教育的改變與挑戰」（第 134 期）為題，廣邀專家學者共同檢視傳播教育的處境，凸顯了數位媒介匯流趨勢下，為當前新聞傳播課程設計和實作帶來的沉重壓力。今年（2021）元月，《傳播研究與實踐》更擘劃探討新聞傳播知識生產建制化（institutionalization）之專題，關注於「產生學科共識與規範學門行動的互動過程如何形成」（夏春祥，2021，頁 i），對華人新聞傳播教育的變革歷程進行更全面的檢視。

其中，新聞教育是傳播學門中最受匯流科技趨勢衝擊的一個學術領域，畢竟新聞實踐技能培訓，幾乎占全球所提供課程總數的一半 (Deuze, 2006)。衝擊之大，甚至連新聞學發源地的美國也束手無策，美國知名研究單位 Poynter 學者 Roy Clark，形容「美國的新聞學教育已陷入混亂的情況」（轉引自 Larkin, 2008, p. 21）。因此，新聞學門教育屢屢遭遇到存在合理性的叩問（嚴三九、南瑞琴，2017），學門處境嚴峻不難想像。換言之，「匯流」論述雖已成不可逆的全球現象 (Wotkyns, 2014)，然而，對於推動匯流課程變革的機制卻有不少批判或質疑，例如 Slaughter & Leslie (1997) 提出的「學術資本主義」（academic capitalism），以及基於學校的生存以及合法性危機的「新體制理論」（new institutionalism）等觀點。

尤其是新體制理論提醒教育者，基於某些現實因素，許多課程變革背後可能潛藏著「偽裝面」（camouflage）與「儀式性」（ceremony）：前者是指為了維持（院系所）存在的合法性；後者則暗示變革通常只是作為穩定教育事務的功用，而不是企圖改變組織的制度性規則與價值（卯靜儒，2014）。本文立基於新體制論，試圖爬梳新聞傳播匯流課程變革過程中，諸多不利因素以及不確定性，藉以反思當前匯流課程變革的必要性與適切性，並拋出新聞傳播教育建制化全新思維的完整檢視與可能方向。而這期間在不同條件與歷史因素下，國內新聞傳播學院陸續採取不同規模的學制或課程變革措施。例如：1999 年銘傳大學成立國內第一所採「大一大二不分系」的傳播學院（但在 2014 年改回原制）；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則仍以媒介屬性設立系所，2010 年 99 學年度以前，先以學程制度進行改革，後來則回歸系所建制，但設立全校必修的「全媒體識讀」（Omni Media Literacy）[1] 課程，並首度將「程式語言」列為共同必修課程；[2] 而政治大學（簡稱政大）傳播學院在醞釀多年後，在 103 學年度也正式實施「大一大二不分系」，強調整合的傳播能力。

近年來，匯流課程變革聲浪確實有增無減，但目前相關研究較少觸及這類議題，本文以國內某傳播學院新聞系為研究個案，藉以檢視個案在實施課程變革後，學生的整體反映以及可能成效，尤其是針對「大一大二不分系」的變革方向。此外，也從教育行政視角訪談兩位新聞傳播教育者，作為檢證與對照，或可作為國內新聞傳播教育改革的他山之石。

貳、課程變革的考量因素

在有關課程變革的討論中，主要的關懷大都圍繞著：教什麼？如何教？以及誰來教？等議題探討（李曉靜、韓羽昕，2018；許瓊文，2007）。然而，更重要的是，如何理解和探討這些在新聞傳播領域所發生的變化，以及它們會遇到哪些阻力，會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等（嚴三九、南瑞琴，2017）。深化對於這些問題的認識，不僅有助於批判性理解課程變革的整體過程，也有益於新聞傳播學門的

1　面對數位媒體帶來的無限可能性，考量學生必須具有判斷全媒體內容以及觀察其衝擊與效應之能力，世新大學成為全臺第一個（106 學年度）將「全媒體識讀」列為全校必修的學校，該課程調整前原名為「媒體識讀」（最早設立於 92 學年度），類似媒介素養的關注，以系所班級為單位進行教學，目前則為百人以上的大型講座課程。

2　世新大學基於現代的新聞採編製播流程愈來愈像「一人樂隊」的演奏方式，即一位稱職、有競爭力的記者，不但要能採、編、寫、拍，還要能上網、懂視覺效果、會程式語言等能力，因此，於 107 學年度將程式設計列為校共同必修課程，以強化全媒體視野和應用能力的培養。

建制與持續發展的思考。其中，匯流課程變革過程仍存在著諸多內外在變數以及不確定因素，引起各界對於推動變革在時機必要性與內容適切性的疑慮。

一、內在變數：學術界

大致而言，傳播學界面臨匯流課程變革壓力，其變數主要是涉及兩大面向：鉅觀的制度面（包括師資結構、財務資源等）以及微觀的互動面（包括學生態度、教學與學習成效等）。

（一）制度面

1. 師資與教學

匯流技能課程的推動與落實，必然需要有合格或適當的師資。然而，新聞傳播學校大多面臨師資困境，而且是全球性的。從文獻上來看，其主要原因，包括教師缺乏數位匯流（或多媒體）類型的相關技能（鄭素俠，2012；Lowrey et al., 2005；Utsler, 2002）、適合的匯流師資難以招聘 (Aumente, 2007)、教師缺乏足夠的時間進修或準備 (Larkin, 2008) 等眾多因素。

國內匯流師資狀況則主要是長久的結構性問題。根據傳播學者倪炎元表示，國內 40–45 歲以上的師資，大多是接受傳統媒體觀念的訓練養成，因而成為匯流趨勢下最直接受到衝擊的一群老師（轉引自蘇蘅等人，2018）。事實上，現今老師們不僅要費心調整和準備相關課程，往往還背負產學合作績效等要求，壓力相當沉重。

整體的困境還在於，有心保持對新聞傳播和商業技術變化做出回應的教師，得面臨不斷更新其課程的窘況；不僅教授較低階的技能課程，還要教授較高階的理論課程。即使在條件允許下，還涉及雇用適任的新教師 (Bhuiyan, 2010)。然而，隨著普遍財務吃緊，教師聘用的趨勢，往往是維持最少名額或維持現有數量。

師資的難題，也存在於匯流教室當中。澳門學者章戈浩在他教學實踐的自我反思中，提到當代新聞教育正在遭遇的合法性危機，其中指出代際危機和方法論危機（轉引自鄭廣嘉、秦靜，2016 年 1 月 12 日）這兩項因素。代際危機，是指數位原住民的學生與數位移民的老師之間的矛盾；方法論危機，則是指文科背景的教師要如何教授當代新媒介技術。國內新聞學者劉慧雯也引用 Prensky (2012) 的觀點，描述了現代師生的這種弔詭關係：

> 一方面，教育者擁有操作符號與邏輯形式的能力，因而可以清楚說明數位工具與公民素養的關係；然而另一方面，老師教者卻因為自身就是數位移民者，講起話來，老是帶著濃厚類比腔，卻想像著自己能夠教導在地人（即數位原住民）他們早就熟悉的語言。（劉慧雯，2015，頁 70）

因此，教育者（即數位移民）的多媒體技能是否與學生（數位原住民）保持同步？經常被視為推動匯流教育是否真正落實的關鍵指標之一 (Bhuiyan, 2010)。然而，這種被翻轉的「一組教與被教的關係」，卻潛藏一些可能的危機。例如面對紛繁複雜的媒介型態與技術應用，匯流教育者可能會成為個別新技術的追逐者（王維菁，2018 年 7 月 23 日）；此外，新媒體時代大量新內容的湧現，也對老師們的知識結構帶來重大挑戰（鄭廣嘉、秦靜，2016 年 1 月 12 日）。

2. 財務與資源

課程推動的不利因素，也包括財務吃緊和資源短缺，以及老師們在時間上的明顯不足。許多學校坦言沒有足夠的時間或資源，進行新課程調整以及匯流新教師的培訓，遑論購買一些昂貴的軟硬體設備 (Cochie, 2008; Kolodsky, 2006)。更新或添購現有設備，通常涉及為數不小的財務支出 (Bhuiyan, 2010; Birge, 2006; Mencher, 2002)；但學校為了保持生存與競爭能力，又不得不考慮更換或添購新設施，因此常陷入兩難。

此外，許多文獻都表明，老師們在教學時間上普遍不足 (Aumente, 2007; Larkin, 2008)。例如 Wilson Lowrey 等學者在調查預測大學引入匯流的因素時發現，「生師比」過高是美國反對引入匯流課程的因素之一；而師生比高的情況，其實就意味著「教師們必須有更多的時間來設計、倡導以及實施課程變革」(Lowrey et al., 2005, p. 44)。根據 2018 年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n.d.）的資料顯示，國際上的高教生師比數據，例如：美國 15.8、英國 19.9、法國 15.6、日本 10.4，甚至中國也仍有 17.3。反觀國內大學的生師比，根據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n.d.）關於 2019 年的資料顯示：公立大學為 18.84、私立大學為 24.36，平均為 21.84，國內高教師資的處境顯然更為艱辛。

3. 課程與配置

首先，從實務面來看，由於匯流科技的相關平臺、軟硬體技術發展快速，

要選定教授哪些技能課程，並非易事。美國佛羅里達大學新聞系主任 Ted Spiker 即曾感嘆：當必須進行全面課程改革時，新聞教育者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就是能否找到一種使課程保持在最新狀態的方法（轉引自 Wordsman, 2014, December 18）。在新傳播科技變化日新月異的情況下，讓課程「保持最新狀態」顯然是一項沉重負擔，且普遍出現在傳播概念下的各個範疇（夏春祥，2002，2016；游梓翔、夏春祥，2003）。

其次，為了快速地進行課程變革，學校通常會採取添加單一專業課程方式（往往是個別的特定技術），這雖可以應對不斷增長的新技能或突然出現的特定技術，以及新的教育理論等需求 (Wordsman, 2014, December 18)。然而，這種一味追逐個別科技、媒介或工具，遇到新技術就開一門課的情況，國內傳播學者王維菁曾批評為是一種「吃 buffet」現象（轉引自蘇蘅等人，2018），使得新聞教育淪為職業訓練所。再者，上課時數也是課程變革阻礙的一環。以美國新聞學校為例，為了追趕匯流趨勢，造成與技術相關的課程過多，導致基礎寫作課程的學習時間限制在 30 小時之內；對此，新聞學者 Melvin Mencher 形容為一種「災難性的影響」（轉引自 Rogers, 2010, September 12）。這種對於技術取代課程而帶來的災難性後果，主要是反映「大學生將再也無法接受到新聞學的基本職能教育」的憂心 (Grant & Wilkinson, 2009; Rogers, 2010, September 12)。傳播學者夏春祥（2002，頁 23）因而主張，課程變革是必要且關鍵的工作：「參與之必要，謹慎之必要」。

類似的憂心，也表現在國內大學的學分數限制上。輔仁大學傳播學者張文強就指出，以現在教育部所規定的 128 個學分，如果要加入「大數據」、「視覺化」等這類匯流課程，勢必就得取消其他非匯流課程（轉引自蘇蘅等人，2018）。這意味著，匯流課程將對更重要的新聞基礎能力教學，形成一定的排擠效應。

（二）互動面

1. 學生的態度

匯流課程的阻力之一，也來自學生本身的抗拒。有些是源自早期以媒介分類的遺緒所致，例如針對楊百翰大學（Brigham Young University）匯流新聞編輯室的一項研究，就揭示了一種學習上的「文化障礙」，即新聞科系學生對於廣電專業的運作，大多抱持懷疑的態度 (Hammond et al., 2000)；相關研究也指出，學生和教師對於特定媒介類型的認同，被證明是美國堪薩斯大學推動匯流課程的阻力

之一 (Lowrey et al., 2005; Utsler, 2001)。

美國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著名的 Medill 新聞學院，在 2007 年實施全新的匯流課程時，不僅校友對於放棄傳統教學方法表達不滿，學生們的接受度也不高，認為新課程降低了他們最在乎的「良好寫作能力」(Cochie, 2008)。國內相關研究也支持這些現象，學者許瓊文在針對學生實習媒體的研究中發現：

> 從學生的反應，卻發現他們對過去有專業領域分組的懷念，不少學生抱怨《e 報》要求學生要輪流參加新聞組、編輯組、工程組、公關組、影音組是不合理的，他們只對某些特定領域有興趣，也願意多花一點時間研究自己有興趣的領域。（許瓊文，2007，頁 18-19）

在教學現場，設置新媒體技術這類課程，許多教師認為對於學生而言，不僅學習的門檻高，而且由於技術發展的速度太快，今天所學，明天可能就過時了；而跟專業技術人員相比，新聞科系學生學技術，顯然也更不具有優勢（彭蘭，2015）。

2. 教學與學習

許多對於匯流課程的反對或抵制，則是對學習成效的質疑。在 Birge (2006) 對南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關於匯流核心課程的調查中，許多教師回應了這種擔憂：認為匯流課程削弱了關鍵新聞技能的教學，例如寫作和批判性思維；傳播學者 Tanner & Duhé (2005) 在關於媒體匯流對於傳播教育的影響研究中，也呼應了相同的觀察。許多研究更表明，匯流教學很難提供在任一種媒介上所需的深度學習，尤其在普遍強調所謂「背包記者」（backpack journalism）或「全媒體記者」的概念下，容易造成學生「什麼都會，卻什麼都不專精」的尷尬現象 (Wotkyns, 2014)。

美國傳播學者 Elizabeth Birge 更直言匯流趨勢是一項「昂貴的錯誤」，它讓學生雖然學會基本的多平臺能力，卻失去了更重要的專業能力。他並舉南加州大學 Annenberg 新聞學院為例，該校在推動匯流課程一年之後放棄，就是教師意識到所謂匯流課程，往往是以犧牲學生的基本技能為代價 (Birge, 2006; Callaghan, 2009)。總之，批評者大多認為，「超級記者」（super-journalist）這種教學法，

無益於學生將來的新聞事業，因為他們不再專精於新聞業的任何利基能力 (Quinn & Filak, 2005)。

3. 跨領域藩籬

在推動匯流課程的理念上，還有一個關鍵的支撐要件：跨學科學習。從近幾年的發展來看，很明顯地，圍繞著跨學科方法（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的匯流教學，似乎已經形成了一種學術共識 (Wotkyns, 2014)。然而，誠如學者 Jerome Aumente 在關於匯流新聞教學變革的文章所指出的，匯流教學成效的主要阻礙之一，就是跨學科教學的難以落實 (Aumente, 2007)。

確實，就課程設計而言，跨學科的課程內容要占多少比例、範圍要包含哪些領域等，都茲事體大，要綜合考量這些問題並提出方案，其難度與複雜度都很高。如同長期關注新聞教育改革的中國大陸學者蔡雯（2017）所言，追求複合型、厚基礎的目標雖好，但在現實操作中，由於課程資源的配置是跨學科的，因此對教育品質的控制難度很大，鑒於大學四年時間有限，存在兩方面都做不到最好的風險。

儘管認知到跨學科學習對於落實匯流課程變革的重要性，但面對知識領域的無限細分和無限擴展，可能成效不彰，甚至無濟於事。事實上，已有學者從「技術自主性」的角度認為，新聞傳播教育從多媒體技能和跨學科知識兩個方向培養全能型人才，太過於理想化（唐海江，2016；張小琴、胥佳，2018）。

二、外在變數：媒體業

課程變革的阻力更直接受到外部因素的牽引，可以從兩大方面考察：一是產業面，一是技術面。

（一）產業面

雖然文獻大多表明，有愈來愈多新聞系所採用匯流課程，然而一些調查卻反映出不同的訊息，即業界對於匯流變革並不積極，相關作為也不明顯 (Lowrey et al., 2003, November)。儘管學界大多認為，產業需要具備匯流技能的新聞專業畢業生，但正如學者 Stephen Shepard 所形容的，就業市場並未像匯流修辭所暗示的那樣轉變。因此，當前匯流課程的這股趨勢，就頗耐人尋味 (Lowrey et al., 2003, November; Shepard, 2007)。

1. 媒體業者高層

學者 Massey (2010) 曾分析二百多個新聞工作職位發現，傳統新聞媒體機構的勞動力市場，對於匯流技能的需求並不高；並指出當代對於匯流平臺新聞工作的定義，過於寬泛而模糊不清。這意味新聞教育者可能難以充分掌握應該設置何種課程，以滿足業界的模糊需求；同時也表明，新聞業者在面對不斷變動的媒體環境時，往往也不太確定自己真正的需求 (Callaghan, 2009)。許多匯流研究就曾批評，在課程變革的過程中，學者要麼高估了新聞編輯室的實際所需，要麼缺少足夠的證據支持這些變革 (Birge, 2006; Criado & Kraeplin, 2003, July; Dennis et al., 2002; Lowrey et al., 2005; Shepard, 2007)。

相關研究也指出媒體業之間的「匯流」，嚴格說大多只是一種「交叉推廣」（cross-promotion）的操作，屬於一種市場推廣策略，一般是指某一款商品或服務的消費者推薦與之相關的另一款商品或服務 (Lowrey et al., 2005)。而在一項針對美國校園媒體組織的調查中則顯示，雖然約有一半的受訪者回答，他們正在進行匯流課程變革，然而大多數只能算是一種跨平臺出版（cross-platform publishing）的形式 (Wotanis et al., 2015)。

2. 新聞工作者

值得注意的是，新聞媒體主管和新聞工作者之間的態度和看法，也存在著若干落差。Smith et al. (2007) 針對中小型市場電視臺所進行的全國性匯流研究發現，新聞工作者和管理者對於匯流實踐對新聞編輯室的影響，有著不同的看法。新聞工作者「似乎更可能」感到匯流實踐，會對新聞品質產生負面影響；此外，新聞工作者與媒體管理者在跨平臺內容創作方面，也存在著不同的價值觀 (Wotanis et al., 2015)。由此，我們看到媒體經營的現實面與新聞專業追求，形成兩難拉扯。

新聞業對於匯流的不積極，也反映在能力培訓的態度上。Cleary (2006) 的廣播電視新聞編輯室研究指出，業者雖宣稱要進行相關的專業培訓，但許多員工卻表示他們不相信這些培訓會得到管理者方的大力支持。Cochie (2008) 在其文章中指出 Newton 的美國研究也顯示，當時新聞業界中有超過三分之二的記者，沒有接受定期的匯流培訓；而從過去歷史經驗來看，全美國各地的新聞機構，也大多沒有增加培訓的預算。

再從營運面分析。一直以來，線上新聞業務缺乏穩健的獲利模式，仍然只是停留在一種「暗示性」（allusive）的階段，未來的發展方向也依舊充滿不確定性。

事實上，預測新聞業的未來，讓許多媒體專家學者感到尷尬 (Wotkyns, 2014)。研究表明，多平臺（匯流）出版的商業模式只是一種用來「提高員工生產率的方法」(Quinn, 2005, p. 32)，讓個人表現的壓力愈來愈大 (Deuze, 2004)。Quinn 在 *Convergent Journalism: Writing and Producing Across the Media* 一書導言中就提出警告：記者所做的工作越多，他們錯過截稿期的可能性就越大 (Cochie, 2008; Quinn & Filak, 2005)。正是基於對新聞媒體匯流運動的種種質疑，有不少新聞學院反對將新媒體匯流納入到課程中。

一般媒體業要過渡到匯流運作確實不容易，它涉及新聞編輯室中的技術、管理以及文化轉換，這些過程都需耗費許多時間、精力和資源，並且會遇到一定的阻力 (Wotanis et al., 2015)。事實上，並非所有媒體業者，都會優先尋求匯流技能這方面的人力 (Stewart, 2007, July 26)。因此，儘管學界大多認為應該提供正確的課程，使學生在匯流世界中發揮最佳作用，但這並不意味著就必須提供匯流新課程 (Cochie, 2008; Mitchell, 2002, December 18)。

3. 產學脫節

根據國內大眾傳播科系學生的職能落差的最新研究也顯示，傳播學生雖普遍希望能掌握職場直接應用的技術，然而業界卻似乎更加重視學生在文字、邏輯概念、人際溝通、自主學習、解決問題等方面的能力（王正慧、林小蓉，2018）。任教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的林照真也坦言，該所致力於運用科技創新產製新聞內容的教學，然而卻未必可以應用於業界，許多該所畢業生反映在校所學在實務界用不上（轉引自蘇蘅等人，2018）。由此可見，產學之間對於職能的期待，從在明顯的差異。

儘管匯流課程議題已經蔚為大趨勢，然而，從上述討論中可以看出，無論是學界或業界，都仍然存在著程度大小不一的不利因素或困境；而在認知與態度上，學界與業界之間也存在落差，文獻表明兩造各自或共同所遭遇的真實現狀與經歷，並非空穴來風、無的放矢。

（二）技術面

從技術面來看，匯流現象還存在著兩種不確定性：個別新傳播技術的快速發展以及匯流定義的複雜性與變動性，這兩項不確定性因素，讓因應匯流趨勢的課程變革之路，更加充滿變數與挑戰。

1. 新技術不斷湧現

任何新增課程都有一個相同的難題，即擔心新課程只是時尚流行所驅動的「一時之選」，並非源自產業的實際需求或理性的理論基礎 (Aumente, 2007)，這也是引入匯流課程經常被質疑之處。其後遺症之一即前文所提：課程設置容易成為個別新技術的追逐者，因而造成課程與教育的「零碎化」處境（王維菁，2018 年 7 月 23 日）。如何避免匯流課程只是短暫性的新媒體風潮，考驗著教育工作者。但新技術日新月異，預測的難度愈來愈高；而學校為了生存與競爭，往往也不得不推出「新鮮」課程。

再對照本研究個案，學生對於自己選修的課程滿意程度（高達八成），比例也明顯高於校方的必修課程（滿意與不滿意比例各占一半）。理論上被視為核心專業的必修課程，在銘傳傳播學院與本研究個案兩案例中，都並沒有發揮太大的作用與成效，這似乎反映出學生個人需求與校方存在著落差。

2. 定義名稱齊鳴

推動匯流課程變革的困難之一，在於「匯流」的內涵與定義。迄今為止，新聞傳播學界對於如何定義「匯流現象」，仍然持不同的意見或觀點。許多研究科技匯流方面的專家學者 (Dailey et al., 2005; Filak, 2015; Jenkins, 2006; Kolodzy et al., 2014; Lawson-Borders, 2003; Quinn, 2006; Sarachan, 2011) 也都不諱言，匯流的定義仍然處於不確定狀態。

不同的專家學者各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視角來定義或描述匯流現象。例如，Killebrew (2005) 從傳播歷史發展角度、Quinn (2005) 從新聞編輯室角度、Birge (2004) 則從記者的角色切入。也有不少學者則試圖將匯流的定義更細緻化，例如，傳播學者 Lawson-Borders (2003) 的匯流七要素、[3]Gordon (2003) 的匯流五大形式，[4] 以及 Huang et al. (2006) 的匯流四大類等。[5]

再者，不僅是匯流定義難以有共識，在匯流的相關名相上，也因為隨著匯流

3 Lawson-Borders 提出匯流概念涉及七個要素，包括：溝通（communication）、承諾（commitment）、合作（cooperation）、補償（compensation）、文化（culture）、競爭（competition）以及客戶（customer）等。

4 Gordon 依不同功能提出五種形式的媒體匯流，包括：所有權（ownership）、策略（tactical）、結構（structural）、資訊收集（information-gathering）以及講故事（storytelling）等。

5 Huang et al. 2006 研究有關文獻後，將匯流歸納為四大類：內容（content）、形式（form）、企業（corporate）以及角色（role）。其中，內容匯流與新聞組織之間的新聞合併或共享方式有關；形式匯流則涉及允許「視頻、音頻、數據、文本、靜態照片和圖形藝術」相結合的技術；企業匯流指的是媒體合併後新聞編輯室進行的整合；最後，角色匯流則是與記者跨平臺工作的能力有關。

形式、範疇以及程度的不同，使得以媒介（形式）為核心，用以表述匯流現象、過程或結果的新名詞也層出不窮。單就新聞領域來看，歐美學界對於使用匯流的相關概念，從其採用的名稱就可以看出其多樣性，舉其主要者包括：convergence media (University of Kansas, 1999, December 3)、multiple-platform publishing、integrated journalism (Quinn, 2005)、convergence journalism (Larkin, 2008; Quinn, 2008)、multimedia journalism (Aumente, 2007)、media convergence (Bhuiyan, 2010; Emma-Okoroafor, 2016)、internet journalism (Bhuiyan, 2010)、Journalism 2.0 (Boers et al., 2012) 等詞彙，都是用以表示或統稱各個時期的新聞匯流現象。

至於華人地區，中國大陸目前則習慣使用「融媒體」[6]一詞來表示匯流現象。而臺灣的使用習慣，比較接近「融媒體」涵義的用詞應該是「媒體匯流」、「媒體融合」及「全媒體」等術語（吳永乾，2017 年 12 月 6 日）；有些學者則使用概念相似、但名稱稍有出入的一些名詞，例如「數位匯流」（夏春祥，2015；陳東園，2013；劉蕙苓、羅文輝，2017）、「數位媒體匯流」（陳雅惠，2014；陶振超，2007）、「科技匯流」（簡維克，2007）等用詞。

最後，此間也有一些專家學者基於更實際的考量，而主張以其他名詞代換匯流一詞，例如多媒體（multimedia）、跨媒體（cross-media）、超媒體（transmedia）、新媒體（new media）以及適應性媒體（adaptive media）(Bhuiyan, 2010) 等詞彙。相關文獻表明，研究者 (Karmasin et al., 2015, June) 也傾向於將「多媒體」和「跨媒體」[7]等詞彙列入匯流家族。

必須指出的是，課程變革實務通常涉及「明確的」課程方案（即目標、綱要、計畫等），以及相應配合的教材、教法、環境以及設備等資源（周淑卿，2002）。然而，從上述討論可以看到，當前各界對於匯流現象的認知與理解，似乎隨著新技術及其形塑的新傳播生態而不斷變化。換言之，這些不同的匯流視角，仍依各自的發展邏輯發散地闡述，尚未見清楚的匯流共同定義；這不僅不利於新聞傳播教育的整體發展，在匯流課程的規劃與實施上，也必然形成許多窒礙。

總之，存在於產學間的這些匯流諸多不利變數以及不確定性，提醒處於火熱

6 「融媒體」一詞是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寔軼玫於 2008 年首次提出，並由中國大陸官方經營的「新華社」在 2017 年 3 月正式採用。

7 按《劍橋字典》（*Cambridge Dictionary*）的定義，「跨媒體」意指涉及多個媒體頻道的所有交流企圖，而「多媒體」指的是以聲音、圖片和視頻以及文本等形式的資訊傳達或共享。這兩者與匯流定義之間，確實存在某些重疊性。

實踐中的匯流課程變革，對於其必要性與適切性，教育者仍須注入更多的檢證與反思。對此，國內的變革實施情況又是如何？本文以個案研究方式，檢視國內某傳播學院因應數位匯流採行「大一大二不分系」的革新作法，針對該院（已分流）大三新聞系學生進行問卷調查，一則用以檢視個案在實施課程變革後，學生對於新制度實施的整體反映以及可能成效；二則作為上述推動匯流課程變革不利因素的參照。

參、個案分析：學生觀點

近年來，基於適性選擇的教育理念考量，「不分系」逐漸成為因應世代變化的熱門產物。此制度最先源自美國，強調培養「通才」，因此課程內容從以往講求專業化，改為著重基礎性通識教育與基礎訓練課程，並給予學生比較大的選課彈性與選擇空間，而延緩科系的分流至大二或大三。

一、大一大二不分系

其實，在華人地區也多有實施大一大二不分系相關概念之新聞傳播院校。例如香港中文大學新聞系早期就曾主張只設三、四年級，招收對象為其他學系完成首兩年課程的學生（蘇鑰機，2021）。新加坡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其學生在四年學制的前兩年必須修讀統一課程，在第三年後才進入不同的科系修讀專業課程（郝曉鳴，2021）。中國大陸浙江大學的「2 + 2」模式，強調一種「寬專交」（拓寬基礎、專業培養、學科交叉）的人才培養模式（韋路，2013 年 1 月 10 日），彌補其傳統單一化專業教育的不足。臺灣則從 1997 年就已開始實施這種以「跨領域學習、適性探索」為理念的不分系教育，目前發展出以學院或以校為單位的不分系及學程。

面對數位環境巨變以及媒體匯流趨勢，國內各新聞傳播院校系所也大多亟思因應之道。其中，個案傳播學院在 2014 年正式實施「大一大二不分系」，並進行匯流相關課程之變革，是國內目前唯一實施此制度的新聞傳播學校。個案主要是採取延後分流，並提供多元學程，在大一大二時修讀傳播基礎科目，對傳播學有完整之瞭解後，學生再決定其具體專業學程。作為國內新聞傳播學術重鎮，該院推動匯流課程的過程以及累積多年之經驗，值得參照與借鑒。本文針對該校新聞系、主修「新聞媒體實驗班」的三年級學生進行問卷調查，問卷有效回收共計 28 份。基於前文討論，問卷提問主要針對學生對於匯流技能課程的現狀理解與

感受，詢問範圍包括：匯流師資、課程內容與安排、跨學科與基礎設備、不分系成效、未來工作角色的認知與態度，以及新聞價值觀等六個面向。

二、現狀之反映

（一）師資與教學

學生對於匯流技能授課老師的實務經驗，有高達 86% 的學生持肯定的態度，只有 17% 的學生不太認同；而將近 80% 比例的學生也認為這些授課老師符合他們的學經歷。可見在匯流師資方面，整體而言，個案新聞系學生的滿意度頗高。然而，在被問到是否「老師比較多呈現傳統的媒介分類思維，而較少是網路或媒體匯流的思維」時，則有超過半數 57% 的學生表示同意。這可能表示在匯流教學上，老師大多還在於對個別媒介的強調，而較少是匯流式的融合。

（二）課程內容與安排

首先，是關於匯流技能課程的難易度，有 75% 的學生覺得匯流技能課程偏難，25% 的學生則認為過於簡單。在課程教學時數的比重方面，有 71% 學生認為比重偏低，29% 認為教學時數尚可接受；這可能是礙於 128 學分所限，而無法多開課程所致。而「實務」與「理論」的課程比例，有 68% 的學生認為沒有達到平衡，32% 的學生認為有達到。在「匯流技能課程是否具有多樣性」問題上，學生有 68% 偏向於否定的態度，僅有 32% 學生稍微同意。在被問到匯流課程是否具有很高的「實用性」時，有 54% 同學偏向於同意，46% 的同學偏向不同意。

被問到學校匯流技能課程安排是否「有助於強化未來職場所需的知能」，有 75%的學生表示同意；然而，「是否符合學生個人的需求或期望」，有 54% 的學生認為還算滿意，卻有 46% 學生表示不太滿意。這是否意味著，身為數位原住民的學生，他們所感知到的匯流技能與在校所學，存在著一定程度的落差。

（三）跨學科與基礎設施

在媒體匯流時代，新聞傳播教育更強調跨領域、跨學科學習的重要性，高達 96% 的學生表示認同。然而，當被問到「學校在跨領域課程的安排是否符合學生個人的需要」時，卻有 54% 超過半數的學生表示不滿意。

而維持良好的匯流技能教學環境，需要購置相關的平臺、軟硬體等基礎設施，並且往往涉及最新數位、網路科技的更新。在對於學校提供的這些基礎設施

方面，有 71% 的學生表示不太滿意，表示滿意者不到三成（僅有 29%）。顯見學生對於相關的軟硬體設備與平臺，有更多的需求與期待。

三、認知與態度

（一）未來職場角色

由於科技匯流趨勢，媒體工作者的角色在轉變，必須具備更多技能素養、跨領域知識，以符合業界的要求。對於這樣的未來描述，學生在認知上，一面倒地完全認同這樣的趨勢。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認同必須具備更多技能素養、跨領域知識之外，全部學生也都回答「願意付出更多工作時間，以符合業界的要求」。

至於新聞人才的培訓，新聞傳播教育界普遍存在「專才型」（專精某一領域的記者）或「通才型」（全能型記者）的二元爭辯。與上面調查結果相呼應，學生們大都希望選擇將來成為全能型記者。並且有將近 70% 的學生表達他們喜歡匯流技能課程，顯見現在的年輕世代，在未來的匯流職場上，已經做好心理上的準備了。

然而，有許多文獻皆表明，在匯流技能教學過程中，往往造成學生「什麼都會，但什麼都不專精」的現象。在本調查中，有高達 71% 的學生認同了這種擔憂，只有 29% 的學生不太同意。由此可以推斷，目前大部分學生對於匯流技能課程，在學習深度上是不滿意的。因此，在「是否與匯流課程授課老師有積極互動」問題上，有將近 80% 比例的學生的回答偏向否定，就不難理解。

根據文獻顯示，老師與學生對於傳統特定媒介（例如廣電、新聞、廣告等）的認同，是推動匯流課程的阻力之一，在本調查中，也反映出這樣的情況。問卷顯示仍然有 58% 的學生，比較認同傳統的媒介分類。而當被問到「是否同意學校完全排除以媒介分類（即不分流）」時，將近 80% 比例的學生回答不贊成。在強調傳播匯流的典範轉移主張中，有論者提出釜底抽薪之計，應把心態從「新聞傳播業」改為「資訊業」，也有將近 80% 比例學生不表贊同。看來，即使是數位原住民，要完全轉換為匯流新思維，短期內並不容易。

（二）新聞價值觀

在網路時代，關於新聞報導客觀中立性原則，則仍然有高達 95% 的學生表示認同。但在關於新聞內容的陳述策略上，將近 80% 比例的學生認為「訴諸情感，比客觀事實的陳述更能影響閱聽人」；而對於網路上的訊息或新聞，那些「評論

或留言，比事實本身更容易引起關注與回應」，更有 96% 的學生表示同意。此外，以往新聞報導所強調的真實性與正確性，在本調查中卻只有 25% 表示認同，高達 75% 的學生贊成新聞報導「應該抱持開放性或多元詮釋」。

從以上調查交叉來看，可以發現另一種弔詭現象。年輕世代雖然仍然肯定新聞報導秉持的客觀中立性原則，但在認知與態度上，卻明顯偏向接受對於新聞處理的開放性或多元詮釋，不再強調新聞的正確性與真實性。傳統新聞專業的價值觀受到挑戰，年輕世代信奉新的新聞價值；是好是壞，值得各界深思。

（三）不分系成效

為了因應科技匯流趨勢及傳播生態的改變，個案實施大一大二不分系制度，強調在大學前兩年階段提供整合性課程，希望學生先瞭解傳播的各個面向，再發掘自己真正的興趣和專長。然而，當被問到「大三才進入專業領域分流，在時間上是否覺得太晚」時，回答傾向於同意者高達 71%（42%「同意」、29%「非常同意」）。對於這個現象可能的解讀，一方面是學生大多仍然習慣於認同特定媒介分類，二方面是學生對於分流學習與校方的課程安排，在步調上有相當程度的落差。

然而，有趣的是，當被問到「是否希望匯流技能延後到三、四年級後再修讀」，則有將近八成的學生傾向於不同意。這可能表示大多數學生希望從低年級開始，匯流技能與專業分流學習就可以同時進行。因此，這可能也意味著，匯流與分流教學的前後期劃分，對於年輕世代而言，似乎沒有太大的意義。

此外，對於不分系階段的「必修」課程，是否有助於學生在分流之後的學習與訓練，回答傾向於同意或不同意的學生，各占一半。但不分系階段的「選修」課程，是否有助於學生在分流之後的學習與訓練，回答傾向於同意的學生，則攀升到 82%。這可能表示，在核心課程的安排上，與學生的期待有一些落差。

四、小結

個案傳播學院的匯流教育理念，是希望在大學前兩年培養具備「整合的傳播能力」的「全能傳播人」，包括平面媒體、影音媒體、數位媒體、網路媒體等多元平臺的基本製作原理，以及熟悉相關理論。其推行的經驗與成效，當可作為其他新聞傳播院校的他山之石。

總結此問卷調查，呼應前文所提推動匯流課程的不利因素，至少可以歸納幾

個重點：（一）目前老師與學生，大多仍然偏愛傳統的媒介分類思維，而較少匯流思維；（二）匯流技能課程的教學時數比重以及課程安排，不太符合學生的期望與需求；（三）與匯流技術相關的平臺、軟硬體等基礎設施，學生普遍認為不足；（四）在跨領域學習的課程安排上，則有超過半數的學生反應不佳；（五）關於課程與教學的深化，則有超過七成學生擔心「什麼都會，但什麼都不專精」，學者擔憂的「吃 buffet」現象，恐非誇大之詞。

肆、個案分析：教師視角

任何教育政策變革牽涉的範圍相當廣泛，包括課程設計、行政、研究以及人事等各方面的協調與整合過程。因此，除了瞭解個案學生端的意見反映，本研究也分別訪談曾參與不同校際之大一大二不分系政策關鍵過程的兩位教育工作者（銘傳大學傳院的 N 與本個案傳院的 C），除了作為與學生端的意見調查互為檢證與對照，也希望能更有助瞭解匯流課程變革在實務面上的現狀與潛在問題。

一、結構與困境

（一）課程難開、師資難求

大致而言，國內大學若要開設新課程，通常是來自從上而下的壓力，或是需要有一些誘因。一般情況下，私立學校比較可以從上而下開設新課程，公立學校則不見得可行。個案乃國立的研究型大學，受訪者 C 直言，目前在教育部對研究型大學教師的獎賞制度下，往往存在著「做好無賞，弄破要賠」的心態。因此，老師們往往只注重在研究的產出，以至於會看到一種「葉公好龍」的現象：

> 我們在研究型大學中要發展新科技就很難。最後，老師只是寫 paper 來講科技。我們是有很多關於新科技的研究，可是卻很少能把這些研究成果教授給學生。（受訪者 C）

換言之，個案老師如果要開設新課程以因應匯流科技新趨勢，同時又要顧及好升等，勢必有不少的負擔，因而在取捨上形成兩難，這也可能是個案推動課程變革的結構化困境之一。受訪者 N 服務於私立大學，他也認為國立大學往往比較傾向於保守，而私立大學在調整上就相對比較靈活：

> 我們傳院早在七、八年前就已經意識到必須引進資訊人……而這些師資其實也花了三、四年才真正體認到傳播人的思維，才知道如何讓技術、平臺和內容作有效的結合。（受訪者 N）

關於新課程與師資的困境，受訪者 N 則指出，目前新聞傳播教育的最大危機來自社群媒體的興起。社群媒體不僅稀釋了傳統媒體的影響力，其功能或技術更持續在演變中，年輕世代大多駕輕就熟，老師卻往往無法跟上這些變化，而顯得脫節；在課堂上所教授的內容，也就顯得過時。在談到新課程議題時，受訪者 C 也以某個課程為例，表達了他的感想：

> 一方面，我們是看到了這些都是和資訊有關，但是在設計該課程的過程中，我們常常會被過去的結構所束縛，或是被老師既有的能力所侷限。（受訪者 C）

事實上，課程變革或調整對專職老師的影響甚鉅，尤其是接受傳統訓練而今面對新媒體、新技術等傳播新生態的師資。新課程需要大量的師資與專業，而傳統師資大多很難在短時間進行大幅改變，因此只能嘗試讓教師將原有的課程內容加以「調整」（施伯燁，2021）。誠然，升等、論文、研究、教學等已耗盡老師們的大部分時間和精力，而傳播科技的演變又如此快速，為了解決這部分的焦慮，因此大多採用業界的兼任師資。然而，受訪者 N 指出，採用業界師資的問題重重。首先，業界師資的名額有限；再者，許多有技術經驗的業師卻學歷偏低；而微薄的鐘點費也始終誘因不高。而真正關鍵的是：應該聘請何種兼任師資、開何種課程？對此，受訪者 N 直言，也是言人人殊、莫衷一是。以至到最後，「大部分的學校都是摸著石頭過河，草草想了一門課，就試著教教看」。

受訪者 C 也指出兼任業師類似的問題：例如，對於兼任業師其人不夠瞭解、雖懂技術但教學經驗不足、有些則只是圖個名聲或資歷，並不熱衷教學，因此，常有請神容易送神難的窘況。此外，業界人士也往往缺少將實務經驗加以知識結構化，以便跟學生現有的知識體系相結合的能力：

> 如果業界兼任老師沒有足夠的學養的話，他們其實就是把這些學生當作學徒在教，完全沒有辦法跟學生他們的理論知識結合，這會影響學生的知識發展。因此，引進業師兼任課程，容易有這方面的弊病

產生。（受訪者 C）

而不可否認，匯流媒體課程主要仍偏重在技術性、實務性面向，一般教師如果無法掌握這些新技術，就只能「填充」一些理論課程，從受訪者 N 的角度，這也是一種學用之間的脫節現象。

（二）學用脫節、實務理論待融合

關於「實務」與「理論」之間的辯證關係，長久以來爭論不斷。以往受到美國新聞傳播教育的影響，總是習於將實務（程序性知識）和理論（陳述性知識）二分對待，在課程安排上亦然。受訪者 C 則強調，這種二分法僅只是一種方便法門，並以個案大一大二不分系主要推動者的理念說明：

> ……就是在強調，實務是一種程序性很強的知識，而理論則是偏向陳述性知識。事實上，這兩種概念在我們從事傳播工作時，它們其實是不可分割的。……在這樣的理解下，再開始思考如何設置課程：首先是傳播最基礎的知識，然後是個別的專業。（受訪者 C）

簡言之，先從思考新聞傳播學生需具備什麼樣的知識，再從此知識出發以決定其核心能力為何；然後根據此核心能力，再設計出所需的課程。個案即據此精神，進行課程變革的鋪陳。只是，在普遍強調新傳播科技工具性的當代，先整合、後分流的教學模式，能否將實務與理論有效地「融合」，有待後續更進一步的觀察。

值得注意的是，以往學校教育和業界就算有所脫節，在畢業生進入職場後，只要稍加訓練即可勝任工作。網路時代則使得脫節更加惡化，尤其是當前經營新媒體成功者，大多不是傳播人，而是資訊人；而資訊人和傳播人的思維，往往南轅北轍。對此，受訪者 N 坦言：

> 對於這種現象，在學界長久以來一直是視而不見。為什麼？並不是學界不知道，而是束手無策。因為對於這些新技術專業，學界大多不瞭解、跟不上，現在情況仍是如此。（受訪者 N）

此外，受訪者 N 以他執教學校致力於促成學生取得相關證照以增加競爭力（如：Premiere、Google Ads 等）為例，說明相較於公立大學，私立大學在某些教學策略上，更有利於培訓學生的就業競爭力。這似乎暗指原因就在於國立大學教師大多把研究放在首位或是承接公、私部門的研究計畫，因而較無法兼顧這方面的能力培訓。受訪者 N 認為，私立大學比較在乎學生們的實務性能力，而這些相對後段的學生，也更注重他們未來的就業問題。

（三）克服虛假跨領域學習

近來多有學者主張，當前數位匯流的主要核心問題，在於「跨學門融合」如何能成為具體的課程，並在操作與理論架構上形成可以供業界參考的模式。個案在跨領域學習方面，雖然每年都有一些固定的學生交換名額，也曾跟資訊科學系等共開課程，但其間也產生一些問題，受訪者 C 舉例表示：

> 雙方學生雖然分配為同一組，卻還是各自作各自擅長的部分，因而形成了一種虛假的跨領域學習。（受訪者 C）

個案以往也曾試圖在傳院開程式寫作的課程，但因先天畏懼這類「理工」課程，修課學生愈來愈少，最後停掉課程。針對這個缺失，個案現在改採「鯰魚效應」策略。鯰魚效應意指某個環境如果過度靜止，生態環境就會愈來愈萎縮，因此加入一些激勵的新元素，使得環境活絡起來，重現生機。個案具體作法之一，就是在幾年前開始招收自然組的學生，和其他文組的新聞傳播學生一起共同修課，包括程式寫作，希望藉此帶動文組學生對資訊、程式寫作等方面的學習。

二、未來與想像

（一）制度變革初探

其實，實施大一大二不分系的成效，從個案經驗來看，目前尚難以遽下確切論斷。因其中涉及到許多學校層級的配套措施，牽動的層面也相當複雜，受訪者 C 就表示，實施課程變革其實是一場打不完的戰：

> 要推動一個新制度，你會發現必須是一邊做一邊修正。今天有一些東西是你想要的，但是一旦做下去，會發現一些漏洞或問題跑出來，

因此，你就必須填補那個洞。所以，在這過程中，必須不斷地修正，但只要有修正的機制就可以了。（受訪者 C）

有趣的是，就在銘傳傳播學院捨棄大一大二不分系改回原制之後，同一年，政大傳院則開始實施大一大二不分系。這兩所傳院的實施與捨棄大一大二不分系，有不同的前因後果與歷史背景，存在著校際之間的差異。可見，每個學校有其各自的土壤，因應匯流的課程變革，亦須衡量各校本身的體質與目標。

不過，來自私立大學的受訪者 N 直言，雖然仍會有來自教育部推動「院實質化」的壓力，但似乎「國立大學才玩得起院實質化，一般私立大學則玩不起」。因為，這其中還牽涉到聯考招生百分等級（percentile rank, PR）值的問題：

一般來說，前段班的學生，不太會因為大一大二不分系，而不挺學校（指國立大學）；但私立學校，當學生志願只有一個或有四個選項，則往往攸關招生成敗，我們學校就曾吃過這種虧。（受訪者 N）

（二）未來職場想像

從學術面來看，當前新媒體的發展跟社會學理論有不少相呼應之處，例如傳播學者 Fidler (1997) 曾提出媒體變形（media morphosis）觀點，它強調媒體液態化現象，改變了新聞從業人員的勞動過程、新聞資訊的內容文體、媒體產業的生態結構，以及閱聽人與社會文化等（陳百齡、陳世敏，2001；Pavlik, 1999）。這種變化並將成為一種常態，貼近的說法是：未來有許多工作，現在還無法叫出它們的職務名稱。

而根據受訪者 C 表示，許多學生在進入傳播學院時，腦中卻已有某些固定的職業想像，而這些想像大多受到過去所見所聞、師長傳授，尤其是來自家長的影響。甚至，仍抱守傳統固態思維的老師，也不在少數。因此，「現在比較難的是，要如何告訴學生，不要再充滿傳統大眾媒體時代的舊想像」。

然而，根據本問卷調查顯示，現在的學生似乎不需要特別去強調匯流與分流，因為他們本身屬於數位原住民世代，匯流已是他們的日常生活。學生問卷調查結果與受訪老師觀察之間的這種差異性，可能也暗示著學生們對於匯流的認知與態度，存在著兩極化現象。

伍、全新思維的檢視

不可否認，在匯流浪潮衝擊下，全球新聞傳播產業面臨空前挑戰，包括傳播平臺、傳播模式、內容生產、營運以及媒體管理等各個層面，都正在或已經發生根本性的變化。而目前因應匯流所開設的課程，大多跟不上傳播技術以及新聞媒體發展的節奏。即使課程不斷作局部調整或者增補，對於整體困境的紓解並不大，反而可能導致課程體系龐雜臃腫，以及教學內容的交叉重疊（蘇宏元，2014 年 12 月 24 日）。媒介大環境丕變，傳統新聞教育模式不再能適應社會的發展要求，不少論者因而呼籲新聞教育體系必須重新建構（姜衛玲，2011）；也有強調新聞傳播教學應該進行「整體轉型」（黃旦，2014），而不是追逐新技術的變化而增減課程。而無論重整、重構或轉型，似乎都應先從思維轉變開始，方能帶動學術研究方式以及課程設置邏輯的轉變。國內外學者從不同層面與視角提出許多新思維與新見解，其中不乏嶄新觀點，值得未來變革借鑒與參考。

首先，關於學門建制革新。有些學者認為在「網絡化關係」傳播時代，應該徹底打破現有的專業劃分，而不是從口語傳播、平面傳播、電子傳播，再另加一個網路傳播來解決問題（黃旦，n.d.）。另有些則主張打破新聞學或大眾傳播學的藩籬，大膽改革創新，設置多門跨學科基礎課程，例如：法學、經濟學、電腦資訊科學等（蘇宏元，2014 年 12 月 24 日）。

中國大陸學者譚天（2015）則從新聞學門困境出發，提出將「新聞學與傳播學」改為「傳播學與傳媒學」，把新聞學內置在傳媒學之中，一則兼顧學術與應用，二則拓展內涵與外延。國內傳播學者鍾蔚文亦主張新聞教育的思維必須全盤改變，並指出當前新聞傳播領域正處於典範變遷的時代，從課程、教法到組織等都須要調整和改變；甚至直言學門定義也應改變（轉引自蘇蘅等人，2018），為未來「去學門化」的可能性留下伏筆。

在因應匯流的學門建制變革中，比較極端的案例是 2011 年美國科羅拉多大學「關閉」其知名的新聞與大眾傳播學院，僅保留一個新聞學科，以作為輔修之用（張迪，n.d.）。值得玩味的是，根據該校的說法，「關閉學門」反而是提升新聞傳播教育的一大契機，有望在未來建立一所融合資訊、傳播、媒體和技術等多種相關學科和資源的新學院（韋路，2013 年 1 月 10 日）。

相對地，也仍有對於打破傳統傳播教育上「系」的分界持保留態度者。這類學者認為，學生在進入媒體職場時，其具備何種「專業」仍是首先被提問的能力條件，因此主張學生仍需保有可辨識的「專業度」（陳清河、李明哲，2012）。

事實上，前文也提及，仍有 58% 的學生比較認同傳統的媒介分類，也有將近八成學生不贊成「學校完全排除以媒介分類（即不分流）」。

受訪者 C 坦言，對於學門或科系定位，年輕世代大多仍無法跳脫對「科系」的認同，而從知識面來看待這些問題。有些校友在捐款時還堅持指定給特定「名稱」的系所專款專用，使得校方必須花許多力氣處理學生這類傳統分系的認同問題。換言之，學生既是新媒介科技的原生使用者，卻又保有傳統媒介分類的思維。這種認同的弔詭現象或說過渡期，值得新聞傳播教育者進一步推敲。在此，傳播學者夏春祥（2002，2015，2016）則認為正視傳播行為繼而將學科建制化，並以「傳播」來統籌，將想像的訓練以具體內涵來驗證；如此一來，匯流的技術訓練與理論的邏輯關懷可以關聯起來，繼而也是同時面對學科正當性的問題回應。

第二，未來新聞傳播人才的想像。相較於上個世紀英國學者提出 21 世紀的新聞人才應該具備四種素養：廣博的知識、客觀的視角、批判的態度、準確的判斷；以及三種才能：清晰準確的寫作才能、傳播才能以及創造才能（陳麗菲，2015），傳播學者鍾蔚文則提出培養思想家、跨界人、想像人、土著、玩物人、造物人、創業人、人等「八種人才」，其總結似乎更為貼切、完整。鍾蔚文並指出，當今大學教育應該更重視「夢想家」的培養（轉引自鄭廣嘉、秦靜，2016 年 1 月 12 日）。

此外，根據研究顯示美國的新聞傳播學生當中，有超過七成畢業後並不打算從事媒體工作，此趨勢在過去二十幾年來一直持續著 (Wenger & Owens, 2012)。而根據教育部 2014 年公布的調查資料，國內傳播學門畢業生投入相關行業的比例更低，只有 22.3%；因此，新聞學者林照真就提出，不必狹隘地認為新聞系所畢業生只能往新聞媒體發展（轉引自蘇蘅等人，2018）。事實上，學新聞的不做新聞，做新聞的不學新聞（曹林，2018），已是常見的現象。因此，以往新聞教育主要是為新聞業培養媒體工作者，現在則需為所有與傳播相關的職業培養人才（張迪，n.d.）。

關於新聞傳播教育革新，我們也看到培養「複合型人才」策略。其構想是先安排學生系統地修讀一門非新聞傳播學科的專業理論、知識和技能，再回到新聞學院修讀本科專業相關理論、知識和技能（黃瑚，2012）。其背後理念，是重視多學科、多專業的交叉融合，摒棄以往專業化教育模式。從本研究問卷數據來看，個案學生也大多希望將來成為全能型記者；若再對照學生對於未來職場的正面態度：都「願意付出更多工作時間，以符合業界的要求」，這種全能型人才策略似乎頗被接納，因此如何讓學生避免「什麼都會，但什麼都不專精」的疑慮，就成

為新聞傳播教育變革的重要課題。

第三，未來的新聞教學。鍾蔚文主張回歸大學想像的初衷，拿下「職業訓練中心招牌」；實行無目標設計，不要對準某個行業，而要對準新聞這一工作（鄭廣嘉、秦靜，2016 年 1 月 12 日）。中國大陸學者黃旦（n.d.）也有類似主張，認為新聞學科的基礎要從媒體機構或職業新聞實踐，轉到整個人類的傳播實踐；另一學者黃欽（2018 年 8 月 30 日）則建議以「參與式傳播」[8] 取代傳統的「大眾傳播」教學理念。

事實上，面對臺灣整體就業環境，學生大多是以先有工作為優先考量，在校所學專業成為次要考量；而科技變化太快，傳統狹窄的專業劃分也屢見窘境，對學生的將來就業也未必有利。受訪者 C 透露，當初個案傳院大一大二不分系設想之一，即是基於讓學生畢業後的就業選擇能更具有「彈性」。

另一方面，受訪者 N 憂心當前科技變化快速，近來新聞傳播學者的研究能量，多向「批判」過度傾斜，已造成新聞產學之間的互動發展有脫節之虞。尤其是許多新聞媒體的新聞職能已被取代，例如社群媒體（Facebook、Twitter 等）已成為突發新聞的主要載體，未來新聞產學之間的關係模態，恐將有更多難以預期的變數。近來更見「以社群為中心」取代傳統「以新聞產業為中心」的倡議，呼聲高漲（Mensing, 2010）。

第四，傳統新聞學所堅信不疑的前提或概念，也面臨典範轉移。例如，黃旦（n.d.）提出應該重新看待「新聞真實」，他強調不是反思，而是直接否思（unthinking）舊思維。此外，不同於傳統記者編輯必須冷靜客觀地報導新聞，現在則強調帶有情感的新聞報導更容易受到人們的關注，更容易拉近與讀者的距離。甚至主張，為了使受眾感到更有人情味，而將毫無疑問的第三人稱新聞報導的敘事方式，改用第一人稱講述新聞（韋路，2013 年 1 月 10 日）。近來不少學者更主張「新聞是作品，更是產品，因此要求真，而且要求趣」（黃欽，2018 年 8 月 30 日，頁 77）等務實觀點。

第五，主張重新思考傳播的關鍵字詞。例如以「訊息」取代「新聞」，不僅可以符合當前的傳播演變，同時也能讓傳播圈內、圈外人重新認識「傳播」（中華傳播學刊編輯部，2008）。這個觀點與企圖甩開包袱、建議把從事媒體事業改為從事資訊（information）業務的想法 (Cochie, 2008; Johnson, 2007, August 20)，可說如出一轍。

8 黃欽（2018 年 8 月 30 日）認為相較於大眾傳播自上而下、點對面的精英式（旁觀式）傳播，強調自下而上或社會群體之間的橫向傳播和交往的參與式傳播，更符合當前的傳播生態與面貌。

思考傳播學門變革的未來，亦有從審視傳播的知識架構分類下手。例如，受訪者 C 引述傳播學者徐佳士的觀點指出，新聞系應是如何處理事實資訊（factual information）概念的科系；廣告系則是跟說服（persuasive communication）有關；而廣電系主要偏向是和娛樂有關的科系。如此，對於科系的關鍵詞想像，則可以導向報導、勸服、創意等這類的知識概念上（須文蔚、陳世敏，1996），進而跳脫出傳統總是追著「媒介」的傳播科系分類思維。

第六，值得注意的是，更有論者質疑學習這些匯流技能的適切時空點，認為匯流技能最佳的學習場所，並非在校期間，而是在進入業界職場之後。曾擔任美國新聞集團 Knight Ridder 副總裁、新聞與大眾傳播認證委員會成員的 Jerry Ceppos，在回應知名研究機構 Poynter Institute 的一段採訪中，表達了他對於學習匯流課程時間點的看法：

> 我擔心匯流的缺點。如果這個詞意味著向所有學生傳授基礎知識—因為選擇任何媒介的學生都需要瞭解它們—這很好。如果這意味著強調立即提交一些故事的重要性，那也是合適的。但如果這意味著只是教些網際網路的相關知識，那就算了，我們可以在學生進入職場之後再傳授這些知識。 (Bhuiyan, 2010, pp. 120-121)

總體而言，主張全新思維者認為，匯流教育的真正落實必須是打破傳統、顛覆性創新，可能還必須是打破舊有學科典範（譚天，2015）的一場學術革命。然而，綜觀以上之變革新思維，有些尚在「只聞樓梯響」的論理階段，另一些則棄守人文原則、在既有框架或條件下的「舊瓶換新酒」，大破大立格局仍待突破。

此外，回到本研究個案的一組矛盾題：有超過 70% 學生認為「大三才進入專業領域分流，在時間上太晚」；卻有將近 80% 的學生「不希望匯流技能延後到三、四年級後再修讀」。如果這意味著匯流與分流教學的前後期劃分，對於年輕世代而言沒有太大意義，那麼新聞傳播教育者，又該如何看待以及回應年輕世代的「新思維」呢？

陸、結語

傳播生態巨變下，本研究爬梳當前匯流課程變革的諸多不利因素，並針對個案（已分流）新聞系學生進行問卷調查。研究個案在許多面向，一定程度上也呼

應前文所述匯流課程不利因素的相關研究。例如，在個案中教師與學生大多仍較認同傳統媒介思維（因此也就可以合理解釋，為什麼有高達 71% 的學生認為大三之後才分流太晚）；課程的多樣性不太符合學生的需求（傳播技術發展如此快速，課程很難跟得上腳步）；軟硬體基礎設施不足（財務普遍吃緊）；學生希望成為全能型記者，卻又非常憂心「什麼都會，卻什麼都不專精」的窘境等。

除了上述，本研究並指出匯流課程變革的兩個不確定性因素：新技術與匯流定義。這些種種因素，一方面顯示現行匯流課程變革的窒礙難行，二方面表明課程變革的過程可能只是流於表面，並未觸及匯流變革的精神與核心。再者，從參與大一大二不分系政策過程之教育工作者的行政經驗談，也發現了包括課程設置、匯流師資、跨學科學習等方面的執行難處，以及學與用脫節、實務與理論尚缺融合的問題。因此，本文提出近來關於新聞傳播教育的全新思維，期待各界有進一步的激盪與對話；需強調的是，全新思維的本質可能是「大立」，卻也可能是「大破」。它的變革之路，在現實與理想之間、在現象與本質之間，未來恐怕仍需要有更多的討論與辯證。

然而，課程變革無論是採取大破或大立的方式，美國華盛頓與李大學的新聞倫理學教授 Edward Wasserman，基於匯流與新聞學的深刻檢視而提出的四項反思，仍值得新聞傳播教育者細究審辨：

> 匯流是否只是對於商業需求的回應，而不是回應新聞的需求？匯流是否使某些特定技術能力優先於其他技術能力，以及某類資訊優先於其他類資訊？匯流是否導致在管理實踐上，使新聞編輯室的工作條件惡化，並促使新聞報導流於輕薄和草率？匯流是否強化了將行銷目標置於新聞學之上？ (Wasserman, 2006, December 15)

參考書目

王正慧、林小蓉（2018）。〈大眾傳播科系大學生之職能學用落差：以「品質機能展開法」（QFD）分析課程結構為例〉，《傳播研究與實踐》，8（1）：103-129。http://doi.org/10.6123/JCRP.2018.004

王維菁（2018 年 7 月 23 日）。〈傳播教育怎麼變？該怎麼變？〉，《媒體改造學社》。上網日期：2018 年 7 月 23 日，取自 http://twmedia.org/archives/2333

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n.d.）。〈教育部調降大學生師比，全國平均應低於18%，放寬專任教師員額，不設限以擴增教授師額（20% 以上）〉。上網日期：2020 年 8 月 21 日，取自 https://join.gov.tw/idea/detail/ccfd954f-18d6-4cfd-9db6-72c392bee1e5

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n.d.）。〈各級學校師生比—年〉。上網日期：2020 年 10 月 13 日，取自 https://statdb.dgbas.gov.tw/pxweb/Dialog/viewplus.asp?ma=ER0105A1A&ti=%A6U%AF%C5%BE%C7%AE%D5%A5%CD%AEv%A4%F1-%A6~&path=../PXfile/Education/&lang=9&strList=L

中華傳播學刊編輯部（2008）。〈傳播教育及研究如何因應傳播未來發展趨勢：訪談紀要〉，《中華傳播學刊》，13：233-240。http://doi.org/10.6195/cjcr.2008.13.08

卯靜儒（2014）。〈改革即改變嗎？——教育改革理解路徑之探索〉，《教育學刊》，42：1-37。

吳永乾（2017 年 12 月 6 日）。〈融媒體時代的新聞傳播與人才培育〉。《立報傳媒》。上網日期：2019 年 8 月 14 日，取自 https://www.limedia.tw/comm/969/

李曉靜、韓羽昕（2018）。〈歐美新媒體傳播碩士課程教學分析與反思〉，《新聞記者》，5：91-96。

周淑卿（2002）。〈誰在乎課程理論？——課程改革中的理論與實務問題〉，《國立臺北師範學院學報》，15：1-16。

施伯燁（2021）。〈傳播科系學程制度規劃與反思：以南華大學傳播學系為例〉，《傳播研究與實踐》，11（1）：83-104。http://doi.org/ 10.6123/JCRP.202101_11(1).0005

韋路（2013 年 1 月 10 日）。〈新媒體時代新聞傳播教育的四大轉型趨勢〉，《今傳媒》。上網日期：2019 年 10 月 6 日，取自 http://media.people.com.cn/BIG5/n/2013/0110/c354159-20158752.html

姜衛玲（2011）。〈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新聞教育改革研究〉，《新聞界》，4：150-152。

夏春祥（2002）。〈眾聲喧嘩的迷思：關於傳播研究的筆記〉，《中華傳播學刊》，1：3-26。

____（2015）。〈傳播的想像：論媒介生態學〉，《新聞學研究》，125：143-174。http://doi.org/10.30386/MCR.201510_(125).0004

____（2016）。〈在建制化與數字化之間：口語傳播的人文主義追尋〉，《現代傳播》，7：20-24。

____（2021）。〈編者的話〉，《傳播研究與實踐》，11（1）：i-iii。

唐海江（2016）。〈互聯網革命與新聞傳播學科重構之反思——一種技術自主性的觀點〉，《社會科學戰線》，7：143-149。

郝曉鳴（2021）。〈新加坡的傳播教育：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的發展個案〉，《傳播研究與實踐》，11（1）：33-52。http://doi.org/10.6123/JCRP.202101_11(1).0003

張小琴、胥佳（2018）。〈美國新聞與傳播教育最新動向及其啟示〉，《當代傳播》，2：33-36。

張迪（n.d.）。〈媒體變革背景下的海外新聞傳播教育現狀與發展趨勢〉，《國際新聞界》。上網日期：2014 年 4 月 14 日，取自 http://cjjc.ruc.edu.cn/fileup/HTML_EN/20140414.shtml

陳百齡、陳世敏（2001）。〈媒體網站的理想與現實：1995–1998〉，《廣播與電視》，16：51-85。

陳東園（2013）。〈大眾傳播學的新境域〉，《空大學訊》，493：48-52。

陳清河、李明哲（2012）。〈匯流趨勢下「系」定位的省思〉，《傳播實踐與研究》，2（2）：63-66。http://doi.org/10.6123/JCRP.2012.022

陳雅惠（2014）。〈探索網路新聞敘事新方向〉，《新聞學研究》，121：127-165。http://doi.org/10.30386/MCR.201410_(121).0004

陳麗菲（2015）。〈國外新聞傳播學科教育發展新趨勢探討〉，《新聞記者》，10：57-64。

曹林（2018）。〈新聞學致命危機：學新聞的不做新聞，做新聞的不學新聞〉，《吐槽青年：曹林的時政觀察》。上網日期：2018 年 6 月 9 日。取自 https://mp.weixin.qq.com/s/_EwonhttC6x-E4oL3GVJZg

陶振超（2007）。〈量變、質變、或不變：數位媒體匯流下的新聞傳播教育〉，《中華傳播學刊》，11：59-64。http://doi.org/10.6195/cjcr.2007.11.03

許瓊文（2007）。〈數位化媒體教育課程實驗初探與省思：以某大學實習媒體爲例〉，《中華傳播學刊》，11：3-47。http://doi.org/10.6195/cjcr.2007.11.01

須文蔚、陳世敏（1996）。〈傳播學發展現況〉，《新聞學研究》，53：9-37。http://doi.org/10.30386/MCR.199607_(53).0003

黃旦（n.d.）。〈重造新聞學——網路化關係的視角〉，《國際新聞界》。上網日期：

2019 年 4 月 17 日，取自 http://cjjc.ruc.edu.cn/fileup/HTML_EN/20150106.shtml

____（2014）。〈整體轉型：關於當前中國新聞傳播學科建設的一點想法〉，《新聞大學》，6：1-8。

黃欽（2018 年 8 月 30 日）。〈參與式傳播：新聞傳播教育的範式轉換及其實踐價值〉，《Media：傳媒》。上網日期：2018 年 8 月 30 日，取自 https://www.pressreader.com/china/media-5898/20180830/282282436169550

黃瑚（2012）。〈推行 2+2 培養模式，培養複合型新聞傳播人才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本科教學改革情況介紹〉，《傳播實踐與研究》，2（2）：1-8。http://doi.org/ 10.6123/JCRP.2012.014

游梓翔、夏春祥（2003）。〈傳播學門的再思考：口傳與大傳的分立史與整合路〉，《中華傳播學刊》，4：109-144。

彭蘭（2015）。〈融合時代，新媒體教育向何方〉，《新聞與寫作》，3：5-7。

鄭素俠（2012）。〈媒介融合下美國新聞傳播教育變革的經驗與啟示〉，《編輯之友》，9：120-123。

鄭廣嘉、秦靜（2016 年 1 月 12 日）。〈傳播教育的當下與未來〉，《壹讀》。上網日期：2019 年 10 月 6 日，取自 https://read01.com/GJyg6L.html

潘家慶、羅文輝、臧國仁（1996）。〈傳播教育核心課程規劃〉，《新聞學研究》，53：85-106。http://doi.org/10.30386/MCR.199607_(53).0006

蔡雯（2017）。〈新聞教育亟待探索的主要問題〉，《國際新聞界》，3：6-18。

劉慧雯（2015）。〈從媒體素養到新素養：試論教學策略與認識論的轉變〉，《中華傳播學刊》，27：67-98。http://doi.org/10.6195/cjcr.2015.27.03

劉蕙苓、羅文輝（2017）。〈新聞人員對媒體角色認知的變遷與第三人效果〉，《中華傳播學刊》，31：191-225。https://doi.org/10.6195/cjcr.2017.31.06

簡維克（2007）。〈從科技匯流到管制匯流：論 NCC 成立後的通訊傳播監理政策〉，《科技法學評論》，4（2）： 229-285。

譚天（2015）。〈從「新聞學與傳播學」到「傳播學與傳媒學」〉，《新聞記者》，12：38-42。

嚴三九、 南瑞琴（2017）。〈一流學科建設的制度研究：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和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的學科制度變革為例〉，《華東師範大學學（教育科學版）》，6：95-106。

蘇宏元（2014 年 12 月 24 日）。〈多維度全方位重構新聞傳播學科〉，《中國社會科學網》。上網日期：2019 年 10 月 8 日，取自 http://mgmt.cssn.cn/zx/

bwyc/201412/t20141224_1454550_1.shtml

蘇蘅、王維菁、林照真、倪炎元、夏珍、張文強、陳百齡、陳韜文、鍾蔚文、吳岱芸、吳俊葵（2018）。〈《新聞學研究》五十週年座談：數位時代新聞傳播教育的改變與挑戰〉，《新聞學研究》，134：179-217。http://doi.org/10.30386/MCR.201801_(134).0005

蘇鑰機（2021）。〈機構歷程與社會變遷：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發展省思〉，《傳播研究與實踐》，11（1）：5-31。http://doi.org/10.6123/JCRP.202101_11(1).0002

Aumente, J. (2007). Multimedia journalism changes what universities teach. *Nieman Reports*, *61*(3). Retrieved August 8, 2019, form https://nieman.harvard.edu/articles/multimedia-journalism-changes-what-universities-teach/

Bhuiyan, S. I. (2010). Teaching media convergence and its challenges. *Asia Pacific Media Educator*, *20*, 115-122.

Birge, E. (2004). Teaching convergence—But what is it? *The Quill*, *92*(4), 10-13.

-- (2006). The great divide: Journalism schools around the country are doing their best to churn out students with multimedia skills. But is the industry really ready for them? *The Quill*, *94*(6), 20-24.

Boers, R., Ercan, E., Rinsdorf, L., & Vaagen, R. W. (2012). From convergence to connectivism: Teaching journalism 2.0. *Onlin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and Media Technologies*, *2*(4), 52-64. https://doi.org/10.29333/ojcmt/2398

Callaghan, R. (2009). A toe in the water and a bet both ways: A rationale for teaching convergence journalism. *eCULTURE*, *2*, 43-49. Retrieved March 15, 2020, from https://ro.ecu.edu.a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079&context=eculture

Cleary, J. (2006). From the classroom to the newsroom: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 broadcast journalism.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Educator*, *61*, 253-266. http://doi.org/10.1177/107769580606100304

Cochie, M. A. (2008). *Convergence in the curriculum: A survey of college communication programs*.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University of Florida, Gainesville, FL.

Criado, C., & Kraeplin, C. (2003, July). *The state of convergence journalism: United States media and university stud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of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Kansas City,

MO.

Dailey, L., Demo, L., & Spillman, M. (2005). The convergence continuum: A model for studying collaboration between media newsrooms. *Atlantic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3*, 150-168. https://doi.org/10.1207/s15456889ajc1303_2

Dennis, E. E., Meyer, P., Sundar, S. S., Pryor, L., Rogers, E. M., Chen, H. L., & Pavlik, J. (2002). Learning reconsidered: Educ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communications, convergence and the curriculum.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Educator*, *57*, 292-318. https://doi.org/10.1177/107769580205700402

Deuze, M. (2004). What is multimedia journalism? *Journalism Studies*, *5*, 139-152. https://doi.org/10.1080/1461670042000211131

-- (2006). Global journalism education. *Journalism Studies*, *7*, 19-34. https://doi.org/10.1080/14616700500450293

Emma-Okoroafor, O. (2016). Media convergence: A paradigm shift in journalism education in Nigeria. *Review of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4*(1), 19-42. https://doi.org/10.15640/rjmc.v4n1a2

Fidler, R. (1997). *Mediamorphosis: Understanding new media*. Thousand oaks, CA: Sage.

Filak, V. F. (2015). *Convergent journalism: An introduction: Writing and producing across media* (2nd ed). Burlington, MA: Focal Press.

Gordon, R. (2003). The meanings and implications of convergence. In K. Kawamoto (Ed.), *Digital journalism: Emerging media and the changing horizons of journalism* (pp. 57-73).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Grant, A. E., & Wilkinson, J. S. (2009). *Understanding media convergence: The state of the field*. New York, NY: Oxford Press.

Hammond, S. C., Peterson, D., & Thomsen, S. (2000). Print, broadcast and online convergence in the newsroom.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Educator*, *55*, 16-26. https://doi.org/10.1177/107769580005500203

Huang, E., Davison, K., Shreve, S., Davis, T., Bettendorf, E., & Nair, A. (2006). Bridging newsrooms and classrooms: Preparing the next generation of journalists for converged media.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8*, 222-260. https://doi.org/10.1177/152263790600800302

Jenkins, H. (2006). *Convergence culture: Where old and new media collide*. New York,

NY: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Johnson, D. (2007, August 20). Campus revolutionary. *Chicago Magazine*. Retrieved August 31, 2020, from https://www.chicagomag.com/Chicago-Magazine/September-2007/Campus-Revolutionary/

Karmasin, M., Diehl, S., & Koinig, I. (2015, June). *Convergence in Media Education Curricul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igher Education Advances, Valencia, Spain. https://doi.org/10.4995/HEAd15.2015.303

Killebrew, K. (2005). *Managing media convergence: Pathways to journalistic cooperation*. Malden, MA: Blackwell.

Kolodsky, J. (2006). *Convergence journalism: Writing and reporting across the news media*. Oxford, UK: Rowman and Littlefield.

Kolodzy, J., Grant, A. E., DeMars, T. R., & Wilkinson, J. S. (2014). The Convergence Year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Educator*, *69*, 197-205. https://doi.org/10.1177/1077695814531718

Larkin, J. (2008). *Convergence journalism: Towards a new media landscape.* (University of Canterbury A Robert Bell Travelling Scholarship report). St Petersburg, FL: Sculpture in courtyard at the Poynter Institute.

Lawson-Borders, G. (2003). Integrating new media and old media: Seven observations of convergence as a strategy for best practices in media organiz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dia Management*, *5*, 91- 99. https://doi.org/10.1080/14241270309390023

Lowrey, W., Daniels, G. L., & Becker, L. B. (2003, November). *Tracking and explaining convergence efforts among schools of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Expanding Convergence: Media Use in a Changing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Columbia, S.C.

Lowrey, W., Daniels, G. L., & Becker, L. B. (2005). Predictors of convergence curricula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program.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Educator*, *60*, 32-47. https://doi.org/10.1177/107769580506000108

Massey, B. L. (2010). What job advertisements tell us about demand for multiplatform reporters at legacy news outlet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Educator*,

65, 142-155. https://doi.org/10.1177/107769581006500204

Mencher, M. (2002). What should be taught in journalism schools? An aspiring reporter 'doesn't need to learn how—He needs to learn what.' *Nieman Reports*, *56*(4). Retrieved March 14, 2020, from https://niemanreports.org/articles/what-should-be-taught-in-journalism-schools/

Mensing, D. (2010). Rethinking [again] the future of journalism education. *Journalism Studies*, *11*, 511-523. http://dx.doi.org/10.1080/14616701003638376

Mitchell, B. (2002, December 18). Can convergence float? *Poynter*. Retrieved March 10, 2020, form https://www.poynter.org/archive/2002/can-convergence-float/

Pavlik, J. V. (1999). New media and news: Implications for the future of journalism. *New Media & Society*, *1*, 54-59. https://doi.org/10.1177/1461444899001001009

Prensky, M. (2012). *From digital natives to digital wisdom: Hopeful essays for 21st century learning*. Thousand Oaks, CA: Corwin.

Quinn, S. (2005). Convergence's fundamental question. *Journalism Studies*, *6*, 29-38. https://doi.org/10.1080/1461670052000328186

-- (2006). *Conversations on convergence: Insiders' views on news produc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NY: Peter Lang.

-- (2008). Changing journalism for the likely present. In F. Papandrea & M. Armstrong (Eds.), *CPRF 2008: Record of the Communications Policy & Research Forum 2008* (pp. 21-29). Sydney, Australia: Network Insight Institute. http://dro.deakin.edu.au/view/DU:30016785

Quinn, S., & Filak, V. F. (2005). *Convergent journalism: An introduction: Writing and producing across the media*. Burlington, MA: Focal Press.

Rogers, T. (2010, September 12). In Journalism: A teacher from the old school worries about the future of journalism education. *About.com: Journalism*. Retrieved March 14, 2020, from https://techcrunch.com/tag/about-com/

Sarachan, J. (2011). The path already taken: Technological and pedagogical practices in convergence education.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Educator*, *66*, 160-174. https://doi.org/10.1177/107769581106600204

Shepard, S. (2007). How a new J-school takes on a changing profession. *Nieman Reports*, *61*(3). Retrieved November 3, 2019, from https://niemanreports.org/

articles/how-a-new-j-school-takes-on-a-changing-profession/

Slaughter, S., & Lestlie, L. L. (1997). *Academic capitalism: Politics, policies, and the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Smith, L. K., Tanner, A. H., & Duhe, S. F. (2007). Convergence concerns in local television: Conflicting views from the newsroom.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51*, 555-574. https://doi.org/10.1080/08838150701626354

Stewart, P. (2007, July 26). Manic over multimedia. *Diverse: Issues in Higher Education*. Retrieved November 3, 2019, from https://diversepodium.com/article/8868/

Tanner, A., & Duhé, S. (2005). Trends in mass media education in the age of media convergence: Preparing students for careers in a converging news environment. *Studies in Media &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5*(3), 1-12.

University of Kansas. (1999, December 3). *Journalism school adopts "convergence media" curriculum*. Retrieved November 18, 2019, from: https://www.newswise.com/articles/journalism-school-adopts-convergence-media-curriculum

Utsler, M. (2001). The convergence curriculum: We got it. Now what are we gonna do with it? *Feedback*, *42*(3), 1-5.

-- (2002). The convergence curriculum: Lessons from year one. *Feedback*, *43*(2), 22-27.

Wasserman, E. (2006, December 15). Looking past the rush into convergence: As technology drives big newsroom changes, what will happen to journalism? *Nieman Foundatio*n. Retrieved March 9, 2020, from https://nieman.harvard.edu/articles/looking-past-the-rush-into-convergence/

Wenger, D. H., & Owens, L. C. (2012). Help wanted 2010: An examination of new media skills required by top U.S. news companie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Educator*, *67*, 9-25. https://doi.org/10.1177/1077695811426826

Wordsman, E. (2014, December 18). Journalism schools add courses in sports, emerging technology. *American Journalism Review*. Retrieved November 12, 2019, from https://ajr.org/2014/12/18/journalism-schools-add-courses-sports-emerging-technology/

Wotanis, L., Richardson, J., & Zhong, B. (2015). A study of campus media organizations' convergence practices. *Research*, *53*. Retrieved March 12, 2020, from https://www.

printfriendly.com/p/g/AVPwpp

Wotkyns, R. S. (2014). Curriculum development in the digital age of journalism. *GSTF Journal on Media & Communications*, *2*(1). Retrieved March 12, 2020, from https://www.deepdyve.com/lp/springer-journals/curriculum-development-in-the-digital-age-of-journalism-BdgqgdX7q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11(2), pp. 95-130, July 2021

Predicament, Reform, and Reflection: A Case Study of Journalism Education in the Era of Digital Convergence

Ma, Yao-Tsu*

Ph.D. Candidate, Ph.D. Program in Communication Studies, Shih Hsin University

Abstract

Digital convergence has brought a huge impact to the world's communication ecology, including news reporting methods, production mechanisms, media structures and operating models, etc., all of which have undergone fundamental changes. Meanwhile, it has also initiated a wave of reforms in journalism education in various degrees from tentative supplementary courses to brand-new fully integrated courses. This article listed various unfavorable factors and uncertainties d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form of the Convergence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in order to reflect on the necessity and appropriateness of the current educational reform and call for possible new directions in the reform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The case study focused on the new journalism curriculum of the journalism department of the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in a local university. One aim was to examine student responses to the new curriculum and the overall effect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generalization first, then specialization" system. The other aim wa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discussion on the unfavorable factors listed above during curriculum reform. This study also interviewed two educators in order to triangulate with student responses in questionnaires and to understand further of the current status and potential problems of the convergence curriculum reform in practice.

Keywords: generalization first then specialization, journalism education, convergence courses, digital convergence

* Email: masir5189@gmail.com
Received: 2020.3.24
Accepted: 2021.4.6

JCRP 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成舍我紀念館 Cheng Shu-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Ainosco Press

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11 卷 第 2 期．頁 131-152．2021 年 7 月
DOI:10.6123/JCRP.202107_11(2).0006

復旦師生的「好學」與「力行」：新聞傳播學的中國經驗

李良榮

上海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
浙江傳媒學院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

周玉橋 *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自 1929 年建系以來，培育出大量新聞事業的從業人員，也為中國新聞傳播學科領域的建制化做出奠基與拓展的工作，其中以新聞教育的師資培訓與傳播研究的人員養成最具系統性的積累。文章以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為個案，考察其新聞傳播教育的實踐歷程；而圍繞著對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好學力行」傳統的考察，闡述新聞傳播學「復旦學派」的理論脈絡，最後則在建制化經驗的總結中，指出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未來發展可能面對的問題。

關鍵詞：好學力行、建制化、復旦學派、新聞傳播學科

* Email: zhouyuqiao@fudan.edu.cn

JCRP 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舍我紀念館 Cheng She-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Ainosco Press

壹、問題意識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創辦於 1929 年，是中國持續辦學時間最久的高校新聞傳播學專業。2019 年 11 月，數千學生、系友從國內、外彙聚復旦大學體育館，共同慶祝新聞學院（原新聞學系）90 週年，「好學力行」的文字掛在會場中心。

這是 1943 年 4 月由時任新聞系主任的陳望道（1891–1977）提出，語出《中庸》「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的字詞；之後雖經曲折，但這觀念打造的世界觀銘刻在一代代師生心中，形成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的一種精神傳統。正如上海《解放日報》記者朱瑨迆、王瀟在其〈新聞人的底色——寫在復旦大學新聞學院九十華誕之際〉一文中所寫道：

> 就和「新聞」這個東西一樣，新聞系的方方面面，變動不居，每天都是新的。但變動中，依然有始終未變的氣質，有始終高懸的系銘——「好學力行」。這是中國最知名新聞學府的精神密碼。（朱瑨迆、王瀟，2019 年 11 月 2 日）

本文通過對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新聞傳播教育的實踐歷程進行考察，關照中國大陸新聞教育變遷的社會現實，而圍繞著對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師、生之間「好學力行」傳統的考察，闡述新聞傳播學「復旦學派」的理論脈絡；最後則總結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在過往中形成的建制化經驗，反思其未來發展可能面對的問題。

關於新聞傳播學的「復旦學派」，南京大學劉鵬（2019）《範式的探索：新聞學復旦學派的浮現及其學術傳統——以王中為中心的考察》一文認為，1950 年代中期和 1980 年代初期，王中主持下的復旦新聞學研究體現出「學派」的種種特點，幾代新聞學者共同在新聞理論、新聞史、傳播學等領域進行了開拓性研究，試圖構建一種「新聞本位」的範式，但也因此促發了不同力量共同建構學院的制度性發展歷程。本文從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好學力行」傳統切入，對「好學」、「力行」等概念進行具體闡釋，論述其構建新聞傳播學學術話語體系中的三次話語超越，以此來豐富過往對「復旦學派」的探究。[1]

---

1 本文使用的大部分素材資料，來自 2019 年學院成立 90 週年時黃瑚等人（2019）編著的《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簡史》、復旦大學新聞學院（2019）編著的《復旦大學新聞學院九十週年紀念冊》大事記、張力奮主持舉辦的《以新聞的名義——復旦大學新聞學院 90 週年文獻展》、朱瑨迆、王瀟（2019 年 11 月 2 日）所撰寫的〈新聞人的底色——寫在復旦大學新聞學院九十華誕之際〉以及圖書館資料等，特此說明。

貳、「復旦新聞館，天下記者家」

「復旦新聞館，天下記者家」是 1945 年 4 月 5 日復旦新聞館建成時，系友所送對聯；正如于右任（1879–1964）在新聞館落成時所送賀詞中寫道：「中國新聞事業與復旦，在過去已有密切的關係，在未來更有遠大的展望」（于右任，1945/2015，頁 71）。90 年的發展，復旦新聞學院不僅培育了中國大陸新聞事業發展所需要的從業人才，更為中國新聞事業師資力量的培育、中國新聞傳播學學科領域的開拓、中國新聞改革的推動等方面做出了積極的嘗試與摸索。

學院積極培育中國新聞事業的各種從業者，90 年間累計培養出 8,605 名本科生，2,602 名碩士研究生，556 名博士研究生和 175 名博士後。[2] 學院同時也是中國新聞傳播專業的師資訓練基地。僅 1991–2009 年畢業的 305 名博士生中，擔任各高校新聞學院副院長、研究所副所長以上的就有 50 多人（黃瑚等人，2019，頁 166）。而學院自 2004 年以來至今開設的暑期進修班，每期招收 60 多名來自全國各地的博士生和講師以上職稱教師，更形塑了廣泛且深入的影響。

而作為新聞傳播學學科的最早發展者，復旦大學新聞系在 80 年代便出版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下簡稱「新中國」）成立以後第一套新聞學教材（1986 年）、廣播電視學教材（1987 年），在 1980、90 年代，這些教材也普遍為中國高校新聞傳播學專業採用，繼而奠定了這一學科發展認知的普遍性。而在建制化的摸索過程中，復旦大學是新中國最早開設傳播學課程的新聞學院之一，相關作為包括招收研究生（1961 年）、招收博士生（1984 年）和設立博士後流動站（1999 年）等；而在新世紀，學院更是最早發展「部校共建」[3] 辦學模式（2001 年）以及「2 + 2」課程體系改革（2012 年）的新聞傳播學院，內部、外部等多方力量共同參與學術體制發展的過程。

也由於這種結構性的規劃與醞釀，新中國成立以後 1956 和 1978 年開始的新聞改革，復旦新聞學院的學者們都為新聞改革的推動，提供了具有戰略性、方向性的理論觀點，以及為輿論引導、媒介融合、媒體經營管理等提供了因應變遷、配合時代的創新性對策。

---

2 相關數據由研究者根據《復旦大學新聞學院九十週年紀念冊》刊載的歷年本科生名錄、歷年碩士研究生名錄、歷年博士研究生名錄、歷年博士後名錄統計得出，截至 2019 年 9 月（復旦大學新聞學院，2019，頁 118-185）。

3 部校共建，是中國特色的新聞學院建設模式，始於 21 世紀初，是由復旦大學最早摸索出帶有中國特色的新聞教育發展路徑，這一模式以促進新聞學院的發展為出發點，而由黨政力量溝通著新聞學院發展中需要的社會資源，新聞學院借助機制作用推動改革與發展，這一模式於 2013 年在全國得到推廣。

參、九十餘年的新聞傳播教育實踐歷程

歷史悠久只是說復旦辦學時間持續、綿延，但不是中國最早創辦者。1918年10月14日，北京大學新聞研究會成立，「是我國第一個有組織的新聞學研究團體，是我國將新聞作為一門科學從事研究的開端」（章玉梅，1985，頁94）。而在〈中國第一個新聞專業創辦時間考論〉的文章中，鄧紹根指出：「上海聖約翰大學在1921年9月創辦了中國第一個新聞專業」（鄧紹根，2010，頁88）。之後，廈門大學（1921年）、北平平民大學（1923年）、燕京大學（1924年）、上海南方大學（1925年）等都先後開設新聞學專業。

而在1920年代的這股浪潮、趨勢下，復旦新聞系也謀求設立。1924年，陳望道在復旦文學科開設「新聞學講座」，聘請一批著名報人、主筆如邵力子（1882–1967）、謝六逸（1898–1945）等來講課。1925年11月，肇建於近代最早開放口岸城市的上海《申報》，在〈復大中國文學科之發展〉的時論中提及醞釀建設復旦新聞系：

> 復旦大學鑒於近來世界各國文學思潮之進步，而國內各大學設專科以供需要，實不多觀，特於本學期增設中國文學一科，內分文藝、教育、新聞三系，俾造就專門人才，該科主任葉楚傖，教授劉大白、陳望道諸先生。（〈復大中國文學科之發展〉，1925年11月3日，頁15）

1929年9月，新聞學系正式成立，首任系主任是謝六逸。當時他寫道：

> 今後欲圖我國新聞事業的發展，必須培養新聞人才。我國各地的地方報紙，多腐敗不堪，亟待改良，不患將來學生無用武之地。（謝六逸，1935/2015，頁560）

這說明，復旦大學辦新聞學系是時代的需求、報業的需求、地域的需求。而院系90餘年的歷程，大致可以分為四個時期。

一、第一時期：1929–1937年，從創辦到基本成型

自復旦新聞系成立，謝六逸著手制度建立的三個面向：制訂課程、聘請教師、

開展學術研究並編寫教材。這些工作是辦學關鍵，也是後來發展的建制基石；當時設計出來的課程：學制規定為四年，需修滿 161 學分，可分為基礎知識課程、專門知識課程、輔助知識課程、寫作技巧課程、實習與考察課程等 5 類（謝六逸，1930，頁 114）。此後，歷代新聞系都有所增刪，但基本上是修修補補，其指導思想和基本框架一直延續至今。而在師資建設方面：

> 謝六逸聘請到不少著名報人來新聞學系講課，如《時報》總編輯戈公振、《時事新報》編輯黃天鵬、《新聞報》編輯郭步陶、《民報》編輯兼中央通訊社記者陳萬里、《新聞報》印刷部主任章先梅、《文化建設》月刊主編樊仲雲等，逐步形成專職教授與兼職教授並存的良好局面。（黃瑚等人，2019，頁 10）

這批教師教課同時積極開展學術研究，把相關講課內容逐步提煉、完善，形成教材，比如後來赴臺發展的黃天鵬[4]（1905–1982）編著的《中國新聞事業》、《新聞文學概論》，以及《怎樣做一個新聞記者》等；郭步陶（1879–1962）編著的《編輯與評論》、《時事評論作法》等。

課程、教師、教材的制度化作為逐步規範、完善，使新聞學系漸次成型，招收學生也從 1929 年的 5 名到 1937 年達到 71 名。在此期間，復旦新聞系舉辦「首屆世界報紙展覽會」，被譽為「中國新聞史上的創舉」、「展出了本國報紙 1,500 多種，分別來自 33 個國家的外國報紙 500 多種」（復旦大學新聞學院，2019，頁 5），這是當時新聞界的重要事件，擴展了復旦新聞系在學界與業界的關係網絡。

二、第二時期：1937–1949 年，西遷重慶、東歸上海，在戰火中崛起

1937 年 7 月，中國全面抗戰開始，新聞學系與復旦大學部分師生遷移內地，歷盡艱難，於當年 12 月底抵達戰時首都重慶。半年以後，系主任謝六逸返回貴

4 黃天鵬是當時著名報人，曾於 1927 年在北京創辦新聞學學術團體北京新聞學會，主編會刊《新聞學刊》，李秀雲曾在〈黃天鵬對中國新聞學術研究的貢獻〉一文中指出，《新聞學刊》「拓展了新聞學術研究的空間」，「推動了新聞學研究的『學術化』」（李秀雲，2003，頁 31）；1930 年，黃天鵬回滬入《時事新報》工作，並擔任復旦大學新聞學系教授，他主導在復旦大學新聞學系建立新聞學研究室，意在「將復旦大學新聞學系建設為新聞學術的中心點」（同上引，頁 32）。

陽老家，時為中國國民黨中央機關報《中央日報》社長程滄波（1903–1990）出任新聞系主任。

當時新聞系剛遷到重慶北碚，校舍、教學設施、經費，樣樣都缺。但最缺乏的還是師資，程滄波利用其在新聞界的關係網絡，聘請當時重慶最優秀的記者、編輯、管理人才來校任教。譬如 1925 年獲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新聞學碩士學位、時任英國路透社重慶分社社長的趙敏恒（1904–1961），再如英國倫敦大學新聞學碩士、擔任英文《大英晚報》採編工作的曹亨聞（1910–1968），以及劉光炎（時任《中央日報》總編）、胡健中（《東南日報》社長）、《新蜀報》總經理周欽嶽、《中央日報》主筆儲安平，以及中華書局總編輯、擔任《新聞報》主編的姚蓬子等等。

1941 年 9 月，程滄波出任香港《星島日報》總主筆，陳望道正式接任系主任。在東歸上海之前的 5 年時間裡，他採取一系列舉措來建設、改造新聞系，對後來幾十年的發展產生影響。

（一）1942 年 9 月，陳望道提出「宣揚真理、改造社會」為辦系指導思想，並把「好學力行」作為系銘，通過精神面向上的引導，賦予新聞系明確的價值追求。

（二）創辦「新聞晚會」。1943 年秋，陳望道指導並主持每週一次的「新聞晚會」。晚會不只談新聞，主要是評論天下與國家大事，新聞系師生、社會名流登臺演講、討論、辯論，氣氛自由，在重慶北碚時期，共舉辦過 110 多場。

（三）籌建新聞館。鑒於教學設施匱乏，1944 年 4 月起，陳望道到各處募款，募集到 200 萬元資金，於 1945 年 4 月 5 日建成復旦新聞館，集資料室、圖書館、閱覽室、印刷間、編輯室、報展室於一館，極大改善辦學條件。

（四）修訂教學大綱，保持繼續聘請新聞界從業者來校任教實務性課程。

這一系列行動使得復旦新聞學，日益成為所有新聞傳播教育建制化過程的討論核心。1946 年的 6 月，新聞系隨同復旦大學遷回上海，回到地處江灣的老校區，直到 1949 年 5 月 26 日，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復旦大學江灣校區，復旦新聞系發展的結構性脈絡全然不同了。

三、第三時期：1949–1968 年，跌宕起伏中的新聞系

新中國成立後不久，國家對全國高等學校進行大調整。上海暨南大學新聞系

（1949 年 8 月）、中國新聞專科學校（1949 年 9 月）、華東新聞學院（1950 年 9 月）、民治新聞專科學院（1951 年 9 月）、上海聖約翰大學新聞系（1952 年 9 月）等院校師生併入復旦新聞學系。一時之間，復旦新聞學系的規模空前龐大；同時，北京、燕京等各大學新聞學系先後停辦，復旦大學新聞學系成為當時中國高校裡少數開設的新聞學專業之一。

1950 年 7 月，原新聞系主任陳望道因身兼多職而辭去職務，並推薦時任《解放日報》社長惲逸群（1905–1978）兼任新聞學系主任。不久，就由王中（1914–1994）代理新聞系主任（1950 年 9 月），並於 1952 年 10 月起正式接任。

王中上任後，大力修改新聞學系課程，竭力推進研究的開展，並組織力量編寫新教材。1956 年，中共中央提出「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文化藝術基本方針，中共中央黨報《人民日報》在 7 月 1 日發表〈致讀者〉社論，吹響新聞改革的號角。受此影響，王中提出了一系列創新性的新聞觀點。王中把這些見解都納入他的《新聞學原理大綱（初稿）》中，這份大綱僅 1,000 來字，卻對中國新聞學科發展具有里程碑式意義，但也是這份大綱，給王中帶來災難性後果。

1957 年夏，中國開始「反右」鬥爭，王中很快成為新聞界批判的目標，當時新聞界的一本主要雜誌《新聞戰線》還發社論〈大家都來批王中〉，「報紙的兩重性」、「兩論」成為反動反黨的主要罪證，復旦新聞系遭到重大打擊。當時，新聞學系包括王中在內，有 7 位教師被打成「右派分子」，占教師總數的 20%。在此同時，依上級命令，新聞系停止一切教學，集中批判王中，肅清王中反動觀點影響。1962 年，時任新聞系黨總支書記的徐震（1929–1993）提出了新聞系新的辦學思路「兩典一筆」，即師生要努力掌握馬列主義經典著作和中外文史經典著作，並培養出深入淺出，能說服大眾的文字能力。這一主張在當時很快被新聞學系師生接受，並據此重新制定新聞學教學課程，使教學再次步入正軌。

1966 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新聞學系險遭關閉。1969 年 3 月 29 日，《人民日報》發表署名「駐復旦大學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文章〈我們主張徹底革命〉，明確提出：「有些系，如新聞學系，根本培養不出革命的戰鬥的新聞工作者，可以不辦。」（丁淦林，2002，頁 477）所謂的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是當時復旦大學的領導機構，按此設想，新聞系就要解散。後來，大學開始招收工農兵大學生，新聞學系還是和其他系一樣，從 1970 年秋開始，招收學生。這也是全國唯一招收新聞系學生的大學。但課程全被打亂，教學面目全非，科研只剩下大批判，在運動中，三名資深教師被迫害致死。

四、第四時期：1976 年至今，領航全國的新聞學專業

1976 年 9 月，四人幫宣告覆滅，文化大革命結束。1977 年，全國高校恢復高考招生。新聞系迎來第一批文革後的大學生。1978–1979 年，一批自 1957 年反右鬥爭以來遭受迫害的師生陸續得到平反，王中於 1979 年 1 月 13 日平反，恢復職稱與行政職務，並於 10 月再次擔任復旦大學新聞學系主任。

王中復出以後，立即開始了自 1957 年中斷的新聞學理論研究，寫出了《論新聞》（1981）、《論傳播工具》（1981）、《論宣傳》（1982）、《新聞學的第二課題》（1982），以及《論新聞事業的階級性》（1982）等一系列論文，提出了嶄新的學術觀點，引領全國的新聞學研究。

但王中把更多精力投入到新聞學科建設中，他的後繼者一棒接一棒，與時俱進，不斷推出新的舉措，再次推動著全國新聞學科建制化摸索的具體歷程。1979 年 6 月 27 日到 7 月 4 日，復旦大學新聞系發起召開全國新聞理論教學座談會，這是全國首次召開的新聞理論研討會，全國各地新聞理論課程教師、中央與地方新聞主管部門領導多人參會，這在當時影響教學與科研極大。1981 年 5 月創刊《新聞大學》，由復旦大學新聞學系主編；同年春，新聞系正式開設「傳播學概論」課程。1984 年 1 月，國務院正式批准復旦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一起獲得新聞學二級學科博士學位授予權，這是新聞學科第一批博士點，2000 年 12 月，又被授予一級學科博士學位授予權。1985 年 6 月，成立復旦大學文化與傳播研究中心。1986 年，由復旦大學出版社和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聞學基礎教材叢書》一套 6 本核心教材出版；翌年（1987），又出版《廣播電視教材叢書》一套 5 本，這些不同面向的建制化作為都逐步開展。

1988 年 6 月 10 日，復旦大學新聞學系正式改建為新聞學院。1999 年 3 月，復旦大學新聞傳播學博士後流動站正式設立，成為國內第一個新聞傳播學博士後流動站（李建新，2014）。2000 年 12 月，復旦大學新聞學院信息和傳播研究中心被批准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2007 年，復旦新聞學擁有新聞學、傳播學兩個國家重點學科。2001 年 12 月，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與復旦大學簽訂協議，共建復旦大學新聞學院，開創「部校共建」的辦學新模式，部校共建主要工作有五項：共建管理機構即新聞學院院務委員會；共建精品課程；共建骨幹隊伍；共建實踐基地；共建研究智庫。2012 年，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正式實施「2 + 2」教學新模式，即本科生培養的前兩年，完成跨學科課程，後兩年回歸新聞傳播學專業課，開創了全新的培養模式。2019 年，教育部授予復旦大學新聞

學院「新聞學國家教材建設重點研究基地」，這是全國唯一一所（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2019 年 2 月 11 日）。在全國「2015 年度博士後工作綜合評估」中，復旦大學新聞傳播學博士後流動站是新聞傳播學科唯一獲得「優秀」等級的流動站（人社部留學人員和專家服務中心，n.d.）；2020 年度，復旦大學新聞傳播學博士後流動站再次獲得「優秀」等級的肯定。2021 年，QS 全球教育集團發布第 11 次世界大學學科排名，[5]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在傳媒學科排行榜中位列全球排名第 53 位，中國大陸地區高校排名首位。

肆、新聞傳播教育實踐的影響因素

新聞傳播教育實踐的開展離不開其生存的社會環境；復旦新聞傳播教育實踐，深受國家政治形勢變化、新聞事業發展、關鍵任教人物、上海城市環境、外部交流合作等五方面因素的影響。國家政治形勢變化對新聞傳播教育實踐產生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學院建址、教學理念、管理方式等方面的變化上。1937 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復旦新聞學系內遷重慶北碚，戰爭紛亂導致學院建址的改變，國家政治形勢的動盪不安導致經費困難，甚至最終促成學校所有制屬性的改變：由私立而公立。

1950 年代，新中國剛剛成立，百廢待興之際，興起了向蘇聯學習的浪潮，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的課程設置、課程大綱都向著蘇聯學習；在文革時期，學術探討被擱置一邊，取而代之的是「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運動式教育。改革開放初期，國家面臨著新聞隊伍年齡結構老化、從業人員數量短缺的局面，復旦大學新聞系響應國家號召，經教育部批准，正式改系為院，為全國高校最先建立的新聞學院；伴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深入推進，中國走向國際舞臺，復旦大學新聞學院也開拓了多樣化的對外交流交往的管道；新世紀以來，「部校共建」的教育理念指導著復旦大學新聞學院辦學模式和管理方式的轉變。總體來說，國家政治形勢變動、國家和教育部對新聞傳播教育的頂層設計深刻影響著高校新聞傳播教育實踐。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是順應中國新聞事業的發展而創辦的，在發展過程中，它通過理論的推進闡述著新聞事業的發展，也因此站在了國家新聞事業發展的前

5 QS 世界大學學科排名（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係由英國私人公司 Quacquarelli Symonds 發表的年度大學排行榜，是根據國際聲譽、學術研究品質等指標進行評估，目前全球有多種排名提供參考，如《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Times Higher Education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等。具體排名方法詳見 QSChina（n.d.）。

端。1950、60 年代，王中教授提出「社會需要論」、「讀者需要論」、「報紙的兩重性」等論述，強調新聞事業的發展需要尊重社會和讀者的需求，後者則凸顯報紙的宣傳工具和商品的兩重性質；1990 年代，李良榮（1946–）教授也提出「新聞媒介雙重屬性」的理論，為新聞事業的改革鋪路架橋，帶來了新聞事業發展的新思路。在新世紀，李良榮教授針對互聯網平臺的壟斷性地位所引發的網絡治理問題，提出重視互聯網平臺在當下所呈現的「私有制與公共性」的雙重屬性，提出以「私有制屬性，社會化監管」為核心理念的治理方案。尊重客觀規律，直面現實問題，通過基礎理論研究的推進帶動新聞事業的發展，這是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得以長足進步的重要因素。

關鍵人物的任教歷史對於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的發展產生著重要的作用。謝六逸、程滄波、陳望道、王中等人的任教，不僅對教學內容產生影響，更在建制化過程中深刻影響著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的發展方向。例如陳望道先生，他最早翻譯了《共產黨宣言》第一個中文全譯本，具有堅定的共產主義信仰，在復旦新聞傳播教育實踐中引入馬克思主義哲學思辨基因，影響深遠。1960 年代，時任新聞學系黨總支書記徐震提出「兩典一筆」的辦系思路，側重培養學生新聞專業技能。1980、90 年代，時任復旦大學校長謝希德（1921–2000）提出試行通才教育培養目標，新聞學院丁淦林（1932–2011）院長跳脫出專門化人才培養的思路，也提出複合教育的觀念，強調放寬專業口徑，讓新聞傳播學專業學生真正具有雜家優勢，並為外語、經濟、管理、法律等其他專業參與新聞人才的培養騰出空間。進入新世紀以後，黃芝曉（1946–）、趙凱（1944–）、宋超（1950–）、尹明華（1954–2021）、米博華（1954–）等院長進一步完善新聞學院教育理念與人才培養目標，2008 年，基於「大新聞傳播」的全新教育理念，推出了全新的跨專業、跨學科的新聞傳播學教育模式，致力於培養複合型應用型新聞人才。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地處上海，上海的城市精神影響著學院整體的精神氣質。上海作為最早開放的口岸城市，歷經百年間文化的碰撞，形成了「海納百川、追求卓越、開明睿智、大氣謙和」的城市精神，這種城市精神也影響著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精神氣質的型塑。在上海都市環境下，新聞事業蓬勃發展，為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師生提供了大量專業實踐的機會，也為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探索新聞事業發展規律提供了研究對象。上海的城市環境提供了大量可研究的經驗材料，拓展了復旦新聞傳播學研究的領域和範圍。以黃旦（1954–）、孫瑋（1964–）、謝靜（1971–）、潘霽等為代表的學者們將城市研究引入了傳播學研究視野，他們最先提出和使用「城市傳播」這一名詞和概念，通過對關鍵概念的闡釋及展開一系

列具體研究，試圖從傳播學視角推進人們對城市、社會發展、人之存在、人類文明的認識。黃旦（2015）教授主編的《城市傳播：基於中國城市的歷史與現實——跨學科的視野》一書收錄了十幾位來自不同學科的學者們圍繞「城市傳播」這一主題展開的研究成果，學者們立足中國實際，努力創造本土傳播研究的範式和理論。這些學者們立足於上海，主持了「可溝通城市指標體系建構：基於上海的研究」（2015）、「上海全球城市形象的傳播效果研究」（2017）等多項專項課題，完成了對城市傳播研究範式、可溝通城市概念及評價體系的建構，還基於對上海全球城市形象傳播效果的研究提出具體的政策建議，同時印證了復旦大學新聞學院與上海城市發展之間相輔相成的關係。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的發展深受外部交流合作的影響。復旦大學新聞系在創辦之初受到日本新聞教育的影響，創辦者如謝六逸等具有日本留學經歷，「謝六逸來復旦大學任教後，認為日本學校的新聞教育很值得效仿，便向劉大白建議創設新聞學系」（黃瑚等人，2019，頁 7）；1970、80 年代，在改革開放背景下，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率先開設了傳播學、公共關係學等全新課程，並通過歐美傳播學理論著作的譯介工作，逐步引進西方傳播學；進入新世紀以來，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更是通過舉辦或參加國際學術會議、國際學術工作坊等不斷增強對外交流的能力，擴展自身影響力。通過多年來的努力，復旦大學新聞學院與不同學科、院校、國家和地區間的合作交流範圍不斷擴大，主動性不斷加強，為學院發展注入著源源不斷的推動力。

總體上來看，上述五方面因素的綜合作用促使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發展演變至今，國家政治形勢變化、新聞事業發展、關鍵任教人物、上海城市環境、外部交流合作等五方面因素彼此之間相互有交叉的部分，需要綜合起來觀察。

伍、好學：學貫中西，博通古今，融會文理

陳望道把「好學力行」作為復旦新聞系系銘，師、生們長期耳濡目染。只是，「好學」該學什麼？「學貫中西、博通古今、融會文理」構成「好學」的基本內涵，是新聞系師生逐步形成的共識並不斷踐行著，成為復旦新聞系的傳統和一大特色。

新聞學作為一門專業，應該有獨立的、完整的、科學的新聞理論、新聞史、新聞實務。但新聞學並沒有一套判別是與非、利與害的價值標準，必須借助於其他的學科，比如，從事經濟新聞報導，記者就得知道起碼的經濟學知識；從事法

治報導，得知曉法學知識；從事科學研究同樣如此，必須借助於哲學和社會科學的理論來建構研究各類問題的理論框架。

從新聞學系成立之初到目前實施的課程設計，始終如一地貫徹「好學」的基本內涵，其課程大體分為通識教育基礎課、專業基礎課、專業技能課、專業輔修課和實習與考察課程等。新聞系課程特別強調融會文理，新聞系創辦之初就要求學生必須選讀一門理科課程。1942 年夏，陳望道接任系主任，便進行課程改革，將學生按興趣分成不同小組，如文史哲組、財政金融組、政治外交組等，學生根據分組，選修不同課程；與此同時，邀請不同學科、不同專業領域、不同學術流派、不同政治立場的學者前來新聞系開講座、授課。自 2012 年實施的本科生「2 + 2」教學模式，現已形成 8 類跨專業課程方向：社會學、經濟學、法學、中國語言文學、政治學與行政學、國際政治學、行政管理、電子信息科學與技術，學生可任選一個類別方向進行修讀。

學貫中西、博通古今、融會文理，既是對學生的要求，更是教師的追求。1956 年 3 月，在系主任王中主持下，新聞系創辦《新聞學譯叢》（季刊），除介紹前蘇聯、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的新聞事業外，還開闢「資本主義國家新聞事業」，大量介紹美國、西歐、日本等國家的新聞事業、新聞理論，並第一次介紹西方傳播學的研究文章，引介「大眾傳播」一詞（最初譯為「群眾思想交通」）。這在當時可要冒極大的政治風險，有人曾勸過王中以不發此類文章為好，但王中不為所動，堅持在《新聞學譯叢》中大量介紹，數量達到 50% 左右。果不然，反右鬥爭開始後，《新聞戰線》就發文專門批判《新聞學譯叢》「這個刊物實際上已成為宣傳資產階級新聞觀點的陣地」（何梓華，1958，頁 53）。

文革剛結束不久，1978 年 7 月新聞系又創辦《外國新聞事業資料》（1980 年 3 月改名為《世界新聞事業》），第一期就大幅刊登由鄭北渭老師翻譯的〈公眾傳播〉。11 月，又刊登陳韻昭老師翻譯的〈公眾傳播的研究〉。此外，還請來傳播學奠基人威爾伯・施拉姆來復旦新聞系講課（1982 年 4 月）。為了全面瞭解、學習西方傳播學，復旦新聞系還主編兩套西方傳播學叢書，一套是李良榮教授任編委會主任的《西方新聞傳播學經典叢書》，聘請國內外學者遴選 24 本西方各國新聞傳播學名著，由新華出版社出版（2005–2010 年），另一套由黃旦主持的《傳播・文化・社會》譯叢，共 12 本，由華夏出版社出版（2003–2008 年）。正是復旦新聞人矢志不渝的追求，才使復旦新聞學院成為傳播學的引介者、推動者和引領者（黃旦、李曉榮，2019）。

陸、力行：宣揚真理，改造社會

陳望道先生提出「好學力行」的系銘，有些人把「好學力行」理解為知行合一、學以致用，或者直接理解成理論聯繫實際，強調新聞學系學生的實踐能力。這樣理解沒錯但卻並不全面。一方面，新聞學與其他人文社會學科相比，更顯實踐性，被稱作「文科中的工科」，在復旦新聞學院 90 年的歷史中，無論哪一年代，教學計畫都特別重視學生的實訓、實習；課程設計中都把新聞實務課（採、寫、編、評）當作核心專業課；大量聘請有實踐經驗的資深記者、編輯和管理者來充實師資，從而使學生畢業以後就能獨當一面；上手快、業務操作能力強，歷來是復旦新聞系學生受人讚賞的一大優勢。另一方面，陳望道先生在提出「好學力行」的系銘同時，提出了新聞學系「宣揚真理，改造社會」的辦學宗旨，這兩者緊密相連。「好學」目的志在「宣揚真理，改造社會」，這才是陳望道先生對新聞系師生的期望，這也是《中庸》「力行近乎仁」中「仁」的含義所在。

「宣揚真理，改造社會」，既是新聞系師生追求的理想，也是實踐的目的。對於學生來說，畢業以後從事新聞工作，不僅僅要把新聞工作當作謀生的職業，而是要將其當作推動社會進步的事業。對於教師來說，他們所從事的科學研究主要就是面向傳媒業，那麼，他們就要永遠站在傳媒業的前沿，引領傳媒業，推動傳媒業的變革。這和新聞學本身的本質特性相關，新聞學是追隨傳媒業永不停息的變化、變動、變革中展開動態研究，從而豐富新聞傳播學研究的內涵。

不畏艱險，永立傳媒業前沿，永立新聞改革潮頭，從而推動新聞改革，成為新聞改革的動力源，構成復旦新聞系的傳統和特色。新中國建立以後，有過兩次新聞改革，復旦新聞學為這兩次新聞改革提供一系列理論觀點，成為推動新聞改革的力量來源。

前文所言，1956 年春，在「百家爭鳴，百花齊放」方針下，中國新聞業開始新聞改革。新聞改革什麼呢？當時莫衷一是。時任新聞系主任王中適時提出了「報紙的兩重性」和「兩論」。所謂「報紙的兩重性」，是指：

> 一重是宣傳工具，一重是商品，而且是在商品性的基礎上發揮宣傳工具的作用。商品就是要使人買後有用，改進報紙工作，主要是解決如何把報紙變成為群眾所需要的東西。報紙要先為群眾所喜愛，然後才能發揮指導作用（王中，2004a，頁 16）。

所謂「兩論」，一是「社會需要論」，「（新聞事業）是社會產物，報紙隨社會條件變化而變化。新聞事業是社會產物，包括了新聞是階級鬥爭工具的涵義。」（王中，2004b，頁 72）。二是「讀者需要論」，即辦報要根據讀者的需要，「報紙的作用，不完全在於指導人們工作，而且在於增加人民群眾的知識，培養人民群眾的生活興趣。」（王中，2004c，頁 6）。這些觀點，在今天看來都是新聞學的常識，在當時卻是開創性的，從根本上顛覆了新中國成立後學界、業界對媒體的固定印象。因為 1950 年代初，當時報紙一方面承接中國共產黨在解放區辦報的經驗。這種辦報經驗有其優秀傳統，深入實際，深入群眾，但當時辦報主要面向農村地區，難以適應城市辦報的新語境，報紙辦得像黑板報、公告牌；後來又全面照搬前蘇聯辦報經驗，提出報紙上每句話、每個標題都要體現黨的政策、黨的主張，卻沒考慮讀者的實際需要，報紙辦得死氣沉沉，讀者無法接受。所以，王中的「報紙的兩重性」、「兩論」既有理論深度，又擊中時弊，在學界、業界引發強大的震撼，一時成為新聞改革的焦點。正因這種強大的震撼力，「反右」鬥爭開始後，王中及其理論主張成為集中批判的聚焦點，王中成為新聞界「第一號右派」。但在整個反右鬥爭中，不管批判火力多猛，批判嗓門多響，王中自始至終沒有說過一句檢討的話，表明了一個學者堅持真理、宣揚真理的骨氣。當然，批判再猛也無法掩蓋真理的光芒。「報紙的兩重性」、「兩論」在中國新聞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頁，1978 年第二次新聞改革就從繼承 1956 年新聞改革的遺產展開。

第二輪新聞改革從 1978 年底開始，共產黨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拉開解放思想、改革開放的序幕，經濟領域的改革開放從農村的包產到戶、城市的企業責任承包制開始，那新聞領域的改革開放從什麼地方著手呢？

長期以來，宣傳被認為是中國媒體的主要功能，甚至唯一功能。在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媒體又成為「階級鬥爭工具」。「信息」概念自西方國家引入，激起新聞界對新聞媒體功能的討論，「新聞與宣傳」關係的爭論，「絕不僅僅是學術之爭、概念之爭，而是改革開放向傳媒業提出的全新命題」（李良榮，2009a，頁 15）。這場討論歷時 5 年，終於有了定論——「傳播信息是新聞媒體的第一功能」，獲得業界、學界的基本共識。

新聞與宣傳大討論乃是對新聞媒體功能的重新定位，這更新了新中國之後新聞學的觀念，極大地解放了新聞界的社會生產力。其中，一個最顯著的變化就是：新聞媒體逐步從宣傳本位轉向新聞本位。（李良榮，2009b）

1990 年代初，鄧小平發表南方談話，確立了中國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新聞界躍躍欲試，渴望面向市場，實現市場化運作，但卻步履艱難。因為長久以來，新聞媒體的性質被定格在上層建築的意識形態領域。意識形態領域裡的東西怎麼可以成為商品呢？當時新聞界大多數人都認爲「新聞沒有商品性，新聞不是商品，記者不是商人」（劉保全，1994，頁 9）。於是，媒體是否具有商品性，媒體能否實現市場化運作的爭論立刻在全國展開。這場爭論涉及中國傳媒業的性質問題，無論是業界、還是學界，都參與其中。

在這場爭論中，李良榮教授提出了著名的「雙重屬性」理論：

> 新聞事業就它生產帶有強烈的意識形態的精神產品來說，屬於上層建築領域；但同時，就它為全社會提供經濟活動和人們必不可少的信息、知識和娛樂來說，屬於第三產業即信息產業。這個思路可以歸結為「事業性質，企業管理」。（李良榮，1995，頁 5）

「新聞媒體具有雙重屬性」這一理論很快獲得了學界、業界的基本認可，並且極大地推動了新聞實踐。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李彬認為：

> 針對新聞商品性的論證，1995 年李良榮教授提出一種調和觀點——雙重屬性；這一觀點得到普遍認可，為新聞媒體的「事業性質，企業管理」之定位提供了理論依據。在這一理論下，新聞業開始向市場化方向突飛猛進。其間，按照李良榮的分析，報業形成週末報、晚報、都市報的三次熱潮，廣播電視形成「新聞立臺」與「娛樂立臺」的齊頭並進。（李彬，2015，頁 21）

力行，意味著「宣揚真理，改造社會」；所謂「宣揚真理」，不是指推廣一些現代化的想法，而是指立足於中國具體實際，結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宣揚和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新聞傳播學理論：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堅持在馬克思主義真理的指導下，展開「改造社會」的實踐；另一方面，在「改造社會」的過程中，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的學者們不斷總結，持續發展著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持續提出創新理論，為國家新聞事業的改革提供動力源。

柒、在不斷探索中構建新聞傳播學的學術話語體系

新聞傳播學要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必須要有獨立於其他學科的學術話語體系；復旦新聞學院在 90 年的歷史中作持續的探索，也因此有過 3 次超越。

一、第一次超越是超越對文學的依賴

復旦新聞系的建立是從復旦文學系中發展出來，對於文學有著強烈的依賴性，許多教師都有文學專業教育背景。因此，早期的新聞學研究多是帶有文學基因，論文以「新聞美學」、「新聞哲學」的討論為主。他們往往把許多文學、哲學概念套用到新聞學上，黃天鵬的《新聞文學概論》便是典型。

二、第二次超越是對政治話語的超越

新中國成立以後，處理新聞學和政治的關係擺在新聞學研究者面前。因為共產黨的媒體從其產生的那一天起，就是政黨的宣傳工具，新聞媒體的主要功能甚至全部功能就是政治宣傳。所以，新聞學的研究對政治有天然的依附性，政治話語幾乎取代新聞學話語。1956 年，王中提出「報紙的兩重性」、「兩論」，不但旨在推動當時的新聞改革，長遠的目標就是試圖將新聞學的學術話語體系從政治術語的依附中解放出來，探索一條研究新聞自身發展規律的道路。在 1957 年批判王中的會議上，有人質問王中「野心何在？」王中坦然回答：「想把復旦新聞系變成新聞界的，至少華東地區的學術中心」（丁淦林，2009，頁 11）。

改革開放以後，無論是 1980 年代新聞與宣傳的大討論，還是 1990 年代媒體商品性的大爭論，都是走在構建獨立新聞學體系的道路上，為建立新聞學學術體系摸索出屬於中國自身的經驗方向。

三、第三次超越則是對西方傳播學的超越

1980 年代，新聞學界開始引進西方傳播學，全新的理論、模式和研究方法確實帶來極大衝擊；當時學術界幾乎全盤接受，所謂研究就是介紹西方傳播學的觀點、模式，詮釋基本概念，再就是以中國的實踐來印證西方傳播學的某一觀點、主張。一直到 1990 年代後期，中國學者真正開始「傳播學本土化」之路，尤其在互聯網崛起以後，借助對互聯網的研究，復旦新聞學院的學者們開始瞭解中國社會的傳播學研究，並取得不少成果。「新傳播形態下的中國受眾」大型調

查調研了全國近 37,000 份樣本，深度還原了新世紀初新傳播形態下中國受眾的樣態，「是復旦的傳播學實證定量研究的延續，同時又具有里程碑式的開創意義」（黃旦、李曉榮，2019，頁 76）。黃旦、孫瑋等人組成的團隊在「城市傳播」研究中獨樹一幟，孫瑋指出，在城市研究中，傳播學應當有自身的理論貢獻，而「主流的傳播學研究，漸漸地脫離芝加哥學派經典城市研究高度重視的時間或者空間語境，演變成用統計方法不斷給予證實的普遍性論斷」（孫瑋，2018，頁 33）。基於此，黃旦、孫瑋等人提出「城市傳播」的研究路徑：

> 從本土化的歷史與經驗出發，在席捲世界的城市化、新技術、全球化浪潮的背景下，立足於中國當前新傳播技術的豐富實踐及中國社會的城市化轉型，致力於進行傳播學研究進路與理論的反思與創新。（孫瑋，2018，頁 33）

自 2011 年發展至今，「城市傳播成為復旦傳播研究的一個新標誌，同時成為創新研究範式」（黃旦、李曉榮，2019，頁 78）。李良榮則和哲學、社會學、政治學、計算機等學科組成跨學科研究團隊，採用大數據，完成了「中國網絡社會心態報告」（2014、2018、2020）、「互聯網與當代大學生系列研究報告」（2014）、「新時代、新期待：中國人民美好生活觀調查報告」（2019）等多項調查，大大拓展了新聞傳播學研究的新領域。

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領域，新的學術觀點標誌著復旦新聞傳播學學者在探索新聞傳播學獨立的學術話語體系中的巨大進步，新聞傳播學「復旦學派」逐步浮現。

捌、復旦新聞傳播教育實踐的經驗與反思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的教育實踐與時代發展相互呼應，回應著當時浮出現出的社會問題。1920 年代，出於國家與民族救亡圖存、實業興邦的需要，復旦大學新聞系正式建立；1940、50 年代，延續救國報國的傳統，成為馬克思列寧主義傳播的新聞陣地；1980 年代，則作為改革的探索者，為國家新聞教育研究鋪路，為新聞業改革奠定理論基石；新世紀以來，復旦大學新聞學院主動迎接信息化的挑戰，不斷探索適應中國國情、社會發展需要的新聞傳播學教育體系。其教育實踐的特色主要有以下四點。

一、對國家政策的高度回應、服務於國家發展大局

2019 年 4 月，教育部為推動全國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啟動一流本科專業建設「雙萬計畫」，[6]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新聞學、傳播學兩個本科專業分別於 2019 年、2020 年入選國家級一流專業建設點名單。在課程方面，復旦新聞學院的核心課程「馬克思主義新聞思想」是國家級精品課程和教育部網絡共用課程；在招生方面，2019 年，為響應國家「一帶一路」政策號召，復旦新聞學院專門面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招收外籍大學本科畢業生修讀專業碩士課程，藉以提升中國新聞教育的國際影響力；2019 年，復旦新聞學院恢復了專業碩士「國際新聞」方向的招生，服務於國家培養國際化外宣人才的戰略；近幾年，為推進「長三角區域一體化」國家發展戰略，浙江省與復旦大學省校戰略合作，建立復旦大學義烏研究院，復旦大學新聞學院也牢牢抓住學校在義烏布局的發展機遇，承建義烏研究院全球傳播、全媒體等研究方向；為服務社區基礎教育，復旦大學新聞學院還與復旦大學附屬中學開展合作，面向高中生講授媒介素養課程，課程內容覆蓋假新聞、演算法、遊戲等議題，助力高中生媒介素養的提升。此外，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在智庫諮政服務方面也有著豐富的經驗，通過提供諮政報告參與智庫建設，在媒介融合、輿論引導、網絡空間治理、國際傳播、媒介與社會發展等方面不斷提升諮政能級。

二、不斷創新新聞教育人才培養新模式、新理念

如上文所述，復旦大學新聞學院關鍵任教人物們在其教育實踐中，不斷創新教育理念、拓展辦系思路。「好學力行」、「宣揚真理、改造社會」、「兩典一筆」、「大新聞傳播」等教育理念都是重要的創新。2001 年，開創的「部校共建」新模式，是中國新聞教育史上重要的創新機制，於 2013 年獲得國家級高等教育教學成果獎，2013 年 12 月後開始在全國國內高校推廣。此外，新聞學院還邀請市委宣傳部和媒體從業人員的擔任專業碩士同學的業界導師，實行「雙導師制」，提升了學生培養的學界業界雙引路機制。

三、國際化水準高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留學生數量比例高、來源多樣，既有雙學位聯合培養的學

6 雙萬計畫，於 2019 年 4 月 9 日由教育部提出，意指建設 1 萬門左右國家級和 1 萬門左右省級一流本科課程，是中國大學本科生課程建設的全國性激勵機制。

生、也有專門來華攻讀學位的留學生，早些年留學生以日、韓、新加坡、歐美國家為多，近些年來自中亞、東南亞地區留學生的數量逐漸增多；另一方面，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學生出國境交流比例高，有校級項目、院級項目供學生選擇，出國境交流項目涉及的院校覆蓋了新聞傳播學領域著名的新聞傳播院系；復旦大學新聞學院還重視國際性會議的交流作用，舉辦了「2018 全球新聞傳播院長論壇」、「傳播與中國．復旦論壇」（2017、2020）、「智慧時代的新聞傳播學科重塑與人才培養 2020 年國際高峰論壇」等國際性學術交流會議。

四、緊跟學科前沿、重視跨學科合作

直面大數據時代、人工智慧時代挑戰，與復旦大學大數據學院合作，開設了《大數據傳播與新媒體分析》課程；同時，自 2016 學年起，開設《數據分析與信息可視化》、《媒介技術導論》兩門課程作為所有本科生的必修課；跨學科合作既包括課程的聯合開辦，還包括了本文前述科研項目的跨學科合作。

當然，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的發展也面臨著師資結構調整、媒介技術衝擊等方面的挑戰。在師資方面，一是伴隨著國內新聞傳播教育事業的發展，高校間師資流動頻繁，復旦新聞學院面臨著師資流失的問題，如呂新雨、黃旦、張志安等學者於近年相繼離開復旦；二是從年齡結構來說，伴隨著老教授們陸續退休，復旦大學新聞學院亟需增加更多新鮮血液。面對媒介技術的衝擊，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已逐步進行課程改革，如開設相關大數據處理傳媒課程，在課程上教授學生使用 python、R 等計算機相關技術輔助新聞報導，但是，仍然面臨著傳媒業就業飽和、畢業生職業發展引導等問題。此外，儘管經過多年來的探索，新聞傳播學「復旦學派」實現了對文學話語、政治話語、西方傳播學學術話語的超越，建構起了新聞傳播學的學術話語體系，但是，仍然需要持續去打破學科壁壘，加強與人文社會科學的對話，在問題領域、方法領域、對策領域等方面深度挖掘、不斷創新，這樣才能獲得更長遠的發展。

參考書目

QSChina（n.d.）。〈QS 世界大學學科排名：排名方法〉。上網日期：2021 年 5 月 31 日，取自 https://www.qschina.cn/subject-rankings/methodology

人社部留學人員和專家服務中心（n.d.）。〈政策文件〉。上網日期：2021 年 5 月 31 日，取自 http://www.chinapostdoctor.org.cn/website/showinfo_zcwj.html?

infoid=f480e1fc-25cf-45ca-b2a6-e1a99a932a13~

丁淦林主編（2002）。《中國新聞事業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丁淦林（2009）。〈把學科建設放在重要位置上——回憶復旦新聞系（學院）的學術研究活動〉，《新聞大學》，3：10-13。

于右任（1945/2015）。〈新聞自由萬歲！中華自由萬歲！〉，《右任文存》，頁 71-75。北京：海豚出版社。

王中（2004a）。〈新聞事業的發展規律和報紙的職能（1957 年）〉，趙凱（編），《王中文集》，頁 16。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_____（2004b）。〈新聞學原理大綱（1957 年）〉，趙凱（編），《王中文集》，頁 72。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_____（2004c）。〈辦報人要有讀者觀念（1956 年）〉，趙凱（編），《王中文集》，頁 6。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2019 年 2 月 11 日）。〈教育部關於首批國家教材建設重點研究基地認定結果的通知〉。上網日期：2021 年 5 月 31 日，取自 http://www.moe.gov.cn/srcsite/A26/s8001/201902/t20190225_371059.html

朱瑨迆、王瀟（2019 年 11 月 2 日）。〈新聞人的底色——寫在復旦大學新聞學院九十華誕之際〉，《解放日報》。上網日期：2021 年 5 月 30 日，取自 http://m.people.cn/n4/2019/1102/c3351-13353745.html

李秀雲（2003）。〈黃天鵬對中國新聞學術研究的貢獻〉，《新聞大學》，3：29-33。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1460.2003.03.007

李良榮（1995）。〈十五年來新聞改革的回顧與展望〉，《新聞大學》，1：3-8。

_____（2009a）。〈中國新聞改革三十年〉，李良榮（編），《歷史的選擇：中國新聞改革 30 年》，頁 1-92。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

_____（2009b）。〈艱難的轉身：從宣傳本位到新聞本位——共和國 60 年新聞媒體〉，《國際新聞界》，9：6-12。

李建新（2014）。〈中國新聞傳播學博士後培養的緣起、流變與目標〉，《新聞春秋》，1：82-87。

李彬（2015）。〈新時期 : 社會變遷與新聞變革箚記〉，《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1-45。

何梓華（1958）。〈質問“新聞學譯叢”編輯部〉，《新聞戰線》，2：5。

孫瑋（2018）。〈城市傳播的研究進路及理論創新〉，《現代傳播》，40（12）：

29-40。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7-8770.2018.12.006

章玉梅（1985）。〈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新聞大學》，9：94。

〈復大中國文學科之發展〉（1925 年 11 月 3 日）。《申報》，15。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編（2019）。《復旦大學新聞學院九十週年紀念冊》。上海：編者。

黃旦主編（2015）。《城市傳播：基於中國城市的歷史與現實》。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黃旦、李曉榮（2019）。〈領風氣之先，開多源以用，探新徑——復旦大學的傳播學研究〉，《新聞大學》，10：69-80。

黃瑚等人編著（2019）。《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簡史》。上海：中國出版集團東方出版中心。

劉保全（1994）。〈報紙有無商品性？新聞有無商品性？（新聞理論界討論綜述）〉，《新聞界》，2：8-11。

劉鵬（2019）。〈範式的探索：新聞學復旦學派的浮現及其學術傳統——以王中為中心的考察〉，《新聞大學》，10：88-105。

鄧紹根（2010）。〈中國第一個新聞專業創辦時間考論〉，《新聞記者》，6：86-88。

謝六逸（1930）。〈新聞教育的重要及其設施〉，龍偉、任羽中、王曉安、何林、吳浩民（編），《民國新聞教育史料選輯》，頁 114。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_____（1935/2015）。〈復旦大學新聞學系概況〉，李景文、馬小泉（編），《民國教育史料叢刊》（第 910 卷：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史），頁 557-560。鄭州：大象出版社。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11(2), pp. 131-152, July 2021

"Be Fond of Learning and Practice with Vigor" at Fudan University: Chinese Experience in the Discipline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Li, Liang-Rong

Professor, School of Journalism, Fudan University
Dean,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of Media

Zhou, Yu-Qiao*

Ph. D. Student, School of Journalism, Fudan University

Abstract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in 1929, the School of Journalism at Fudan University has cultivated numerous journalism professionals. It also contributed greatly to the establishment and expansion of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in China, among which the most systematic and cumulative achievement was the training of journalism teachers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professionals.This case study analyzed the history of the School of Journalism at Fudan and the process of the school's education and practice in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focus of discussion was on the tradition of "be fond of learning and practice with vigor"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theoretical context for the "Fudan School" of journalism. This study summarized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experience of the School of Journalism at Fudan in the past years and concluded by reflecting the challenges it may face in its future development.

Keywords: be fond of learning and practice with vigor, institutionalization, Fudan school of journalism, the discipline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 Email: zhouyuqiao@fudan.edu.cn

JCRP 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舍我紀念館 Cheng She-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Ainosco Press

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11 卷 第 2 期．頁 153-172．2021 年 7 月
DOI:10.6123/JCRP.202107_11(2).0007

術道之衡與範式轉移
——香港浸會大學傳媒教育個案 *

陳璁

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研究員

黃煜 **

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教授

摘要

進入 21 世紀，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迅速崛起；其發展為傳媒業帶來巨變，對應為傳媒教育也帶來了質的變化。以人文教育為本的新聞傳媒教育，與科技快速擴張本身存在與生俱來的張力與矛盾，在洶湧的傳媒科技革命浪潮下，傳媒教育是否應讓科技知識作範式主導？本文以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為案例，從知識社會學角度分析新聞與傳播教育在新的社會環境和媒體生態下的情境和發展，著重探討科技對傳媒教育知識和課程的影響與挑戰，並以範式轉移的視角審視該領域的變革。

關鍵詞：知識社會學、案例分析、新聞及傳播教育

* 感謝編審人員寶貴的意見和幫助，以及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高級研究助理周琳對本文的貢獻。
** Email: s03033@hkbu.edu.hk

壹、引言

從誕生到成熟，媒體業經過了無數的演化和發展。20 世紀末橫空出世的互聯網技術，令媒體業面臨一場前所未有的變革。踏入 21 世紀，以深度神經網絡為基礎，結合大數據、雲計算及移動互聯網技術而成的人工智能快速崛起，再次為媒體業帶來顛覆性變化，但同時讓新聞專業主義價值觀陷入被質疑和挑戰的泥沼。

在各種科學技術衝擊下，傳媒業發生巨變，對應為傳媒教育也帶來了質的變化。更進一步來說，傳媒教育是否有必要根據當下社會和傳媒業的變化而主動完成範式轉移，成為了一場有趣而持久的討論。以人文教育為本的新聞傳媒教育，顯然與科技快速擴張本身存在與生俱來的張力與矛盾，如何在傳統與變革、不變與變中作出抉擇，選擇一條合適的教學之路，是當今傳媒教育無法回避的重要議題。

新聞傳媒教育的主要爭論，可回溯到五十多年前起對「術」與「道」的討論：新聞傳播教育應以「術」即實務專業為主，還是以「道」即理論學養為主 (Greenberg, 2007) ？受教育者打磨自身的專業本領以適應時代要求，此類適應的進程是受教育者自我實現和創造社會價值的必經之路。新聞傳媒教育由此也在社會發展中不斷發掘受教育者的競爭需求，以「術」為主的教育結構應運而生。隨著專業實務教育不斷深入，實務操作中積累的經驗，慢慢沈澱為系統的理論學識，「道」漸漸統領了「術」，受教育者通過已經被反覆驗證的理論研究，更高效、更周全地深化對特定領域的認知，從而提升自己的實務水平。道術平衡暫時得以解決，正如庖丁解牛中所言：「道也，进乎技矣」，「道」重在探討規律和實務背後的發展本質，比起「術」對技術層面的探討，更具體系化的指導意義，二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然而，十年前新聞傳播教育的關鍵論題開始轉變爲科技主宰傳媒業，進而產生傳媒教育範式轉移的定位問題。傳媒科技革命是否再次打破了傳媒教育中現有「道」與「術」的平衡，傳媒教育的主流是將分化出另一條重要支流，亦或是整個領域的水質都將發生變化？誠然，傳媒領域的發展不能按照媒介技術發展的順序，簡單地理解為從紙媒到廣播、電視媒體、互聯網媒體以至社交媒體的發展，傳媒教育同樣也不是線型的變革，理論基礎和實務操作的比重和彼此的關係經過不斷的嘗試，達至流動的平衡。對應快速變化的傳播科技和新技術這一因素，是否有必要改變已有的傳媒教育知識體系，讓新型科技知識作範式主導？美國密蘇

里大學（University of Missouri）新聞學院的「密蘇里模式」創立逾百年，強調「動手做」的新聞技術傳統和專業取向，並未隨時代的變化而「根本轉移」（張詠、李金銓，2019）。那麼，新媒體時代的傳媒教育面臨新挑戰，若需要範式轉移，又應該以何種形式來落實到實際操作中去？

大中華地區新聞傳播院系的高等教育起步時間不一，模式有相通或相異之處，並發展出各自特色。香港作為世界領先的國際金融中心和亞洲地區的資訊樞紐，社會發展迅速，資訊流動自如，交通配套完善，媒體業身處其中，報導和反映當中的千變萬化。傳媒教育向來奉行言論自由，新聞自由，以為社會培養專業人才為職責，需要與社會互動發展，因此研究香港傳媒教育走向，可視為窺見社會發展的一扇軒窗，而分析社會因素的影響，也有助於對香港媒體教育形成更清晰的認識。

本文以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The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簡稱「浸大傳理學院」）為案例，從知識社會學角度分析傳媒教育在新的社會環境和媒體生態下的情境和發展，詳細探討遇到的挑戰和相應對策，嘗試從知識時代變遷與業界轉型角度去釐清問題， 望取得真切而有意義的結論和省思。

貳、知識社會學理論與傳媒教育

知識社會學，主要研究知識的內容和呈現方式與社會的相互關係。知識社會學源自社會學，最早提出該概念的是哲學家謝勒（Max Scheler），並由社會學家曼海姆（Karl Mannheim）為其賦予獨立學科的意義，為知識社會學奠定基礎。簡言之，知識社會學就是從社會學的角度探討人類的知識的學科。

知識社會學應用在教育研究始於 1960 年代末期，亦被看作是教育社會學的新發展。相關研究涉及知識與權力的關係、教育過程受到政治、經濟、社會階級和意識形態等方面影響，並針對學校課程的內容和制定進行探討和批判（陳伯璋，2000 年 12 月）。研究教育知識社會學的學者認為，學校課程就是教育知識，這些知識的選擇、分類、傳遞和評鑑常受到社會結構和意識型態影響。教育知識社會學的研究貢獻，被認為主要在於課程方面，使得教育工作者在制定和修改學校課程時，具有更批判的眼光，關注到社會因素對課程發展的影響（周淑卿，1995）。Young（1971）指出，教育知識不是「理所當然的」，而是社會建構的結果，因此知識具備歷史的特性，不是穩定不變的。社會的改變帶來教育的改變，

教育問題和挑戰隨之而來（陳照雄，2006，頁 54-65）。

如上文所述，教育知識社會學領域的學者一般從意識形態、社會階級的方面，探討和批判學校課程內容。自第三次工業革命以來，新科技尤其是電子數碼技術的廣泛應用撼動了以「道」統領的教育結構，日新月異的科技發展飛速向前，其更新迭代的速度遠快於「道」的積累。科技在教育中的權重快速提升，從受教育者所處的社會環境，到教育過程運用的硬件設施，甚至是新聞傳媒行業的運營模式，都因科技的更新而迎來翻天覆地的變化。

目前，業界對於科技崛起的角度對教育知識和影響，較少進行綜合整理和分析，忽略了社會變化中新科技扮演的角色。科技浪潮下不進則退，教育機構把握科技發展帶來的教育效率提升的同時，更需要思考科技在教育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探討「人」與「科技」的合作方式，讓科技為人所用，人不為科技所困。本文將著重探討科技及以此形成的新知識對傳媒教育知識和課程的影響，並以範式轉移的視角審視領域的變革。

參、香港社會與研究案例概述

一、香港社會情況

（一）政治制度

香港在 1997 年脫離英國殖民，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同時生效。《基本法》是香港的憲制文件，以法律形式訂明「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根據《基本法》，香港保持原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以公正的法治精神和獨立的司法機構維持香港市民的權利和自由。香港的首長是行政長官，由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選舉委員會選出，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在代議政制架構下，中央層面爲立法會，負責制定法律、批准公共開支，以及監察行政機關的表現；地區層面則有 18 個區議會，分別就所屬地區的政策推行事宜提供意見。香港設有獨立的司法機關，負責執行司法工作，依照法律審判案件。1997 年回歸以後，圍繞著偏向「一國」還是尊重「兩制」，香港社會形成兩大對峙力量，政府管治日趨政治化，並在 2014 年爭取普選的民主運動和 2019 年反對〈逃犯修訂條例〉運動及隨後大規模的社會對抗運動至 2020 年 6 月由全國人大從國家層面直接替香港立〈國家安全法〉，香港陷入全面危機。

（二）教育制度

高等教育在香港發展有百多年的歷史，始於 1911 年香港大學的建立。香港高等教育從 1980 年代精英型，全面引進英國的高等教育管理體制，走到 2000 年代的准大眾化，進入 2010 年代成為一個普及型的高等教育社會（胡少偉，2017）。

香港高校過往曾不願意進行研究工作。在 1970 年代，香港高等教育正待擴展，社會開始辯論政府是否應在研究發展工作上動用資金；直到 1980 年代，政府依然不接納設立研究資助委員會，負責分配政府給予各大專院校進行研究的撥款，院校以競逐的方式申請撥款。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簡稱教資會）指，當時政府認為在大學進行科研花費甚昂，私營機構可按市場情況自行負責研究發展計畫（香港大學資助委員會，1996）。直到 1991 年，研究資助局成立，負責向政府建議香港高等教育機構在學術研究上的需要，包括鑑定優先範圍，以發展一個足以維持學術蓬勃發展和合乎香港需要的學術研究基礎，並透過高等教育機構，邀請和接受學術人士申請研究資助以及各類研究生申請獎學金，將政府透過教資會提供的經費撥作研究資助和其他有關支出之用。目前，香港高等教育機構的研究工作已蔚然成風，在全球高校競爭中處於第一梯隊。

（三）經濟發展狀況

浸大傳理系成立的 1960 年代末，正值香港開始「經濟起飛」，經濟方面向多元化方向發展。在過去半個多世紀中，香港經濟發展可主要分為三個階段（張俊森等人，2009）。第一階段是 1950–1970 年代，也是戰後香港經濟起飛的階段，期間香港從轉口港逐漸轉變爲以製造業為主的工業城市，1970 年代香港經濟結構發生巨大變化，本地生產總值年平均增長率達 9.1%，在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中增速最快（劉蜀永，2016）；隨後 1980–1990 年代，香港製造業北移至中國內地「珠三角」，經濟向金融業等高端服務業轉型，香港在該階段成為全球金融和商業中心；1997 年回歸中國後，自身繼續向高增值服務業發展，並開始擔當聯繫中國內地經濟與國際金融貿易服務的橋樑，經濟發展開始了一個有別於回歸以前的新階段。

（四）傳媒業發展狀況

香港具有先進的通訊科技，傳媒業發達。截至 2019 年 11 月 30 日，本港傳

播媒介除有 82 份日報和 531 份期刊（當中包括多份電子報章），還有三家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持牌機構、兩家本地收費電視節目服務持牌機構、12 家非本地電視節目服務持牌機構、一家公營廣播機構，以及兩家聲音廣播持牌機構（香港政府新聞處，2020 年 10 月）。香港是多家國際通訊社、行銷全球的報章和海外廣播公司等傳媒機構的亞太區基地，例如法新社（L'Agence France-Presse，AFP）、彭博通訊社（Bloomberg News）、杜瓊斯（Dow Jones & Company）、湯森路透（Thomson Reuters Corporation）、《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WSJ）、《紐約時報國際版》(*The New York Times, International Edition*)、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able News Network，CNN）、亞洲新聞臺（Channel NewsAsia，CNA）等。香港因為其地理位置，以及經濟、政治地位而受到國際媒體的重視，未來趨勢「只會加強而不會削弱」，國際化進程會加快（劉瀾昌，2018）。但隨著香港社會日趨政治化、對抗化，傳媒自主空間也愈發收縮，行業正面臨大重組與大洗牌的局面。

二、研究案例

香港新聞教育的歷史並不算長，新聞傳媒教育規範化起始於 1960 年代。1965 年，香港中文大學新聞系在本地開創了由大學設立新聞學系的先河，引進美國學術界的教育模式和課程設計思維，因而發展方向很大程度上受到當時美國新聞學術的影響。隨後，浸會書院與珠海學院亦前後於 1960 年代創辦新聞及傳播學系，不同於其他院校沿用「新聞傳媒」之的說法，浸會書院以「傳理」為名開闢了新聞傳播教育的道路，並於 1991 年升格成一個獨立學院，是香港傳播教育的先驅之一。

傳理是英文 "Communication" 當時的中文翻譯。據創系主任余也魯教授（1920–2012）解釋：因為 Communication 一詞當時剛剛傳入中文世界，並無統一翻譯。他認為，物有物理，心有心理，傳也應該有傳理，故將之命名為「傳理系」。

傳理學院現下設電影學院、新聞系、傳播系，提供本科生、研究生、高級文憑及學位銜接課程（詳見附錄），現有 2,000 多學生，150 多位教職員工。其傳理課程，培育出一大批新聞傳播影視從業者。2011 年，浸大傳理學院被新聞網站 Asian Correspondent 評選為亞洲學生首選的全球十大新聞學府，在 QS 全球學科排名（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中也位居前列。下文分三個階段概述浸

大傳理學院的歷史沿革。

（一）1968–1990 年，唯真為善．以術為先

襁褓階段的浸會傳理，誕生於香港新聞傳媒教育初步發展的時代，為培養順應時代潮流的傳媒實踐者而開創先河。1968 年，由一間幾十平方米的課室開始，當年的香港浸會書院的一個新學系——傳理學系成立，傳理系創系主任是被稱為「香港傳播教育之父」的余也魯教授。學系當時並不被看好，甚至被質疑將會製造失業大軍。未料，最後收到超過一千封入學申請信，經過筆試和面試評核，取錄了 111 人，歷史從這裏開始了。

余也魯 1960 年代於美國深造，奠定了自己傳媒事業根基的同時，他也意識到東方的出版事業勢必隨著經濟發達與文盲的消減而發展。唯有訓練順應時代發展的專業人才，方可讓香港抓住成為遠東傳播中心的機會。他將當時還未有普遍採用中文譯名的 “communication” 理解為傳授理論與實踐的學科，仿效物理學、心理學，將這一學科稱為「傳理學」，浸大傳理學系由此為香港引入傳理這門獨立的全新學科（張昆，2018）。在該傳理學系成立前，香港已有若干大專或高校開設一些傳媒課程（如香港中文大學，珠海書院等），但都是以「新聞」冠名，而傳理（播）這個包含公關、廣告、影視等大眾傳播普遍範疇的新領域則是由浸會首先在香港開創的，更強調培養學生在專業領域多方位的實踐能力，畢業之後深耕奉獻於香港傳媒行業。

余也魯在傳統新聞教育文史基礎上，引入社會科學元素，強調對學生實踐經驗和多方位專業技巧的培養，這標誌香港傳播教育進入正規教育新階段。傳理系設計成四年制文憑課程，提供新聞、廣播及公共關系三科專業。及至 1973 年，傳理學系課程修訂成新聞、電臺及電視廣播、公關廣告和媒體教育四個專科。1987 年開辦首個學位課程——傳理學社會科學學士（榮譽）學位，跟隨英國大學模式從四年改為三年制本科。

當時的傳理系以教學培訓為主，授業為先，重視為學生提供實踐操作機會。傳理系在 1971 年開創香港傳統大專院校新猷，由學生籌辦出版英文 *The Young Reporter* 及中文《新報人》兩份實體報紙，是現存從未間斷出版的大學生中歷史最悠久的英文報章，也一直是傳理學生新聞實踐的平臺。這兩份實體報紙定位不是校園學生報，而是報導社會事態的報紙，包含新聞、特寫、專題和社論，人手編制與工序與正式報章無異。傳理系的學生包辦編採攝排，學系自設印刷機，印

刷工由學生兼任。

余也魯之後，香港電視新聞的重要奠基者黃應士（1937–）在 1974 年接任傳理學系第二任系主任。黃應士畢業於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在多份美國地方報紙擔任過記者、編輯，參與過越戰爭的採訪，是一名理論與實戰經驗兼備的媒體從業者。黃應士任職階段時逢浸會書院更名為浸會學院後不久，學院夯實理論學識氛圍日漸濃厚，黃應士也重視對學生論文寫作能力的培養，逐字修繕學生論文。他將現代新聞學理論與實務完整帶入浸會傳理，主張學習與實踐並行的教育方式，「授業」為先，「傳道」亦不缺席。

資深媒體人張國興在 1978–1985 年擔任傳理學系第三任系主任。張國興同樣具備豐富的新聞從業經驗，執教新聞、政治和中國報導，而整個學系教學課程與教學亦以實務為主。他常勉勵學生："Truth is virtue"（唯真為善）。這句雋語強調傳播者肩負求真和道德上的責任，後來成為（系）院訓（Motto），學院校友發起成立「張國興新聞傳播教育基金」，「唯真為善」之新聞精神和教育理念傳承至今。

傳媒是一種專業。自 1968 年創系到 1990 年間，浸會傳理系以專業技能訓練為重點，培養出的大批畢業生投身香港傳媒、公關機構，為香港新聞傳媒行業的起飛備足動力。

（二）1991–2014 年，以道統領．道術平衡

1980 年代香港浸會學院開始得到政府資助後，逐漸轉向教學與研究並重的教育模式，傳理學院（系）也開始轉型，在教育文化中融匯西方新聞傳播教育的方法和成果，逐步建立適合香港社會的傳媒教育制度（俞旭等人，1998）。1991 年，傳理學系升格成傳理學院，下設三個學系：電影電視、新聞及傳播系。

1994 年，香港浸會學院升格為香港浸會大學。升格的立法中列明大學的未來定位是教學與研究並重。在浸會學院時期，教師可以「教而不研」，著重於「術」的傳承，憑履歷傳授學生以實踐經驗；浸會大學的教師則要「既教且研」，傳承的不僅是「術」的精華，也需要以「道」為逕，引領學生探討理論層面的學識。傳理學院也需要向「教研並重」轉型，擴展學士後的學位課程，提升研究水平。

傳理學院首任院長為謝利國（John Lee Jellicorse，1937–2020）教授。他作為一位學者背景的領導者將傳理學院立足於一個更廣闊的平臺，全面拓展高等學

位課程，建立更完整的升學階梯。第二任院長朱立在 1995 年就任，朱立教授就任不久便發公開信提到，傳理學院要同時以重理論研究的史丹福大學傳播學院和以實務見長的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新聞學院為榜樣，學院要重視學術理論，但對實務教學也不能放，即在重視領域「術」業的發展時，要堅持以「道」統領指引前行的航向，深化「道」的教育，為新聞領域的研究培養肥沃的土壤。他推動學院和各系主辦學術會議，鼓勵並資助教師和研究生參加國際學術會議，邀請國際傳播學會 ICA 會刊《傳播學刊》（*Journal of Commutation*）的主編等來訪分享學術刊物的投稿程序和選稿標準，以培養學術風氣和研究氛圍。

謝利國、朱立兩任院長任職期間，傳理學院開始轉型，向「以道統領」的方向發展。在此期間，傳理學院開辦了高等學位課程，包括傳理學哲學碩士（研究式）、傳理學哲學博士（研究式），以及傳理學文學碩士（兼讀式），實現「以道統領」的教育系統。進入千禧年，學院開辦全日制的傳理學文學碩士，電影電視與數碼媒體藝術（三年制 MFA）碩士、傳媒管理社會科學碩士、國際新聞碩士等，其中 2006 年開設的傳媒管理社會科學碩士課程，是亞太區內首個同類課程。至於傳理學社會科學（榮譽）學士學位，自 2004 年起，提供五個主修科目，分別為電影電視、數碼圖像傳播、新聞、組織傳播和公關及廣告。2012 年，在本科四年新學制下，學院調整主修科目，分為電影與媒體藝術、新聞、組織傳播和公關及廣告。學制與多領域學科的不斷深化改革，為學生提供了系統強化理論學識的不二之選。

在研究領域，此階段傳理學院成立了媒介與傳播研究中心，負責舉辦各類國際會議、多媒體講座及工作坊系列，邀國際專家和學者分享媒體最新發展，加強行業內對「道」的交流討論，為師生提供一個打開國際學術視野的廣闊平臺。另外，與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合辦中文學術期刊《傳播與社會學刊》，先後成為「臺灣社會科學引文索引」（Taiwan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TSSCI）核心期刊及「國際傳播學會 ICA」全球首份中文附屬學刊。

在提升研究水平的同時，傳理學院在運作上仍然重視實務和與業界的緊密聯繫。自 2007 年起，新聞系首創「普立茲新聞獎得主工作坊」，每兩年邀請普利茲獎獲得者來到浸大與學生進行為期一個星期的授課與從業經驗交流分享。 電影電視系（現為電影學院）舉辦「大中華地區大學生影視作品獎」，並在 2018 年拓展為「全球大學生電影節」中的全球競賽，為大中華區新晉影視行業輸送人才。

浸大傳理學院在這個時期，主要探索「道」和「術」的平衡，從以專業教學為先，轉型成研究與教學並重的學院，並開始開辦學士後的學位課程（postgraduate degrees）。此時浸大傳理學院在研究方面處於迎頭趕上的狀態，專業訓練在鞏固的基礎上繼續摸索前進。

（三）2015 年至今，新型知識．範式轉移

自創系以來，無論是 1990 年代之前因社會行業的人才需求而生的教育求索，還是九十年代後順應學院發展提升理論研究、「道」「術」平衡的結構調整，浸大新聞傳媒教育的變革本質上是在討論「實踐先行」與「理論先行」何者更為重要。在過去的範式討論中，無論「實踐先行」或是「理論先行」，皆是對教育落腳點的討論。然而在科技浪潮中，以「實踐」或「理論」教育成果為判別準則已然難以適應時代變遷：二者的整合才是在教育範疇中培養順應時代人才的最優方式，這個整合，正為新範式提供了一個全新的教育思路。

隨著新科技在社會發展中的角色趨於主導，以及大數據與人工智能在媒體傳播與社交媒體上的廣泛應用，促使以數據與計算機為主導的跨學科新型知識（如大數據、網絡交互、算法輿編碼、健康環境、內容自動生成等）系統性地進入課堂，浸大傳理學院的教育模式自 2015 年開始向新範式轉移：堅守培養心懷夢想、理論學識夯實、實踐工作卓越的傳媒人為目標，更進一步把握新科技浪潮，創新教學結構為學生提供全方位傳媒教育，為香港乃至國際傳媒輸提供前沿成果。

換句話說，培養適應科技發展、靈活運用大數據與人工智能技術來實現傳媒夢想的人才，才是浸大傳媒教育在新時代裡堅守的方向。在通往這個方向的道路上，「道」「術」並重，二者相結為舟。

首先精簡主修科目，於 2016 年起入學主修科目為三個，分為電影、新聞和公關廣告，主修下面又設八個專修，分別為：國際新聞、中文新聞、大數據與媒體傳播、組織傳播、公共關係、廣告與品牌、電影電視、動畫及媒體藝術。其中，大數據與媒體傳播專業是與計算機科學系合辦的新課程，為亞太地區首個同類課程。

學生入讀首年主力修讀多個「通識教育」必修科、學院必修課及選修課，未分配哪一個學系，到一年級下學期才選出第二年級的課程主修。在此新制度下，學生有更充裕的時間思考自己的志向，而不急於為選專業所困，既能強化對自身優勢的認知，又可更為深入地探索和理解自己的夢想，心定而後出發，方能把路

走遠。

在學術研究方面，浸大傳理學院全方面涉足媒介和傳播科研領域，包含理論和應用的研究，探索橫跨計算機／大數據、健康環境、傳播學科、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等學術領域。學院聯同校內其他院系、本地大學與海外院校的學者進行各類合作研究計畫及項目，教師會為不同企業和公共部門開展不同的應用研究及調查。傳理學院每年錄取的研究式課程學生人數，由 5 至 6 人，倍增至 10 至 12 人，現時有 50 多位哲學博士和哲學碩士學生，分別來自香港、中國內地、美國、捷克、波蘭、義大利、保加利亞、菲律賓、印度、希臘、非洲及巴基斯坦。

電影學院於 2016 年成立電影與動態影像研究中心，促進電影、動態影像及數字人文的研究工作。2018 年，人工智能與媒體研究實驗室成立。連同原有的媒介與傳播研究中心共三個研究機構擴大研究範圍，孕育與時並進的創新研究及合作項目。

此時的浸大傳理學院，把國際化作為核心策略，為學生提供廣闊平臺以及多元的學習環境，相應舉措包括增加具有國際背景的教師及學生數量、舉辦海外交流團、與海外高等學府建立合作關係、提供海外實習機會、支持跨地域研究合作、支持全球性研究項目、鼓勵師生參與高水平的國際會議等。2015 年，傳理學院與德國萊比錫大學和美國俄亥俄大學正式建立長期合作關係，三間院校師生定期互訪、學習、交流。2018 年學院開展的「亞洲記者駐校計畫」（Asian Journalism Fellow Scheme），邀請亞洲知名記者交流訪問傳理學院一個學期，同期舉辦講座、工作坊等活動。

此外，基於香港的媒體環境，提供數字化新聞傳播的平臺，浸大傳理學院出版「2018 香港數字媒體報告」（*Hong Kong Digital Media Report 2018*），該報告仿效路透社新聞研究院與牛津大學合作年度推出的 *Digital News Report*，搜集香港年度傳媒生態的事實及現狀，共享全球數字媒體的資源。

肆、變與不變：改革創新與堅守傳統的問題和對策

一、科技挑戰

香港的傳播新科技和互聯網通訊發展迅速，原生數碼媒體在 2000 年逐漸出現，2010 年始爆發，到 2016 年原生數字媒體的數量已超過運營數碼平臺的傳統媒體。《香港媒體數碼發展報告 2018》中提到，新技術對香港媒體機構、尤其是傳統媒體機構造成了巨大衝擊（李文、滿子梵，2018）。香港媒體負責人普遍

表示，對香港媒體業短期前景感到憂慮，但同時也認為新媒體發展是未來重點所在。

《香港媒體數碼發展報告 2018》又指出，數據新聞、虛擬實境及可視化展示等新媒體技術的應用在香港媒體業的應用仍未普及，而人工智能技術使新聞內容自動化在香港仍是空白；香港大多傳媒機構缺乏長遠的數碼發展戰略，針對編採人員的新媒體技術培訓投入資源不足（李文、滿子梵，2018）。

在面對科技挑戰和新媒體衝擊時，傳媒教育應該教授什麼知識？什麼知識最有價值？傳媒教育知識應該如何變化？從知識社會學角度，需要分析學校課程目標、內容和結構的狀況和變化。如今，以人工智能和大數據知識為主導的傳媒教育新範式正在打破原有的新聞專業主義為內核的「道」、「術」平衡舊範式。而這一轉變，往往圍繞新的「道」（傳媒教育的根本）與「術」（新科技知識與應用）之辯而展開。由於傳播新科技的飛速發展，迫使傳媒教育需要開始又一次的範式轉移。

新範式需要具備當代意義，傳媒人才不僅要熟絡過去傳媒專業中的理論學識，掌握傳媒實踐基礎，更要具備「跨學科」整合能力，學會將新型知識和科技運用到傳媒領域。因此近年來，學院特別强調以人工智能和大數據等新型知識及跨學科領域知識的融合，企圖通過知識的融合，重構傳媒教育的課程配量與設置。因此浸大傳理學院核心必修課程因應當下新媒體時代的變化而進行系統調整（圖 1）。舉例來說，於 2016 年或之前入學的全體傳理學院有四門傳理學核心課程，包括「傳播學概論：公關及廣告和組織傳播的視角」（Introduction to Communication: A PRA and ORGC Perspective）、「動態影像和聲音概論」（Introduction to Moving Image and Sound）、「新聞學概論」（Introduction to Journalism），以及學生可從「視覺傳播」（Visual Communication）、「創造力發展」（Developing Creativity）、「傳播者的當代香港問題」（Current Hong Kong Issue for Communicators）、「傳媒管理」（Media Management）、「文化、社會與媒體」（Culture, Society, and the Media）、「傳播、科技與變化」（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Change）中選一門。2017 年和 2018 年入學的傳理學院的四門傳理學核心課程改為「媒體與傳播概論」（Introduction to Media and Communication）、「倫理、法律與傳播」（Ethics, Law, and Communication）、「多媒體講故事」（Multimedia Storytelling），以及學生可從「媒體、文化和社會」（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英文媒體寫作與製作」（Media Writing and Production in English）、「視覺傳播」（Visual Communication）、「中

圖 1：浸大傳理學院近年課程改革內容

2016年或之前入學	2017年和2018年入學	2019年或之後入學
傳播學概論：公關及廣告和組織傳播的視角 Introduction to Communication: A PRA and ORGC Perspective	媒體與傳播概論 Introduction to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動態影像和聲音概論 Introduction to Moving Image and Sound	倫理、法律與傳播 Ethics, Law and Communication	
新聞學概論 Introduction to Journalism	多媒體講故事 Multimedia Storytelling	
視覺傳播 Visual Communication	媒體、文化和社會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
創造力發展 Developing Creativity	英文媒體寫作與製作 Media Writing and Production in English	-
傳播者的當代香港問題 Current Hong Kong Issue for Communicators	視覺傳播 Visual Communication	
傳媒管理 Media Management	中文媒體寫作與製作 Writing and Producing for the Chinese Media	-
文化、社會與媒體 Culture, Society and the Media	大數據與非語言傳播 Big Data and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傳播、科技與變化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Change	人工智能和數位傳播 AI and Digital Communication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文媒體寫作與製作」（Writing and Producing for the Chinese Media）、「大數據與非語言傳播」（Big Data and Nonverbal Communication）、「人工智能和數位傳播」（AI and Digital Communication）中選一門，2019 年入學的學生的可選傳理學課程仍然是四門，前三門與 2017 年和 2018 年入學的學生一致，第四門選修的可選課程由六門縮減到三門，為「視覺傳播」、「大數據與非語言傳播」和「人工智能和數碼傳播」。

從保留的三門可選傳理學核心課程可看出，學院課程對於新媒體和人工智能知識的重視，培訓學生在傳統媒體和傳播方式之外的認識、分析和應用能力，回應了香港媒體業當下處於數碼媒體轉型時期的需求，也回應了新範式對「道」「術」平衡的要求，以數碼傳媒的行業需求為指向標的，培養新的範式指導下整合能力優異的傳媒人才。

在浸大傳理學院的主修劃分上，也經歷了方向性的變革。以新聞系為例，原本新聞主修分為中文新聞、廣播新聞、國際新聞，後增設財經新聞，將廣播新聞併入中文新聞；到 2018 年，將財經新聞併入中文新聞，增設浸大傳理學院與計算機系合作開辦數據與媒體傳播跨學科專修，這也是全香港第一家本科跨學科合作課程，故形成現時新聞主修的三個專修分別為中文新聞、國際新聞與數據與媒體傳播。新設的專修課除了讓學生掌握與數據相關的新聞學課題，並善用科技處理新聞業的日常工作，更體現了新聞系在教學觀念和知識體系的轉變。

浸大傳理學院開拓人工智能、大數據新聞學和虛擬實境等新領域的傳播教育技術，必須有教學和科研人員作配合。現時浸大傳理學院共有 90 多名全職教員，其中業界經驗背景和學術背景的各占一半，另聘有 50 名業界背景的兼職導師和 50 名職員及技術人員。為配合課程改革，學院近年聘請計算機背景、數碼媒體、網絡分析、數據和人工智能等專長及跨學科的教員達 8 人，並有相關課程由理學院計算機科學系的教員，為傳理學院學生授課。此外，傳理學院與全球最大的中文媒介內容供應商騰訊建立策略性合作關係，發展傳播教育科技。

裝備學生應對新媒體世界，在校內實踐也有體現。例如，浸大傳理學院新聞系學生的實驗報章《新報人》從紙媒，走向網上新聞，開設電子版、臉書版等踏足社交媒體，發布網上即時新聞。學生的實踐訓練不再侷限在一個領域，而是同時掌握所有媒體平臺，包含印刷媒體、廣播電視、數碼媒體、手機應用程式等。

新聞傳播已成高科技支撐的領域，各項業務都與現代技術密不可分，傳媒教育同時需要足夠且完備的設備條件。浸大傳理學院在教學和研究設備上，根據新媒體和新技術需要進行提升。2018 年，新建的浸大傳理學院人工智能媒體創新實驗室及虛擬實境及擴張實境工作室投入使用。

二、新聞倫理道德傳統與實踐的距離

浸大傳理學院的院訓是「唯真為善」，希望學生做事做人都要以「唯真為善」為本，有勇氣、有良心、有分辨事實真假的智慧，對待人和事業都要真誠、真實。在浸大傳理學院，倫理道德課程是全體學生必修的傳理學核心課程之一。儘管新範式要求的對數碼傳媒新時代的適應能力，重在強調人才的專業技術和學識水平，但「倫理道德」亦是人才之本：人才如種子，只有在真實、健康的土壤中孕育，方可有茁壯成才的可能性。

香港近年社會運動愈漸頻繁，大專院校學生關注甚至參與運動。浸大傳理學院學生必須參與校內實踐和校外實習，「跑新聞」時會接觸到真實的社會和傳媒環境。學生到前線採訪、拍攝及撰寫報導示威遊行活動期間，可能會遭遇傳媒倫理道德的選擇。例如，學生記者如何在採訪過程中把握自己的角色，不帶偏見和保持記者專業精神，理性實踐課程理論等。對於學院教學方面，引導學生價值觀，維繫傳媒專業精神，保持良知和社會責任也是一種挑戰，在香港社會現時氛圍下，任務變得更加艱巨。

新範式教育所處時代的特殊，亦對傳媒人倫理和素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出

淤泥而不染，世道繁雜真假混沌，更需要傳媒人在泥淖中高舉專業主義的明燈，堅守「唯真為善」的專業精神。

伍、結語

面對新媒體時代的科技變革和傳媒業轉型，浸大傳理學院在傳媒教育方向上選擇了一條以變應變的道路，充分重視科技，讓新型知識充當媒體教育的主導，改革課程，推動新聞傳播教育的範式轉移，同時堅守傳媒道德倫理傳統以及「唯真為善」的院訓。

香港傳統的新聞教育，包括早期浸大傳理學院在內，多偏向「新聞工匠」的訓練，以培訓未來新聞記者的技能為主，如新聞寫作、採訪技巧、廣播電視製作等。為適應科技發展，開設課程傳授計算機數據處理結合新聞傳播的技能，亦可看作是專業訓練， 納入為「術」的範疇，與香港新聞教育一向以來的傳統並無衝突。不同時期關於傳媒教育爭論的議題雖有變化，但同時又有重疊之處；儘管科技賦予傳媒新功能，帶來新面貌，甚至改變了人與傳媒的關係，但新聞傳播教育對於專業的追求不改，過硬的專業實務大不可因過度關注科技而偏廢，但是在新型知識（如人工智能、算法、大數據、內容自動生成等）的引領下，媒體專業與其所在的瞬息萬變的社會環境及傳播生態之間，不斷拔河，並持續自我修正其意涵。

人工智慧科技時代，專業記者仍有存在的意義，技術雖將「機器生成內容」（machine-generated content）、聊天機器人、機器人主播變為可能，但難以替代記者真人採訪。傳媒業者需要的是善用科技處理新聞工作，提高處理數據、整合資訊的效率，通過個人判斷和經驗找出有用的數據，後續分析並處理數據，從而發掘新聞題材，進行調查報導和深度報導等，這是對傳統媒體抑或數碼媒體等新媒體運作都同樣重要。傳媒教育開設相關課程，就是培養學生在新聞方面數據採集、分析和報導的能力，懂得運用科技，從而在走出校門時能應對及智能傳訊器材衝擊傳統媒體後的新秩序。

類比早期香港新聞教育側重實務訓練，因不能滿足當時時代的需求而無法繼續存在下去，高校在課程中加入社會科學和傳播理論及研究方法（羅文輝，1989），隨後學術理論統領實務操作的教學模式在 20 多年的運用和摸索中，被證明行之有效。在新一波科技浪潮中，浸大傳理學院創造性地改革主修和專修劃分，全新推出數據與媒體傳播專修，同時在全院規定選修傳理學核心課程「大數

據與非語言傳播」和「人工智能和數碼傳播」、「多媒體講故事」，開拓傳統媒體和傳播之外的未被全面涵蓋的新領域，回應當下媒體業生態和新媒體時代的需求。這並非是在傳統新聞傳播課程中增加一兩門與科技相關的課程，或是讓學生簡單地跨學科到資訊科技領域，學習編寫計算機程序代碼和整合大數據的技能，更不是在原有教學模式上的錦上添花，而是一個整體體系上解決新問題的激烈躍進。之所以稱為激烈躍進，是由於原有的「道」、「術」平衡的模式在實踐中出現了新的變量，已難以再勝任有效解決當代社會和新聞傳媒發展而帶來相應教育問題，需要新型知識框架和理念，為理論和實踐提供新的範式，從而廣泛運用到各類媒體與傳播中，同時加入人工智能、機器學習等相關議題的法律、道德及倫理問題的思考。

科技的發展為教育帶來新的機會，數碼設備在研究、教與學和寫作上創造更多便利，但同時不乏教育工作者認為，互聯網和多媒體對高等教育的生存產生威脅（Taylor, 2010）。Taylor 強調，科技不是高等教育的「萬能藥」，保持原來有價值的教育政策和作法仍有必要，「新的不需要取代舊有的，用舊有的理解和欣賞新的發展，再用新的推動革新」（同上引）。

傳媒教育範式轉移的出現，科技的演變和新技術的應用無疑是其中一個因素，不過更基本的一點，是教育創新內容本身。例如，因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停止面授課堂而改變教與學模式，網上課堂和電子學習所需要的電腦和網絡技術是工具，如何應用人工智能和大數據破解疫情謠言，學習建立疫情電子互動地圖則是傳媒教育以科技為主導的新型知識轉移。在新媒體時代浪潮中，對於傳媒行業的新理解和詮釋，體現在傳媒教育中，便可能帶動新的知識架構和教育模式的出現，而這些範式轉移未必是要切斷源頭，打破地基，另起爐灶，而是在現有基礎上作出適當的調整。

針對香港新聞機構對數碼轉型策略和數據科學培訓不足，包括浸大傳理學院在內的本地大學新聞學院可加強與香港媒體的合作，在學校培訓適應科技發展的新聞傳播系學生，為媒體輸送人才外，同時也可為媒體的現有記者和編輯提供相關技能培訓，提高媒體競爭力，以適應全球數字化媒體浪潮。

傳媒業是受到新的科學技術衝擊最大的行業之一，亦是從人工智能與互聯網發展得益最大的行業，是故傳媒教育中必須重視科技帶來的變化，科技在新聞傳播的應用可以成為傳媒教育的主導方向，但在教學實踐中，保持卓越的專業培訓和人文教育行之有效也十分必要。這，可能是新範式下的平衡吧。

參考書目

李文、滿子梵（2018）。〈香港媒體主管個人專訪〉，李文、黃煜（編），《香港媒體數碼發展報告 2018》，頁 36-57。香港：中華書局。

周淑卿（1995）。〈教育知識社會學的幾個重要概念〉，《空大學訊》，157：49-52。

胡少偉（2017）。〈香港高等教育的發展及國際化現況〉，《香港教師中心學報》，16：55-69。

俞旭、朱立、朵志群（1998）。〈香港四所院校新聞教育之比較〉，《新聞與傳播研究》，1：21-33。

香港大學資助委員會（1996）。《香港高等教育——香港大學資助委員會報告》。香港：香港大學資助委員會。

香港政府新聞處（2020 年 10 月）。〈香港便覽——大眾傳播〉，《GOVHK 香港政府一站通》。上網日期：2020 年 2 月 22 日，取自 https://www.gov.hk/tc/about/abouthk/factsheets/docs/media.pdf

陳伯璋（2000 年 12 月）。〈知識社會學〉，《國家教育研究院——雙語詞彙、學術名詞暨辭書資訊網》。上網日期：2020 年 2 月 20 日，取自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306728/

陳照雄（2006）。《當代教育社會學導論》。臺北：心理出版社。

張昆主編（2018）。〈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中國新聞傳播教育年鑒 2018》，頁 395-401。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

張俊森、伍曉鷹、姚先國、李宏彬、吳延端（2009）。《香港經濟研究：經濟轉型、競爭力與經濟增長可持續性》（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中央政策組委託研究報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

張詠、李金銓（2019）。〈密蘇里新聞教育模式在現代中國的移植——兼論帝國使命、美國實踐主義與中國現代化〉，李金銓（編），《傳播縱橫：歷史脈絡與全球視野》，頁 343-376。新北：聯經。

劉蜀永（2016）。《簡明香港史》（第三版）。香港：三聯。

劉瀾昌（2018）。《在河水井水漩渦之中：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新聞生態》（增訂版）。臺北：秀威。

羅文輝（1989）。〈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對中華民國新聞教育及新聞事業的影響〉，《新聞學研究》，41：201-210。

Greenberg, S. (2007). Theory and practice in journalism education. *Journal of Media Practice*, *8*, 289-303. https://doi.org/10.1386/jmpr.8.3.289_1

Taylor, M. C. (2010). Emerging network culture. In M. C. Taylor (Ed.), *Crisis on Campus: A bold plan for reforming ou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p. 69-83). New York, NY: Alfred A. Knopf.

Young, M. F. D. (1971). An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curricula as socially organized knowledge. In M. F. D. Young (Ed.), *Knowledge and control. New Directions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pp. 1-19). London, UK: Collier-Macmillan.

附錄：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專業設置

課程	課程內容
本科生課程	電影主修：包括動畫及媒體藝術專修、電影電視專修。
	公關及廣告主修：包括廣告及品牌專修、組織傳播專修、公關專修。
	新聞主修：中文新聞專修、國際新聞專修、數據與媒體傳播（由新聞系與計算器科學系合辦）。
修課式研究生課程	傳理學文學碩士：課程從個人、組織和社會層面探究傳播領域，集中探討香港、中國內地及臺灣的傳播模式，同時關注媒體科技轉變帶來的影響。
	國際新聞文學碩士：課程提供專業的國際新聞深造研究，側重探究香港、中國內地及東亞／東南亞地區情況。備有兩門主修選擇：國際新聞和財經新聞。
	影視與新媒體制片管理文學碩士：課程由大中華地區電影公司高層及資深產業人士親臨授課，教授學生有關影視及新媒體產業的策劃、融資、制片管理、營銷、宣傳、院線經營等科目。
	傳媒管理社會科學碩士：課程由傳理學院與商學院合辦，旨在培育學生掌握基本的營商和管理技巧，以及管理媒體業務的專門知識。
	電影電視與數碼媒體藝術（制作）碩士：香港首個影視制作碩士學位，修讀年期為三年。為有志從事影視及媒體工業人才提供國際視野的專業培訓。
研究式研究生課程	傳理學哲學碩士：學院只會在個別情況考慮哲學碩士課程的申請。
	傳理學哲學博士：主要錄取在公關廣告、電影電視、新媒體傳播、新聞、組織傳播和傳媒研究等傳播領域有較高造詣，並對理論探索及學術研究有興趣的人士。
高級文憑課程	創意電影制作課程：涵蓋導演、編劇、電影攝影與燈光、剪接與混音、表演技巧五個主要範疇，內容融合創意、美學、人文素質。
學位銜接課程	新媒體及影視創意寫作文學士（榮譽）學位課程：由電影學院負責，著重培訓新媒體和傳統影視的創作思維及寫作技巧。
	綜合傳播管理學社會科學學士（榮譽）學位課程：由傳播學院負責，教授公關廣告、市場推廣、籌劃旅遊款客、商業及媒體活動等綜合傳播知識及技巧，理論與實務兼備。
	媒體及社會傳播社會科學學士（榮譽）學位課程：由傳理學院負責，傳授與媒體、社會傳播及相關專業的知識及技能。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11(2), pp. 153-172, July 2021

From Balancing "Skills" and "Principles" to Paradigm Shift—A Case Study of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in Teaching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Chen, Cong

Researcher,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uang, Yu*

Professor,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fast-growing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big dat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and other technologies have brought about tremendous changes in the media industry, and correspondingly brought qualitative changes to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Inevitably, the humanistic nature of journalism education has inherent tensions and contradictions with the rapid expans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shoul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ominate the paradigm in the area of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Drawing on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from the theory of sociology of knowledge, this article assess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in Hong Kong based on a case study of the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of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by analyzing its history and approaches in dealing with the ever-changing social environment and media ecology. Some noteworthy findings have been drawn from the analysis. The changes in the curriculum, in particular, have revealed the paradigm shift in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Keywords: sociology of knowledge, case study,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 Email: s03033@hkbu.edu.hk

JCRP 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舍我紀念館 Cheng She-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Ainosco Press

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11 卷 第 2 期．頁 173-177．2021 年 7 月
DOI:10.6123/JCRP.202107_11(2).0008

如果沒有了你：新聞傳播教育的新局面與舊挑戰

汪琪 *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名譽講座教授

由 1920 年代到現在，新聞傳播教育在華人社會發軔已經整整一百年時間；在全球疫情更進一步凸顯媒體傳播重要性的此刻，《傳播研究與實踐》出版專輯，將兩岸四地教師們在種種壓力下奮鬥的經歷，點滴化為歷史紀錄完整呈現，自有其特殊的意義。而對於將生命歲月投擲在發展新聞傳播教育上的我們，回首崎嶇道路上顛仆前行的過往，有驕傲有感歎、有喜悅也有辛酸；然而展望未來，看到的又是什麼？平坦的康莊大道、更為艱險的羊腸山徑，還是一片迷霧？過去的經歷，究竟讓我們學到了什麼？

和西方文化熱衷研究和預言變化相比，《易經》提供了一個不同的世界觀；世界無時無刻不在改變，然而「變」中卻有「不變」之處。不論現在變的節奏是否比以往更快、幅度更大，但「常」、「變」相隨，如果我們能定下心來，鑑別過往「變」中的「常」處，即便無法預知未來，至少能夠掌握到未來發展的幾個關鍵。高等教育有許多面向，鉅觀層面有理念、辦學目的與發展方向，微觀的實務層次有課程架構、師資配置、財務管理等等，而兩者互為表裡因果，本文就嘗試由兩個小故事，由學門的起源，談談未來。

許多年前，學校同事間傳言，一位到媒體實習的學生被長官拍桌痛罵：「你的老師是怎麼教的？」由於這句話出於一位「非本科系畢業」的主管，聽在當老師的耳裡，就不只是對學生表現的不滿。學界與業界存在的這種張力，在張繼高先生（1926–1995）——一位 1980–1990 年代很受敬重的媒體主管、新聞工作者、作家和評論家——的一句話，得到印證。當我向他提起政大新聞系和中國電視

* Email: telgw230@gmail.com

JCRP 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成舍我紀念館 Cheng Shu-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Ainosco Press

公司[1]之間的合作構想時，張先生笑了笑說：「新聞界和新聞教育界是『相看兩厭』」。

由各校發展的歷程來看，新聞傳播教育存在價值所遭受的挑戰，大約來自四個方向：新聞傳播產業的開放性、傳播科技的變化、國家社會的需求以及理論知識的發展。

現今大學科系五花八門，但是一般而言，學科的成立，大多基於理論知識與現代社會對專業人才的需求，例如法學、醫學、會計學與應用及自然科學，或至少是理論知識系統性的累積，例如社會學、經濟學或文史哲學。如眾所周知的，作為獨立科系，時序上新聞先於傳播；而全世界的新聞教育，幾乎都是由職業訓練起家的。之後新聞傳播教育雖然由職訓逐漸成熟為專業人才的培養，並成為社會科學最年輕的一員，上述科系的「寒微出身」，在大多數人心中仍然營造了一個刻板印象，就是：培養新聞傳播事業所需的專業人才，是學院的天職。問題是，新聞傳播事業果真是「專業」嗎？

不可否認的，新聞傳播人員必須具備特定條件，然而在人事進用上，傳播事業一直是一個「開放型」的產業。在傳播機構工作，並不需要通過任何專業證照考核；甚至表現最傑出的記者或主持人，往往也不是由本科系畢業的。而本科畢業的學生，真正進入相關產業工作的，比例卻又偏低。在此情況下，新聞傳播科系的生存與發展，很容易受到各地政治、經濟或社會因素的影響。在政府支持、資源充沛的情況下，可以穩定健康成長，但是一旦大環境遭逢逆流，相關科系便成為災區；行政主管也立刻被迫站上第一線、直接面對砲火。在大陸，學界引入傳播理論與「學科化」的崎嶇歷程、香港政府教育資源短缺時，學校主管被迫在自闢財源或裁員間二選一的險況，以及臺灣因少子化導致部分私立大學搶學生的窘境，在在提醒我們，無論是媒體主管、政府官員、企業主與家長所挑戰的，都是新聞傳播教育存在的必要性；也就是本刊專輯中，在不同論文與不同脈絡中一再提出的「（工具）價值」與「正當性」。話說得白一點，就是：沒有你，又怎樣？

相對於政治、財務或社會因素，傳播科技對新聞傳播教育的衝擊使「正當性」問題更形複雜。一般情況下，前者的影響，往往在問題緩解之後，一切仍可逐步回到原來的發展軌道上；但科技發展纏夾了其他影響因素帶來的挑戰，卻長久而深遠。當每一個人都可能成為「公民記者」、「小編」和「網紅」，甚至像谷歌（Google）與亞馬遜（Amazon）的創辦人，由車庫起家，最終在網路世界引領

1 當時臺灣只有三家電視臺，每一家都是媒體界的寵兒。

風騷，我們又如何說服政府、媒體和家長，年輕人必須花費四年寶貴時間，去取得一張人人可得的入場券？在今天，傳統的「傳播『專業』」還有立足之地嗎？」

上述現象並非始自今日，網路興起也已經有二十年以上的時間。由於新聞傳播教育過去一向以傳播媒體為科系藍圖，在媒體匯流逐漸成為趨勢之際，教育機構立即感受到打破科系界線的壓力；教育方向、課程架構、科系名稱都曾經被提上系所，甚至國際會議的議程，激烈論辯。如今大眾傳播媒體的頹勢日益明顯，學院為「後大眾傳播時代」所作的準備，妥善了嗎？

我們由本刊專輯的論文中可以看出來，兩岸四地各校除了開設電腦網路相關課程，有部分學系也以通識教育搭配更新穎而彈性的課程安排因應變局。但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在新聞傳播學門世界排名前幾名的大學裡，[2] 看不到石破天驚的變革。和許多學校一樣，課表上多了「數位／字」（digital）、「數據」（data）與「行／移動」（mobile）這些關鍵字，學生也必須透過選修或工作坊，時刻精進自己的網路與電腦技能；[3] 新穎的開課主題並非沒有，例如「新媒體生財策略」（Strategies for Monetizing New Media；南加州大學），甚至「謊言、信任與科技」（史丹福大學）顯然都在回應網路通訊所衍生的重要課題。然而除此之外，無論是科系名稱或課程架構，我們仍然輕易辨認出新聞傳播學科的傳統風貌。即便網路上假消息與仇恨言論氾濫、書寫方式五花八門，甚至不忍卒讀，必修課程的核心，仍然是倫理、法規與寫作。

事實上，與其說這些學校一成不變、仍然以大眾傳播媒體為藍圖勾勒教育的版圖，不如說網路興起後二十餘年的今天，決策者已然識破媒體世界的變與不變：變動大的是訊息展現的平臺、方式與策略，變動小的是媒體功能。前者是所有網路使用者的揮灑舞臺；隨時隨地出現的新型態服務帶動一波波的流行，甚至亂象，令人眼花繚亂、無所適從。然而這些產品所發揮的功能卻有如孫悟空七十二變，並沒有脫離傳統媒體的三大功能領域：新聞與訊息、說服以及娛樂。網路上的選擇愈多，使用者也愈需要可信賴的新聞分析 [4] 與高品質的娛樂內容；至於網

2　包括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南加州大學（Annenber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史丹福大學、德克薩斯州奧斯丁大學（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等。

3　例如「數位文化」、（史丹福大學）、「數據新聞學」（南加州大學）、「行動閱聽人的新聞」（德州大學）等。

4　有分析指出，當媒體訊息在谷歌的搜尋結果中大幅度缺席時，谷歌的使用率明顯受到影響。2020 年，澳洲政府已經開啟修法程序，立法規定臉書與谷歌必須付內容使用費給澳洲媒體。未來可能有更多國家跟進。此舉是否改變傳統媒體目前的黯淡前景，值得觀察（Why Google and Facebook are being asked to pay for the news they use—explainer, 2020, September 4）。

路在推廣理念與產品的龐大潛力，更使廣告與公關的重要性與日俱增。這也就難怪 2021 年 QS 全球學科排名（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中，排名第一的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University of Amsterdam）在「傳播科學」學位課程網頁上所標示的四大教學領域，其中有三項直接指向上述媒體的三大功能：政治傳播與新聞、娛樂傳播與說服傳播。[5] 同樣意義深遠的，是許多新聞傳播教育系所以不變的核心課程，展示了葉啟政教授所說的：大學的「理想性」。現實中媒體為在市場競爭中勝出，千變萬化、各領風騷；新聞事業所標榜的那把尺卻不容隨時改變。因此由教育的角度來看，技能上的基本素養以及專業倫理同樣重要；如此，日後本科畢業生縱橫職場，才不至於進退失據。由此看來，假使媒體與學院果真「相看兩厭」，也不過是兩個社會機制終極目標不同的結果。

現今無人能論斷媒體產業的未來，在網路比傳統媒體更為自由開放的情況下，媒體工作是否屬於專業，必然繼續受到質疑；然而可以想見的是，只要媒體功能沒有根本改變，則過去新聞傳播的教育模式就有存在的價值。換言之，我們面對的不是「存」、「廢」，而是如何調適與更新的問題。

除了培育人才，大學學科的另一成立要素，是理論知識的累積。錄取學生的標準與畢業系友的表現，是衡量系所在培育人才方面表現的指標，而研究發表，則是衡量學術地位的指標；兩者相互激盪、密不可分。由發展歷史來看，新聞傳播理論的出現較其他社會科學理論晚。近年來全球化與網路媒體興起，帶動學術發表一片欣欣向榮的氣象；但是榮景之下，作為學術研究核心的理論論述不但相對貧乏，甚至呈現與媒體現況脫節的問題 (Wang, 2018)。另方面，包括華人學界在內的非西方學界雖然有「本土化」的覺醒與努力，大體上研究仍然停留在套用理論、進行資料分析的階段 (Wang, 2014)。

無可諱言的，無論是以自由主義或馬克斯主義為基礎的傳播產業與理論都是外來的；沿用與不沿用這些產業模式與學術典範，往往引發爭議。沿用，因為媒體發展的型態路徑大致一樣、理論也有一定的普世性；不沿用，因為時空文化社會背景都不同，不可能完全適用。上述爭議顯現的問題，是華人社會有其獨特性，但也有其共通性。回頭看歷史，早年報人，多有傳統士人，甚至「言官」的修養與氣節；這種特質所凸顯的精神，雖然不能等同新聞學對客觀性與真實性的追求，然而堅持站在為公共利益的角度實話實說、「雖千萬人吾往也」的氣度，卻與後者有相通之處。

5 第四個領域是組織傳播。

沿用西方典範，因此似是無可厚非。然則學理上我們不能忽視兩點：首先，相對於為擬訂政策或競爭策略參考而進行的研究，學術研究的目的是發展理論論述，而非單純的「應用」；理論不合用不是研究的終點，而是起點。其次，學術與思想發展，不能依附任何他人——包括西方大師與古聖先賢。理論文獻是啟動我們省思與學術對話的藥引，而非救治百病的藥方。失去了主體性，學術不可能生根發芽；在主流論述陷入困境的今天，華人學界絕非只有忠實跟隨一途（汪琪，2014）。[6] 由主體角度出發，才可能見前人所未見、為學術開拓更廣闊的空間，也才可能找到適合分析本土傳播產業的觀照點，並回應其需求。

由 2019 年逐漸蔓延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將所有人禁閉在家，卻也拓展了網路世界的版圖，更進一步提升了它的重要性。這是媒體與傳播教育界所面臨的新局面，但這個新局所帶來的挑戰，對我們卻不全然陌生。如何拿捏順應變局或堅守原則之間的分寸，下一個百年，將繼續考驗新聞傳播教師們的勇氣與智慧。

至於外界「沒有你，又怎樣」的質疑，每個人都在自己的崗位上努力、也都有自己的答案；誰也不能代表誰回答。作為一個服役將近三十年的退伍小兵，我只能說，我認真思考過這個問題了，「沒有我們，你還真不行」。

參考書目

汪琪（2014）。《邁向第二代本土研究：社會科學本土化的轉機與危機》。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簡體字版：《本土研究的危機與生機》。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Why Google and Facebook are being asked to pay for the news they use --explainer. (2020, September 4). *The Guardian*. Retrieved June 11, 2021, from 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20/sep/05/why-google-and-facebook-are-being-asked-to-pay-for-the-news-they-use-explainer

Wang, G. (2014). Culture, paradigm, and communication theory; a matter of boundary or commensurability? *Communication Theory*, *24*, 373-393. https://doi.org/10.1111/comt.12045

-- (2018). Media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the digital era: Moving beyond ontological dualism. *Communication Theory*, *28*, 235-253. https://doi.org/10.1093/ct/qty011

6 《邁向第二代本土研究》（汪琪，2014）同書於 2016 年出版簡體字版，書名為《本土研究的危機與生機》，由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

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11 卷 第 2 期．頁 179-184．2021 年 7 月
DOI:10.6123/JCRP.202107_11(2).0009

政大新聞教育與我的報業生涯

黃清龍 *

前《中國時報》發行人

我們這一輩媒體人真可說生逢其時。大學畢業、退伍進入職場，正逢解嚴前夕、報禁即將開放，工作機會多不說，還經歷了從威權到民主的大轉型，可在時代的舞臺上盡情揮灑。相較於戒嚴時期新聞前輩的匍匐前進，我們的境遇實在好太多了。

但我們也可以說生不逢時：媒體榮景無法長久，特別是報紙行業，先是有線電視開放、廣告市場分散，繼之網路興起、免費資訊氾濫，產業前景變得不明，還有港媒的挑戰。但這些，都比不上手機普及的衝擊，隨著社交平臺興起，自媒體發達，媒體機構逐漸崩解；更不用說惡性競爭下的專業淪喪，以及低薪不足養家的慘況。

我們所經歷的行業變化，真可說大起大落。這也使得我多年前回到母校演講，面對學弟妹詢問應否投入新聞行列時，竟一度為之語塞！因我擔心給錯建議，害他們入錯行，將來後悔一輩子。畢竟在我臨退休前那幾年，經常慨嘆新聞業怎麼會變成這樣？如果人生能夠重來，是否還要選擇當記者？這些問題我連自己都沒有答案，又怎麼忍心鼓勵學弟妹投入呢？

因之，對於蘇蘅（2021）教授這篇專文〈新聞教育在臺灣的轉變：政治大學新聞學系的發展與省思〉，我是帶著追憶、探索與對照的複雜思緒來閱讀的。我想找出政大四年的學習，對我日後從事新聞工作有什麼影響？我也想以自己在報紙 30 多年的經驗，對比學校教育的發展過程，試著探求其中的落差，希望有助於未來的新聞教育。

從蘇教授的專文瞭解，政大新聞系從草創到茁壯，影響最大的有兩人，一位是把美國密蘇里新聞學院新聞學理論引入的創系主任馬星野先生，另一位是倡導

* Email: cl.huang5091@gmail.com

JCRP 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成舍我紀念館 Cheng Shou-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Ainosco Press

博雅教育、創立集選制度與輔系制度的徐佳士先生。我就讀時馬星野先生已經不在學校，對於文中描述的美式新聞理念的氛圍，坦白說大學四年並沒有深刻感受到。當時正是戒嚴後期，黨外運動方興未艾，但相比臺大的勇敢衝撞，政大要保守許多，新聞系也不例外。記得大四時有一堂課，曾和老師為了應否解嚴發生爭辯，事後還被系主任叫去訓了一頓。

剛進政大頭一年，我對學校其實蠻失望的。雖然新聞系是我的前三志願，但大一有許多共同課如國文、中國通史、國父思想等，師資都不怎麼樣。有些老師顯然是靠關係進來任教的（或者說學校要借重他們的政治關係），但官大未必學問大。還好政大上課不點名，遇到不喜歡的老師，我可以溜到圖書館看自己的書。

至於新聞系的專業課程，如採訪寫作、新聞文選、世界新聞史、傳播理論等，我也不甚滿意。主要是專任老師都沒有實務經驗，上課內容與現實脫節得很厲害，一本教學手冊泛黃了還在教。印象中只有「世界新聞史」這門課，讓我有比較大的收穫。我從小喜歡歷史，李瞻老師編的世界新聞史，介紹許多西方無冕王的精彩事例，讓我油然萌生「大丈夫當如是」的壯志，要以新聞作為一輩子的志業。

當時政大有些課也找媒體主管來兼任，他們大都來去匆匆，或因忙碌而須調課。其中張任飛老師和殷允芃老師，留給我比較深的印象。張老師創辦的《綜合月刊》是當時很叫座的刊物，他常在課堂上以《讀者文摘》為例，強調文字精簡的重要，讓我受益良多。殷老師是《天下雜誌》創辦人，雖然她教的是新聞英文，卻開了一堆中文書單，記得連高陽的《紅頂商人胡雪巖》都在其中。當時雖看得津津有味，卻不免納悶：上新聞英文為什麼要看這種書？等到進入媒體工作一段時間，才恍然大悟這是要讓我們瞭解中國社會複雜的一面。

大二、大三開始有輔系及專業分組。分組是新聞系配合媒體實務早有的規劃，當時共有「採寫」、「廣電」、「英文」及「廣告」等四組，我本來想選「廣電組」，但在甄選時就因國語不夠標準被刷下來，這讓我耿耿於懷了許久。從小看盛竹如播新聞，那種權威感讓我心嚮往之，偷偷把當電視主播當作志願。考上政大新聞時，以為距離目標更近了，沒想到卻因國語不標準無法如願。後來我選了英文組，但進入報界連一天編譯都沒當過。

輔系是政大新聞的特色，從蘇文介紹得知，原來是徐佳士老師的創舉。徐老師創設「集中選修」制度，精簡新聞科目至全部學分的四分之一，「規定學生在新聞系以外的政治、法律、經濟、國際關係和企業管理五系，任選其一修 20 學分的課，目的是要讓學生及早確立方向，並將他們訓練成專業記者」（蘇蘅，

2021，頁 12-13）。

當時我選了政治輔系，修過的課有呂春沂老師的「政治學概論」、荊知仁老師的「中華民國憲法」、華力進老師的「公共行政」、朱堅章老師的「西洋政治思想史」、江炳倫老師的「比較政府」、還有郎裕憲老師的「比較憲法」等，幾乎政治系名師的課我都上過。這些課程讓我眼界大開，對日後從事政治新聞報導與評論助益很大。確如蘇文指出，「徐佳士的集選制度具有博雅教育概念，使得師生視野開闊，知識與研究突飛猛進。」（蘇蘅，2021，頁 13）也一掃此前我對新聞系課程的失望。

輔系制度除了達到徐老師說的「讓學生及早確立方向，並將他們訓練成專業記者」之外，對於沒興趣或不想從事新聞工作的學生，也開啟了另一道門，我同班同學林安祺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她對新聞系專業課程沒興趣，也不想當記者，大學前兩年過得很不快樂。幸好有輔系制度，助她重新找到方向，她修了社會系大量的課，後來赴美專攻社會學，最後拿到哈佛大學博士學位。還有 34 屆學長徐偉初，專攻經濟輔系，後來獲得美國南伊大經濟學博士學位，成為財政學名師。記得我曾在畢業紀念冊上寫說：政大新聞就像一道旋轉門，讓所有進來的人無論喜不喜歡新聞，都可以找到走出去的方向，指的就是輔系的功能。

政治輔系雖然啟發了我對政治新聞的興趣，但影響我後來新聞工作最大的，則是大四下學期的一次助理經驗。當時學長魏誠要趕碩士論文，找我幫忙把《自由中國》的社論分類摘要，因為我的學分都已修得差不多了，空閒時間很多，就這樣天天跑社資中心看雜誌、記重點，看著看著竟然把《自由中國》從第一本看到最後一本。那還是解嚴前的 1980 年代初，禁忌待解未解之際，幾個月「苦讀」後赫然發現：原來當時社會上熱論的議題，如國會改選、地方自治、解除戒嚴、開放組黨等，《自由中國》二十多年前都已深入探討過，我們關注的所謂「新聞」，其實是「歷史」。《自由中國》像一扇窗，開啟我對新聞與歷史辯證關係的認識，也讓我下定決心日後要從事政治新聞與評論。

所以如果要問：政大四年對我從事媒體工作影響最大的是哪些課程？我的排序將是：「自由中國」、「政治輔系」、「新聞課程」、「專業分組」。除此之外，值得一提的還有實習制度。

實習是政大新聞系的必修課，最早叫「學生新聞」，1973 年改版為「柵美報導」，1993 年改名為「大學」。照蘇文的介紹，新聞系實習報「數十年來，雖因時空、定位而更改刊名及內容，但作為新聞系輔助教學的實驗報立場，提供學生學習、反思之精神未曾改變。」（蘇蘅，2021，頁 20）我很早就知道實習

的重要，大一時因為對系上課程失望，決定「自我救濟」，向外發展。當時報導文學正流行，有一回跑去找作家古蒙仁，受到他的啟發，大一寒假就一個人到嘉義奮起湖原住民部落駐點。升大二的暑假我參加救國團幼獅新聞營，記得師資有《中國時報》的金惟純、《自立晚報》的楊堯等人，同梯同學包括常玉慧、袁乃娟、紀惠容等。兩次「實習」雖然沒留下什麼作品，但也種下我在一年後決定參加《聯合報》的建教合作計畫。

當時《聯合報》是報業龍頭，為了培養新聞人才，總管理處規劃了建教計畫，由劉潔先生督導，馬冀伸老師執行，參與的學校除了政大，還有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及東海大學。我那一年三校共有7位同學報名參加，最後考評我僥倖得了第一。成為建教生後，報社除了全額補助大學四年學雜費，每月還提供五千元的生活津貼，以及寒暑假實習機會，實習時另有津貼，可見當時報社營運狀況有多好。

大三、大四寒暑假我都去《聯合報》實習，從市政組、社會組、國際組、編輯組、專欄組、經濟組、政治組，幾乎所有編輯部的單位都待過，很少人像我這樣，學生時期就已全面瞭解編輯部的運作。日後我有幸當過三個報紙的總編輯（《中時晚報》、《中國時報》、《旺報》，其中《旺報》是創報社長兼總編輯），還曾是最年輕的大報總編輯（35 歲在《中時晚報》、40 歲在《中國時報》），不能不說是《聯合報》建教實習打下的基礎。不只我，建教前期學長黃素娟、羅國俊也都當過《聯合報》總編輯，可見這套計畫確實發揮功效。

談到實習的收穫，不能不提及歐陽醇老師。歐陽老師是我們當時的實習指導老師，他是老報人，早年當過《中國時報》總編輯，經驗豐富不說，對學生尤其充滿愛心，每次返校與他座談都是收穫滿滿。我雖沒上過歐陽老師的課，但終身奉他為師，畢業後我們仍常聯繫，他是一位令人懷念的老師。

以上所述都已是陳年往事，或許起不了什麼前瞻未來的作用。不過媒體產業巨變，數位匯流固然已是趨勢，實習制度讓學生「做中學」，輔系制度擴大學生的專業領域，我的經驗應當還是有參考價值的。

最後要談關於媒體產業的轉型與新媒體的探索。正如蘇文描述，1980 年代後期報禁解除後，政治對媒體的箝制逐漸鬆綁，「歷經戒嚴的新聞工作者多半以報導公共議題為己志，組織改而重視記者的專業自主，使得當時的新聞工作屬於薪資佳、福利優渥，且記者能藉由認真經營某一路線，取得同事與同業的認同及讚賞，經驗交織成的尊嚴與榮光，構成他們對新聞專業的想像。」（蘇蘅，2021，頁 15）確實，如果把實習階段算進去，我應該是 1981 年開始跨入實務界，從那時到 1990 年後期可說是臺灣報業最輝煌的時期，媒體作為輿論公器的角色

益發凸顯，許多媒體人都是以終身志業來看待這份工作。

但也誠如蘇文所說，「1990 年代後期媒體私有化政策成為主流，媒體產業加速朝向寡占競爭與集中化。新聞傳播環境受市場的影響與日俱增，2002 年三家無線電視臺晚間娛樂新聞出現明顯『市場導向新聞』；2003 年香港《蘋果日報》在臺創辦，以完全市場邏輯為基的商業模式，使得原本力求恪守傳統專業意理的新聞媒體面臨複雜處境，一如歐美媒體受市場資本主義作為媒體編採政策指南，離 20 世紀初甫樹立的新聞專業與實踐愈來愈遠。」（蘇蘅，2021，頁 16-17）當中一個關鍵的轉變來自有線電視的無序開放，開放之初政府並未考慮自由競爭與市場規模的問題，導致頻道充斥、良莠不齊，很快墜入羶色腥的深淵，三家無線臺跟著「沈淪」。不僅如此，有線電視市占率的擴張，也侵奪了報紙的廣告基盤，等到港媒入臺，一切就完全變樣了。

蘇文提到，這段時間「政大新聞系師生除了撰文批判外，也投入社會運動，形成督促媒體改造的力量。」（蘇蘅，2021，頁 17）當時我在實務界擔任主管，明顯能感受到來自學界對媒體的「敵意」。學界督促媒體本是好事，比較可惜的是，不管是「媒體改造學社」、「臺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或「無線電視民主化聯盟」等組織，都比較集中於批判媒體報導亂象，少有針對市場結構與市場規模問題進行探究，但照我看後者才是亂象的導因，前者只是必然的苦果而已。

再者，蘇文提到「進入數位時代，新聞業明顯轉變，媒體匯流趨勢出現，新聞工作受到科技演進不斷挑戰，加上傳送新聞給閱聽眾方式改變，在在顯示新聞學院數十年變化有限的教育模式需要大幅改革。」（蘇蘅，2021，頁 17）蘇文的重點在於新聞教育如何因應科技的挑戰，相對地我從實務界的角度，更關注的是傳統媒體如何因應新媒體的挑戰；畢竟唯有找出媒體產業的生路，媒體教育才有未來可言，可惜臺灣媒體教育界在這方面的探討殊少。

或許就是源於這份對報業的不死之心，2005 年初，我從《中國時報》總編輯卸任，5 月就到東京進行為期三週的媒體考察，先後拜會《朝日新聞》、《讀賣新聞》、《日本經濟新聞》、日本電視臺、NHK、共同通訊社、博報堂廣告集團、電通總和研究所、日本雅虎及 J-WAVE 廣播電臺等媒體機構，除了與日本同業交流，最主要就是想瞭解他們如何面對新媒體的衝擊。

2006 年秋天，我前往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東亞所進修，最關心的還是媒體發展。趁著人在紐約之便，課餘之暇常到新聞學院旁聽，也多次造訪學院內的新媒體中心。我甚至跑去商學院旁聽，希望找出傳統媒體如何肆應新媒體挑戰的他山之石，可惜收穫有限。我也曾到彭博社（The Bloomberg

News）總部參觀，請教美國《商業週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總編輯對新媒體前景的看法，感覺都只是隔靴搔癢。隔年秋天我從紐約轉到華府，進入布魯金斯學院擔任訪問學者，還是離不開媒體研究與觀察，曾先後和兩家網路媒體 *Polotical.com*、*The Nelson Report* 總編輯有過長談。

2008 年返國後，我把前述美、日媒體的考察與反思，寫成《報業還有明天嗎？——美、日、中媒體發展觀察》，由卓越新聞基金會獎助出版，並蒙基金會董事長陳世敏老師寫序。陳老師形容我的書「及時彌補了傳統報紙產業轉型所需要的基本資訊，對於已經陷入困境的報紙、報人、第一線編採從業人員，都有很大的參考價值。」（黃清龍，2009 推薦序文）又說：「書中談報業專業的未來，在我看來，是以他的一己之力，做整個報業同業團體、傳媒智庫應當做的策略思考工作。」（同上引）給我很大的鼓勵。

個人從事報紙工作 30 多年，歷經《聯合報》、《首都早報》、《自立晚報》、《自立早報》、《中時晚報》、《中國時報》、《旺報》等不同媒體，對於臺灣報業由盛而衰的曲折軌跡感受至深。尤其任職過的報紙，竟有三分之二已經從市場上消失，毋寧更有著滄海桑田的感慨。希望我的一點個人經驗，有助於學界推行新聞教育的參考。

參考書目

黃清龍（2009）。《報業還有明天嗎？——美、日、中媒體觀察發展》。臺北：巨流。

蘇蘅（2021）。〈新聞教育在臺灣的轉變：政治大學新聞學系的發展與省思〉，《傳播研究與實踐》，11（2）：5-36。https://doi.org/10.6123/JCRP.202107_11(2).0002

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11 卷 第 2 期．頁 185-219．2021 年 7 月
DOI:10.6123/JCRP.202107_11(2).0010

陸生在臺之網路使用行為及其趨勢研究

單文婷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廣播電視學系副教授

朱灼文 *

中國文化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副教授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廣播電視學系暨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兼任副教授

摘要

離開網路審查嚴密的中國大陸，來臺陸生能長時間使用不受限的網路收發資訊。在 2014、2016 和 2018 年，本研究各用一次佐以問卷調查的集體訪談，來探討他們來臺前、後的網路使用行為，結果發現陸生來臺後會大幅增用大陸封禁的臺灣或國際主要網站，並減用功能類似的大陸網站，而這種現象在三個調查時期並沒有顯著變化。陸生上網行為轉變的原因包括使用與滿足理論預測的社交、娛樂和生活等需求，對政治敏感議題的好奇則是另一重要因素。訪談結果也顯示陸生對臺灣自由的傳播環境之評價不高，而隨著兩岸關係的變化，晚近訪談中陸生的戒心日益明顯，其所反應的在臺上網體驗也每況愈下。

關鍵詞：網路使用、網路審查、來臺陸生、兩岸關係

* Email: chowen@ntu.edu.tw
投稿日期：2020 年 8 月 6 日
接受日期：2021 年 5 月 10 日

JCRP 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含我紀念館 Cheng Soo-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Ainosco Press

壹、大陸的網路傳播與陸生來臺

本世紀初中國大陸的網路媒體經歷了高度商業化的成長和發展，市場邏輯似有凌駕黨國管制之勢。網路上大陸人民彷彿一度取得了話語權，時有超過官方的聲量；在部分時事議題中，網路消息甚至成為傳統新聞報導的根據。網際網路擴大了公眾的視野，也讓他們更容易發表自己的觀點和參與公共事務的討論，當這種討論累積到一定程度就會形成輿論壓力（展江，2016，頁 143）。外界也注意到大陸當局對網路管制的態度並非鐵板一塊，發展資訊產業與監管資訊內容的部門常因立場或利益相左而導致政策扞格，而且鋪天蓋地的全面管制也有技術和成本上的難處，因此中共長時間維持了相對彈性的網路管制政策 (Zheng, 2008)。在中國大陸的傳媒版圖裡，網路一度已成為黨性媒體與都市報之外的第三勢力，其於反映輿情、傳播異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並對愈年輕的世代具有愈強大的影響力。

然而北京奧運之後大陸進入新一波言論緊縮的週期，官方對包括網路在內的所有傳媒展開更嚴格的管控。在 2008 年之後的幾年內，許多原本可從大陸連上的國際網站都陸續被封禁。美國官方資助的非政府組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每年《網路自由報告》（*Freedom on the Net*）的各國自由度排行榜幾乎都由大陸敬陪末座；大陸的網路也早已被網友譏為「大型局域網」，因此許多用戶都有「翻牆」去瀏覽被封鎖網站的經驗。專門研究大陸網路的香港中文大學副教授李治安估計有兩到三千萬大陸人用可翻越「防火長城」（Great Firewall）的虛擬私人網路（virtual private network，VPN）（斯影，2019 年 1 月 11 日），許多大陸網友也不諱言翻牆就是為了使用中共封禁的 Google、YouTube 或 Facebook 等國際知名網站。大陸「90 後」（1990 年後出生的世代）曾經拜網路之賜而便捷地接收各種知識，他們對自由民主、權利維護和公共參與的認識也比上一世代顯著提高，因此對近年壓抑的網路環境應該最有感觸（樓啟煒，2011，頁 59）。

這些 90 後、甚至是 00 後的大陸青年來臺後能使用基本上無限制的網路服務，那麼其網路使用和體驗是否會與在大陸時有所不同？而在兩岸關係因太陽花學運、馬習會、民進黨重新執政而跌宕起伏的這幾年，不同階段的來臺陸生是否會有相異的網路行為？這些都是本研究所關注的主題。臺灣的大學校院陸生聯招會之數據顯示，自從 2011 年開放陸生就學後，第一屆來臺註冊者為 928 人，並成長至 2015 年的最高峰 3,019 人；2016 年註冊人數開始下降，至 2019 年已跌至 2,259 人。大陸當局在 2017 年開始主動限制陸生來臺名額，例如大學部陸生名額

從 2015 年最高峰的 2,134 名減少到 2019 年的 800 名；2018 年大陸教育部還將分發學生到兩岸的大學改為同時進行，增加了臺校招生的難度；2020 年臺灣和大陸先後因防疫而暫停部分陸生來臺，這或許是陸生政策進一步緊縮的前兆。值此政策前景不明之際，我們也希望本貫時性研究（diachronic approach）能為這些年的來臺陸生留下更立體的剪影。以下兩節將先後整理使用與滿足理論對移民或留學生網路行為的分析，以及大陸留學生在境外上網的相關實證研究，以作為後續研究設計的理論基礎。

貳、異鄉人對網路媒體的使用與滿足

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裡，有愈來愈多人為了學業或工作而需要長時間離開祖國。移居海外通常會減弱人們與家鄉親友間長期建立起來的關係，移居者也需要花時間在新國度建立新的社交網絡 (Adelman, 1988)。他們的社交生活容易遭到孤獨感的挑戰，對他們個人發展至關重要的社會支持也可能較為薄弱 (W. Chen & Choi, 2011)。有別於傳統媒體，網際網路超越了大眾傳播和人際傳播的界線，讓使用者可以搜尋資訊、獲取娛樂，以及拓展或維持人際關係。如今，愈來愈多人運用網路來取得或提供鼓勵、理解與同情，以舒緩焦慮等負面情緒 (W. Chen & Choi, 2011; Walther & Boyd, 2002)。研究也發現透過網路的情感支持在各方面都能促進移居者更融入新的社會環境 (W. Chen & Choi, 2011)。

傳播相關研究已顯示人們會使用媒介去滿足他們求知、娛樂、回憶、社交、逃避、陪伴，以及打發時間等不同需求 (Rubin, 1981; Ye, 2005)。欲解釋人類的媒介使用模式時，最有用的理論框架之一是「使用與滿足理論」（uses and gratifications theory），這項基於社會心理學的理論試圖具體認識人們使用媒介的原因 (Rubin & Rubin, 1985)。不同於強調媒介相對於觀眾具有更大權力的社會學視角理論，早期的使用與滿足理論一再強調個體閱聽人在使用媒介的主動性。持此論者相信，消費媒介內容可以滿足人類認知、情感、社會互動和逃避現實的需求 (Katz et al., 1973)。Katz et al. (1974) 指出，使用與滿足理論注重閱聽人需求的心理與社會根源，該根源導致了對媒介的期待以及不同的媒介暴露模式，最終則達成需求滿足或預期之外的結果。

使用與滿足理論原先認為閱聽人是一個主動的群體，這個觀點後來被批評為過度簡化，因此在 1980 年代相關學者重新評估並修改了該理論中的閱聽人概念 (Levy & Windahl, 1984)。人們雖然會選擇和利用媒體來滿足他們的期待，但這

些期待可能來自個人特質、社會環境或此二者的互動結果 (Rubin, 1994)。現在該理論中的閱聽人被認為是「在不同程度上主動——但並非個個都主動」，或者可以說，並非每一個閱聽人「在所有時刻都一樣主動」(Rubin, 2002, p. 534)。正如 Rubin (2002, p. 541) 所言，使用與滿足理論「在我們試圖瞭解更新、互動性更強的媒介環境時顯得更有價值」，因此該理論被認為是非常適合探討網路傳播之行為與心理傾向的分析框架 (C. A. Lin, 1999; Ye, 2005)，其閱聽人中心視角契合了用戶在使用網路過程裡的主動地位，學者們已多有利用該理論去理解人們如何與為何使用網際網路 (Althaus & Tewksbury, 2000; Wang, 2006)。

主張使用與滿足理論的學者相信，媒介使用與動機緊密相關。這些動機促使用戶有目的地選擇特定媒體和內容來消費，以滿足其心理需求 (Katz et al., 1974; Wang, 2006)。Rubin (2002) 將使用媒介的動機歸結為兩大取向：「工具性取向」（instrumental orientation）和「儀式性取向」（ritualized orientation），前者是指主動和有意圖地使用媒介以滿足諸如獲取訊息等需求，後者則包括運用媒介以轉移注意力或打發時間。相較於儀式性的使用，工具性地使用媒介會產生更強的態度或行為效果，因為它涉及有目的的內容選擇和媒介訊息涉入 (Wang, 2006)。相對於電視閱聽人，網路用戶的上網行為更具主動性，因為他們更需要自行決定想看的訊息形式和內容。有研究發現網路除了滿足用戶娛樂和互動的需求，逃避現實也是其重要功能之一 (C. A. Lin, 1999)；Greenfield (1999) 則注意到網路對調節使用者的情緒卓有成效；另有調查顯示 29% 的受訪者宣稱他們上網是為了改變情緒或逃離現實生活 (Ye, 2005)。因此，網路使用中的工具性取向似乎也不宜高估。

移居者會將關於母國的記憶帶到移居國，所以他們不只會消費移居國的媒介內容，也仍會持續消費母國的媒介以滿足其情感上的需求。Branco (2018) 用問卷調查和深度訪談來研究葡萄牙之尼泊爾移民對媒體的使用與滿足，她發現媒體使用能幫助移民調和來自不同文化的價值和習俗以形塑新的認同，並在促進移民適應新的生活場域之同時維繫他們和家族與傳統文化間的紐帶。跨國遷移時移居者通常傾向於使用傳播媒介與母國保持文化、社會，甚至是經濟與政治的聯繫，這些媒介包括電話、衛星電視以及後來居上的網際網路 (Yin, 2015)。在英美等有許多移民的國家，主流媒體之外還有專為某國移民服務的民族媒體（ethnic media），例如美國的華文報紙《世界日報》和西語電視臺 Univision。在網路崛起之前，對民族媒體內容的消費讓移居者在融入新社會之餘，也能保留部分的民族記憶和身分認同 (W.-Y. Lin & Song, 2006)。然而民族媒體其實具有二重性

（duality）：它們一方面讓移居者維持對故國語言和文化的接觸，但也不時暗示閱聽人已身處於一個新的國度——就跟民族媒體業者自身一樣 (Yin, 2015)。

國際學生的定義是在母國以外國家求學的學生，作為一個實踐跨文化生活的特殊群體，國際學生一直吸引了不少傳播學者的關注。網際網路深刻地影響著國際與跨文化交流，其高速、低成本、互動性、虛擬性以及多媒體兼容性都讓它成為國際學生通訊的第一選擇 (X. Chen, 2004, October; Wang, 2006)。如今透過網路，愈來愈多國際學生能接觸到原汁原味、未經修改的母國媒體（homeland media）內容。移居國的民族媒體通常具有地域性——畢竟它們是為了移居海外某國之使用者所專設的，而母國媒體則以主要使用者為國民的前提來設計內容，因此兩種媒介對移居者的閱聽體驗、文化實踐與身分認同之影響是各異其趣的 (Yin, 2015)。Elias & Lemish (2011) 以焦點團體和半結構式深度訪談來調查以色列和德國的數百名俄羅斯移民，他們發現移居國媒體、母國媒體和全球性媒體各以不同的方式協助移民向內整合與向外整合，前者是指家庭中的母國文化傳承，後者是指適應移居國的新文化。

Nedelcu (2012) 研究旅居多倫多的羅馬尼亞專業人士家庭之網路使用行為，她指出當代的資訊通訊技術（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ICT）連結了多樣的生活形態、提升了運用他者性（otherness）的能力、促進了超越國界的社會化，從而萌生新的跨國慣習（transnational habitus）。這種跨文化的媒體使用現象讓人們開始注意到網路空間在「消弭國家疆界」的作用，Morley & Robins (1995, p. 87) 認為這顯示了「全球化時代裡的領土或地域不再是支撐我們身分認同的有力因素」。國家疆界的鬆動是全球化對文化的重要影響之一，網路傳播可說是這三十年來文化全球化的主要技術動力。

母國媒體雖然能夠維持移居者對故鄉文化的記憶和認同 (Jeffres, 2000)，但若長期過度倚重母國媒體，可能也會導致跨文化適應的障礙 (Ye, 2005)。所幸網路本質上是一種中性的傳播工具，以青少年居多的國際學生對它的運用也很靈活，例如國際學生既會利用網路來與相同族裔的學生維持關係，也會用其與當地學生建立新關係 (Sawet et al., 2012, June)。有一項針對在美國的東亞大學生之調查也發現，他們使用英語網路媒體多於使用母語網路媒體；該研究還歸納出他們上網的三大動機是搜尋訊息、娛樂放鬆以及社會交往 (Ye, 2005)。另外 Hossain & Veenstra (2017) 採用線上問卷調查了美國 535 名南亞成年移民對社群媒體語言的使用與滿足，結果顯示他們在母國網站偏好用母語，用英語則是為了滿足情感調適的需求。

在年輕世代中盛行的社群網站讓國際學生多了一項聯繫母國親友的選擇。社群網站讓異鄉學子可以輕鬆地發布那些記錄自己生活的文字和影音，這些線上紀錄也讓其母國親友能便利地得知他們的現況 (Park et al., 2014)。隨著社群網站的用戶基礎大增，參與方式也愈來愈多元。Valenzuela et al. (2009) 關於 Facebook 社團和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的研究顯示，很多學生會利用社群網站進行公共參與（public participation），而不僅止於社交活動。Halperin (2018) 表示社群媒體與智慧型手機等新傳播科技會賦權給旅英巴勒斯坦人，增加他們的國際能見度，並強化團體中的民主價值觀。Junco (2012) 的調查則發現，除了社交，學業出色的學生還會花不少時間在社群網站上蒐集和分享資訊。因此，國際學生的網路行為和動機不一而足，從使用與滿足的角度分析個案才能比較貼近現實。

參、大陸留學生在境外的網路行為

學生是海外大陸網友中一個頗具代表性的群體。一項對在美國的 268 名大陸學生之調查發現，其使用網際網路的主要動機是搜尋資訊、社交、娛樂和試圖保留自己對母國的民族認同，而且透過網路重度消費母國媒介內容的學生具有更高的生活滿意度和更低的沮喪度 (Wang & Quan, 2013)。也有研究顯示，使用中國大陸網路媒體其實有助於留美學生或學者多元地融入美國社會 (Melkote & Liu, 2000)。

有實證研究指出，在美國居住的時間長度與使用大陸網路內容的程度呈負相關 (X. Chen, 2004, October)。Wang & Quan (2013) 對這個現象的解釋是，移民或旅外者在美國停留的時間越長，他們在當地社交網絡的發展就越完善，因此他們也比較不需要母國的媒體來滿足他們尋求情報和社會支持的需求。另有對東亞留美大學生的研究則發現，僅使用 Facebook 者比僅使用母國社群網站或兩者都使用的人有較小的文化融入壓力和更好的心理健康狀態 (Park et al., 2014)。一項探討香港陸生文化適應（acculturation）的研究則收集了 447 份有效問卷，統計結果顯示報紙、電視等傳統媒體可以促進陸生在知識瞭解和行為參與方面的文化適應，網路則能促進其於態度看法和行為參與方面的文化適應（程楊等人，2013）。

大陸留學生出國前通常已會使用 VPN 等工具翻牆來獲取境外資訊；而在離開大陸後，他們可能又會需要從境外「逆翻牆」[1] 來獲取大陸網站的資源。Yang

1 國外的網路通常沒有封禁中國大陸的網站，因此「逆翻牆」只是呼應「翻牆」的文字遊戲，並不

& Liu (2014) 在其研究中指出，身處大陸的網路使用者翻牆而出主要是為了尋求訊息和進行社交，而身處美國的大陸網友回訪母國的網站則主要是為了獲得娛樂，他們會轉向諸如優酷等網站來尋找華語的影視節目，此外一些在國外需要花費的媒體內容也易於在大陸的網站上免費取得。

對於許多頻繁使用大陸網路媒體的海外留學生而言，居住國與母國之間的疆界被大大弱化了。如同他們在母國的同胞一樣，移居海外的大陸人也許很少能夠跳脫被高度審查的大陸媒體框架而自其他角度來看待事物 (Yin, 2015)。消費母國的網路媒體已經成為不少海外大陸網友的日常儀式，這幫助他們建立了強大的族內認同感，使他們覺得自己仍然是一個真正的中國人。[2] 很大程度上母國的網路媒體促進了 Billig (1995) 所謂的「日常的民族主義」（banal nationalism）之形成，這些媒體能夠讓母國的意識形態暢行無阻地傳播到海外移居者的日常生活中。祖國媒體的話語讓移居者以一種自然又舒適的方式繼續維持自己出國前的「中國人」身分，經常使用母國的線上媒體讓大陸的海外網友更傾向於認同中國而不是他們的居住國 (Yang & Liu, 2014; Yin, 2015)。

Yin (2015) 深刻探討了大陸的網路媒體如何重新構建和強化紐西蘭華人的身分認同。不同於海外的民族媒體，母國媒體一視同仁地把用戶視為國民，以共同的單一語言、文化和政治立場來傳達對國族的集體想像，這使得作為「真正中國人」的感受在海外大陸網友的身上得到延續。如果線上閱讀大陸媒體的新聞代表移居者與祖國之間的象徵性連結，那麼使用大陸蓬勃發展的社群媒體則把此連結的「真實性」推上了新高點。許多留學生或移民會發現自己常常因為發表對居住國的認同而在網路上遭到批判，我們可以說，在無疆界的中文網路空間裡，「中國人」這個身分或概念還是會遭遇持續的談判與重構。

除了可能面臨類似的「大陸人」身分再定位，陸生在臺灣的網路上也有機會發現以往被屏蔽的許多臺灣和國外資訊。陳重成（2008）從全球化的脈絡來觀察兩岸社會的互動，發現大陸人士的來臺經驗讓他們心目中想像的「符號臺灣」變成了真實臺灣，並且從臺灣民眾的「鏡像」裡看見了另一種中國大陸的形象。王嘉州（2012）則發現，透過接觸臺灣同學或新聞媒體，與臺灣文化互動愈深的陸生愈可能調整既有的認知，甚至開始認同臺灣文化；然而該研究也發現，多數來臺陸生仍以大陸媒體作為獲取新聞訊息的主要來源，而當陸生閱讀臺灣新聞的頻

存在真正翻越防火牆的動作。

2 Yin (2015) 的研究所稱之 “Chinese” 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臺灣也稱其「大陸人」，但在涉及國族主義的理論中「大陸人」的說法比較令人費解，故相關段落裡譯為「中國人」。

率愈高，其政治傾向就愈偏向支持「盡快統一」，此原因在於臺灣的媒體多半偏好報導大陸的負面新聞，不僅有違陸生心中對母國的既定印象，也影響其對於兩岸關係定位的認知。

在統獨立場的框架之外，臺灣朝野、學界與媒體牽涉大陸的論述也常有民主自由的規範性框架，這項框架在 2011 年後的各大政治事件中都沒有缺席，[3] 陸生就是在臺灣這種傳媒環境裡持續和自己本來的價值觀對話。一項深度訪談 20 名陸生的研究則顯示，陸生來臺後通常很快就能發現兩岸學生統獨立場的差異，這種認知衝擊反而讓不少本來嚮往臺灣民主的陸生轉向擁抱中共的意識形態；但因為怕得罪臺灣同學，加上來臺前被家人或國臺辦告誡應避談政治，所以陸生通常只在 Facebook 上分享與生活相關的狀態，對敏感議題則大多噤聲（徐宥嫻，2014 年 5 月）。汪宏倫、張可（2018）深度訪談和參與觀察 25 名在臺的陸籍學位生，並以制度、認識框架與情感結構來分析他們留學期間對「國族問題」的經驗，結果發現這些在臺經驗對多數陸生的推力大於拉力，亦即增加了他們對臺灣的反感與對中共體制的認同。

自以上的理論和文獻觀之，陸生來臺後或許會繼續使用母國媒體，他們也可能不會這麼輕易地就認同臺灣的民主自由，但是在其他面向上是否還有一些目前不起眼的轉變正在發生？本研究將調查陸生來臺前後使用各網站的時間差異，特別是他們在臺灣多常使用在大陸被封鎖的網路媒體。具體的假設包括陸生來臺後使用大陸網路媒體的時數變少、使用臺灣網路媒體的時數變多、兩者呈負相關、且兩者的變化幅度和來臺月數與調查的年代有關（精確的假設牽涉一些本研究的術語，請見下一節及其中的表 2）。本研究還會試圖探索使用量變化的原因及影響，以便更具體地瞭解在臺陸生網路體驗所產生的意義（完整的訪談題綱可見下一節的表 4），進而反思網路行為的解禁是否真能帶來意識形態的解放，並希望研究結果能有助於洞察未來兩岸傳媒和網路文化的發展趨勢。

肆、研究方法

前述對使用與滿足的理論梳理使本研究將聚焦於人們透過媒體做了什麼，而非效果研究關心的媒體對人們做了什麼。當媒體縮限至網路，先前的討論也讓我

3 從反媒體壟斷運動、太陽花學運、占領中環和雨傘運動，到反修例運動，無論臺灣的國、民兩黨、大學院校、新聞評論員、藝文界或網路紅人，都發出過許多強調臺灣民主價值，甚至呼籲大陸政治改革的聲音。

們知道閱聽人對此媒體的主控能力更大，個人使用它的私密性和自由度更高，人們不但能獲得更客製化的參與、互動和滿足，甚至能在擴大的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裡強化其自我表達與自我實現。Halperin (2018, pp. 17-19) 認為除了使用與滿足理論所關注的閱聽人需求，他們對媒體訊息的詮釋也很重要；雖然該理論重視個別閱聽人的主體性和能動性，但兩級傳播模式（two-step model）中的意見領袖對人在異鄉的群體也有不容忽視的影響力——特別是在公共議題方面。Halperin 以偏向行為主義的使用與滿足理論來探索巴勒斯坦移民的媒體使用模式，但也自覺該理論雖長於探討個體動力，卻容易錯失關於群體動力的線索，這個反思可以呼應本論文兼顧個體和群體的研究設計，亦即用問卷調查的量化方法探討「使用」，用集體訪談的質化方法探討「滿足」，以試圖瞭解陸生使用網路媒體的多層次行動和心態。

因取得陸生完整名單有其難度，故本研究採取便利抽樣（convenience sampling），先號召有意參與訪談的陸生進行線上問卷調查（online survey），再舉行集體訪談（group interview）來當面獲取更豐富的意見回饋。作為來臺陸生網路行為變遷的初探性研究，用問卷輔以訪談的方式應可較有效率地取得兼顧廣度和深度的資訊。本研究的另一特色是每隔約兩年對不同梯次的陸生施用類似的調查兼訪談，先後共三輪（如表 1），以期在較長的時間跨度下觀察到更全面的陸生樣貌。[4] 第一與第三輪集體訪談的陸生都是銘傳大學的大三交換生；[5] 第二輪訪談的陸生則來自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東吳大學、中國文化大學與開南大學，雖以大三交換生為主，但也有少數大學部和研究所的學位生。由於有些填答問卷的學生沒出席集體訪談，也有些參加集體訪談的學生沒有填答問卷，又或者有學生填

表 1：研究施行紀錄

訪談日期	地點	集體訪談陸生數	線上調查有效答卷數
2014/1/2	銘傳大學傳播大樓	73	63
2016/5/30	臺灣藝術大學影音大樓	38	40
2018/5/8	銘傳大學傳播大樓	31	23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註：線上問卷調查以 Google 表單進行。

4 若無新冠肺炎（COVID-19）的影響，2020 年原本還會再辦一次集體訪談；後來又逢陸方暫停新陸生來臺，相關政策前景不明，遂先行做此發表。

5 根據教育部統計處的資料，銘傳大學 102 學年有 276 名大陸學位生，106 學年則有 553 名；另外作者估計該校 102 和 106 學年的大陸交換生人數分別為 350 人和 250 人左右。

答的問卷是無效問卷，所以每輪研究的有效答卷數和與談陸生數不一定一樣。

在每一輪的問卷調查中，我們列出了中國大陸和臺灣多個重要網路媒體類型（含國外網站的臺灣分站），讓受訪者填答這次來臺灣學習之前，和之後對某類網路媒體「每日平均使用的時間長度最接近何者」（這是問卷的確切用語）。在難以取得陸生來臺前後精確電信數據的情況下，他們若記憶不精準會是本調查的主要誤差來源。本研究在設計時即發現若要填答者回想使用所有大陸網路媒體（或臺灣網路媒體）的總時數會相當困難，答案也可能很不精確，所以改採針對個別網路媒體類型來詢問使用時間的模式。因為受訪者要對不少網路媒體分別回想來臺前、後的使用時間，所以答案選項需設計得較為簡單和直觀，以減少棄答率。我們將答項設計為五級：「從未、0–6 分鐘、6–30 分鐘、30 分鐘 –2 小時、2–4 小時」，其各自的平均值「0 小時、0.05 小時、0.30 小時、1.25 小時、3 小時」即作為統計中各答項所對應的每日約略使用時數。總共 126 份的有效答卷有 26 份來自男性陸生、100 份來自女性陸生；省籍方面的樣本特徵顯示分別有 55 和 71 名陸生來自北方和南方省分；[6] 此外前人論文中很重要的來臺時間長度則被納入研究假設中的變項。問卷調查的研究假設如表 2。

為了便於之後的討論，本研究將「來臺前對某類網路媒體的每日使用時數」簡稱為「前用量」，將「來臺後對某類網路媒體的每日使用時數」簡稱為「後用量」，將「後用量減去前用量所得之時數變化」稱為「變用量」；來臺後使用時數增加則變用量為正，減少則變用量為負。根據前述的研究動機和文獻探討，本

表 2：問卷調查之研究假設

假設代碼	研究假設
H11-i-k	在 Zk 年陸生對 Xi 的後用量小於前用量。
H12-j-k	在 Zk 年陸生對 Yj 的後用量大於前用量。
H2-i-j-k	在 Zk 年陸生對 Xi 和對 Yj 的變用量呈負相關。
H31-i	陸生對 Xi 的變用量在 2014、2016 和 2018 年間有差異。
H32-j	陸生對 Yj 的變用量在 2014、2016 和 2018 年間有差異。
H41-i	陸生來臺月數和對 Xi 的變用量呈負相關。
H42-j	陸生來臺月數和對 Yj 的變用量呈正相關。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註：研究假設之代碼在其第一條橫線前加 0 即為相應虛無假設之代碼，例如 H42-j 對應的虛無假設為 H420-j，H2-i-j-k 則對應 H20-i-j-k，依此類推。

6 南北省分的界定按照中國傳統的地理分界，受訪者會根據其省籍被分為北方人和南方人。

研究提出了上表所臚列的假設。為精簡敘述，假設中的大陸網路媒體、臺灣網路媒體和訪談的年分分別以 Xi、Yj 和 Zk 代替，而這些代號的指涉對象可見表 3。值得注意的是本論文中「臺灣網路媒體」的精確意思應是在臺灣可近用的網路媒體。[7]

表 3 中的網路媒體名稱被實際用在了問卷之中，這些名稱通常是以某些知名網站[8]為例帶出一個類型的網站，以利問卷填答者理解和回想。[9] 三輪問卷共有十種主要網路媒體的類型：影片分享、搜尋引擎、新聞媒體、入口、社群、即時通訊的社群、百科全書、論壇、OTT 影音和直播，[10] 但排除了購物或遊戲等和本研究旨趣不符的類型。表 3 還顯示 Zk 所對應之三個訪談年分，由於技術和市

表 3：研究假設中的代號

西元年 Zk			大陸網路媒體 Xi		臺灣網路媒體 Yj	
Z1 = 2014	Z2 = 2016	Z3 = 2018	X1	優酷等大陸常用視頻分享網站	Y1	YouTube 等臺灣常用視頻分享網站
			X2	百度等大陸常用搜索引擎	Y2	Google 等臺灣常用搜索引擎[a]
			X3	大陸新聞媒體網站	Y3	臺灣新聞媒體網站
			X4	騰訊網等大陸常用門戶網站	Y4	Yahoo 奇摩等臺灣常用門戶網站
			X5	新浪微博等大陸常用社交網站	Y5	Facebook 等臺灣常用社交網站
			X7	百度百科等大陸常用網絡百科全書	Y7	維基百科等臺灣常用網絡百科全書
			X8	天涯等大陸常用網絡論壇	Y8	PTT 等臺灣常用網絡論壇
			X6[b]	微信朋友圈等大陸常用即時通信社交服務	Y6	Line 動態消息等臺灣常用即時通信社交服務[c]
			X9	愛奇藝等大陸常用 OTT 視頻平臺	Y9	Netflix 等臺灣常用 OTT 視頻平臺
			X10	鬥魚等大陸常用網絡直播服務	Y10	Twitch 等臺灣常用網絡直播服務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註：[a] 問卷皆有註明「並非在大陸可正常連線的 Google 香港」。

[b] 為把強調社交功能的服務放一起，本網站的代號刻意編在 X5 的後面，但它在 2014 年訪談前的問卷尚未出現；Y6 的考量亦同。

[c] Line「動態消息」在 2018 年底被公司改名為「貼文串」。

7 因為其中許多代表性的網站並非臺灣的公司，而是來自美國。

8 當時兩岸各類網站中 Alexa 流量最高的網站。

9 為符合問卷調查題目需精簡易懂的設計原則，各類網路媒體的用詞不採用列舉法（其實也難以列舉某類型的所有網站）；而其具體定義就是例子外的字面意義，例如 X1 就是「大陸視頻分享網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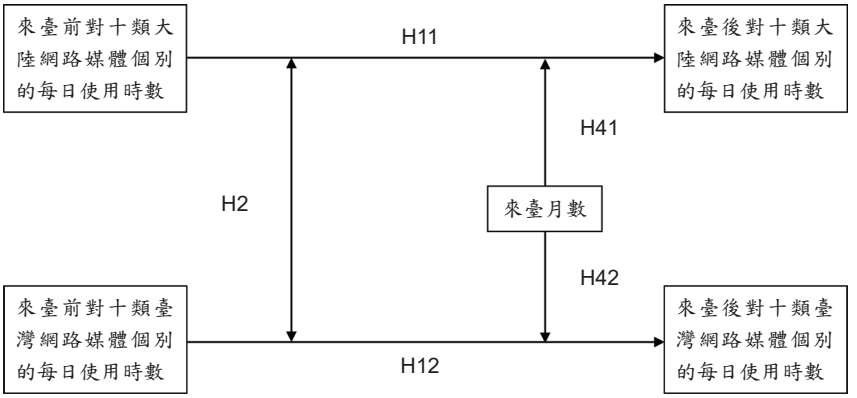
10 網站類型的用語在問卷和訪談中乃採大陸的說法（如「影片」改為「視頻」等），以利陸生理解。

場的演進，頭兩輪問卷內並沒有問及所有的 Xi 和 Yj，例如直播相關的 X10 和 Y10 就沒出現在 2014 和 2016 年的問卷中，表 3 也標明了這些涵蓋範圍的差異。因本研究會對每類網路媒體進行假設檢定，所以假設數量繁多，透過表 2 和表 3 即可用系統性的假設代碼來有序檢驗所有假設，例如「H2-8-5-2」對應的具體假設就是「在 2016 年陸生對天涯等大陸常用網絡論壇和對 Facebook 等臺灣常用社交網站的變用量呈負相關」。作為初探性的調查，本研究之資料分析採用成對樣本 *t* 檢定、皮爾遜積差相關係數分析以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等基本統計工具。除了較難圖示的貫時性趨勢假設（H31、H32），本研究量化部分的完整假設和變項關係可參見圖 1 的模型架構。

本研究質化部分所採用之集體訪談法是類似公眾座談會的一種訪談方式，由一人或少數幾人擔任主持人（moderator）並與參加者進行問答對話。相較於個人訪談或人數較少的焦點團體，集體訪談是一種能快速認識全貌的高效方法，而且經費的投入也較少。然而集體訪談法在適當的主持下也有一些類似焦點團體法的特徵，參與者可以像在現實生活中一般，既能達成某些共識，也能挑戰某些彼此的觀點，既能影響他人，也可能被他人所影響 (Gray et al., 2005)。不同於結構化的問卷調查只要求研究對象選擇限定範圍內的選項，訪談法較不容易被初始設計所限制，因此能透過受訪者的互動分享和語境產生較豐富的資料。此外，訪談法有利於與研究對象交流思想和感情，較適用於像本研究這種可能存在文化差異的對象。

使用與滿足理論強調閱聽人使用媒體的目的互異其趣，個別媒體並不能滿足

圖 1：歷年趨勢以外的研究假設示意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用戶的所有需求，人們會根據印象中各媒體滿足其需求的程度來調整對媒體的選擇，每個媒體也都在和其他媒體競爭看誰最能滿足閱聽人。延續文獻探討和量化的研究假設，集體訪談之題綱設計也關注兩岸十類網路媒體彼此對用戶的爭取，半結構式的提問將引導陸生回答其來臺前後網路使用變化的成因或目的（課業、生活、好奇、社交或求知等）、其所認知的兩岸各類網路媒體在內容、功能、和介面上的差別、在臺上網時看到印象最深刻的資訊，以及回大陸後是否還會想上臺灣網站等問題，以期瞭解在使用量此消彼長的現象背後有什麼發人深省的意涵。為瞭解每種現象的長期趨勢，三階段的訪談題綱大體上是一樣的，間或有少數現場提問會根據當時的問卷調查結果或時事而有所微調，具體的訪談題綱請見表 4。

伍、問卷調查結果

本節將根據回收的問卷答案對研究假設進行統計上的檢定。因問卷中的部分網路媒體名稱較冗長，此後的圖表和內文將採縮短版的名稱，例如「新浪微博等

表 4：集體訪談之題綱

一、若你來臺後有用 YouTube 等大陸用不了的視頻分享網站，請問原因為何？你覺得它們和優酷等大陸同類網路媒體有何差異？	六、若你來臺後有用維基百科（Wikipedia）等大陸用不了的網絡百科全書，請問原因為何？你覺得它們和百度百科等大陸同類網路媒體有何差異？另外也可分享對 Yahoo 奇摩知識 + 和知乎的不同使用經驗。
二、若你來臺後有用臺灣或美國谷歌（Google）等大陸用不了的搜索引擎，請問原因為何？你覺得它們和百度搜索等大陸同類網路媒體有何差異？	七、若你來臺後有用 PTT 等大陸用不了的網絡論壇，請問原因為何？你覺得它們和天涯等大陸同類網路媒體有何差異？
三、若你來臺後有用大陸用不了的臺灣新聞媒體網站，請問原因為何？你覺得它們和大陸新聞媒體網站有何差異？	八、若你來臺後有用 Netflix 等大陸用不了的 OTT 視頻平臺，請問原因為何？你覺得它們和愛奇藝等大陸同類網路媒體有何差異？另外也可分享對 Twitch 和鬥魚直播的不同使用經驗。
四、若你來臺後有用 Yahoo 奇摩等大陸用不了的門戶網站，請問原因為何？你覺得它們和騰訊網等大陸同類網路媒體有何差異？	九、總體來說，大陸和臺灣的網絡媒體或網絡環境給你的感覺有哪些不同（內容選材、輿論尺度、網民反應，以及網民互動等）？
五、若你來臺後有用 Facebook 等大陸用不了的社交網站，請問原因為何？你覺得它們和新浪微博或人人網等大陸同類網路媒體有何差異？另外也可分享對 Line 和微信社交服務的不同使用經驗。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大陸常用社交網站」改寫成「新浪微博等」、「PTT 等臺灣常用網絡論壇」改寫成「PTT 等」。本研究的顯著性水準為 .05，表格中的統計量會根據顯著性而標註星號。如前所述，有些年分的問卷沒有調查特定網路媒體，因此與其相關的數值在表格中為空白。

一、各類網路媒體使用時數在來臺前後間的比較

以成對樣本 *t* 檢定驗證 H11-i-k 和 H12-j-k 後發現：在 2014 年陸生對大陸新聞媒體網站、騰訊網等、優酷等、百度搜索等、新浪微博等的後用量小於前用量，對 YouTube 等、Google 等、Facebook 等、臺灣新聞媒體網站、Yahoo 奇摩等的後用量大於前用量；[11] 在 2016 年陸生對愛奇藝等的後用量小於前用量，對 YouTube 等、Line 動態消息等、Facebook 等、Google 等的後用量大於前用量；在 2018 年陸生對天涯論壇等、百度百科等、騰訊網等、微信朋友圈等、愛奇藝等的後用量小於前用量，對 Google 等、YouTube 等、臺灣新聞媒體網站、Facebook 等、Yahoo 奇摩等、Line 動態消息等的後用量大於前用量。各年分除此之外的受測網路媒體都是研究假設不成立。[12] 圖 2 各直條的上下端點分別為各年各類網路媒體的平均前用量或後用量，空心的直條表示來臺後使用量降低，實心者表示增加，各直條長度即為平均變用量，變用量數值皆被標出，其中不顯著的數值以斜體呈現；[13] 表 5 則列出了標準差和 *t* 值。總之，來臺前後使用時數有顯著差異的網路媒體中，大陸網站都呈現時數減少，臺灣網站都呈現時數增多。

二、大陸和臺灣網路媒體變用量之間的相關性

為了驗證研究假設「H2-i-j-k：在 Zk 年陸生對 Xi 和對 Yj 的變用量呈負相關」，這裡採用皮爾遜積差相關係數分析來檢定大陸和臺灣網路媒體變用量之間的相關程度。大陸網站和臺灣網站兩兩之間的相關係數 *r* 列於表 6，[14] 若 *p* 值達標且其相關係數是負數，則 H2-i-j-k 成立。值得注意的是 2014 年 YouTube 等和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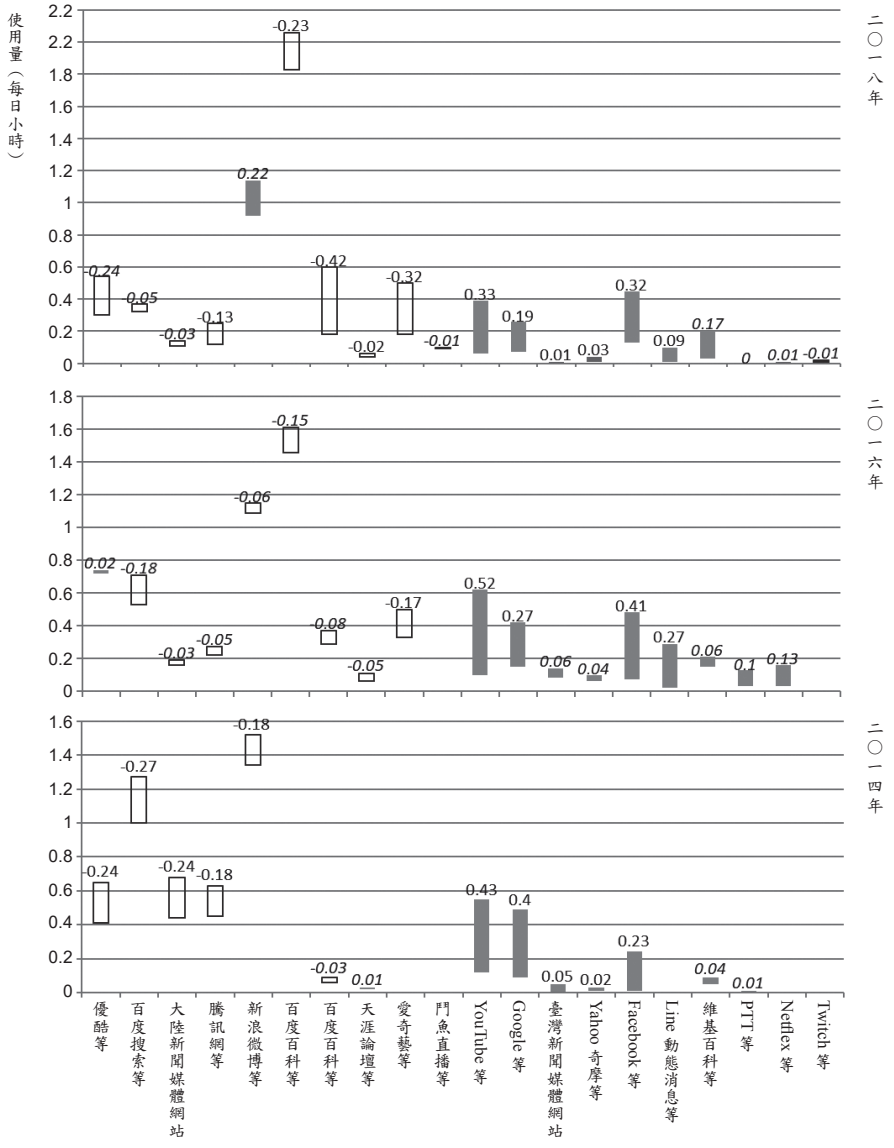
11 此處網路媒體的順序按 *t* 值的絕對值由大到小排列，亦即按來臺前後的差異程度由大排到小，本段落皆如此。

12 以下凡內文所列為顯著的受測網路媒體（或網站組合）之外者，其對應之研究假設皆不成立。因篇幅有限以下不再敘明。

13 陸生來臺前後的上網總時數可能會不同，各類網路媒體歷年使用量的增減也反映該媒體熱門程度的變遷。

14 因篇幅有限，只表列本段落有提及之網路媒體。

圖 2：前用量、後用量與變用量的平均值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註：空心的直條表示來臺後使用量降低，實心者表示增加。

類大陸網站顯著負相關，2018 年 Facebook 等和四類大陸網站顯著負相關。另外某些顯著負相關意味陸生對某類臺灣網站使用時數增加的同時，也在減少使用提供類似服務的大陸網站，這種組合包括了 2014 年的「優酷等 & YouTube 等」、

表 5：前用量和後用量之間的比較（單尾）

網路媒體	2014 年		2016 年		2018 年	
	標準差	*t*	標準差	*t*	標準差	*t*
優酷等	0.93	-2.03*	0.85	0.15	0.70	-1.64
百度搜索等	1.09	-2.00*	0.84	-1.33	0.20	-1.24
大陸新聞媒體網站	0.83	-2.27*	0.35	-0.51	0.30	-0.49
騰訊網等	0.66	-2.21*	0.27	-1.27	0.29	-2.26*
新浪微博等	0.79	-1.79*	0.87	-0.46	0.63	1.71
微信朋友圈等			0.77	-1.20	0.55	-2.05*
百度百科等	0.20	-1.19	0.49	-0.98	0.84	-2.43*
天涯論壇等	0.16	0.43	0.24	-1.30	0.02	-3.76***
愛奇藝等			0.38	-2.84**	0.86	-1.76*
鬥魚直播等					0.05	-1.14
YouTube 等	1.00	3.46***	0.99	3.32***	0.70	2.30*
Google 等	0.78	4.07***	0.63	2.72**	0.32	2.83**
臺灣新聞媒體網站	0.17	2.54**	0.39	0.95	0.03	2.01*
Yahoo 奇摩等	0.09	2.02*	0.23	1.08	0.07	1.84*
Facebook 等	0.65	2.79**	0.91	2.87**	0.77	1.99*
Line 動態消息等			0.58	2.99**	0.26	1.73*
維基百科等	0.18	1.62	0.51	0.70	0.56	1.47
PTT 等	0.03	1.47	0.45	1.46	0.02	1.00
Netflix 等			0.51	1.55	0.05	1.19
Twitch 等					0.05	-0.78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註：本表格之「標準差」為來臺前後使用時數變化量（即「變用量」）的標準差。

*p < .05, **p < .01, ***p < .001

表 6：兩岸網路媒體變用量之間的相關性（單尾）

年分與網路媒體	優酷等	百度搜索等	騰訊網等	百度百科等	天涯論壇等	愛奇藝等	鬥魚直播等
2014 年 YouTube 等	-.48**	-.23*	-.21*	-.29*	-.23*		
2016 年 PTT 等	-.01	-.11	.06	.03	-.82**	.11	
2018 年 Google 等	-.04	-.52**	-.43*	-.56**	.03	-.25	-.09
2018 年 Facebook 等	-.57**	-.15	-.20	-.38*	.04	-.40*	-.70**
2018 年 Line 動態消息等	-.82**	.05	.04	-.64**	-.25	-.66**	.03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p < .05, **p < .01

2016 年的「天涯論壇等 & PTT 等」，以及 2018 年的「百度搜索等 & Google 等」。其中「天涯論壇等 & PTT 等」的相關係數為 -.82、判定係數（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為 67.73%，為本檢定中最強的負相關；其他也達到高度負相關（$r \leq -.70$）的組合還有同在 2018 年的「優酷等 & Line 動態消息等」（$r = -.82$）及「鬥魚直播等 & Facebook 等」（$r = -.70$）。

三、各類網路媒體使用時數於來臺前後之變化量在不同年代之間的比較

為了驗證研究假設「H31-i：陸生對 Xi 的變用量在 2014、2016 和 2018 年間有差異」和「H32-j：陸生對 Yj 的變用量在 2014、2016 和 2018 年間有差異」，這裡採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來比較三個年代（各有 63、40 和 23 個樣本）變用量的差異程度。[15] 表 7 的統計數據顯示只有百度百科等的 F (2, 123) = 6.21 達顯著標準（$p = .003$），但其 Levene 變異數同質性檢定所得結果為顯著，意味其變異數非同質，故改採 Brown-Forsythe 平均值相等穩健檢定（robust test of equality of means），結果依然顯著，遂可進行 Games-Howell 事後多重比較，但比較後確認 2014 和 2016 年間的顯著性為 .84、2014 和 2018 年間為 .09、2016 和 2018 年間為 .18，皆未達顯著標準。

因為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和 Brown-Forsythe 檢定後都只有前述的百度百科等為顯著，因此其餘網路媒體無論其變異數是否同質都不可能顯著，至此可確定所有 Xi 所對應的研究假設 H31-i 和所有 Yj 所對應的研究假設 H32-j 皆不成立。換言之，即使過去幾年兩岸關係起伏不小，但陸生來臺前後使用本研究各類網路媒體的時數變化在 2014、2016 和 2018 年之間沒有顯著差異。

四、來臺月數與各類網路媒體變用量之間的相關性

以皮爾遜積差相關係數分析驗證研究假設 H41-i 和 H42-j 後發現：陸生來臺月數和對本研究所有大陸網路媒體的變用量未呈相關，但和對 YouTube 等、臺灣新聞媒體網站、Line 動態消息等的變用量呈正相關。受測陸生的來臺月數中位數為 8、平均值為 10.90、標準差為 11。來臺月數和這三類臺灣網路媒體使用時數的增加幅度只呈低度相關（modestly correlated）。表 8 列出了相關係數 r。

15 「微信朋友圈等、愛奇藝等、Line 動態消息等、Netflix 等」這四類網站對應的研究假設後半需修改為「在 2016 和 2018 年間有差異」，因為它們在 2014 年時未列於問卷；另外在 2014 和 2016 年都未列於問卷的「鬥魚直播等、Twitch 等」因各只有一組樣本而不存在對應的研究假設。

表 7：不同年代變用量之間的比較（雙尾）

網路媒體	2014 平均值	2014 標準差	2016 平均值	2016 標準差	2018 平均值	2018 標準差	Levene 統計量	*F*	Brown Forsythe 統計量
優酷等	-0.24	0.93	0.02	0.85	-0.24	0.70	0.46	1.20	1.37
百度搜索等	-0.27	1.09	-0.18	0.84	-0.05	0.20	6.11**	0.53	0.79
大陸新聞媒體網站	-0.24	0.83	-0.03	0.35	-0.03	0.30	5.90**	1.69	2.72
騰訊網等	-0.18	0.66	-0.05	0.27	-0.13	0.29	5.17**	0.80	1.22
新浪微博等	-0.18	0.79	-0.06	0.87	0.22	0.63	0.03	2.19	2.37
微信朋友圈等			-0.15	0.77	-0.23	0.55	0.11	0.23	0.28
百度百科等	-0.03	0.20	-0.08	0.49	-0.42	0.84	15.73***	6.21*	3.62*
天涯論壇等	0.01	0.16	-0.05	0.24	-0.02	0.02	2.07	1.32	1.57
愛奇藝等			-0.17	0.38	-0.32	0.86	7.41**	0.88	0.60
YouTube 等	0.43	1.00	0.52	0.99	0.33	0.70	1.31	0.29	0.33
Google 等	0.40	0.78	0.27	0.63	0.19	0.32	4.43*	0.99	1.36
臺灣新聞媒體網站	0.05	0.17	0.06	0.39	0.01	0.03	5.28**	0.31	0.32
Yahoo 奇摩等	0.02	0.09	0.04	0.23	0.03	0.07	2.38	0.17	0.17
Facebook 等	0.23	0.65	0.41	0.91	0.32	0.77	2.67	0.71	0.66
Line 動態消息等			0.27	0.58	0.09	0.26	4.59*	1.99	2.87
維基百科等	0.04	0.18	0.06	0.51	0.17	0.56	2.59	1.00	0.69
PTT 等	0.01	0.03	0.10	0.45	0.00	0.02	7.25**	2.03	1.89
Netflix 等			0.13	0.51	0.01	0.05	4.72*	1.10	1.91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p < .05$, **$p < .01$, ***$p < .001$

表 8：來臺月數與變用量之間的相關性（單尾）

大陸網路媒體	*r*	臺灣網路媒體	*r*
優酷等	.06	YouTube 等	.31**
百度搜索等	-.08	Google 等	.12
大陸新聞媒體網站	-.05	臺灣新聞媒體網站	.22*
騰訊網等	.16	Yahoo 奇摩等	.07
新浪微博等	-.07	Facebook 等	.18
微信朋友圈等	.04	Line 動態消息等	.28*
百度百科等	.18	維基百科等	.01
天涯論壇等	.05	PTT 等	-.03
愛奇藝等	.14	Netflix 等	.12
鬥魚直播等	.11	Twitch 等	.08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p < .05$, **$p < .01$

陸、集體訪談結果

本研究根據受訪者的各種意見萃取出有代表性或特殊意義的論點，受訪者原話內的括弧部分為來自研究者的補充說明。為恪守保障受訪者隱私的承諾、又為維持訪談研究的可信度，本研究以代碼指稱各受訪者，代碼的最後一位數字表示集體訪談的場次，例如 LXM1 就是參加第一輪（2014 年）集體訪談的一名陸生。相同代碼即指涉同一名陸生，沒有參與者重複出席過不同的集體訪談。以下各小節標題彙整自陸生發言的主流觀點。

一、YouTube 影片多元性和性能領先優酷

對境外娛樂的需求是陸生使用 YouTube 的主因之一，甚至在大陸時就開始用。ZL1：「歐美音樂在 YouTube 上資訊較多。」ZZZ2：「用 YouTube 可免費聽取音樂……也會用 YouTube 看 MV 或綜藝節目。」ZXY2：「我是追星族。韓國明星視頻在 YouTube 上比較多，所以會用淘寶買 VPN 來翻牆看。」LQY3：「很多優酷、騰訊的視頻因為版權問題在這裡〔臺灣〕不能播放，但是在 Youtube 反而能看。」YWL2：「用 YouTube 是因為想看陸劇，可是用大陸視頻網站看不到。」

但來臺後不愛用 YouTube 的人不少也同樣是因為對大陸節目的偏好。LL1：「YouTube 電視劇排序很亂，而且不能看到很多大陸節目。」YY1：「YouTube 更新很慢，比如我想看大陸電視劇都搜尋不到全部。」另一些對 YouTube 的抱怨則包括較嚴格的年齡和版權規定。ZXL1：「YouTube 註冊程序很複雜，規定要滿 18 歲才能申請，優酷就簡單多了。」ZZZ2：「YouTube 不方便使用的地方是有版權問題和某些影片會下架。」

許多陸生對 YouTube 的畫質和其他性能讚譽有加。LJQ1：「優酷的資訊比較不清楚，YouTube 的比較清楚，而且更新速度快、視頻畫質也較清晰。」LSS2：「YouTube 短篇較多、介面較乾淨。」YouTube 的廣告也被認為比大陸的視頻網站要節制。RC3：「YouTube……廣告〔到可按跳過的〕時間很短，短的只有 5 秒，最長的也只有 20 秒……；騰訊視頻、愛奇藝、土豆之類的視頻網站……5 分鐘左右的視頻就會有約 30 秒的廣告，5 分鐘以上或者到半個小時、一個小時長度的節目都會有 6、70 秒的廣告。」

上傳影片到 YouTube 相對容易。HYY1：「YouTube 上可以看到真實的東西〔用戶自己拍攝的〕，有草根聲音。民眾把 YouTube 當成自營媒體，可以隨意上

傳與收看。」ZXL1：「YouTube 的使用就自由多了，也不用審核。」CZF3：「大陸上傳影片到優酷比較不容易……它的審核週期比較長，而且審核相對更嚴格一些……超過三個工作日之後它就會告訴你『你的視頻有什麼問題，上傳失敗。』」

YouTube 有很多大陸視頻網站上看不到的影片，第一輪訪談很多陸生表示欲罷不能。TYJ1：「YouTube 跟優酷有一點不同就是可以看到許多『中國禁聞』，在大陸很多政治新聞是禁播的……還有許多關於非典〔SARS〕、法輪功、江澤民、胡錦濤的新聞，還有關於南京大屠殺、抗日戰爭的真實紀錄。」SJY1：「在 YouTube 有看過李敖的節目，他很多言論都在批判臺灣，很驚訝這樣的視頻可以在臺灣看到，這也顯示出臺灣可包容各種各樣的言論，這在大陸是不行的。」LXM1：「回大陸我會繼續使用 YouTube，用優酷就是看看連續劇，但是 YouTube 上有更多有趣的東西……而且看到很多大陸看不到的視頻，尤其是政治視頻。」

第二、三輪的陸生對大陸視頻網站的言論封閉性著墨略少。LSS2：「會看〔YouTube 上〕美國之音的焦點對話，這在大陸無法看到……回大陸會設法繼續使用 YouTube。」LFY2：「來臺灣後室友會傳一些關於大陸政治的視頻，會點開看是因為有興趣，不過沒看完，因為內容有點偏激。雖說中國政治的確有些問題，但也不能全都講負面的。有政治立場的視頻在中國看不到，這裡可以看，挺好的。」CYZ3：「Bilibili〔大陸視頻分享網站〕的彈幕會讓人有大家一起看的感覺……彈幕還是有一些關鍵字會被屏蔽。」

二、谷歌（Google）會讓你知道太多

百度資料之地域侷限性是很多陸生轉向谷歌的主因。YWL2：「搜尋臺灣資料或是別國資料用谷歌；搜尋大陸資料則用百度。」SYX1：「百度是大陸人看的，在大陸使用沒問題，但是在臺灣根本不夠用。」ZWJ1：「百度只有中文搜尋，谷歌是多國語言的，資料也是全世界的。」很多陸生仰賴谷歌提供的臺灣地理情報。LMXZ1：「在臺灣百度地圖完全空白〔誇飾〕，無法使用，所以使用谷歌地圖非常好。」RL2：「比較常用谷歌，因為搜尋旅遊信息、售票、景點後所得到的連結都比較官方，地圖在谷歌上也比較詳細；百度地圖的入口標示則比較不清楚。」SYX1：「谷歌有真實街景影像，這對我們是很新鮮的應用，但是不能看到大陸。」谷歌的搜尋效率、資料實用性與節制的廣告政策也讓陸生相當欣賞。WTY1：「來臺灣之後我已經把谷歌申請成為主頁〔首頁〕，搜尋速度很快。」

LLY1：「谷歌內容比較偏向技術性，百度比較娛樂。」DJL2：「谷歌廣告比較少，百度前兩條都是商家給百度錢的商業連結。」

第一輪訪談很多人熱烈地分享在谷歌上發現的新知。HZ1：「有很多不可能在大陸被看到的資訊都可以透過臺灣網站搜尋，例如六四、兩岸關係等等……我在谷歌上搜尋就會出現非常多的評論，各式各樣的說法都有，但是在百度上只有單一一種聲音。」WTY1：「來臺灣之後我有嘗試使用過去不能用的關鍵詞來搜尋……回大陸後會繼續使用谷歌。」XJC1：「有順口溜說：『百度一下，你就知道了；谷歌一下，你就知道太多了』……谷歌管的是內容，百度管的是腦袋。」

也有少數陸生對谷歌上的新知心存警惕。GYF1：「在谷歌上搜中國大陸的資料是從世界觀看大陸……很多資本主義國家的批判是不真實的，視頻與信息都不是真的，例如學運……百度本身的附加功能也很多，所以不會想改用谷歌。」在民進黨籍的蔡英文 2016 年就任總統後不久所舉行的第二輪訪談中，沒有陸生分享對谷歌新知的感想；在第三輪訪談中也很少，只有 CZF3 委婉地表示：「有很多資源在百度搜不到，在谷歌搜得到。例如限制級的電影，或法律不允許的電影。」

三、臺灣新聞媒體的新技術和新聞專業落後大陸

陸生普遍表示臺灣新聞業在新媒體的技術水準相對大陸同業要落後。HY1：「常看的蘋果日報、壹周刊和商業周刊沒有開發 App，用手機看電腦版的網站很不方便。大陸媒體如新華社、人民日報與南方周末都有 App。」RL2：「臺灣新聞的 App 使用後都刪除了……字體應該小一點，刷新快一點，而且版面廣告太多。」PP2：「大陸還有無界、澎派等新媒體，脫胎自大陸的報刊集團……會做全景圖、360 度、李克強微信對話，形式很創新。臺灣新聞注重內容和客觀。」第三輪訪談顯示不少人是透過臺灣的社群媒體轉入新聞網站。LX3：「會在 Line 上面看 Today 欄位出現的新聞，它會收集各個時事網站的新聞。」CZF3：「有時候像是 Facebook 上推薦的新聞我會看一下，但是不會上專門的新聞網站去看。」

對於臺灣能看到的新聞內容，陸生是貶大於褒。XY1：「大陸媒體的標題都比較平淡。蘋果的題目多半是渲染血腥暴力或婚外情等。」RL2：「蘋果每天版面都是貓狗如何、誰被強〔性侵〕了、出車禍問家屬什麼感受。臺灣媒體大多數都有顏色，報導內容沒有公信力……周子瑜事件、小燈泡事件不應該被持續

消費……應該要下結論。新聞多是受財團掌控。」YY3：「自己上過大紀元的網站……看了之後感覺它是故意想要抹黑大陸。」CMM2：「我每天會瀏覽 Yahoo 奇摩新聞，大陸的則都看新華網、鳳凰網。喜歡先看大陸的再看臺灣的，兩者感覺不同。大陸頭條通常是習近平相關事件；臺灣頭條比較自由、不固定。不多說了，大家都懂。」

四、經 Facebook 關注公共議題不如新浪微博便利

許多陸生表示哪個社群媒體的朋友多就用哪個。LXW1：「回大陸之後我不會使用 Facebook，因為朋友都在人人網上。」BYY1：「許多出國的同學都使用 Facebook，所以我在大陸就有申請……回大陸後會繼續使用，才能跟出國的朋友和臺灣的朋友保持聯繫……人人網在大陸通常是學生使用……朋友全都在上面。」XJJ1：「來到臺灣後知道臺灣這邊都在玩 Facebook，所以我就加入了……廣告也多，還可以成立社團，很多不同的群體都在上面。我回到大陸會繼續使用。」LQR2：「Facebook 非常重要，很多朋友都在上面。以前都在 QQ，但在臺灣待太久，回去就得翻牆。」

適合娛樂追星是 Facebook 的另一大誘因。LJY1：「我加了肚皮舞者孫于婷的 Facebook，沒想到她立刻就回覆了……讓我比較激動。回大陸後一定會翻牆，不想斷了聯繫。」ZX2：「追星用 Facebook，因為有些明星不用微博，只用 Facebook，例如阿信。」DJL2：「沒用 Facebook 發過內容，但會看娛樂新聞，看明星活動、追星、關注明星動態。」部分陸生提及了 Facebook 在好友驗證和註冊過程上比人人網繁複。JXY1：「Facebook 加你好友需要 email 驗證，人人網不需要，Facebook 還會一直發通知，感覺很煩。」LJY1：「Facebook 個人填寫的資料比較詳細，包括種族、宗教信仰等都必須填寫，人人網就不需要。」

這三輪的與談者都有對 Facebook 和大陸社群媒體做具體的評比，整體來說前者比較占上風。XLL2：「滑 Facebook 會比滑微博時間長……因為想看朋友點誰讚、給誰留言。而且 Facebook 會推信息，即使自己沒按讚也看得到。」LXW1：「天天使用人人網就好像有了自己的網頁，就像我自己的『房子』一樣，發信聊天什麼的功能比 Facebook 齊全，Facebook 太多遊戲了。」FYQ2：「新浪微博資料比較多……Facebook 好處則是即時性很強……新浪私信〔私訊〕回覆慢也比較看不到。」ZXY2：「Facebook 有不公開社團，新浪現在沒有不公開社團，但是可以開群聊。」RC3：「Facebook 我個人感覺排版特別亂。」LX3：「用

Facebook 可以看到出去玩的店家景點的頁面，可以去打卡……但是微信能看到的只限於自己的朋友圈。」

若透過社群媒體關注公共議題，陸生認為 Facebook 的方便性不如新浪微博，但內容的廣度是前者取勝。CM1：「我都會在 Facebook 上看些喜歡的東西和做一些新嘗試，例如在 Facebook 上發新聞，或使用 follow 功能。不過 Facebook 搜索功能很不好，大陸微博搜索力強大且更好使用、相關度更強。Facebook 上沒有收藏功能，主頁功能也不強，微博上則會顯示曾經搜尋過的物品或資訊。」ZZZ2：「在『新浪熱門』任何人都可以發起討論，但 Facebook 要自行去粉絲專頁才能討論。」ZXY2：「新浪搜索屏蔽很多作為關鍵詞的敏感詞彙，會說因為政策原因搜索不出來，但新浪能搜索到的資料量比較大，而 Facebook 除非有加入粉專否則都看不到。」BYY1：「用 Facebook 可以直接上電視新聞，掃描二維碼在電視新聞下方就會看到自己對正在播出的新聞的評論和頭像，人人網是沒有這種功能的，微博也要經過審核後才能在很小的位置顯現自己的評論。」

隨著行動上網的普及和微信的崛起，第二、三輪訪談中有陸生論及微信和臺灣類似服務間的差異。CZF3：「微信比 Facebook 的隱私性更強一點，微信僅限於你的朋友才能看到你每天在分享什麼動態……在 Facebook 上會定期給你推薦一些好友，方便你去擴大社交圈。」GYN2：「大陸人交流用微信，臺灣人交流用 Line。不過 Line 的已讀功能很不好，已讀了就一定要回覆……微信朋友圈不可能取代新浪微博，因為新浪微博關注的並不全是真正面對面的朋友。」

五、維基百科的客觀性和開放性勝過百度百科

維基百科的資訊廣度和客觀性廣受陸生好評。HXL1：「維基百科內容比較公平也比較準確。」DYY1：「利用維基百科可以看到很多歷史事件，而且是很全面的資訊。」YJC1：「比如我一開始搜基尼係數，在百度百科上搜不到相關的資料，結果就用維基百科來搜尋，發現用維基百科找到的資料是比較沒有立場的描述。」HZ1：「百度有立場，比如查中國領土……內容就是有立場的，維基百科就比較公正，而且幾乎可以搜到任何事情的資料，所以我〔返陸後〕會繼續使用。」

陸生也很欣賞維基百科的開放性編輯、原創性和公益性。YX1：「維基百科編輯詞條會直接顯示，不用經過審核，但是百度百科要審查，也不會直接顯示。」YX1：「感覺起來維基百科的內容都是原創的，但百度百科則是複製的比較多。」

YJC1：「百度百科是有廣告的，維基百科好像是公益性的。」對維基百科的批評雖不多但還是存在。YX1：「我覺得維基百科的內容太少，百度的詞條是維基百科的十倍多。」DJL2：「谷歌的知識連結都是維基百科，裡面內容比較不易理解，百度百科比較淺顯易懂。」

關於知識問答型網站，大陸的知乎青出於藍，臺灣的 Yahoo 奇摩知識 + 和大陸的百度知道都相形見絀，有陸生認為這得力於知乎成功的市場分眾化。ZZZ2：「Yahoo 奇摩知識 + 或百度知道通常是簡單直接的回覆，知乎則有完整回答。」LSS2：「Yahoo 奇摩知識 + 答案會錯，知乎則會進行深度問答……身邊朋友都用知乎。自己有回答過知乎的問題……如果太簡單地回答會破壞知乎的風氣。」

六、Yahoo 奇摩和 PTT 的介面不討喜

臺灣第一入口網站 Yahoo 奇摩被多數陸生評為版面紛亂。YX1：「Yahoo 奇摩有很多圖片，感覺沒有 360〔大陸入口網站〕簡潔，且 Yahoo 奇摩手機版介面不好讀也不好用。」ZRR1：「我平常使用大陸的 360 比較多，點擊率最高的欄目都會整理得很清楚。Yahoo 奇摩的搜尋條太小。」DYY1：「整體感覺臺灣網站的介面很擠，資料都很靠近，有時候看得心很煩，信息量太大。」第一輪受訪者有人滿意 Yahoo 奇摩的搜尋功能。HXL1：「Yahoo 奇摩新聞或信息搜索比較快倒是真的。」也有人覺得騰訊網的服務更齊全。FZQ1：「騰訊有生活、社交、遊戲等功能，且騰訊主打的 Yahoo 奇摩好像都看不到。我感覺 Yahoo 奇摩內容比較不全面。」第二輪訪談中沒有陸生說把首頁換成了臺灣的入口網站，雖然有人上過 Yahoo 奇摩，但普遍沒什麼印象可分享；另外承認首頁是大陸入口 Hao123 的陸生不少，可見這個網站的崛起趨勢。ZHY3 則把百度當成入口網站使用：「百度做得很好，雖然百度的主業是搜索引擎，但是做得像一個門戶〔入口網站〕。」

在臺灣匯聚大量草根聲音的論壇型網站由於落伍的版面設計而罕有陸生青睞，但也有少數受訪者提及兩岸論壇的言論風格。JDW1：「天涯有圖片，跟沒有圖片的 PTT 比較，好像臺灣論壇的網頁單調些。」RC3：「PTT 讓我完全摸不著頭腦，黑乎乎的……我的體驗很差，也因為不太會用，所以就沒有再用了。」LXW1：「在臺灣網站的公共評論好像保留比較久，上個月的東西都可以看到，但是大陸網站或論壇的消息很快就會被刪除。」LQR2：「臺灣人喜歡用 PTT 發文……上面有各種言論，發言者有厲害的人，但大部分是酸民，很多臺灣的網絡

語言很難瞭解。」

此外，訪談現場沒有什麼陸生分享臺灣 OTT 平臺的使用心得，至於對大陸 OTT 的使用則主要是節目導向。ZHY3：「除了愛奇藝之外還常用騰訊視頻……有些節目只在某些平臺獨家播出……所以可能不是取決於你想用什麼網站，而是取決於你想看什麼節目。」關於直播服務，有發言的陸生表示來臺後並未轉用臺灣的服務，而內容方面是以遊戲直播最受歡迎。LX3：「常用鬥魚、熊貓看直播……臺灣的我沒有用過……我沒有用 Twitch 看遊戲直播，一般都是在鬥魚看。」RC3：「我有用騰訊官方的直播，也會看熊貓和鬥魚的遊戲直播。」

七、臺灣的網路自由未獲太多欣賞

陸生普遍同意臺灣的網路環境比大陸自由，但其主流意見卻不欣賞這種自由。GYF1：「大陸的網絡只要出現敏感詞就會被系統自動阻擋……臺灣網絡的東西太多……大陸管制還比較好，尤其是能保護未成年人。」LSS2：「封鎖部分信息是必要的。法輪功之類的可不是無關緊要的信息，他們的觀點非常極端……如果百姓不會判斷又太容易接觸這些信息，會不好治理。」BY2：「信息極端會煽動民眾，導致極端的行為，天安門自焚就是被煽動才會產生。」

緊繃的兩岸關係也可能使陸生出現寒蟬效應。LSS2：「來之前覺得臺灣是民主自由的地方，但是在這說『統一』會被別人罵。」ZZZ2：「我會為了在臺灣生活而刪除自己認為正確的言論，如果真地想說話會去微信說。」YWL2：「有一次去西門町看到有人宣傳兩岸統一，心裡特別激動……下午時就看到新聞說臺獨分子去攻擊，很納悶為什麼臺獨人士插旗就沒人攻擊？挺鬱悶的。」LDMG3：「大陸的政策是以一種比較封鎖的方法在保護我們，包括限制我們過激的言論或髒話……所以在大陸的網絡上我個人覺得不存在風險，反而在臺灣的社群媒體上我不敢隨意發言。雖然說這邊言論很自由，但是我覺得這種自由也給我帶來了非常多的不安全感。」雖然臺灣朝野面對大陸常以自由民主典範自居，但亦不乏只將這些價值當成統獨鬥爭工具之人，再加上臺灣網軍或多數網友面對異議時易於忽略自由或民主精神，[16] 這些都會衝擊到陸生在臺的上網體驗。

還有一些陸生雖然也在表達對大陸網路環境的肯定，卻也透露了微妙的訊息，例如有人提到了內化的自我審查。CZF3：「身為大陸網民，一般不會在政

16 國家認同的撕裂使臺灣政黨的民主競爭更接近互批賣國賊的內戰（江宜樺，2018，頁 26），身處統獨漩渦中心的陸生在民粹化的網路上自能體驗到此戰之酷烈，也許就少有餘裕去品味臺灣的網路自由了。

治和言論上意識到無力感，我們都知道上的網站哪些是可以說的、哪些是不能說的……評論只要不是過激或反社會的，你的人身安全都是有保障的。」有人對網路實名制有褒有貶。XZX3：「我覺得實名制有好有不好，不好就是我不太喜歡在網絡上暴露自己，好的就是大家會因為需要承擔責任而不會不經大腦思考就隨便說話。」也有人談到兩岸網友對政府的批判有不同的形式。CZF3：「臺灣的網民會直接說到重點，哪怕有時候是對領導人不滿……而我們則是用漫畫或黑段子來宣洩。一種是直接的，另一種是不直接的。」

柒、結論與討論

線上問卷的調查顯示，陸生來臺前後使用時數有顯著差異的網路媒體中，大陸網站都呈現時數減少，臺灣可近用的網站都呈現時數增加。可見有不少大陸封禁、臺灣才能上的網路媒體一直對陸生有強大的吸引力，因此他們來臺後都大幅增加使用。行為或習慣的轉換需要各種成本，所以通常人們偏好不做轉換，例如臺灣人去歐洲留學不一定會大幅減用臺灣常用網站，文獻探討也多次提及移居者愛用母國媒體維持文化認同，但從本研究的實證結果可知，即使在臺灣仍能連上大陸網站，陸生對其使用量卻顯著滑落。

在本研究的問卷中每類大陸網站都有功能與其類似的臺灣網站，這類網站組合有三組在變用量的相關性分析裡呈現顯著負相關。從使用與滿足理論來說，大陸網站減少的用量可能是以增用功能類似的臺灣網站來彌補，亦即改用不同的媒體來滿足相同的需求。此外，陸生的來臺月數與所有受測大陸網站之變用量間均無顯著相關，但與臺灣能上的 YouTube 等、臺灣新聞媒體網站、Line 動態消息等這三類網站之用量增幅間則有顯著正相關。這或許可被視為這些陸生深化與臺灣文化互動的過程，但值得注意的是，陸生閱讀臺灣新聞的頻率越高，其政治傾向可能越支持「盡快統一」（王嘉州，2012）。在媒體滿是兩岸衝突議題的近期，那些來臺較久，也看了較多臺灣新聞網站的陸生對兩岸關係的立場不見得會對臺灣較友善。

YouTube 等、Google 等和 Facebook 等這三類臺灣可上的網路媒體最令人矚目。三輪調查中它們都出現陸生來臺後使用時數顯著增加的現象；此外，YouTube 等和 Google 等的變用量還分別在第一和第三輪調查中與功能類似的大陸網站（優酷等和百度搜索等）呈顯著負相關。然而很多受測的大陸網站以及上述三類網站以外的臺灣常用網站在本研究的諸多檢定中都並未有顯著的結果，這

也是不能忽視的事實。

透過集體訪談我們發現，許多陸生反映他們使用 YouTube 主要是為了娛樂，並認可 YouTube 品質上的優勢。YouTube 既是高流量的影音資料庫，也是其影片創作者（YouTuber）透過視聽文本對話的社群空間。除了娛樂性的節目外，政治、人權或各類前衛議題都在 YouTube 以最直接的影音來面向用戶 (Burgess & Green, 2018)；YouTube 的娛樂內容占比為 58%，比優酷網的 70% 和土豆網的 75% 都低（張毅蓮、李鳳琳，2013）。陸生表示上傳影片到 YouTube 相對容易，而且 YouTube 有很多大陸視頻網站看不到的內容，第一輪訪談很多陸生承認對這些內容的興趣，但第二、三輪的陸生談起這個議題變得欲言又止，或許是太陽花學運後低迷的兩岸關係影響了陸生的表達意願。

相較於百度搜索，陸生欣賞 Google 的搜尋效率、資料廣度和實用性，以及節制的廣告政策。前面使用與滿足理論有說到，帶有目的性的「工具性使用」會讓用戶更深入地涉入媒介訊息。相較於傳統媒體的閱聽人，網路用戶在搜尋資料時展現了強烈的主體性，他們會在偏好的搜尋引擎輸入自訂的關鍵詞，並從搜尋結果中主動選取欲細看的網頁。第一輪訪談裡很多陸生熱烈分享來臺後在 Google 上發現的新知，根據 Wang (2006) 的研究來推敲，這些在大陸被屏蔽的資訊透過這些陸生工具性的媒介使用可望產生不小的態度或行為效果。在民進黨執政期間的第二、三輪訪談裡，願意分享對 Google 新知感想的陸生遽減，也有陸生心懷警戒地對這些新知加以批判。

陸生普遍表示在新媒體的技術水準上臺灣新聞業相較於大陸同業是落後的，對臺灣能看到的新聞內容也是貶大於褒——儘管他們也意識到很多大陸媒體是刻意對某些議題噤聲。在臺灣使用大陸新聞網站可讓陸生以一種自然又舒適的方式維持對大陸政府的認同，對兩岸媒體都出現的新聞他們傾向採用陸媒的觀點；已將中共官方意識形態內化的陸生若先看到有違自己信念的臺灣媒體報導，也會再回到大陸媒體網站針對相同議題尋求能修復自己信念的報導。這些對大陸新聞網站的使用已成為不少頑固的閱聽人的日常儀式，[17] 這種儀式在讓陸生免於認知失調之餘，也促成了前述之 Billig (1995) 的日常民族主義。陸生對社群媒體的選擇則充分印證了使用與滿足理論：對傳媒的消費可以滿足人類認知、情感、社會互動和逃避現實的需求，無怪乎許多陸生表示哪個社群媒體的朋友多就用哪個，另

17 陸生的這些行為近似 Raymond Bauer 和 Jay Blumler 等人所謂的頑固或主動的閱聽人之所為，亦即受自己既有的興趣、偏好和動機引導，主動地選擇和使用媒介，並避免接觸不喜歡的資訊，更不會輕易受這些資訊影響。

一項主要判準是娛樂追星的功能，因此陸生來臺後通常會顯著增加對 Facebook 和 Line 動態消息的使用。

在表達對臺灣網路環境的總體感想時，陸生一致承認臺灣上網比大陸自由，但多數人卻認為「太自由」還不如「有限的自由」，並主動為大陸當局設想資訊自由化可能帶來的種種治理難題。近年緊繃的兩岸關係讓部分陸生覺得臺灣網路上充滿自己不樂見的意見，並預見自己的意見可能會不受歡迎，因此認為臺灣的言論自由反而讓自己不安，從而嚮往大陸對相關討論的禁止；不過這種論述其實混淆了對「特定言論」的偏好和對「言論自由」的偏好，導致言論自由只在自己偏好的特定言論能占上風時才有價值，否則寧可揚棄言論自由——這樣就忽略了言論自由的精神是包容自己討厭的言論。

陸生對社群媒體的選擇一如使用與滿足理論所預期，而對新聞網站、入口網站和網路論壇的偏好則有性能方面的考量。臺灣本土公司長年在這些線上服務的技術進步有限，即使有再好的內容陸生也難以下嚥。先不論其他，從性能面來講，Google、YouTube 和 Facebook 也都居於世界前列，難怪陸生來臺後總會大增使用它們的時數；這個現象與其說是臺灣網路自由的勝利，或許更適合說是美國資訊工業的另一項戰果。陸生的發言顯示，在大陸看不到的網路內容並非總是討喜：陸生對維基百科相當欣賞，對臺灣新聞媒體網站卻沒有好感，換言之雖然他們樂見維基百科介紹會被大陸屏蔽的知識，但卻不感激臺灣媒體報導會被大陸屏蔽的新聞；這也許是因為人們在抽象議題（知識）方面樂於汲取新資訊，對切身議題（新聞）卻傾向維持舊信念，當然部分臺灣新聞媒體過於偏頗的報導風格也有責任。

總體回顧本研究的量化和質化結果：如果陸生來臺前後使用各類兩岸網站的時數變化在不同年分的調查結果間存在顯著差異，那就有必要進一步探討是哪些外生因素在發揮作用；[18] 然而儘管從 2014–2018 年兩岸關係歷經不少波動，[19] 本研究觀察的這三批來臺陸生的網路行為卻沒有明顯的變遷趨勢；不過集體訪談的主持人清楚感受到 2016 和 2018 年陸生的談話尺度有明顯的緊縮，和 2014 年訪談表現出的有如在臺灣網路上發現新大陸之興奮感迥然不同；涉及兩岸言論自由或大陸禁忌議題的討論，後兩輪的學生發言都顯得小心翼翼，似乎對臺籍主持人或其他陸籍同學抱持著戒心，甚至偶有對大陸網路審查振振有詞的辯護，宛如在反

18 例如中共有可能加強對申請來臺之陸生的政治審核。

19 諸如太陽花學運、馬習會、民進黨執政、陸生周泓旭涉共諜案和臺人李明哲涉顛覆中共政權案等。

擊自己對臺灣輿論所感受到的「敵意」。總之，兩岸關係對陸生較私密的個人上網行為並無明顯影響，但對陸生在同儕間的公開發言則似乎影響不小；從另一角度來說，無論陸生的思想（或表現出來的部分）在來臺後有無「解放」，但在網路「解禁」後他們都願意負擔轉換成本，使上網行為開始趨向其自然偏好，可見其來臺前對網路媒體的選擇實為迫於無奈。

本研究相對於留學歐美的陸生上網研究之特殊性在於陸生來臺後多出了兩岸關係的變因，其身分讓他們難以無視臺灣媒體和網友對這項議題的立場，結果研究發現陸生對在臺上網體驗的主觀評價會隨著兩岸關係惡化；另外，本研究相對於一般異鄉人上網研究之特殊性在於故鄉有網路審查的陸生離境後多出了網路解禁的變因，結果發現無論兩岸關係如何變化，客觀數據上陸生都會程度顯著地從大陸網站轉而使用本來被禁的臺灣或國際熱門網站。

受限於人力物力，本研究也有許多不盡如人意之處。線上問卷調查的代表性以及各輪的樣本數難免不足，因此只能作為初探性的研究結果。與個別訪問相比較，集體訪談法的最大缺點是無法完全排除受訪者之間的社會心理影響，而且有些問題不宜透過集體訪談來回答，例如涉及保密、隱私和政治敏感性的議題。與焦點團體法相比，參與者較多的集體訪談裡每人發言時間較少，個人的意見或主張未必能得到充分的分享和討論。訪談過程中身兼研究者的主持人很重視對參與者經驗的真誠關注，如果臺籍主持人抱著先入為主的觀念而對言論自由和網路開放深信不疑，那很可能會對陸生為中共政策的辯護嗤之以鼻。唯有先放空自己的價值觀，才能讓參與者敞開其經驗世界，建立質化研究所必需之互為主體（intersubjectivity）的研究關係，現象才會如其所然地呈現。各場主持人雖都盡力恪守此一原則，但完全放空自己來引導討論談何容易，因此對與談者經驗的誤讀或重點錯置都還是有可能的。未來在資源許可下，可根據本初探性研究的量化結果設計一份至少有三百名隨機陸生填答的問卷來調查最關鍵之兩岸網路服務（如 YouTube、Facebook 和微信等）的精確使用時間和方式變化，並根據本研究的質化結果來設計問卷中的態度和動機選項，以期得到信度和效度更高的研究發現。另外大陸人性別和出身地區對網路使用行為的影響也是未來還可以深入探討的方向。

如果要問本研究結果對臺灣當局和大陸當局有什麼啟示，那麼臺灣當局應可思考如何促進臺灣本土網路產業的技術競爭力，以提供至少不遜於大陸網站的線上功能；並鼓勵臺灣新聞媒體自愛自強，減少廢聞、假新聞和黨同伐異的政治新聞；同時繼續維持臺灣開放的網路環境，讓網友安心暢享言論自由；也可為陸生

提供在臺上網教程，讓他們有更多心理和技術準備（例如某些臺灣常用網站的用法和網路用語）來充分運用臺灣開闊的網路資源。大陸當局則或可思考鬆綁，甚至解除對境外網路媒體的封禁、對敏感詞彙的審查和對網路用戶的監視，因為言論和思想控制等上個世紀的統治技術在行動網路時代的性價比已愈來愈低，這從大陸網友廣用 VPN 和一離境就大幅使用在家鄉被禁的國際主要網站即可見一斑，只有充分的資訊自由才能孕育耳聰目明、自立負責的公民，這正是當下中國大陸邁向現代化社會必要的一環。最後，無論是促進大陸民主化或對臺統戰，都是偏向將陸生「工具化」的思考，本研究以陸生為主體來探索其上網行為和欲求，希望能勾勒出他們更有機的面貌、帶來對兩岸關係更前瞻的想像。

參考書目

王嘉州（2012）。〈來臺陸生統一態度變遷初探——政治社會化途徑與定群追蹤法之分析〉，《臺灣民主季刊》，9（3）：85-118。https://doi.org/10.6448/TDQ.201209.0085

江宜樺（2018）。〈對臺灣民主現況與未來的思考〉，《二十一世紀》，169：23-29。

汪宏倫、張可（2018）。〈「RIP，426」：解析「大陸地區旅臺學位生」的國族經驗〉，《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65：1-88。https://doi.org/10.6523/SOCIETAS.201806_(65).001

展江（2016）。《守望公共領域》。北京：新星。

徐宥嫻（2014 年 5 月）。〈陸生在臺使用 Facebook 與文化適應之研究〉，論文發表於「2014 數位創世紀學術實務研討會」，臺灣，臺北。

陳重成（2008）。〈全球化下的兩岸社會交流與互動：一個從他者轉向自身的歷程〉，《遠景基金會季刊》，9（1）：39-73。https://doi.org/10.7063/PQ.200801.0039

張毅蓮、李鳳琳（2013）。〈中國視頻網站娛樂化傾向調查及反思——以優酷網、土豆網和 56 網為例〉，《今傳媒》，9：39-40。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2-8122.2013.09.020

程楊、郭佳、高鹿洋子、姜瓊茜、孟超、王藝磬（2013）。〈媒體使用與文化適應：以大陸赴港大學生為例〉，《廣播與電視》，36：91-114。

斯影（2019 年 1 月 11 日）。〈中國 VPN 用戶被罰「翻牆」怎麼會違法〉，

《BBC 中文網》。上網日期：2019 年 3 月 12 日，取自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6823319

樓啟煒（2011）。〈『90 後』大學生思想特點調查與分析〉，《江蘇教育學院學報》，4：56-59。

Adelman, M. B. (1988). Cross-cultural adjustment: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n social suppor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12*, 183-204. https://doi.org/10.1016/0147-1767(88)90015-6

Althaus, S. L., & Tewksbury, D. (2000). Patterns of Internet and traditional news media use in a networked community.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7*, 21-45. https://doi.org/10.1080/105846000198495

Billig, M. (1995). *Banal nationalism*. London, UK: Sage.

Branco, I. (2018). Media and the receiving country's language: The integration of Nepalese immigrants in Portugal. In K. H. Karim & A. Al-Rawi (Eds.), *Diaspora and media in Europe: Migration, identity, and integration* (pp. 147-164). London, UK: Palgrave Macmillan.

Burgess, J., & Green, J. (2018). *YouTube: Online video and participatory culture* (2nd ed.). Medford, MA: Polity Press.

Chen, W., & Choi, A. S. K. (2011). Leveraging computer mediated communication for social support in immigrants' intercultural adaptatio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7*(3), 167-176. http://dx.doi.org/10.3968/j.ccc.1923670020110703.285

Chen, X. (2004, October). *Acculturating on the Internet: A survey study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online communication and accultur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f Global Fusion 2004, St. Louis, MO.

Elias, N., & Lemish, D. (2011). Between three worlds: Host, homeland, and global media in the lives of Russian immigrant families in Israel and Germany.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32*, 1245-1274. https://doi.org/10.1177/0192513X11400837

Gray, N. J., Klein, J. D., Noyce, P. R., Sesselberg, T. S., & Cantrill, J. A. (2005). Health information-seeking behaviour in adolescence: The place of the internet.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60*, 1467-1478. https://doi.org/10.1016/j.socscimed.2004.08.010

Greenfield, D. N. (1999). Book Excerpt: The net effect: Internet addiction and

compulsive Internet use. *The Center for Internet and Technology Addiction*. Retrieved May 23, 2018, from https://virtual-addiction.com/book-excerpt/

Halperin, A. (2018). *The use of new media by the Palestinian diaspora in the United Kingdom*. Newcastle upon Tyne, UK: Cambridge Scholars.

Hossain, M. D., & Veenstra, A. S. (2017). The uses and gratifications of language in social media among the Indian subcontinental diaspora in the U.S.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46*, 478-496. https://doi.org/10.1080/17475759.2017.1377101

Jeffres, L. W. (2000). Ethnicity and ethnic media use: A panel study.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7*, 496-535. https://doi.org/10.1177/009365000027004004

Junco, R. (2012). Too much face and not enough book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ultiple indices of Facebook use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8*, 187-198. https://doi.org/ 10.1016/j.chb.2011.08.026

Katz, E., Blumler, J. G., & Gurevitch, M. (1974). Utilization of mass communication by the individual. In J. G. Blumler & E. Katz (Eds.), *The uses of mass communications: Current perspectives on gratifications research* (pp. 19-32). Beverly Hills, CA: Sage.

Katz, E., Gurevitch, M., & Hass, H. (1973). On the use of the mass media for important thing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8*, 164-181.

Levy, M. R., & Windahl, S. (1984). Audience activity and gratifications: A conceptual clarification and explorati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1*, 51-78. https://doi.org/10.1177/009365084011001003

Lin, C. A. (1999). Online-service adoption likelihood. *Journal of Advertising Research*, *39*, 79-89.

Lin, W.-Y., & Song, H. (2006). Geo-ethnic storytelling: An examination of ethnic media content in contemporary immigrant communities. *Journalism*, *7*, 362-388. https://doi.org/10.1177/1464884906065518

Melkote, S. R., & Liu, D. J. (2000). The role of the Internet in forging a pluralistic integration: A study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62*, 495-504. https://doi.org/10.1177/0016549200020060 03

Morley, D., & Robins, K. (1995). *Spaces of identity: Global media, electronic*

landscapes and cultural boundaries. London UK: Routledge.

Nedelcu, M. (2012). Migrants' new transnational habitus: Rethinking migration through a cosmopolitan lens in the digital age.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38*, 1339-1356. https://doi.org/10.1080/1369183X.2012.698203

Park, N., Song, H., & Lee, K. M. (2014).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and other media use, acculturation stress,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mong East Asian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36*, 138-146. https://doi.org/10.1016/j.chb.2014.03.037

Rubin, A. M. (1981). An examination of television viewing motivation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8*, 141-165. https://doi.org/10.1177/009365028100800201

-- (1994). Media uses and effects: A uses-and-gratifications perspective. In J. Bryant & D. Zillmann (Eds.), *Media effects: Advances in theory and research* (pp. 417-436).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 (2002). The uses-and-gratifications perspective of media effects. In J. Bryant & D. Zillmann (Eds.), *Media effects: Advances in theory and research* (2nd ed., pp. 525-548).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Rubin, A. M., & Rubin, R. B. (1985). Interface of personal and mediated communication: A research agenda.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2*, 36-53. https://doi.org/10.1080/15295038509360060

Saw, G., Abbott, W., Donaghey, J., & McDonald, C. (2012, June). *Social media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t's not all about Facebook*.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Libraries Conference,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ingapore.

Valenzuela, S., Park, N., & Kee, K. F. (2009). Is there social capital in a social network site? Facebook use and college students' life satisfaction, trust, and participation.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4*, 875-901. https://doi.org/10.1111/j.1083-6101.2009.01474.x

Walther, J. B., & Boyd, S. (2002). Attraction to computer-mediated social support. In C. A. Lin & D. Atkin (Eds.),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society: Audience adoption and uses* (pp. 153-188). Cresskill, NJ: Hampton Press.

Wang, Y. (2006). *Internet use among Chinese students and its implication for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Kent State University, OH.

Wang, Y., & Quan, X. (2013). Does ethnic Internet use deter or promote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Journal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5*(7), 78-87. https://doi.org/10.5897/JMCS2013.0340

Yang, Q., & Liu, Y. (2014). What's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great firewall? Chinese Web users' motivations for bypassing the Internet censorship.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37*, 249-257. https://doi.org/10.1016/j.chb.2014.04.054

Ye, J. (2005). Acculturative stress and use of the Internet among East Asian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CyberPsychology & Behavior*, *8*, 154-161. https://doi.org/10.1089/cpb.2005.8.154

Yin, H. (2015). Chinese-language cyberspace, homeland media and ethnic media: A contested space for being Chinese. *New Media & Society*, *17*, 556-572. https://doi.org/10.1177/1461444813505363

Zheng, Y. (2008).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The Internet, 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11(2), pp. 185-219, July 2021

The Patterns and Trends of Internet Uses of Mainland Chinese Students in Taiwan

Shan, Wen-ti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Arts

Chu, Cho-wen*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Mass Communication,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Adjunct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Arts;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Studying in Taiwan has given mainland Chinese students an opportunity to use the Internet for information access and communication without censorship. This study conducted three rounds of group interviews along with surveys in 2014, 2016, and 2018 respectively to investigate the changes of the Internet uses of these students before and after coming to Taiwan and their motivations of the changes. The findings indicated that, during their stay in Taiwan, the access of popular foreign and Taiwanese websites blocked in China had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while the access of similar websites in mainland China had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The changes were consistent among the three rounds of data collection.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se changes are the practical needs for social contact, entertainment, the convenience of everyday life, etc., which correspond with the uses and gratifications theory. Another reason for such changes is the curiosity over politically sensitive issues. However, most mainland Chinese students in group interviews expressed their negative attitudes towards the free communication environment in Taiwan. Possibly due to the deteriorating cross-strait relations in recent years, those students who come to study in Taiwan later have become more cautious in their interview responses, and they have expressed more negative attitudes towards their experiences of the Internet uses in Taiwan.

Keywords: internet uses, internet censorship, mainland Chinese students in Taiwan, cross-strait relations

---

* Email: chowen@ntu.edu.tw
Received: 2020.8.6
Accepted: 2021.5.10

JCRP 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成舍我紀念館 Cheng Shu-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Ainosco Press

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11 卷 第 2 期．頁 221-258．2021 年 7 月
DOI:10.6123/JCRP.202107_11(2).0011

公民科學與創客運動：空氣盒子計畫的案例探討 *

曾靖越 **

臺北市立大學視覺藝術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本文試圖從數位時代中的科學參與出發，介紹並討論一個新興的字詞：創客運動；並以發展於 2013 年的空氣盒子計畫為例，試圖說明一種參與式文化的形塑過程，這包括了「自造者」們如何集眾人之力，透過開放原始碼進行概念混搭、線上線下虛實集結等。結論指出，基於創客文化開放分享的協作模式，眾人的創意思維能透過不同形式於數位空間中整合，從而成就了一種新的文化生產方式；而藉由創作，廣大群眾也更自由地參與了科學，並以自下而上的世界觀深化了「更民主的科學溝通」。

關鍵詞：公民科學、自造者、空氣盒子、開放原始碼、創客運動

* 作者感謝主編夏春祥教授暨期刊編務團隊，與三位匿名評審委員的費心審閱及細心協助，使得文章完整度與可讀性大幅提升。
** Email: jingyueh@go.utaipei.edu.tw
投稿日期：2020 年 10 月 27 日
接受日期：2021 年 3 月 26 日

JCRP 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成舍我紀念館 Cheng Shu-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Ainosco Press

壹、背景與目的

2018 年 11 月 14 日在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會議中，一位公衛背景的立委質疑空氣品質感測器「空氣盒子」（AirBox）的檢測數值不甚正確，會引發民眾恐慌，企圖刪除空氣盒子的計畫預算（立法院，2018 年 12 月 18 日；李秉芳，2018 年 11 月 15 日），因而引起了社會一連串的討論。[1]

基本上，「空氣盒子」是一個結合多方單位合作而成的空氣品質監測網，透過計畫發想者與「開源公益環境感測網路系統」（Location Aware Sensing System, LASS）[2] 創辦人的推動，結合 LASS 社群的開發、網通廠商的協助，以及政府前瞻計畫預算的挹注（行政院科技部，2018），期望藉由開源、公益、非營利的形式，配合網路使用者的通力合作，設計與實現一個大型環境感測系統，並藉由公民科學的型態，運用感測活動對環境給予具體幫助，是目前國內廣受民眾關注與使用的空氣品質資訊服務（陳伶志，2016a；許武龍，2016；曾蘭淑，2018；謝宜婷，2020）。但委員認為，空氣盒子採用簡單的感測器，其精度遠不如環保署專業的國家級測站；且空氣盒子容易取得，又可讓民眾隨意架設，因此統整之大數據不但不準確，又容易遭到誤解而引起恐慌，因此，在尚未仔細規劃之前，空氣盒子數值應審慎評估與分析（吳焜裕，2018 年 11 月 14 日）。

然而，部分媒體與學者則肯定空氣盒子所執行的方向，且與環保署網站的 PM2.5 即時資料相較，該計畫反映出來的數據揭露了臺灣空氣污染防制的盲點，對於一般民眾極有參考意義（方儉，2018 年 11 月 15 日；莊秉潔，2018 年 11 月 18 日）。另一方面，隸屬環保署的空污感測物聯網，亦計畫於 2017–2020 年逐步布建超過一萬個空污品質感測器，如此高數量的偵測熱點，其感測器運作原理與空氣盒子相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n.d.）；換句話說，環保署認為簡單感測器若布建得當，仍有應用價值。2019 年，英國廣播公司來臺訪問空氣盒子發起人，報導了計畫如何發揮作用，並促使人們思考空污問題 (BBC, 2019, November 7)。上述顯示，即便空氣盒子感測器的價格、精度遠遜於國家級官方測站，但其可信度與接受度仍高。

---

1 根據中研院網站「研之有物」，空氣盒子是中研院資訊科學研究所研究員、資訊服務處處長陳伶志帶著團隊發展推動的計畫，預算則來自中華民國行政院編列的前瞻預算，全臺中小學都已布站完畢，全部採用開放資料，並且和民間團體、新創公司等組織合作；隨著民眾愈來愈關注空氣品質，空氣盒子現在也被廣泛使用於日常生活中，現已和全球 40 個國家合作，全球共有 6,000 個點實施量測（〈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n.d）。

2 LASS 不但是「開源公益環境感測網路系統」的簡稱，也是開發該系統之創客社群的名稱（陳伶志，2016a），為避免混淆，本文以「LASS 系統」與「LASS 社群」兩詞作為區隔。

空氣盒子發起人談到，計畫早期曾有「準確性」的迷思，亦即期待低價感測器的表現能與專業儀器相同，然而要有極致的準確性，硬體成本是無法避免的，因此隨後轉而追求「一致性」，也就是讓大量低價堪用的小型感測器組成綿密的監測網路，從穩定的數值變化中得到空品趨勢的變化，能與官方專業儀器做相輔相成之效，這是以更細膩、更區域的角度關照在地居民的環境資訊需求（古國廷，2020 年 6 月 30 日；謝宜婷，2020）；特別的是，就在這種量測策略的轉變中，能夠看到諸多創客（Maker）[3] 參與的身影。因此，本文欲以空氣盒子為例，針對計畫運作的基本核心概念：「創客文化」進行不同角度的思考。諸多空氣盒子的報導，均會提及專案發起後是透過 LASS 創客社群成其大，而後有產業界、政府等單位資源挹注，才顯現今日之規模；雖然「創客」是一再被提及的關鍵字，卻鮮少有資料深入討論，究竟創客們是如何運用自身獨特的文化，在專案初期置入了什麼核心思想？進而深化了空氣盒子的說服力與可信度，讓檢測精度較低的低價感測器，反而能滿足一般民眾的需求，且具體深化了科學的民主性質。本文因而聚焦於 LASS 社群所開發的空氣盒子初始版本，及 LASS 系統本身，探討的問題如下：一、創客文化運動是什麼？而在數位技術所帶來的創新使用中，公眾參與科學實踐的歷程為何？二、從創客文化的實踐精神出發，民眾透過空氣盒子參與科學帶來何種結果？現況如何？我們又該如何對此進行反思？

為了回答上述研究問題，本研究主要就環繞「空氣盒子」專案資料進行內容分析，首先，透過創客、自造者、公民科學、開放原始碼、空氣盒子等關鍵字進行聯集，蒐集自 2013 年計畫開始，迄今為止關於空氣盒子的相關報章雜誌資料、學術論文作為參考，以理解此計畫中的創客活動脈絡為何；其次，再援引國際重要之公民科學案例（需具備創客實踐內涵）進行比較，藉此梳理自造者社群如何基於開放原始碼，以及不同的集結方式進行協作，進而瞭解創客文化如何在空氣盒子專案中發揮效應。

貳、公民科學與創客運動

一、科學參與的意涵

奠基於網路新媒體的當代科普網站，普遍呈現一種網狀的「整合式的科學傳

3　此英文亦可譯為「『自』造者」，以與日常通用的「製造者」做區分，畢竟製造過程中自己的體驗與嘗試創新扮演重要角色，請參見邱誌勇（2016）以及連育德譯作（Anderson, 2012／連育德譯，2013），故以此詞彙加以凸顯；為求行文順暢與脈絡連貫，本研究交替使用這兩個中文詞彙，以凸顯意義的不同面向。

播模式」，以兩岸科普平臺「果殼網」與「泛科學網」為例，文章作者與讀者透過平臺的互動功能進行意見交換，建立了雙向溝通的渠道，消弭多數科學傳播活動中單向傳播的問題（黃惠萍等人，2017）；而內容轉發功能亦提供了公眾參與科技的新管道，使科學議題得以藉由文章分享，由各種社群媒體延伸到更廣泛的層面，並最終體現了一種「公眾參與」（public engagement model）的科學傳播模式（關尚仁，2010；Brossard & Lewenstein, 2009）。

公眾「參與」（participation）與公眾「涉入」（engagement）常被交替使用，施琮仁（2016）認為，公眾涉入可就廣義與狹義兩種角度理解；廣義的定義是在行為之外，強調認知層面的涉入，包含民眾對於科學的興趣、知識、信念、態度，以及對科學家的信任，包覆了心理上的連結 (Retzbach & Maier, 2015)。而狹義的定義常將公眾涉入等同於公眾參與，只強調公眾在議題設定、決策形成過程中的角色與正當性。

本研究關注的是公眾透過自造、改進感測器、貢獻數據資料等形式參與科學，參與者需要投注知識與認同於計畫之中，因此本文所提之參與，是以「涉入」（engagement）為準，為求行文順暢，文中均以「參與」進行討論。

二、參與科學新路徑：創客運動

「公民科學」（citizen science）一詞泛指一般民眾積極參與科學活動，並透過監測等方式進行數據收集與分析的行為，藉此能與科學家一同參與科學研究，或將所取得的科學數據，供決策者與公眾使用，最初被視為是一種跨時間與空間的大量數據蒐集法；但公民科學不一定是為國家服務的活動，它常是一種民眾質疑事物的方法與態度，也是保護環境的一種有效辦法 (Cigliano et al., 2015; Fortun & Fortun, 2005; Kelly et al., 2019; McKinley et al., 2017)。

公眾參與科學研究的歷史發軔甚早，早在 1880 年代就有鳥類遷徙時間與方向之調查研究（Harvie-Brown & Cordeaux, 1880；轉引自 Hsiung et al., 2018），而這種開放式的科學參與文化，亦因為數位化的世界浪潮在近年來延續不斷，諸如「星系動物園」（Galaxy Zoo）(Raddick et al., 2010)、「眼線」（EyeWire）(Tinati et al., 2017) 都是參與者高達數十萬人的超大型公民科學計畫。林德恩指出，臺灣近日亦有諸多公民科學計畫如「臺灣兩棲保育網」、「暮光之城——蛾類普查」，「臺灣繁殖鳥類大調查」、「路殺社」、「蛛式會社」、「新年數鳥嘉年華」、「空氣盒子」等，都大舉出現在社會之中（Busch, 2014 ／王惟芬譯，2018）。公民

科學運動儼然成就了一種「互相學習與對話」的模式，讓科學家、一般民眾及科學政策制定者等不同類型的公眾群體，在具備同等參與科學與科技活動的動機前提下，相互學習並建構知識，並制定相關政策，在這種彼此都兼具傳播者與接收者的對等身分、多元參與的關係下，各自的傳播角色於此得到交換，而複雜的科學議題與爭議便有機會透過理解獲得解決（江淑琳、張瑜倩，2016；McCallie et al., 2009）。

科學研究為了分析、描述或理解特定事件的前因後果，往往需要收集數據，以往透過人工進行測量工作，效率非常低下；然而，拜高速發展的電子技術之賜，平價感測器以及新型監控功能，讓科學研究的方式已出現了諸多新的可能 (Fisher & Gould, 2012)。近日，一般民眾對於科技的掌握能力，已透過網際網路、行動裝置、數位自造、微感測器、開放原始碼等面向，獲得突破性的解放（Anderson, 2012 ／連育德譯，2013；De Paoli & Storni, 2011; Hemmi & Graham, 2014）。這股創新的趨勢，亦跨域蔓延進入了公民科學的領土中；與過去相較，現今一般人能更輕易地擁有強大的工具進行數據蒐集，並以自下而上的群眾研究型態，來瞭解所在的環境狀態 (Newman et al., 2012)；Conrad & Hilchey (2011) 的研究指出，因成本下降，各種連網的行動設備都具備了多種感測器，所收集的資料透過網路不斷地被共享與分析，藉此，大眾對於獲取在地環境數據的需求也日漸殷切；Jiang et al. (2016) 認為，這種數據普及推動群眾對於環境變化的關注，便是「公民感測」（citizen sensing）的體現，且就在不同層面知識領域（如專業社群、創客空間、自造者實驗室等）揉和在線與離線的廣泛協作下，公民感測正不斷地持續與發展當中。換言之，在媒體革新的影響下，群眾透過數位工具（數位社群平臺與數位自造技術），以創客的形式進入科學傳播的領域，這是一種技術民主化的彰顯，且透過結合專業科學資訊，與實驗設備的變相釋出，將促進專業科學家，和業餘科普愛好者之間的新實踐和橫向合作 (Landrain et al., 2013)。

所謂創客，就是創造事物的人 (Martin, 2015)，他們熱衷於學習製作的技術，並透過私人時間設計與創造物件，進而修補、解決問題，同時還分享習得新知並與他人合作，以及進行社會公益；他們能從學習與分享的過程獲得成就感，不斷透過內在獎勵驅使自我再投入創造 (Dixon & Martin, 2014; Dougherty, 2013; Kalil, 2013)。而「創客運動」（Maker Movement），則指前者的人數愈來愈多，並在實體與數位社群中，分享創作物件的成果與製作方法 (Halverson & Sheridan, 2014)；這昭示了人們渴望透過製作，來重新灌注對於形塑物件的熱情，更重要的是創客們以網路分享資訊為為本，集結成強大群體，並透過「混搭」概念來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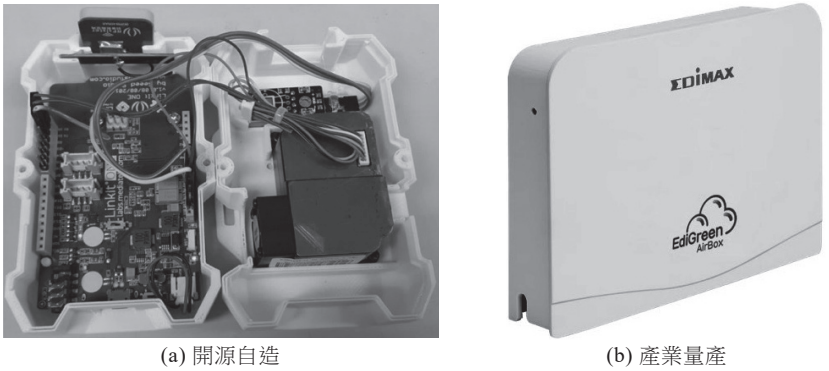
行藝術、科學與工程的創作 (Dougherty, 2012)。Martin (2015) 認為，數位工具、社群軟硬體的建構（包含線上資源、實體場地與活動），以及社群中的「創客態度」（The Maker Mindset），是形成創客風潮的三個潛在要素。

三、開放式的科學參與：空氣盒子

空氣盒子（圖 1）計畫，是基於創客脈絡之下，結合專業科學而成的一件公民科學專案 (Chen et al., 2017)。在計畫前期階段，發起人就決定將軟硬體資料全部公開，並鼓勵創客們參與實作，以產出感測器推廣空氣品質監測（袁明豪、陳宥羽，2017）。如此「開放軟硬體原始碼」的精神，是專案成功的關鍵，它讓任何人都能使用空氣盒子的原始架構（基於 LASS 系統），配合自身需求改裝後運用於不同情境，這是一種透過資料共享，並結合跨域協作，以促進公民參與科學的模式 (Chen et al., 2016)，最終讓群眾對於空氣品質監測的需求日趨興盛（謝宜婷，2020）。

初期順著創客社群與公民的推廣，空氣盒子迅速普及於城市的各個角落（康育萍，2019），不具備專業科學背景的民眾，能以簡易的方式在住所週邊建構空氣品質感測器，而透過網路回傳機制，專業科學家藉此可取得大量多元的資料，以進行後續分析；這種群眾採集數據，並交由專業人員研究的合作模式 (Chen et al., 2017; Chen et al., 2018; Ho et al., 2020; Mahajan, Chen, & Tsai, 2018; Mahajan, Liu et al., 2018)，說明空氣盒子實踐了公民科學的真諦，亦即專業科學家與業餘科普愛好者，各自從不同視角做出巨大的貢獻，最終，群眾將從環境科學分析結

圖 1：兩種不同版本的「空氣盒子」



(a) 開源自造　　(b) 產業量產

資料來源：(a) Chen et al. (2016, p. 98)；(b)〈AirBox 空氣盒子 V2〉（n.d.）。

果中獲益 (Chen et al., 2017; Chen et al., 2018; Ho et al., 2020)。然而，由於其感測元件成本低廉，且參與者設站位置不一定適宜，因此測量精度與官方儀器相比，仍有一定的落差（陳嘉惠等人，2019）；不過，這種手法讓群眾能簡易地自下而上參與科學監測運動，除了可增強民眾的環境意識外，亦可能有助於政府推行降低汙染的相關政策 (Sîrbu et al., 2015)。

從空氣盒子可以發現，環境數據的蒐集能夠輕易地參與，這是由於科學測量工具已透過數位媒體，進行一種轉化後的釋放，不但打破了一般人與科學的藩籬，亦增強了知識的擴散 (Jiang et al., 2016)；這種鼓勵群眾自由參與、動手實作，並公開數據成果的作法，亦體現了創客運動的「分享」、「合作」特色（袁明豪、陳宥羽，2017；Dougherty & Conrad, 2016／張家綺譯，2018），再伴隨著參與人數的增加，彼此創意的連接更達到了一種價值生產的良性循環，擴大了網路效應（network effect）的威力（Anderson, 2012／連育德譯，2013）。由此可以發現，空氣盒子基於創客文化以開放原始碼為本，從基本面革命性地打破了事物的原始組態，並向社會創新設計的實踐邁進，在社群與科技的互動之中，體現了一種參與式文化（participatory culture），最終直接促使人們思考當代文化與社會的可能性，以及媒體系統劇烈變遷等議題（邱誌勇，20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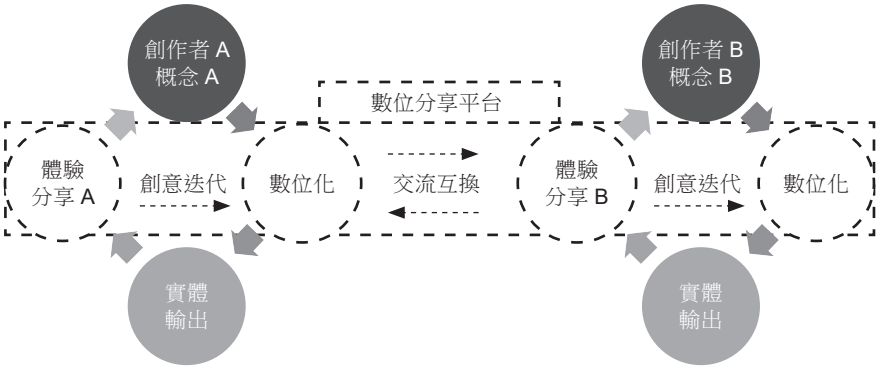
如同空氣盒子鼓勵參與者透過 DIY（do it yourself）形式自製量測設備，相同的手法還可見於另一個非營利組織：「開放科技公共實驗室」（Public Laboratory for Open Technology and Science, PLOTS）。2010 年，英國石油公司（British Petroleum，BP）在美國墨西哥灣造成嚴重的漏油事件，PLOTS 引導群眾以氣球或風箏夾帶傻瓜相機升空，從空中拍攝海上污染實況，並結合網路平臺製作污染地圖，透過這種手法，一般人得以更有效地推動公民科學 (Breen et al., 2015)；這項基於特定場域探索污染狀況的創舉，核心關鍵是讓群眾得以透過開放原始碼的方式，塑造自己的草根地圖（grassroots mapping），除了發現環境的問題，亦改變了科學研究的模式 (Dosemagen & Gehrke, 2017; Wylie et al., 2014)。一般而言，公眾對於專業科學技術往往不得其門而入，然而，PLOTS 官方網站卻提供了諸多價格低廉，並可自行製作的研究工具，提供一般民眾使用，進而讓公眾成為研究人員 (Breen et al., 2015)。同時，民眾們還能產出與分析自產的數據 (Dosemagen & Gehrke, 2017)，並同步積極開發和精進其工具，這種突破性的創舉，可視為 PLOTS 創建了一門強調「遞回」（recursion）的公民科學，亦即工具使用者能成為開發人員、教學者，抑或參與者，他們不僅可以創造知識，還可以自造工具並進行實踐 (Dosemagen et al., 2011)。

總體而言，在科普傳播的趨勢中，數位新媒體除了改變了大眾取得資訊的方式外，更提供了多樣互動的可能性，諸如事物狀態的改變（如 3D 列印技術將數位檔案輸出為實體物件）（田中浩也，2012 ／許郁文譯，2013），以及集體合作模式的變化（如社群在線上與線下的交流，以及專案協作模式）（邱誌勇，2016）等，為廣大科學愛好者開啟了多扇參與科學的管道，並成就一種科學與公眾對話的平臺。相較於傳統科學博物館所提供的科學「參與的公共性」，自造運動提供民眾參與科學的取徑，更能有效呼應江淑琳、張瑜倩（2016）所提出的「更民主的科學溝通」之意涵，藉由這樣的過程，公眾可透過更為創新與主動的方式參與公民科學，這是非常重要的課題。

四、創客運動結合眾人智慧的協作

從前述兩個案例可以發現，空氣盒子的核心 LASS，以及 PLOTS，兩者既是社群，也是自成一格的知識平臺，[4] 這種揉合開放討論、開放存取的型態，都鼓勵一般人以創客的形式，積極參與公民科學。於此，參與者製造自己的感測設備，往往都會經過以下的歷程（如圖 2）：首先，先依據自身所面臨的需求與經驗，在腦海中成形設計的概念，其次，再透過數位化編修，並結合運用他人的知識及技術（網路上的教學文件、原始檔，原始碼等），以及社群中的討論進行概念混搭；換言之，他們一邊參考他人創意，一邊同步置入自己對於創作物的意念，並

圖 2：創客概念循環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4 LASS 與 PLOTS 都有社群網站、線上討論區，相關軟體原始碼亦在開源平臺 GitHub 中開放。

逐步輸出實體，這是一種運用社群智慧成就創作的過程；於此可以發現，個體的意念透過數位化，結合「眾人的智慧」進行創作的方式，像是利用線上開放服務（如各種雲端平臺），下載他人電子原始檔案（如 Github 平臺）、多媒體教學文件（如線上教學影片），甚至於線上群組進行分享討論，都是當代的一種創作生態（曾靖越，2017 年 12 月）。在 LASS 與 PLOTS 之中，參與者們彼此進行分享、討論、編輯等參與式文化活動，以切身經歷與感受為本，實作環境感測與記錄器，整體而言便直接參與了科學；在更積極的核心意義上，公眾透過創客運動參與公民科學的本質意義，已從過去資料蒐集層面的參與，進而優化延展至思維層面的參與；換句話說，在科技民主化的風潮下，數位化所帶來在物件上的根本質變，已讓個體的「對於環境的感受」，藉由數位傳播與編輯的過程，成就了一種「創作實踐」，讓創客運動在本質上直接地推動了公民科學的積極進展，眾人的創意思想（亦即各種公民科學專案的開放內容）亦持續被不斷地被粹鍊，並深化於社會之中。

自造者文化究竟埋下了何種自發的影響力？讓空氣盒子不但廣受信任並普及。研究者認為，空氣盒子的初始原力，是以前文所提的創客風潮三要素（數位工具、創客社群軟硬體，創客態度）(Martin, 2015) 為核心，並在兩個關鍵驅力：「開放原始碼」與「虛實社群」當中循環成長；廣大的自造者不停地在這兩種加速器中，來回生產與再造各種創意思想 (Peppler & Bender, 2013; Tan et al., 2016)，形塑出了生機勃勃的創客運動，並且成為帶動社會革新的關鍵驅力。本文後續將針對開放原始碼的協作現象，以及創客社群如何不斷地跨越虛實，增益與加值各種創意思想的實踐過程進行探討。

參、開放原始碼下的科學普及：混搭和協作的參與式文化

一、群策群力的骨幹：開放原始碼（open source）

從當代諸多公民科學活動中發現，科學數據的量測已便利到能夠透過手機應用程式、無線感測器等設備，自行動手嘗試 (Newman et al., 2012)。這些計畫多採用「開放原始碼」（開源）的型態（包含軟硬體與數據資料），讓專案內部的環節，可被其他計畫重複使用，這種積極的發展性，亦促進了科學的影響力 (Hecker et al., 2018)。

開放原始碼泛指一種開放的標準，它透過分享軟體的原始程式碼，讓身處各地的網路使用者，可針對軟體進行合作開發 (Gacek & Arief, 2004)；開放原

始碼不僅意味著程式碼可以被自由運用，相對地，使用開放原始碼資源進行修改的軟體，亦須開放程式碼，無限制地再提供他人自由運用、修改或衍生相關作品 (O'Reilly, 1999)，因此，開放原始碼軟體也是一種非競爭性的公共產品，它在人人均可取得、改變軟體的前提下，保留程式碼貢獻者的私有智慧財產權 (O'Mahony, 2003; von Krogh & von Hippel, 2006)；另一方面，開放原始碼專案的開發者，也往往都是該服務本身的使用者 (Gacek & Arief, 2004)，這充分說明開源開發者不但滿足了自身需求，更貢獻一己之力開放軟體造福他人。然而，開放原始碼不單是軟體層面，所謂「開放硬體」（open source hardware）如 Arduino、樹莓 pi（Raspberry Pi）便是價格低廉，且近年來廣為使用的開源電路板 (Jiang et al., 2016; Reguera et al., 2015)；與開源軟體雷同，開放硬體指的是一種開放的硬體設計，任何人均可根據該設計架構免費進行研究、修改、製作、分發，甚至銷售這個設計架構或產出硬體 (Pearce, 2012)。開放原始碼與數位製造設備的廣泛應用，讓具備合作創新，以及參與者自造等特色的創客運動，已成全球新趨勢 (Chorianopoulos et al., 2012; Tan et al., 2016)。

空氣盒子計畫所採用的 LASS 系統，便是一套以開放原始碼、公益為出發點的軟硬體整合平臺。LASS 系統創建的初衷，在於期望取得各種環境感測值，並將數據於地圖上開放顯示與查詢，以造福所有使用者；為了實現這樣的願景，LASS 系統開發團隊盡可能地完成大部分的系統設計，並讓所有的軟韌體都開源，一般人只需要跟著手冊，利用坊間容易購得之電子元件，按步執行即可做出屬於自己需求的環境感測器（許武龍，2016）。空氣盒子計畫最初，LASS 社群集結了來自 19 個縣市的 40 位創客投入開發，[5] 將空氣盒子初始程式碼進行改寫，並自製微型感測器；正因為自造者社群的積極投入奠定基礎，再加上物聯網的趨勢，同時又有網通廠商協助開發，且將量產空氣盒子捐贈多個城市，最終促使環境感測激發出多樣的可能（呂苡榕，2017）。此外，開發市售空氣盒子的網通廠商，每年亦會邀請 LASS 社群成員持續進行討論，以鞏固「共享共創」的空氣盒子之初始開發精神（謝宜婷，2020）；換句話說，基於開放原始碼的創客參與，不但為空氣盒子的成功打下了厚實的基礎，亦深遠地影響了整體計畫未來的持續走向。因此，空氣盒子基於 LASS 系統來採集環境資訊的取徑，是開放、草根、自由的，可以按照參與者的需求進行客製化開發與大規模設置 (Chen et al., 2017)；

5 LASS 與空氣盒子的合作發軔於 2015 年，透過名為 LASS Field Try #1 的環境感測實作，讓空氣盒子原型設計與應用蓬勃發展（Lin，2015 年 12 月 11 日），參與的創客多為關心空品影響過敏問題的年輕父親（呂苡榕，2017）。

反觀傳統的官方空污檢測儀器，雖然精度高，但其技術，資金門檻甚高，設置點少，且其樣本採集作業，有其資訊產生的內在邏輯，一般民眾無法輕易介入更改；此外，這種大尺度的官方資料往往抹煞了環境差異，無法細緻、有效地呈現精確的在地資料，諸如針對空氣敏感族群的居住分布、活動脈絡，以及短暫暴露於高濃度污染之風險等資料作出評估，因此無法有效回應地方居民的身體感官經驗（杜文苓、施佳良，2019）。像空氣盒子這種有別於官方系統之外的開放平臺，藉由開放原始碼打開了一扇參與社會活動之門，人人都可依照自我的邏輯與需求，配合專案整體結構，構建「屬於自己」的環境測量儀器 (Mahajan, 2018)，是創客致力於科普傳播的典型案例。

二、混搭：一種調和的內容再造

基於網路下載與複製的便利，開放原始碼讓毫無技術背景的一般人，可以直接承襲專業行家的思想創意。換句話說，數位時代的思想，能在電子環境中重新混合狀態，進而破壞了所有物與所有權的傳統思維。這是一種「重新混合」（Remixing）的現象（Kelly, 2017／嚴麗娟譯，2017），這項形塑未來的科技趨力，是源自於數位位元的「可替代性」，亦即能夠任意改變與交融，甚至模擬其他形式；而伴著隨著全球經濟轉向於無實體的位元型態前進，非物質的流動性已在網路社會中逐漸加速，更推動了文化思想的劇烈變化；因此，在數位環境下，「取用」的概念勝於所有權，因為思維或想法如同數位原始碼，不會因為將想法（位元）交付給他人，自己就失去了那個想法（位元）。

Wiley (1998) 所提出的開放內容（open content）概念，亦呼應了前述重新混合的觀點，他定義了「5R 框架」作為基準，亦即：持有（retain）、重新利用（reuse）、重新修改（revise）、重新混合（remix）、重新散布（redistribute）(Caswell et al., 2008)，這更細緻地說明了數位內容的「開放」已從「分享」的型態升華為「繼承」，各種構想都能基於他人素材進行發展，進而大幅提高文化生產中的創造力 (Cheliotis, 2009)。整體來看，創客運動正是戮力落實著如此的混合意念實踐，於此，「個人自造」與「群體共創」在社群網絡當中，便可被視為是這種思維合併脈絡下，本質相通的兩種創作詮釋（田中浩也，2012／許郁文譯，2013）。

一項基於「智慧市民感測套件」（Smart Citizen Kit, SCK）(Balestrini et al., 2014; Diez & Posada, 2013)，形似空氣盒子的公民科學計畫「阿姆斯特丹智能公

民實驗室」（Amsterdam Smart Citizens Lab）(Kresin, 2016)，便充分呼應了前文的觀點；該專案透過自下而上的方法，來組織公民監測城市環境數據；在計畫規劃階段，先歸納出了參與者的需求，是以空氣品質為研究目標；接著，配合專家在工作坊的引導，參與者於自造者實驗室（Fablab）進行空氣感測器開發，從而實地執行環境監測與數據收集。計畫成果顯示，一般人要自行獨立進行科學數據的蒐集是有難度的，但專家團體透過教學與配合模組化的軟硬體套件，諸如開放軟硬體平臺 Arduino 電路板等，讓參與計畫者最終建立了能夠收集可靠數據、功能齊全的空氣感知系統 (Jiang et al., 2016)。

於此可以發現，開放原始碼於空氣盒子，亦或於阿姆斯特丹智能公民實驗室之中，都如同一個具備可塑性的中介平臺，它先以讓專家學者（如創客或是科學研究員）以專業的向度，定義出一種運用模式（空氣感測器），接著，透過一般群眾的參與，原初空氣感測器的運作基準與使用環境，為了因應不同需求，在過程產生了不同的修正樣貌（許武龍，2016），這形同專家最早開發的原始碼，已經在後續參與者的編輯過程中，形成了前文所提在意念層次上的「重新混搭」；換句話說，專家的「技術基底」與群眾的「在地需求」，在數位原始碼階段達成了一種調和的新式再造，Jiang et al. (2016) 認為，這是一種跨學科的經驗融合，讓不同領域如電子、環境科學、通信、資訊、設計、在地關懷等各種層面的體驗融為一體。另一方面，這種使在地社群透過開發技術，收集並共享相關數據，促使參與者因意識到在地問題而採取行動，亦可視為是「公民感測」的科學實踐 (Balestrini et al., 2017)。

三、協作：透明、合作下的科學技術民主化

若再從「協作」的角度進行剖析，無論是空氣盒子的 LASS 系統開放物聯網技術，或是阿姆斯特丹智能公民實驗室使用 Smart Citizen Kit 感測套件，這些系統都讓參與者自由地進行原始碼改造，如此協作成其大的現象，好比經典案例 Linux 系統的建構過程，讓廣大的網路使用者一同進行軟體除錯，或自行依需求改寫開發新功能，透過頻繁地釋出修正版本，除了強化整體穩定性，參與者之間亦能基於共享建立有效溝通，並互補地共構了系統的主體性（Raymond, 1999／衛劍釩譯，2014；Hertel et al., 2003；Malone et al., 2009）。Weber (2004) 認為，不同於物理世界，軟體的概念存在於多個彼此疊加的邏輯層面中，建構軟體的根本挑戰在於複雜的本質性；而開放原始碼藉由網路分散進行編輯，一如人聲鼎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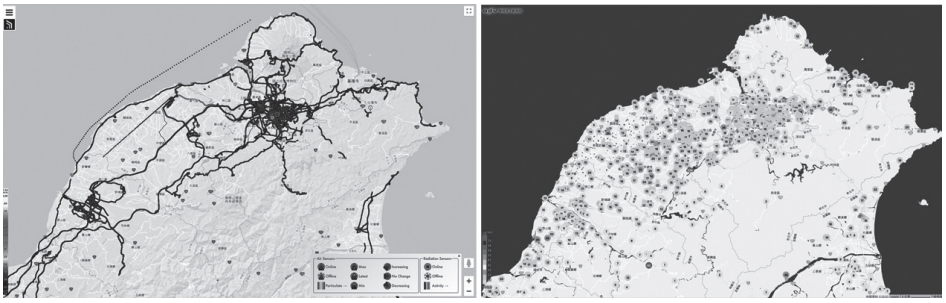
的市集（Raymond, 1999／衛劍釩譯，2014），是將成效立基在以網路平臺為交換場域，這種透過非強制性的群眾互動而成的浮動結構，反而能萃取出最有價值的資訊（McAfee & Brynjolfsson, 2017／李芳齡譯，2017）。總結來說，開放原始碼的核心真諦不是軟體的本身，而是其建構的過程 (Weber, 2004)。

於此，有別於開源文化下，參與者對於軟體本身的優化，協作還能從資料貢獻的角度進行探究，如另一項經典的公民科學案例：“Safecast” (Hemmi & Graham, 2014)，這是一個在 2011 年日本福島核能電廠災變後，迅速成立的公民輻射監測計畫，致力於偵測並公開分享環境輻射和其他污染資訊 (Brown et al., 2016)；它提供了一種開放原始碼的輻射偵測儀 —— “bGeigie”，一般民眾可以從網路下載檔案並自製，而後在行進間記錄輻射數值，最後上傳到網站分享，此舉透過網路協作方式，建構了一種以公民科學為中心的輻射劑量分布圖 (Aldrich, 2012)，民眾所提供的觀測數據，填補了官方無法及時、全面觸及的數據空白 (Hultquist & Cervone, 2019)，相關研究甚至指出，它所提供的量測資料與美國能源部（U.S. Department of Energy, DOE）相比，已被證明是可靠的輻射數據來源 (Coletti et al., 2017; Hultquist & Cervone, 2018)。

Safecast 與空氣盒子兩者所偵測之對象雖不同，但從參與的方式、設備的開發，以及數據的呈現都非常雷同。如兩項計畫均採用開放軟硬體模式，在本質上就具備了高透明度與高共享性，相關開發文件與原始程式碼都可在 GitHub 等線上平臺自由取得，且分別依循著 MIT 授權條款（MIT License），以及創用 CC（Creative Commons）組織 CC0（公眾領域貢獻宣告）的開源授權模式；另一方面，所有參與者所貢獻的輻射路徑，以及空氣品質資訊，最後亦會被整合在地理資訊與量測資料兼具的視覺化地圖中（如 Safecast Map，以及 g0v 零時空汙觀測網，圖 3）之中。Brown et al. (2016) 認為，與官方相比，透過成熟的開源文化和數位自造技術，群眾已能自力產出高品質、可靠的環境資訊，進而帶來了清晰透明的溝通性，公民科學便能取得更強的公信力。

從空氣盒子與 Safecast 的案例中，可見兩股新的社會驅力，讓民眾對環境變故的無可奈何，變成了能夠頻繁地積極應對，這兩種力量其一是開放原始碼下的「黑客」（hackers）文化，亦即透過具備彈性與開放的技術模組，來開發低成本的軟硬體設備，其二則是日與俱增的「網路群眾」，他們積極地參與了數據搜集與分析，進而推展了公民科學的整體進程 (Hemmi & Graham, 2014)；這兩股驅力，在創客空間當中催化與升華，進而使低成本、標準化的開放原始碼技術模組（如開源程式碼，開源硬體電路板）的可用性不斷提高 (Bonvoisin et al., 2017)；而藉

圖 3：Safecast Map (a) 與 g0v 零時空汙觀測網 (b)



(a) (b)

資料來源：(a) Safecast Map (n.d.)；(b)〈零時空汙觀測網〉（n.d.）。

由這種「免費開源硬體」（free open source hardware, FOSH）的傳播與影響下，前文所提的各個公民科學計畫，都可讓廣大的使用者透過網路共享資源，進而參與科學工作，還能將感測器取得的數據，再次透過線上儲存與分析服務，使環境資料升級，以影響更多的人事物 (Maia Chagas, 2018)；這些現象，都說明了當下科學技術民主化的新趨勢。

整體而言，諸如「空氣盒子」、「阿姆斯特丹智能公民實驗室」、“PLOTS” 抑或是 “Safecast” 等專案，其核心系統均運用 Github 平臺進行原始碼公開發布，讓人人皆有權力可無償地對計畫核心運作機制進行複製、修正及使用（只要有能力編寫程式），相對地，各種基於此平臺的軟體改良成果，亦被要求對外分享，以符合開放原始碼精神。最後，透過自造感測器所取得的環境大數據，回傳到專案平臺當中，再藉由科學專家透過各種不同優化的方式進行開放，獲取了更多人們對於環境的關注。這些現象點出了「開放原始碼」是網路社群年代的特有現象，這種價值的共創與共享，顛覆了以往傳統產權「排除」他人使用權利的概念，轉而聚焦於如何將產權進行「散布」（distribute）（李炳曄，2016；Weber, 2004）。與傳統經濟市場假設不同的是，網路共享經濟無須實質的金流來推動，群眾會自主進行資訊分享與軟體開發，最核心的動機除了滿足自身的需求外，就是在群體中的自我行銷，以及追求自我在軟體創作技巧上的成就感，最終做出貢獻而感到自豪 (Cheliotis, 2009; Hars & Ou, 2002; Hertel et al., 2003; Nov, 2007)，這是一種運用群眾計畫來成就自我實現的一種表達模式；人人都有表達的慾望，獲取榮耀與認可也是人類行動的強烈動機，許多開源社群開發者，都想被同儕認可並取得榮耀，透過軟體編寫、資訊分享的貢獻，能在群體之中樹立地位 (Malone et al., 2009)；開發原始碼架構下的價值概念，是以共創、互助與共享來推動著整

體社群的運行，從而形塑一種創意思想的烏托邦。

肆、創客社群穿越虛實的意義建構

一、創客跨虛實的互助協作

所謂「虛擬社群」，是指在線上互動空間中進行社交互動的群體，他們志趣相投，並且共享某種程度的知識與資訊，形塑了彼此間的關係與認同（翟本瑞，2011；Kozinets, 1999；Rheingold, 1993）；然而，若放眼自造運動中的創客社群，不但會在虛擬空間交流討論，更在實體世界集結協作，是一種跨虛實的社群。首先，創客往往因為尋求問題與技術解決之道，而在線上群組討論，從而由他人的製作經驗中找到靈感，並進行檔案交換與下載（Anderson, 2012／連育德譯，2013；Martin, 2015；Oehlberg et al., 2015）；然而，互動不會僅此而止，為了能夠真實創造物件，創客社群的實體聚會，常提供了數位機工具的使用與製作教學，讓群體一起工作、互相學習，在根本上成為了社群的樞紐 (Chorianopoulos et al., 2012; Dreessen & Schepers, 2018; Taylor et al., 2016)。這種兩棲於線上與線下的社群，體現了一種 O2O 模式（“online to offline” 線上到線下，或是 “offline to online” 線下到線上） (Rampell, 2010, August 8)，讓參與者得以於在線與離線的反覆切換，很明顯地為虛擬社群帶來了「本質上的改變」；這是一種認同的改變，也是本體中心的轉變，它讓人們重新思考與理解所謂的「真實」，在社群中不斷引發成員對「實在抽象化概念」，以及「虛擬真實性」的廣泛討論（邱誌勇，2016）。這意味著以數位傳播科技為主體的創客社群，本質是一種混合狀態的群體，他們以開放原始碼為核心，透過頻繁的虛實轉換，共同來完成各種社會意義的加值建構；這種轉換，即是透過創客社群的「由線上到線下聚會」的活動樣態，以及「從概念導出為實體物件」的資訊轉換型態，體現意念、資訊、物質之間的來回轉化。

如同空氣盒子的核心LASS 系統，由於整體架構被創辦人定調為開放，因此，任何有興趣的環境感測參與者，都可以從官方網站找到專案的軟硬體原始碼（許武龍，2016；陳伶志，2016a），而且 LASS 社群臉書專頁亦提供技術支援與解答（張嘉玲等人，2018），這降低了廣大群眾製作專業感測設備的門檻；然而，不同於傳統的虛擬社群，創客社群的實體會面交流，更是非常重要的一環，這是由於數位工具的使用、電路板的焊接、程式的撰寫等等實作項目，還是稍具難度，若能有熟手引導，一般人在參與時會比較順手。因此，LASS 社群透過年年舉辦

年會，[6] 讓參與者以聆聽演講、參與工作坊等等方式，親身與同好交流，使其能夠更熟稔整體系統。這些實體交流的場合，如同創客空間（Makerspace）或自造實驗室（Fablab）的延伸，不但讓自造者的個人思想創意得以落實，也讓創客們透過真實會面，分享更為細緻的經驗與專業知識 (Rosa et al., 2017)；於是，實體創客空間成為創客運動的交流道，人們可以在此拓展自造所需的工具與技術，或是找到志同道合的專業人士，從而激發自己的靈感；整體而言，創客實體會面彷彿一個虛實切換的樞紐站，讓一個個在網路上孤立無援的個體，能在當面交流之中與他人切磋學習，進而演變為發光發熱的創作者（Dougherty & Conrad, 2016／張家綺譯，2018）；換言之，有別於其他虛擬社群，實體的實作參與、發表與分享，都是自造者社群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或說，這種虛實的身分移轉，是創客必經的日常文化。

從多次來臺舉辦工作坊的 Safecast 計畫，也能觀察到與 LASS 社群一樣的趨勢。以臺灣而言，輻射議題亦是公眾關注的切身議題，原能會透過環境輻射即時監測資訊網，定時更新呈現測站資訊（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2020），然而與環保署空氣監測所面對的狀況相同，除了官方的數據無法細緻地反應小區域的居民需求外，大眾對輻射也沒有深刻的感受；鑑此，臺北 Fabcafe（FabCafe Taipei）一位共同創辦人自 2013 年起，便四度邀請 Safecast 來臺辦理小型工作坊，希望臺灣群眾能認同輻射監測計畫並主動加入（陳文姿，2017 年 5 月 3 日；謝錦芳，2015 年 6 月 14 日）。前文提到，Safecast 所有資料都可上網取得，但 Safecast 團隊依然願意多次來臺，透過實體的講座與教學課程，在不同的國家關照不同需求，帶來了更好的經驗傳承；因此，這種創客互助協作的工作坊，體現出「慷慨」是其特質，是一種彼此願意為他人付出心力，透過奉獻自己時間、精神、創意等不同的方式，「關照」他人自造專題的一種無私精神（Dougherty & Conrad, 2016／張家綺譯，2018）。另一方面，創客們除了展現運用開放原始碼協作的集體智慧，以及跨域共創的特質外，更彰顯了對於「動手實作」的看重，這呼應了美國實用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1859–1952）之教育哲學，亦即讓學習者「由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透過主動的「反思」來領會事物之間的關聯，使原初的未經反省的經驗（primary, unreflective experience），轉化為深層化的內省經驗（secondary, reflective experience）（Dewey, 1986；轉引自吳木崑，2009），這種經驗是由學習者自身建構的，而非引導者強加灌輸的，因此學習結果將深刻久

6 LASS 成立於 2015 年底，2016 年在中研院舉辦第一屆年會，截至 2019 年為止，已經連續舉辦四屆年會（林彥維，n.d.，2016 年 11 月 21 日，2017 年 8 月 23 日，2018 年 8 月 28 日）。

遠地內化於學習者心中（同上引，頁 36）。創客的實作厚實了公民科學知識形成的基礎，再加上該社群從虛擬到實體的聚合，都具備的開放性與主動性特質，這營造了一個有利於參與的學習環境（王冠婷，2014），更降低科學實驗的門檻，讓參與公民科學成為學習、成就自我、充滿意義的社會活動。

二、基於開放內容的意義建構

今日，各種數位設備已讓個人與公眾的邊界產生瓦解，公共空間轉變為一個廣泛的區域。空間、時間、地理位置等要素都不斷地被重新定義，協作、集體、跨域交流亦開始在當代流行，這種網路化的現象，重塑了我們的身分與社會系統（Paul, 2011／任愛凡譯，2012）。開放原始碼文化允許無償使用他人檔案與原始碼，創客便能迅速跳過草創階段，並以他人的思想為基礎模塊，開發屬於自己的客製化功能 (Tan et al., 2016)，這是基於群體智慧，並透過程式語言來建構屬於自己的價值觀。另一方面，隨著數位機工具以及開放軟硬體的普及，Büching (2013) 認為，創客社群橫跨虛實，將數位的東西變成實體，亦即讓「虛擬物進入真實的物質世界」，這是電腦革命下的新特質（邱誌勇，2016），正因於此，創客們積極激盪下所生的構思與創意，便能在數位檔案混搭、各種資訊界面交織的型態下，不斷地被分享、提取、改造、轉換型態，進而有效地在虛擬平臺中開放他人使用，並期待著被他人進行更進階地改造，從而成就了愈來愈好的體驗（田中浩也，2012／許郁文譯，2013；Kuznetsov & Paulos, 2010）。因此，參與開發空氣盒子的創客們，因應自身需求投身公民科學，將無實體的開放原始碼轉化為有形物，創作「自製物件」的現象，可視為是對傳統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去中心化，就資訊科技而言，亦是一種人類思緒透過電腦演算的表達（expression）過程，它們是數位工具衍生的實體物，然而若從語言學角度視之，它們則是某種可被感官意識到的符號組合 (Büching, 2013)。換句話說，創客在空氣盒子中，藉由符碼（開放原始碼）自製文化符號（實體感測模組），戮力堆疊著個人對於環境與科學的積極關照。

空氣盒子計畫便實踐著這樣的脈絡，目前基於 LASS 系統所建構的空氣品質感測專案，還有 LASS FT、LASS4U (Chen et al., 2017)、IASS（Indoor Aware Sensing System）等專案，[7] 這些基於同一原始碼所衍生的不同感測模組，建構

7 基於 LASS 系統所建構的各種臺灣在地感測計畫，相關發表可見於 LASS 社群舉辦的「2015 LASS 開源社群見面會」（https://youtube.com/playlist?list=PLJYQbDzKBkcJY__9KIZibdM-3ttExpU7M）與「2016 Maker Faire LASS 社群自造成果分享會」（https://youtube.com/playlist?

的目的各異，如 LASS FT 是最早的空氣盒子版本，提供高度自由組合的彈性；而 LASS4U 具備觸控功能，讓一般人更容易使用；IASS 則更專注於感測室內環境；這些都是 LASS 群組創客們循著前人基礎，一次又一次不斷衍生新創、具備不同意義的新版本感測裝置。如此基於開放原始碼的新意義建構，還能從「農業感測計畫」（Sensors for Farm）看到；「農業感測計畫」也是基於 LASS 系統的環境感測專案，該計畫響應開放原始碼生態學（Open Source Ecology）的理念（顏理謙，2016），嘗試運用自製的軟、硬體，將農業科學資料數位化，讓整體自然環境的變化得以納入生產考量（陳幸延，2019），藉此協助一般農業工作者所面臨的問題。於此，農業實作知識與科技物聯網等知識之間，產生了更為靈活的相互轉譯，亦即一種「創造性的轉化」（creative-transformation），是一種改變既定語言，並延伸自我視界的雙向轉化過程，因此，農民透過學習成為科學家而成為新的農民，科學家也透過學習成為農民而成為不一樣的科學家（蔡晏霖，2016）；由此可見，透過創客實作進行意義建構的過程，亦促成了公民科學參與者在身分上的轉化，更重要的是，這種不同情境的身分變換，將會讓參與者有機會以不同的角度看待環境的面貌，進而產生更多參與環境、貢獻、保護的可能性 (McKinley et al., 2017)。

整體而言，LASS 系統架構下的不同專案，在開發演化的過程中，個人（創客）在意義空間（開放原始碼）中置入了自我的需求，並與前人齊心協力的成果進行重混，同時加值增益了原來的需求，亦產生了新的詮釋；因此，在整合的層次上，LASS 社群的創客們透過空氣盒子，所實踐的是一種廣大的意念共構，這是一種「合作式的意義建構」過程，它起始於個人，實踐於團隊，存放於詮釋，並終結於個人意見的定位（翁秀琪等人，2011）；換句話說，在創客的社會脈絡中，意義建構是個人的，也是社群集體協力的活動，個人對於可用資源的搜索、評估和過濾，與群體整合性的討論，都在伴隨在共構意義的過程之中，正因於此，創客跨越虛實，以不同面向溝通、互助而實踐專案的現象，都是印證形塑意義的過程，再加上開放原始碼的一源多義，使得不同創客有不同的闡釋，這說明了：意義的形成是反覆且高度可變的，而且成功的意義建構，是從「增益」（accretion）、「協調」（tuning）、「重建」（restructuring），三種層面上進行個人概念上的更新 (Zhang & Soergel, 2009, April)。誠如 LASS 系統創辦人在 2016 年第一屆開發者大會所言：「LASS 不是我的，是你的，是大家的。」（林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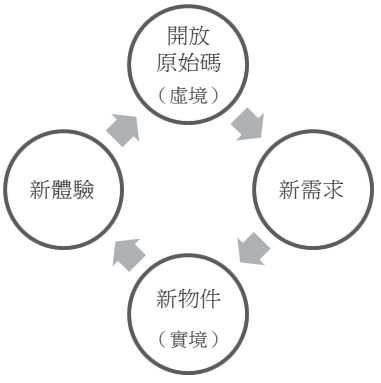
list=PLFvE_wi_SyGKGc5AhuuMRjIKfQ53Vvu6R）。

彥維，2016 年 11 月 20 日）這句話充分體現了開放原始碼的參與式文化基底精神，它鼓勵著參與者進行共創，藉此成就自我。

Nake (2013) 認為，創客的實踐，是藉由新媒體進行著一種心智與實物的複合創作過程，它往復循環於「數位原始碼」，「物件敘事情境」，以及「物質物件」三個環節之中。從 LASS 社群實踐空氣盒子的過程，亦能印證這樣的看法，不過，研究者認為應該強調循環中「原始碼的開放性」以及「虛實互換」的定位（圖 4）；亦即創客們基於開放原始碼的前人經驗，以及實際的需求與情境，積極地用符碼堆砌自己的定義，來形塑感測器，讓空氣盒子計畫有著各種不同的特性與功能，從而得到新的體驗；最後，這些不斷迭代的不同概念、物件與經驗，亦以數位符碼形式留駐在開放原始碼之中，並供他人進行下次的存取。換句話說，由創客所構築的專案成果，可以視為駐留在雲端的「技術」，形同一個科技複合體，它針對各種問題提供了有目的處理法則，並伴隨著人類社會不斷演進變化（Arthur, 2009／曹東溟、王健譯，2014），彷彿是一種自創生的、會自我變化的類生命體，朝著預想的發展方向前進，依附著人類不斷地演化出更好的形式（Kelly, 2010／嚴麗娟譯，2012）

若再從資料蒐集與貢獻的層面進行思考，空氣盒子微型測站深入鄉里，所採集的資料能充分即時反映小區域狀況，進而揭露了一種在地、原鄉，屬於自身環境的本來面貌，這是一種隱含於環境與社會之中，更為細膩的當下意義與生活狀態 (Chen et al., 2017; Kresin, 2016)；於此，參與者透過貢獻數據，亦是基於創客

圖 4：創客透過虛實互換進行意義建構的循環過程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建構的成果（感測器），反映著廣大不同區域的空氣品質脈動；[8] 如同空氣盒子發起人談到：

> 因為資料都是公開的，所以，當我在南港裝一臺監測器，那任何人都可以知道南港的空品；當你在臺中裝一臺監測器，我要去臺中前，也可知道當地的空品。換句話說，就是大家各自貢獻資料，互相幫忙。（陳文姿，2017 年 4 月 7 日）

這種現象也彰顯了參與式文化，亦即人人皆能提供資訊，且亦能隨意取用資訊，透過平臺，訊息的即時生產與使用是一體兩面的事情，於此，資訊「生產者」與資訊「消費者」的界線於此消弭，訊息的設計與獲取方式的創新便從而民主化 (Fischer, 2011)。總的來看，空氣盒子跨域整合了不同社群，諸如感測儀器運用的技術者、創客開源社群、資訊專家等，這形同逐步建立了空汙調查的志願網絡系統，能使公民科學更有機會捲動政策的設定（杜文苓、施佳良，2019），是一種空污風險意識崛起的風潮下，民眾重新詮釋與定義空污問題的意義建構過程。然而，空氣盒子並非完全沒有問題，發起人曾於訪談中提到，有些參與者因不再參與而讓盒子離線，且網路不穩、停電等狀況，亦讓部分裝置無法被計畫掌握（古國廷，2020 年 6 月 30 日）。且部署環境的不同，感測器的量測品質一直是被質疑的重點，為此，中研院亦研發特定演算法來判定感測器狀態（謝欣紘等人，2017 年 12 月）。更重要的是，雖然開源讓任何人都可以成為創客，但想要徹底掌握各種感測方式，如自行開發客製化空氣盒子，還是稍具難度，畢竟焊接電子元件、撰寫程式碼對新手而言充滿了挑戰，但前文提到創客慷慨互助之協作文化，亦降低了這些門檻。

總體而言，創客們試圖運用開放原始碼的共構，以相同的傳播技術基底、共同的顯示介面，在共通的語彙當中，透過一套共享的規範進行互動，進而建立了彼此可理解的象徵符號系統（翟本瑞，2011），藉此得以合作完成公民科學專案，並創造價值與意義；這彷彿一種集體記憶的建構，一種有如 Benedict Anderson 所言的「共同語言」，正在凝結著彼此的思路與集體意識，透過群體互動自發衍生成一種歸屬感，維繫了對於整個社群的想像，讓群體凝聚為一個「想像的共同體」（Anderson, 2006 ／吳叡人譯 2010）。

8 如由中研院與 LASS 社群協作的 PM2.5 開放資料入口網站，就提供了由空氣盒子反饋資料而成的即時感測地圖、資料分析結果以及相關的資料視覺化工具。

伍、結語

一、創客運動提供了更民主的科學參與途徑

一般民眾對於空氣品質的掌握，從過去較難從官方儀器得到共鳴，到了現在已能從遍地開花的空氣盒子，以即時、貼近在地的方式得知空品資訊；經過數年演變，空氣盒子目前已深化成為臺灣重要的環境感測計畫典範；截至 2019 年為止，臺灣透過環保署、教育部及中研院等單位共同推動，以及民眾私人自行購置，已設立了數千個空氣盒子據點（行政院環境保護署，n.d.），空氣數據的採集已經具備一定規模。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臺灣經驗是難能可貴的，因為類似計畫常因缺乏追蹤、觀察與資料開放，往往乏人問津而收場，根植於創客社群的啟動，空氣盒子在產官學界與民眾的努力下，形成了非常正面的生態（陳文姿，2017 年 4 月 7 日）。

發起人曾談到，計畫雖始於中研院，但在 2015 年結合 LASS 社群的力量後，才開始有了突破性的進展，這是基於開放、開源的精神下，藉由學研單位研發關鍵技術，並透過創客社群快速進行原型開發，以至於產業界與政府加入後，才有如此大規模的數量成長（陳伶志，2016b）。由此可知，LASS 社群的創客們賦予給空氣盒子的初始原力，是空氣盒子飛躍成長的關鍵；創客們運用數位傳播科技，秉持開放原始碼的初衷，以及互助的精神，透過線上的資料分享以及虛擬社群討論區的互助討論，再結合年會與各種工作坊的實體活動，帶領計畫參與者延伸發展不同的環境感測模組，這種頻繁的虛實轉換，包含「由線上到線下聚會」的活動樣態，以及「從概念導出為實體物件」的資訊轉換型態，都是形塑各種社會意義的加值建構過程，因此，參與者往往都能在創客社群中，找到更深層與細膩的環境感測手段；易言之，相較於政府感測環境提出的因應之道，創客們定義自己的問題（通常也是一般人的問題），運用數位科技解決自己的問題，再把解決之道開放分享，藉此亦實現了創客無私關懷的精神，讓一般人得以自主、輕易地掌握更為細膩的環境資訊。

另一方面，從普通民眾的視角也能發現，透過空氣盒子，掌握第一手空氣資訊已不是難事，且更重要的是，空氣盒子預設就是一臺「為別人而生的儀器」，提供監測資料讓全民共享，在設備初始階段就得到臺中原鄉文化協會認養，並於臺中迅速普及（陳文姿，2017 年 4 月 7 日；康育萍，2019）。民眾因此取得機會和資源加入公民科學，並在空汙的社會爭議和對話中，於不同的群體之間建立共識（如空氣盒子的數據已成為小區域的空氣品質參考指標），同時解決一般參

與民眾切身相關的問題（相較於大型測站，空氣盒子的空氣品質資訊較為即時）(Fischer, 2011)。不過，大量且自由參與的空氣盒子亦衍生管理困難的問題，除了前文提到設備斷線問題外，感測器、新舊空氣盒子之間的校準，仍然需要提升，針對這樣的情形，空氣盒子團隊與時俱進地不斷發展新演算法，以提高數據的可信度 (Chen et al., 2018; Ho et al., 2020)，還以更具創意、細緻、即時的資訊推播（如 LINE 聊天機器人服務），造福社會大眾，這是專業科學家積極回應參與者貢獻資料，進而提供更優質微型區域空品資訊的努力。但整體而言，一般使用者亦不應盲目相信有絕對正確的數據，反之，無論官方測站抑或空氣盒子都是不同的資訊來源，在取用的同時應該援引不同數據作為參考，以實現計畫與官方測站資料能夠互補之初衷，進而得到細緻且較為客觀之環境樣貌。

二、創客以創作實踐參與科學

創客藉由自我的需求與強烈的社會參與感，運用數位科技打造屬於自己的感測物，儼然成為了一個個跨域創作者，這是用自己面對環境的態度，來形塑感知世界的方法。Paul（2012／任愛凡譯，2012，頁 72）歸納了三個透過新媒體進行意義建構的模式，基於創客的創作實踐，它們也能作為一種框架，來理解一般民眾如何透過空氣盒子參與公民科學：

首先是「數據空間的不同視覺形式」，本文提及相關專案的成果，多是將參與者上傳的數據經過系統的整合與再現，而呈現具備意義的「地圖」（Paul, 2011／任愛凡譯，2011，頁 78），這是一種將焦點朝向「治理藝術」（art of governance）的關注（Sack, 2011／任愛凡譯，2012）；亦是一種從更大格局，關注群眾集合體運行的視角，因此，作為民主社會中更大政治體的一部分，我們需要在更大政治與文化環境中，看見我們自己與我們想像的團體（轉引自 Sack, 2011／任愛凡譯，2012，頁 107）。

其次是「身分的複合體現」，亦即創客們都身兼了開發、使用、分享三種不同屬性的身分，諸如 LASS 系統讓參與者從網路繼承他人智慧，透過開源文化實作物件，親身實踐在地環境探測並分享資料，或成為傳播者力行教育薪傳，從而造福更多的人。

最後則是「基於協作的文化生產新方式」，這意味著開放原始碼彷彿一種另類的社群平臺，讓大規模的參與者進行協作，以保持自身的持續發展，同時創客們的思維，便以程式符碼的形式駐留在開源社群之中，共同進行由下而上

的思想混搭，實踐了參與式文化。最終，人類個體的意念得以就大眾智慧為基礎，透過網際網路挪移到了全球集體心智活動當中（Diamond, 2011 ／任愛凡譯，2012）；這是一種自造運動下的形塑集體智慧的方式，更是一種協作生產文化的分工過程。

總結來說，基於創客風潮，一般人能夠透過創作實踐更自由地參與科學；創客社群以網路平臺（系統、開放原始碼或社群）為基礎，基於開放分享的協作模式，透過數位空間不同形式的資訊傳遞（包含分享專案內容，以及各種測量數據的貢獻），成就了新的協作與文化生產方式，讓本文探討的相關公民科學案例，均能以新媒體傳遞更為細膩的環境資訊，並取得大眾普遍的信任。在這樣的脈絡下，參與者除了實踐公民科學的社會大命題外，亦從透過社會意義的創造，以及經驗的共享而獲得整體的認同感與歸屬（邱誌勇，2016），從而體現了「更民主的科學溝通」。

參考書目

〈AirBox 空氣盒子 V2〉（n.d.）。《Edimax》。上網日期：2020 年 2 月 26 日，取自 https://www.edimax.com/edimax/merchandise/merchandise_detail/data/edimax/tw/air_quality_detection_semioutdoor/ai-1001w_v2/

Lin, M. [Macpaul Lin]（2015 年 12 月 11 日）。〈LASS 開源社群見面會 - 2. 全臺 Field try 成果分享—陳伶志—2015-12-10—MakerPro〉〔影像檔〕。取自 https://youtu.be/CO5Dmr3Axf0

王冠婷（2014）。〈FabLab Dynamic：科技、創意與社會的動態連結〉，邱誌勇（編），《數位藝述第肆號：數位設計——創客與自造時代》，頁 132-139。臺北：數位藝術基金會。

王惟芬譯（2018）。《意外的守護者：公民科學的反思》。臺北：左岸文化。（原書 Busch, A. [2014]. *Incidental steward: Reflections on citizen scienc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方儉（2018 年 11 月 15 日）。〈給吳焜裕委員的一封公開信〉。上網日期：2020 年 6 月 30 日，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fangjay2011/posts/10216551054869893

立法院（2018 年 12 月 18 日）。〈立法院第 9 屆第 6 會期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第 8 次全體委員會議紀錄〉，《立法院議事暨公報管理系統》。上網日期：2021

年 1 月 15 日，取自 https://lci.ly.gov.tw/LyLCEW/lcivComm4VOD.action?Meeting_Date=1071114&p1_2=%E6%95%99%E8%82%B2%E5%8F%8A%E6%96%87%E5%8C%96&p4=%E5%90%B3%E7%84%9C%E8%A3%95

古國廷（2020 年 6 月 30 日）。〈自己的環境自己救！以空氣盒子監測你家附近的空汙〉，《研之有物》。上網日期：2021 年 1 月 1 日，取自 https://research.sinica.edu.tw/pm25-air-box-new/

行政院科技部（2018）。《科技部建構民生公共物聯網計畫》（政府科技發展中程個案計畫書，108-1904-02-20-02）。上網日期：2020 年 9 月 18 日，取自 https://www.ey.gov.tw/File/46FFAD9114F278C1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2020）。〈環境輻射即時監測資訊：臺灣含離島〉，《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輻射偵測中心》。上網日期：2020 年 9 月 22 日，取自 https://www.aec.gov.tw/gammadetect.html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n.d.）。〈認識空污感測物聯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空氣品質監測網》。上網日期：2020 年 8 月 20 日，取自 https://airtw.epa.gov.tw/CHT/Encyclopedia/AirSensor/AirSensor_2.aspx

江淑琳、張瑜倩（2016）。〈更民主的科學溝通：科學類博物館實踐公眾參與科學之角色初探〉，《傳播研究與實踐》，6（1）：199-227。https://doi.org/10.6123/jcrp.2016.008

任愛凡譯（2012）。〈信息可視化美學〉，Lovejoy, M.、Paul, C.（編），《語境提供者：媒體藝術含義之條件》，頁 88-107。北京：金城。（原書 Sack, W. [2011]. Aesthetics of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In M. Lovejoy, C. Paul, & V. Vesna (Eds.), *Context providers: Conditions of meaning in media arts* (pp. 123-150). Chicago, IL: Intellect.）

_____（2012）。〈描繪集體〉，Lovejoy, M.、Paul, C.（編），《語境提供者：媒體藝術含義之條件》，頁 146-173。北京：金城。（原書 Diamond, S. [2011]. Mapping the collective. In M. Lovejoy, C. Paul, & V. Vesna (Eds.), *Context providers: Conditions of meaning in media arts* (pp. 199-232). Chicago, IL: Intellect.）

_____（2012）。〈語境網絡：數據、身分和集體生產〉，Lovejoy, M.、Paul, C.（編），《語境提供者：媒體藝術含義之條件》，頁 72-87。北京：金城。（原書 Paul, C. [2011]. Contextual networks: Data, identity, and collective production. In M. Lovejoy, C. Paul, & V. Vesna (Eds.), *Context providers: Conditions of*

meaning in media arts (pp. 103-122). Chicago, IL: Intellect.）

杜文苓、施佳良（2019）。〈挑戰空汙：初探社區行動科學的在地實踐〉，《傳播研究與實踐》，9（1）：1-32。https://doi.org/10.6123/jcrp.2019.01_9(1).0001

吳木崑（2009）。〈杜威經驗哲學對課程與教學之啟示〉，《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學報．教育類》，40（1）：35-54。https://doi.org/10.6336/JUTe/2009.40(1)2

吳焜裕（2018 年 11 月 14 日）。〈空氣盒子應提供民眾正確的空氣品質資訊〉。上網日期：2020 年 9 月 18 日，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Wukuenyuh/posts/694172744297365

吳叡人譯（2010）。《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臺北：時報文化。（原書 Anderson, B. [2006].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NY: Verso.）

李芳齡譯（2017）。《機器．平臺．群眾》。臺北：天下文化。（原書 McAfee, A., & Brynjolfsson, E., [2017]. *Machine, platform, crowd: Harnessing our digital future*. New York, NY: W. W. Norton & Company.）

李秉芳（2018 年 11 月 15 日）。〈「空氣盒子」錯了嗎？數據和環保署的不一樣，立委說要刪預算惹議〉，《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上網日期：2020 年 9 月 18 日，取自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267

李炳曄（2016）。〈網路導向的藝術機器開發：一個開放原始碼實作的洞察〉，邱誌勇（編），《數位藝述第伍號：數位文化 網絡世代的哲思》，頁 110-121。臺北：財團法人數位藝術基金會。

呂苡榕（2017）。〈臺灣暖爸揪紫爆元凶 吸韓國、印尼取經〉，《今周刊》，1094：42-49。

林彥維（n.d.）。〈2019 LASS 使用者與開發者大會〉，《UniHub》。上網日期：2020 年 2 月 26 日，取自 https://makerpro.cc/2018/08/2018-lass-annual-conference/

_____（2016 年 11 月 21 日）。〈【活動報導】第一屆 LASS 開發者大會圓滿落幕〉，《MakerPRO》。上網日期：2020 年 2 月 26 日，取自 https://makerpro.cc/2016/11/lassevent/

_____（2017 年 8 月 23 日）。〈【活動報導】第二屆 LASS 使用者與開發者大會圓滿落幕〉，《MakerPRO》。上網日期：2020 年 2 月 26 日，取自 https://makerpro.cc/2017/08/2017-lass-annual-conference/

_____（2018 年 8 月 28 日）。〈第三屆 LASS 使用者與開發者大會圓滿落幕〉，《MakerPRO》。上網日期：2020 年 2 月 26 日，取自 https://makerpro.cc/2018/08/2018-lass-annual-conference/

邱誌勇（2016）。〈實體與虛擬的並置參與：當代自造者運動的社群集結與想像〉，《考古人類學刊》，85：83-107。https://doi.org/10.6152/jaa.2016.12.0004

〈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n.d.）。《PanSci 泛科學》。上網日期：2020 年 2 月 21 日，取自 https://pansci.asia/archives/author/research-sinica

施琮仁（2016）。〈社交網站與公眾參與：「Pansci 泛科學臉書專頁」使用者研究〉，《傳播研究與實踐》，6（2）：209-241。https://doi.org/10.6123/jcrp.2016.020

翁秀琪、李嘉維、施伯燁（2011）。〈合作式意義建構：從一個個案分析發現理論〉，《新聞學研究》，106：1-48。http://dx.doi.org/10.30386%2fMCR.201101_(106).0001

袁明豪、陳宥羽（2017）。〈臺灣空氣品質監測／監督系統之公民參與實踐〉，《土木水利》，44（6）：10-14。https://doi.org/10.6653/MoCICHE.201712_44(6).0004

陳文姿（2017 年 5 月 3 日）。〈遊臺灣量輻射 SAFECAST 邀民眾加入輻射量測計畫〉，《環境資訊中心》。上網日期：2020 年 2 月 26 日，取自 https://e-info.org.tw/node/204431

_____（2017 年 4 月 7 日）。〈PM2.5 現形記：1,000 個小盒子完成不可能的任務〉，《環境資訊中心》。上網日期：2020 年 9 月 18 日，取自 https://e-info.org.tw/node/204036

陳伶志（2016a）。〈LASS 的下一步：從環境感測到環境教育〉，《科學月刊》，559：546-547。

_____（2016b）。〈自己的空氣品質自己量：談參與式環境感測的機會與挑戰〉。上網日期：2016 年 7 月 10 日，取自 https://www.slideshare.net/tw_dsconf/ss-64077120

陳幸延（2019）。〈智慧農業初探——當資訊走入田間〉，《科技報導》，466：4-5。

陳嘉惠、蔡詠名、張國楨（2019）。〈細懸浮微粒資料精確度校正探討：以臺北地區空氣盒子為例〉，《地理研究》，70：109-141。https://doi.org/10.6234/jgr.201905_(70).0005

康育萍（2019）。〈熱血爸爸帶頭衝，催生臺中半數空氣盒子〉，《天下雜誌》，

667：96-99。

連育德譯（2013）。《自造者時代：啟動人人製造的第三次工業革命》。臺北：天下遠見。（原書 Anderson, C. [2012]. *Makers: The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 New York, NY: Crown Business.）

曹東溟、王健譯（2014）。《技術的本質：技術是什麼，它是如何進化的》。杭州：浙江人民。（原書 Arthur, W. B. [2009]. *The nature of technology: What it is and how it evolves*. New York, NY: Free Press.）

莊秉潔（2018 年 11 月 18 日）。〈Airbox 是臺灣之光〉。上網日期：2020 年 9 月 18 日，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btsuang/posts/10218109847842885

許武龍（2016）。〈LASS 的理念與經驗分享〉，《科學月刊》，559：544-545。

許郁文譯（2013）。《FabLife：衍生自數位製造的「製作技術的未來」》。臺北：泰電電業。（原書 田中浩也，[2012]。FabLife：デジタルファブリケーションから生まれる「つくりかたの未来」。東京：O'Reilly Japan.）

張家綺譯（2018）。《自由自造》。臺北：商周。（原書 Dougherty, D., & Conrad, A. [2016]. Free to make: How the maker movement is changing our schools, our jobs, and our minds. Berkeley, CA: North Atlantic Books.）

張嘉玲、吳翎華、王秀文（2018）。〈自造者製作空氣盒子之知識探索行為〉，《工業設計》，137：20-24。

黃惠萍、劉臻、智飛（2017）。〈兩岸科普網站特色與傳播效果初探：以《果殼網》和《泛科學網》為例〉，《傳播與社會學刊》，39：93-132。

曾靖越（2017 年 12 月）。〈位元與原子：創作概念在自造時代的形態轉換〉，論文發表於「2017『創新、設計、經營』國際研討會暨亞洲基礎造形論壇」，臺灣，桃園。

曾蘭淑（2018）。〈城市的進化論〉，《臺灣光華雜誌》，43（8）：6-17。

〈零時空汙觀測網〉（n.d.）。上網日期：2020 年 2 月 21 日，取自 https://v5.airmap.g0v.tw/#/map

翟本瑞（2011）。〈從社區、虛擬社區到社會網絡網站：社會理論的變遷〉，《資訊社會研究》，21：1-31。https://doi.org/10.29843/jccis.201107.0001

蔡晏霖（2016）。〈農藝復興：臺灣農業新浪潮〉，《文化研究》，22：23-74。 https://doi.org/10.6752/jcs.201603_(22).0003

衛劍釩譯（2014）。《大教堂與集市》。北京：機械工業。（原書 Raymond, E. S.,

[1999]. *The cathedral and the bazaar: Musings on Linux and Open Source by an accidental revolutionary*. Cambridge, MA: O'Reilly.）

謝宜婷（2020）。〈自己的空氣自己救：公民社群推空氣盒子〉，《臺灣光華雜誌》，45（5）：106-112。

謝欣紘、何昱彰、劉謹瑋、陳伶志（2017 年 12 月）。〈從空氣盒子系統談環境感測的時空大數據分析〉，《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電子報》。上網日期：2020 年 9 月 18 日，取自 https://www.cienve.org.tw/epaper/106_4/tech2.aspx

謝錦芳（2015 年 6 月 14 日）。〈輻射偵測器 DIY 4 小時就搞定〉，《中國時報》，第 A8 版。

顏理謙（2016）。〈科技農夫陳幸延——農田裡的開源自造者〉，《數位時代》，265：114-115。

關尚仁（2010）。《科學傳播發展研究（一）：科學傳播源流》。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

嚴麗娟譯（2012）。《科技想要什麼》。臺北：貓頭鷹。（原書 Kelly, K., [2010]. *What technology wants*. New York, NY: Viking.）

_____（2017）。《必然：掌握形塑未來 30 年的 12 科技大趨力》。臺北：貓頭鷹。（原書 Kelly, K., [2017]. *The inevitable: Understanding the 12 technological forces that will shape our future*. New York, NY: Penguin Books.）

Aldrich, D. P. (2012). Postcrisis Japanese nuclear policy: From Topdown directives to bottom-up activism. In I. J. Miller, J. A. Thomas, & B. L. Walker (Eds.), *Japan at nature's edge: The environmental context of a global power* (pp. 280-292). Honolulu, H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https://doi.org/10.1515/9780824838775-017

Balestrini, M., Diez, T., & Marshall, P. (2014). Beyond boundaries: The home as city infrastructure for smart citizens. In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Ed.), *Proceedings of the 2014 ACM International Joint Conference on Pervasive and Ubiquitous Computing: Adjunct Publication* (pp. 987-990). New York, NY: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https://doi.org/10.1145/2638728.2641557

Balestrini, M., Rogers, Y., Hassan, C., Creus, J., King, M., & Marshall, P. (2017). A city in common: A framework to orchestrate large-scale citizen engagement around urban issues. In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Ed.), *CHI '17: Proceedings of the 2017 CHI Conference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s (pp. 2282-2294). New York, NY: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https://doi.org/10.1145/3025453.3025915

BBC. (2019, November 7). Inside Taiwan's tech industry. Retrieved September 18, 2020, fro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vGmhvqrTWU

Bonvoisin, J., Mies, R., Boujut, J.-F., & Stark, R. (2017). What is the "Source" of open source hardware? *Journal of Open Hardware*, *1*(1), 5. https://doi.org/10.5334/joh.7

Breen, J., Dosemagen, S., Warren, J., & Lippincott, M. (2015). Mapping grassroots: Geodata and the structure of community-led open environmental science. *ACME: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Critical Geographies*, *14*, 849-873.

Brossard, D., & Lewenstein, B. V. (2009).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models of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Using practice to inform theory. In L. Kahlor & P. Stout (Eds.), *Communicating science* (pp. 25-53). New York, NY: Routledge.

Brown, A., Franken, P., Bonner, S., Dolezal, N., & Moross, J. (2016). Safecast: successful citizen-science for radiation measurement and communication after Fukushima. *Journal of Radiological Protection*, *36*(2), S82-S101. https://doi.org/10.1088/0952-4746/36/2/s82

Büching, C. (2013). A universe of objects. In J. Walter-Herrmann & C. Büching (Eds.), *FabLab: Of machines, makers and inventors* (pp. 105-120). Bielefeld, Germany: Transcript. https://doi.org/10.14361/transcript.9783839423820.105

Caswell, T., Henson, S., Jensen, M., & Wiley, D. (2008). Open content and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Enabling universal education. *Th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Research in Open and Distributed Learning*, *9*(1). https://doi.org/10.19173/irrodl.v9i1.469

Cheliotis, G. (2009). From open source to open content: Organization, licensing and decision processes in open cultural production.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47*, 229-244. https://doi.org/https://doi.org/10.1016/j.dss.2009.02.006

Chen, L.-J., Ho, Y.-H., Hsieh, H.-H., Huang, S.-T., Lee, H.-C., & Mahajan, S. (2018). ADF: An anomaly detection framework for large-scale PM2.5 sensing systems. *IEEE Internet of Things Journal*, *5*, 559-570. https://doi.org/10.1109/JIOT.2017.2766085

Chen, L.-J., Ho, Y.-H., Lee, H.-C., Wu, H.-C., Liu, H.-M., Hsieh, H.-H., Huang, Y.-T., & Lung, S.-C. C. (2017). An open framework for participatory PM2.5 monitoring

in smart cities. *IEEE Access*, *5*, 14441-14454. https://doi.org/10.1109/ACCESS.2017.2723919

Chen, L.-J., Hsu, W., Cheng, M., & Lee, H.-C. (2016). Demo: LASS: A location-aware sensing system for participatory PM2.5 monitoring. In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Ed.), *MobiSys '16 Companion: Proceedings of the 14th Annu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obile Systems, Applications, and Services Companion* (p. 98). New York, NY: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https://doi.org/10.1145/2938559.2938560

Chorianopoulos, K., Jaccheri, L., & Nossum, A. S. (2012). Creative and open software engineering practices and tools in maker community projects. In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Ed.), *EICS '12: Proceedings of the 4th ACM SIGCHI symposium on Engineering interactive computing systems* (pp. 333-334). New York, NY: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https://doi.org/10.1145/2305484.2305545

Cigliano, J. A., Meyer, R., Ballard, H. L., Freitag, A., Phillips, T. B., & Wasser, A. (2015). Making marine and coastal citizen science matter. *Ocean & Coastal Management*, *115*, 77-87. https://doi.org/https://doi.org/10.1016/j.ocecoaman.2015.06.012

Coletti, M., Hultquist, C., Kennedy, W. G., & Cervone, G. (2017). Validating Safecast data by comparisons to a U. S. Department of Energy Fukushima Prefecture aerial survey.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adioactivity*, *171*, 9-20. https://doi.org/https://doi.org/10.1016/j.jenvrad.2017.01.005

Conrad, C. C., & Hilchey, K. G. (2011). A review of citizen science and community-based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Issues and opportunities.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d Assessment*, *176*, 273-291. https://doi.org/10.1007/s10661-010-1582-5

De Paoli, S., & Storni, C. (2011). Produsage in hybrid networks: Sociotechnical skills in the case of Arduino. *New Review of Hypermedia and Multimedia*, *17*(1), 31-52. https://doi.org/10.1080/13614568.2011.552641

Dewey, J. (1986). Experience and Education. *The Educational Forum*, *50*, 241-252. doi:10.1080/00131728609335764

Diez, T., & Posada, A. (2013). The fab and the smart city: The use of machines and

technology for the city production by its citizens. In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Ed.), *TEI '13: Proceedings of the 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angible, Embedded and Embodied Interaction* (pp. 447-454). New York, NY: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https://doi.org/10.1145/2460625.2460725

Dixon, C., & Martin, L. (2014). Make to relate: Narratives of, and as, community practice. In Polman, J. L., Kyza, E. A., O'Neill, D. K., Tabak, I., Penuel, W. R., Jurow, A. S., O'Connor, K., Lee, T., & D'Amico, L. (Eds.), *Learning and becoming in practice: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Learning Sciences (ICLS) 2014* (pp. 1591-1592). Colorado, CO: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the Learning Sciences.

Dosemagen, S., & Gehrke, G. E. (2017). Civic technology and community science: A new model for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environmental decisions. *Liinc em Revista*, *13*, 140-161. http://dx.doi.org/10.18617/liinc.v13i1.3899

Dosemagen, S., Warren, J., & Wylie, S. (2011). Grassroots mapping: Creating a participatory map-making process centered on discourse. *Journal of Aesthetics Protest*, *8*.

Dougherty, D. (2012). The maker movement. *Innovations: Technology, Governance, Globalization*, *7*(3), 11-14.

-- (2013). The maker mindset. In M. Honey & D. E. Kanter (Eds.), *Design, make, play: Growing the next generation of STEM innovators* (pp. 7-11). New York, NY: Routledge.

Dreessen, K., & Schepers, S. (2018). Three strategies for engaging non-experts in a fablab. In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Ed.), *NordiCHI '18: Proceedings of the 10th Nordic Conference on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pp. 482-493). New York, NY: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https://doi.org/10.1145/3240167.3240195

Fischer, G. (2011). Understanding, fostering, and supporting cultures of participation. *Interactions*, *18*(3), 42-53. https://doi.org/10.1145/1962438.1962450

Fisher, D. K., & Gould, P. J. (2012). Open-source hardware is a low-cost alternative for scientific instrumentation and research. *Modern Instrumentation*, *1*(2), 8-20. https://doi.org/10.4236/mi.2012.12002

Fortun, K., & Fortun, M. (2005). Scientific imaginaries and ethical plateaus in

contemporary U.S. toxicology.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07*(1), 43-54. https://doi.org/10.1525/aa.2005.107.1.043

Gacek, C., & Arief, B. (2004). The many meanings of open source. *IEEE Software*, *21*(1), 34-40. https://doi.org/10.1109/MS.2004.1259206

Halverson, E. R., & Sheridan, K. (2014). The maker movement in education.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84*, 495-504. https://doi.org/10.17763/haer.84.4.34j1g68140382063

Hars, A., & Ou, S. (2002). Working for free? Motivations for participating in open-source projec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lectronic Commerce*, *6*(3), 25-39. https://doi.org/10.1080/10864415.2002.11044241

Harvie-Brown, J. A., & Cordeaux, J. (1880). Report on the migration of birds in the autumn of 1879. *Zoologist*, *4*, 161-204.

Hecker, S., Bonney, R., Haklay, M., Hölker, F., Hofer, H., Goebel, C., Gold, M., Makuch, Z., Ponti, M., Richter, A., Robinson, L., Iglesias, J. R., Owen, R., Peltola, T., Sforzi, A., Shirk, J., Vogel, J., Vohland, K., Witt, T., & Bonn, A. (2018). Innovation in citizen science—Perspectives on science-policy advances. *Citizen Science: Theory and Practice*, *3*(1), 4. http://doi.org/10.5334/cstp.114

Hemmi, A., & Graham, I. (2014). Hacker science versus closed science: Building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infrastructur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7*, 830-842. https://doi.org/10.1080/1369118X.2013.848918

Hertel, G., Niedner, S., & Herrmann, S. (2003). Motivation of software developers in open source projects: An Internet-based survey of contributors to the Linux kernel. *Research Policy*, *32*, 1159-1177. https://doi.org/10.1016/S0048-7333(03)00047-7

Ho, C.-C., Chen, L.-J., & Hwang, J.-S. (2020). Estimating ground-level PM2.5 levels in Taiwan using data from air quality monitoring stations and high coverage of microsensor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264*, 114810. https://doi.org/10.1016/j.envpol.2020.114810

Hsiung, A. C., Boyle, W. A., Cooper, R. J., & Chandler, R. B. (2018). Altitudinal migration: Ecological drivers, knowledge gaps, and conservation implications. *Biological Reviews*, *93*, 2049-2070. https://doi.org/10.1111/brv.12435

Hultquist, C., & Cervone, G. (2018). Citizen monitoring during hazards: Validation of Fukushima radiation measurements. *GeoJournal*, *83*, 189-206. https://doi.

org/10.1007/s10708-017-9767-x

-- (2019). Comparison of simulated radioactive atmospheric releases to citizen science observations for the Fukushima nuclear accident.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198*, 478-488. https://doi.org/10.1016/j.atmosenv.2018.10.018

Jiang, Q., Kresin, F., Bregt, A. K., Kooistra, L., Pareschi, E., van Putten, E., Volten, H., & Wesseling, J. (2016). Citizen sensing for improved urban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Journal of Sensors*, *2016*, 5656245. https://doi.org/10.1155/2016/5656245

Kalil, T. (2013). Have fun—learn something, do something, make something. In M. Honey & D. E. Kanter (Eds.), *Design. Make. Play. Growing the next generation of STEM innovators* (pp. 12-16). New York, NY: Routledge.

Kelly, R., Fleming, A., Pecl, G. T., Richter, A., & Bonn, A. (2019). Social license through citizen science: A tool for marine conservation. *Ecology and Society*, *24*(1). https://doi.org/10.2307/26796907

Kozinets, R. V. (1999). E-tribalized marketing? The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virtual communities of consumption. *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 *17*, 252-264. https://doi.org/https://doi.org/10.1016/S0263-2373(99)00004-3

Kresin, F. (2016). Smart cities value their smart citizens. In V. Mamadouh & A. van Wageningen (Eds.), *Urban Europe: Fifty tales of the city* (pp. 181-186).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Kuznetsov, S., & Paulos, E. (2010). Rise of the expert amateur: DIY projects, communities, and cultures. In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Ed.), *NordiCHI '10: Proceedings of the 6th Nordic Conference on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Extending Boundaries* (pp. 295-304). New York, NY: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https://doi.org/10.1145/1868914.1868950

Landrain, T., Meyer, M., Perez, A. M., & Sussan, R. (2013). Do-it-yourself biology: challenges and promises for an ope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ovement. *Systems and synthetic biology*, *7*(3), 115-126. https://doi.org/10.1007/s11693-013-9116-4

Mahajan, S. (2018). Internet of environmental things: A human centered approach. In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Ed.), *MobiSys PhD Forum'18: Proceedings of the 2018 Workshop on MobiSys 2018 Ph.D. Forum* (pp. 11-12). New York, NY: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https://doi.org/10.1145/321

2711.3212716

Mahajan, S., Chen, L.-J., & Tsai, T.-C. (2018). Short-term PM2.5 forecasting using exponential smoothing method: A comparative analysis. *Sensors*, *18*(10), 3223. https://www.mdpi.com/1424-8220/18/10/3223

Mahajan, S., Liu, H.-M., Tsai, T.-C., & Chen, L.-J. (2018). Improving the accuracy and efficiency of PM2.5 forecast service using cluster-based hybrid neural network model. *IEEE Access*, *6*, 19193-19204. https://doi.org/10.1109/ACCESS.2018.2820164

Maia Chagas, A. (2018). Haves and have nots must find a better way: The case for open scientific hardware. *PLOS Biology*, *16*(9), e3000014.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bio.3000014

Malone, T. W., Laubacher, R., & Dellarocas, C. (2009). Harnessing crowds: Mapping the genome of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MIT Sloan Research Paper No.4732-09*. Retrieved February 26, 2020, from http://dx.doi.org/10.2139/ssrn.1381502

Martin, L. (2015). The promise of the maker movement for education. *Journal of Pre-College Engineering Education Research*, *5*(1), 4. https://doi.org/10.7771/2157-9288.1099

McCallie, E., Bell, L., Lohwater, T., Falk, J. H., Lehr, J. L., Lewenstein, B. V., Needham, C., & Wiehe, B. (2009). *Many experts, many audiences: Public engagement with science and informal science education: A CAISE Inquiry Group Report*.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Advancement of Informal Science Education (CAISE). Retrieved February 26, 2020, from https://digitalcommons.calpoly.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011&context=eth_fac

McKinley, D. C., Miller-Rushing, A. J., Ballard, H. L., Bonney, R., Brown, H., Cook-Patton, S. C., Evans, D. M., French, R. A., Parrish, J. K., Phillips, T. B., Ryan, S. F., Shanley, L. A., Shirk, J. L., Stepenuck, K. F., Weltzin, J. F., Wiggins, A., Boyle, O. D., Briggs, R. D., Chapin, S. F., ... Soukup, M. A. (2017). Citizen science can improve conservation science,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208*, 15-28. https://doi.org/https://doi.org/10.1016/j.biocon.2016.05.015

Nake, F. (2013). Considering algorithmics and aesthetics. In J. Walter-Herrmann & C. Büching (Eds.), *FabLab: Of machines, makers and inventors* (pp. 79-92). https://

doi.org/10.14361/transcript.9783839423820.79

Newman, G., Wiggins, A., Crall, A., Graham, E., Newman, S., & Crowston, K. (2012). The future of citizen science: Emerging technologies and shifting paradigms. *Frontiers in Ec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 *10*, 298-304. https://doi.org/10.1890/110294

Nov, O. (2007). What motivates Wikipedians?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50*(11), 60-64. https://doi.org/10.1145/1297797.1297798

O'Reilly, T. (1999). Lessons from open-source software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42*(4), 32-37. https://doi.org/10.1145/299157.299164

O'Mahony, S. (2003). Guarding the commons: How community managed software projects protect their work. *Research Policy*, *32*, 1179-1198. https://doi.org/https://doi.org/10.1016/S0048-7333(03)00048-9

Oehlberg, L., Willett, W., & Mackay, W. E. (2015). Patterns of physical design remixing in online maker communities. In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Ed.), *CHI '15: Proceedings of the 33rd Annual ACM Conference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s* (pp. 639-648). New York, NY: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https://doi.org/10.1145/2702123.2702175

Pearce, J. M. (2012). Building research equipment with free, open-source hardware. Science, 337, 1303-1304.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1228183

Peppler, K., & Bender, S. (2013). Maker movement spreads innovation one project at a time. *Phi Delta Kappan*, *95*(3), 22-27. https://doi.org/10.1177/003172171309500306

Raddick, M. J., Bracey, G., Gay, P. L., Lintott, C. J., Murray, P., Schawinski, K., Szalay, A. S., & Vandenberg, J. (2010). Galaxy zoo: Exploring the motivations of citizen science volunteers. *Astronomy Education Review*, *9*(1). https://doi.org/10.3847/AER2009036

Rampell, A. (2010, August 8). Why Online2Offline commerce is a trillion dollar opportunity. *TechCrunch*. Retrieved February 26, 2020, from https://techcrunch.com/2010/08/07/why-online2offline-commerce-is-a-trillion-dollar-opportunity/

Reguera, P., García, D., Domínguez, M., Prada, M. A., & Alonso, S. (2015). A low-cost open source hardware in control education. Case study: Arduino-feedback ms-150. *IFAC-PapersOnLine*, *48*(29), 117-122. https://doi.org/https://doi.org/10.1016/

j.ifacol.2015.11.223

Retzbach, A., & Maier, M. (2015). Communicating scientific uncertainty: Media effects on public engagement with scienc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42*, 429-456. https://doi.org/10.1177/0093650214534967

Rheingold, H. (1993). *The virtual community: Finding commection in a computerized world*. London, UK: Addison-Wesley Longman.

Rosa, P., Ferretti, F., Guimarães Pereira, Â., Panella, F., & Wanner, M. (2017). *Overview of the maker movement in the European Union*. Luxembourg: 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Retrieved July 17, 2020, from https://op.europa.eu/en/publication-detail/-/publication/5d8dfbab-ca80-11e7-8e69-01aa75ed71a1/language-en

Safecast Map. (n.d.). Retrieved February 21, 2020, from https://safecast.org/tilemap/

Sîrbu, A., Becker, M., Caminiti, S., De Baets, B., Elen, B., Francis, L., Gravino, P., Hotho, A., Ingarra, S., Loreto, V., Molino, A., Mueller, J., Peters, J., Ricchiuti, F., Saracino, F., Servedio, V. D. P., Stumme, G., Theunis, J., Tria, F., ... Van de Bossche, J. (2015). Participatory patterns in an international air quality monitoring initiative. *PloS one*, *10*(8), e0136763-e0136763.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136763

Tan, M., Yang, Y., & Yu, P. (2016). The influence of the maker movement on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education. *World Transactions on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Education*, *14*(1), 89-94.

Taylor, N., Hurley, U., & Connolly, P. (2016). Making community: The wider role of makerspaces in public life. In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Ed.), *CHI '16: Proceedings of the 2016 CHI Conference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s* (pp. 1415-1425). New York, NY: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https://doi.org/10.1145/2858036.2858073

Tinati, R., Luczak-Roesch, M., Simperl, E., & Hall, W. (2017). An investigation of player motivations in Eyewire, a gamified citizen science project.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73*, 527-540. https://doi.org/https://doi.org/10.1016/j.chb.2016.12.074

von Krogh, G., & von Hippel, E. (2006). The promise of research on open source software. *Management Science*, *52*, 975-983. https://doi.org/10.1287/mnsc.1060.

0560

Weber, S. (2004). *The success of open sour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Wiley, D. (1998). *Defining the "open" in open content and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Retrieved February 26, 2020, from http://opencontent.org/definition/

Wylie, S. A., Jalbert, K., Dosemagen, S., & Ratto, M. (2014). Institutions for civic technoscience: How critical making is transforming environmental research.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30*, 116-126. https://doi.org/10.1080/01972243.2014.875783

Zhang, P., & Soergel, D. (2009, April). *Examining a comprehensive sensemaking model with user studies of computer-assisted sensemaking*. Paper presented at Sensemaking workshop at CHI 2009, Boston, MA.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11(2), pp. 221-258, July 2021

Maker Movement and Citizen Science: The Case of the AirBox Project

Tseng, Ching-Yueh*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Visual Arts, University of Taipei

Abstract

The study investigated this emerging concept, Maker Mov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of science in the digital age. The study examined the Air Box project developed in 2013 in order to illustrate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a participatory culture, including how makers coordinate together, how they make open source mashups, and how they merge the online with the offline.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maker culture encourages the open collaboration model of sharing. Creative inputs from different people can be integrated in various forms in digital spaces. This facilitates a new model of cultural production. Through creative practices, the public can participate more freely in scientific activities, thereby facilitating a bottom-up and more democratic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Keywords: citizen science, maker, AirBox, open source, maker movement

* Email: jingyueh@go.utaipei.edu.tw
Received: 2020.10.27
Accepted: 2021.3.26

JCRP 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舍我紀念館 Cheng She-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Ainosco Press

徵稿啟事

《傳播研究與實踐》在 2011 年 1 月出版創刊號，由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與舍我紀念館共同出版，是傳播研究社群與實務工作社群的共同園地；凡是符合本刊定位與特色的研究性論述，均歡迎投稿。每期並針對新聞傳播之關鍵議題，規劃專題，促進學術討論與交流。近日規劃中專題如下，截止日期已展延至 2021 年 9 月 1 日，歡迎各位共同參與。

■運動傳播——後疫情的重整與新視野

壹、定位與特色

《傳播研究與實踐》主要在提倡世新大學創校以來「學」與「術」並重，以及二者相互引領的對話精神。本刊之特色與使命如下：

一、提供華人傳播研究社群與實務工作社群對話平臺；

二、鼓勵傳播學術研究社群與實務工作社群之整合性、實證性、反思性、前瞻性之研究論述；

三、促進傳播學門內部不同系所以及與其他學門的知識匯流。

貳、本刊內容

一、研究論文：歡迎任何具原創性研究成果之完整論文（論文長度原則上為 12,000–25,000 字為主）投稿，來稿書寫方式必須符合學術論述格式；符合本刊定位與特色之研究成果將優先刊登。

二、專題論文／論壇：透過邀稿方式，每期針對學術研究社群與實務工作社群共同關切之議題，邀請學者專家從不同觀點撰文，進行理性的、多元的以及民主的觀念交流。除邀稿外，專題論文亦歡迎各界投稿。專題論文自 3 卷 2 期起，均依研究論文方式送雙匿名審查。

三、特邀論文：不定期邀請學者專家針對各期專題之主題或針對學術研究社群與實務工作社群共同關切之議題撰文。

四、研究紀要：研究議題重要且具前瞻性，能系統闡述特定領域相關文獻或最新變動情況，已通過審查但與一般論文的偏重不同，以研究紀要刊出。

五、典籍再現：不定期選擇對傳播研究社群或實務工作社群具備重大影響的經典著作，進行跨時空的詮釋和省思。典籍再現自 10 卷 2 期起，均依研究論文方式送雙匿名審查。

六、口述歷史：不定期刊出由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研究人員或本刊編輯規劃之口述歷史專題。

七、田野筆記／反思與實踐：針對當期專題論文／論壇題旨，邀請專家學者針對其個人田野經驗，分享反思與實踐之心路歷程。

參、審查制度

一、研究論文將送請 2–3 名學者專家進行匿名審查，匿名審查評審人選由本刊編輯委員會推薦。

二、本刊主編考量期刊定位和特色，對於通過匿名審查的來稿內容有建議修改權。

三、審查結果分為以下五種情況：

（一）刊登；

（二）修改後刊登；

（三）修改後再審；

（四）退稿。

（五）其他。

四、研究論文審查（包括編輯委員會內部審查、評審審查、主編審查、作者修改）約花費 3–6 個月。當兩名匿名審查者意見不同時，在以下兩種情況中，將送交第三位匿名審查員評審，再由編輯委員會決議是否刊登：

（一）刊登 vs. 退稿；

（二）修改後刊登 vs. 退稿。

肆、來稿須知

一、來稿格式請參考本刊網頁之最新論文體例。未提及之處，請自行參考《美國心理學會出版手冊》（*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第七版撰寫體例。

二、來稿採隨到隨審方式，無截稿日期；請勿一稿多投。稿件請儲存成「.doc」文件檔，並以「稿件名稱」作為文件檔名，透過本刊線上投稿系統上傳；上傳方式請參考首頁上的「使用說明」。若有疑問，歡迎寫信至本刊詢問，電子郵件：crpjour@gmail.com。

三、本刊只刊登原創性論文，凡已於國內外之刊物發表之論文，無論語文異同，請勿投寄；於國內外研討會發表之論文，請於會議結束並正式宣讀或發表後，再行投稿；同一稿件，請勿同時投遞多份刊物。一經發現，本刊即予撤稿。

四、「特邀論文」、「口述歷史」、「田野筆記／反思與實踐」文稿將由主編審查，再由編輯委員會通過後即可刊登。

五、論文一經刊出，致贈當期電子期刊 1 份，與該文 PDF 檔案。

伍、論文體例

請參閱本刊線上投稿系統：http://www.ipress.tw/J0014?pWebID=490

傳播研究與實踐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第11卷 第2期 2021年7月 Volume 11 Number 2 July 2021　　科技部TSSCI 期刊

出版者 | 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 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
Ainosco Press
Publisher | College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Shih Hsin University
Cheng She-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Ainosco Press

期刊地址 | 116臺北市文山區木柵路一段17巷1號
Add | No. 1, Ln. 17, Sec. 1, Muzha Rd., Wenshan Dist., Taipei City 116, Taiwan

電話 Tel | +886-2-22368225 ext. 83103
傳真 Fax | +886-2-22367150
電子信箱 E-mail | crpjour@gmail.com

華藝地址 | 234新北市永和區成功路一段80號18樓
Add | 18F., No. 80, Sec. 1, Chenggong Rd., Yonghe Dist., New Taipei City 234, Taiwan
電話 Tel | +886-2-29266006
傳真 Fax | +886-2-29235151
電子信箱 E-mail | press@airiti.com

國際標準期刊號 ISSN | 2221-1411
iPress | http://www.ipress.tw/J0014
Airiti Library | 電子期刊全文請上華藝線上圖書館，網址為
https://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alPublicationJournal?PublicationID=22211411

Copyright © 2021 by College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Shih Hsin University, Cheng She-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 Ainosco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Ainosco Press 訂閱單

傳播研究與實踐

發行公司：華藝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電話：+886-2-29266006 轉 8950
傳真專線：+886-2-29235151
郵寄地址：234634 新北市永和區成功路一段 80 號 18 樓
服務信箱：aporder@airiti.com
Ainosco Press 網站：http://www.ainoscopress.com/

個人訂閱價			圖書館／機關團體訂閱價		
	一期	一年		一期	一年
新臺幣	$ 350	$ 600	新臺幣	$ 700	$ 1400
歐洲	€ 31	€ 58	歐洲	€ 48	€ 96
美洲	US$ 36	US$ 66	美洲	US$ 56	US$ 112
亞太	US$ 33	US$ 60	亞太	US$ 53	US$ 106

訂閱	**卷**	**期**	**至**	**卷**	**期**		**數量**		**金額**	
臺灣郵寄處理費	印刷品一本平信 40 元，印刷品一本掛號 60 元。						**數量**		**金額**	
* 以上價格含稅							**總金額**			

注意事項

- 期刊將在付款後兩個營業天內寄出。
- 價格及建議出版日恕不另行通知可能變更。
- 機構團體是指圖書館、政府機構、公司使用者及公司以個人名義訂購。
- 個人訂戶是指單一個人使用而非以營利為目的者。
- 對於有意或無意扭曲「個人訂戶」一詞者，Ainosco Press 保留法律追訴權，並得求償損失。

訂閱者資料

個人姓名	
機關名稱	
發票抬頭及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傳真號碼
電子信箱	
收件地址	

付款方式：銀行匯款

帳戶資訊	戶名	華藝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銀行	玉山商業銀行 – 埔墘分行
	代碼	總行代碼：808；分行代碼：0174
	帳號	017 444 001 9696

付款後請傳真或回函本訂閱單，即完成訂閱。

Ainosco Press Subscription Form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You may subscribe to the journals by completing this form and sending it by fax or e-mail to

Address: 18F., No. 80, Sec. 1, Chenggong Rd., Yonghe Dist., New Taipei City 234634, Taiwan (R.O.C.)
Tel: +886-2-29266006 ext. 8950 E-mail: aporder@airiti.com
Fax: +886-2-29235151 Website: http://www.ainoscopress.com

PERSONAL			LIBRARIES / INSTITUTIONS		
	1 Issue	1 Year		1 Issue	1 Year
Europe	€ 31	€ 58	Europe	€ 48	€ 96
US/CA	US$ 36	US$ 66	US/CA	US$ 56	US$ 112
Asia/Pacific	US$ 33	US$ 60	Asia/Pacific	US$ 53	US$ 106

Vol.		No.	–	Vo.		No.			Copies		Price US$	
* Postage is not included in the price.											TOTAL US$	

PLEASE NOTE

- Issues will be sent in two business days after receiving your payment.
- Please note that all orders must be confirmed by fax or email.
- Prices and proposed publication dates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 Institutions include libraries, government offices, businesses, and for individuals where the company pays for the subscription.
- Personal rates are available only to single-user personal subscribers for personal and non-commercial purposes.
- Ainosco Press reserves its right to take appropriate action to recover any losses arising fromany intended or unintended misrepresentation of the term "Personal Subscriber."

BILLING INFORMATION

Name	
Company	
TEL	FAX
E-mail	
Shipping Address	

INTERNATIONAL PAYMENTS VIA DIRECT BANK TRANSFER

Beneficiary	AIRITI INC.
Address	18F., No. 80, Sec. 1, Chenggong Rd., Yonghe Dist., New Taipei City 234634, Taiwan (R.O.C.)
Bank Name	E.Sun Commercial Bank, Ltd. Puchien Branch
Account No.	017 444 100 6149
Swift Code	ESUNTWTP
Bank Address	No. 188, Sec. 2, Sanmin Rd., Banqiao Dist., New Taipei City 220736, Taiwan (R.O.C.)